

列宁全集

列宁全集

第二十五卷

1917年6—9月

人民出版社

列 宁 全 集

第 二 十 五 卷

*

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朝阳门大街320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号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 印张 16 $\frac{3}{8}$ · 插页 6 · 字数 361,000

1958年5月第1版

1963年7月北京第3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01·359 定价（四）1.70元

“列宁全集”中文版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定，由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依照“列宁全集”俄文第四版译出的。“列宁全集”俄文版是根据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和苏联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决定出版的，其第四版是由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编辑、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于1941年开始出版的。

第二十五卷說明

“列宁全集”第二十五卷包括列宁在准备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时期(1917年6月至9月)的著作。

本卷載有列宁在全俄工兵代表苏維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兩篇演說。在这兩篇演說中,以及在“思想混乱和惊惶失措的人們”、“矛盾的立場”、“六月十八日”、“革命、进攻和我們的党”、“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維克把革命引导到哪里去?”、“階級变动”这些文章中,列宁揭穿了临时政府的反革命政策及孟什維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妥协行为,論証了布尔什維克为解决革命的基本問題而斗争的綱領,并闡明了只有苏維埃政权才能使国家摆脱战争和經濟破坏,才能爭得和平,把土地交給农民。

在“政治形勢”、“論口号”、“論立宪幻想”和“革命的教訓”这几篇文章中,列宁根据在7月3—5日的事变以后已經急剧轉变的国内政治形勢,拟定了布尔什維克党的新策略。

在“大难临头,出路何在?”一文中,列宁說明了布尔什維克党的經濟綱領,并得出結論說,無产階級革命是能够拯救国家、使它避免即将临头的灾祸的唯一手段。

編入本卷的还有列宁的名著“国家与革命”,在这部著作中,列宁發展了馬克思关于国家的学說,并且捍衛了这一学說,不讓机会主义者歪曲它和把它庸俗化。

本卷包括 7 篇第一次編入“列寧全集”的文章。在“为制止革命而結成的联盟”、“俄国革命的对外政策”、“执政的和負責的党”这些文章中，列寧說明了临时政府是資本家同孟什維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为消灭革命而結成的联盟，說明了执政的妥协的政党的罪过是实行反革命的对內对外政策，使灾祸日益迫近。列寧在“罗将柯怎样为自己辯护”一文中，揭穿了前第四届国家杜馬主席罗将柯对奸細馬林諾夫斯基的包庇行为。在“是不是新的德雷福斯案件？”、“感謝李沃夫公爵”两篇文章中，列寧揭穿了克倫斯基政府在反对布尔什維克的斗争中所采取的挑衅手段。列寧在“全部政权归苏維埃！”一文中，論証了布尔什維克党关于全部国家政权归苏維埃的口号。

編入本卷的列寧在 1917 年 7 月事变以后一段时期的一切著作，都是列寧在秘密状态下写成的，当时他不得不隱藏起来，躲避临时政府的迫害。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目 录

第二十五卷說明IX—X

1917年6—9月

全俄工兵代表苏維埃第一次代表大会(1917年6月3—24日 (6月16日—7月7日))	1—26
一、关于对临时政府的态度的演說(6月4日〔17日〕)	1
二、关于战争的演說(6月9日〔22日〕)	13
經濟破坏和無产階級同它的斗争	27—29
資本家的第一千零一次的謊話	30—31
六三派頑固分子主张立即进攻	32—34
为制止革命而結成的联盟	35—37
感激之至	38
有沒有通向公正的和平的道路?	39—40
論人民公敌	41—42
短評	43
“大撤退”	44—46
就本質論战的益处	47—48
輕信的流行病	49—50
天上的仙鶴不如手中的家雀	51

实行社会主义还是揭露盗窃国庫的行为?	52—54
思想混乱和惊惶失措的人們	55—57
暗示	58—59
“扰乱人心的謠言”	60
謎	61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及布尔什維克 党团委员会就禁止游行示威向全俄苏維埃代表 大会提出的声明草案	62—63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委员会會議上 关于取消游行示威的發言(1917年6月11日(24日))	64—66
轉变前夕	67—68
給編輯部的信	69
俄国革命的对外政策	70—72
矛盾的立場	73—75
乌克兰	76—77
什么是現在和“将来”卡維涅克分子产生的阶级 根源?	78—81
怎样同反革命作斗争	82—83
乌克兰問題和俄国执政党的失敗	84—86
惩办包庇奸細的罗将柯和鐘柯夫斯基	87
莫名其妙的歪曲	88—89
执政的和負責的党	90—92
又是一个委员会	93—94
六月十八日	95—97
革命、进攻和我們的党	98—100

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維克先生們，你們同普列汉諾夫 的區別究竟在哪里？	101
罗将柯怎样为自己辯护	102
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維克把革命引导到哪里去？	103—105
用“雅各宾主义”能够吓倒工人階級嗎？	106—108
論建立俄国农業工人工会的必要性	109—113
第一篇文章	109
第二篇文章	111
松懈的革命	114—117
階級变动	118—120
革命毅力的奇迹	121—123
空話与事实	124—126
資本家先生們是怎样把利潤隱藏起来的 (关于監督的問題)	127—128
危机日益逼近，破坏日益严重	129—131
怎么办？	132—133
他們是怎样欺騙和为什么要欺騙农民的？	134—136
誰的責任？	137—138
立宪民主党人退出內閣是指望什么？	139—140
全部政权归苏維埃！	141—142
政权在哪里？ 反革命在哪里？	143—147
黑帮报纸和阿列克辛斯基的卑鄙誹謗	148—149
誹謗和事实	150—151
接近了本質	152
是不是新的德雷福斯案件？	153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委员会执行委员会通告	154
德雷福斯案件重演	155—157
辟謠	158
三次危机	159—163
关于布尔什维克领袖出庭受审的问题	164—165
政治形势	166—168
給“新生活报”編輯部的信	169—170
給“無产階級事業报”編輯部的信	171—172
論口号	173—180
感謝李沃夫公爵	181—183
論立宪幻想	184—198
一	185
二	188
三	192
答复	199—210
一	199
二	207
三	209
拿破侖主义的开始	211—215
革命的教訓	216—230
一	216
二	218
三	219
四	221
五	221
六	223

七	226
八	227
九	228
后記	229
論加米涅夫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上关于斯德哥尔摩	
代表會議的發言	231—233
关于陰謀的謠言	234—241
只見树木不見森林	242—247
政治訛詐	248—251
紙上的決議	252—255
論斯德哥尔摩代表會議	256—265
政論家札記 (农民和工人)	266—274
論誹謗者	275—276
給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信	277—281
政論家札記	282—292
1. 禍根	282
2. 徭役制和社会主义	290
党綱問題	293—294
齐美尔瓦尔得問題	295—296
关于在群众組織中违反民主的現象	297—298
論妥协	299—305
关于目前政治形势的決議草案	306—311
大难临头, 出路何在?	312—356
飢荒逼近	312
政府不起任何作用	315

監督是众所周知和輕而易舉的辦法	318
銀行國有化	320
辛迪加國有化	325
取消商業秘密	329
強迫合併成聯合組織	333
調節消費	336
政府破壞民主組織的工作	339
財政破產和挽救的辦法	343
害怕走社會主義道路能不能前進呢?	346
消除經濟破壞和戰爭問題	350
革命民主派和革命無產階級	353
革命的一個根本問題	357—364
怎樣保證立憲會議的成功 (關於出版自由)	365—370
國家與革命 (馬克思主義關於國家的學說與無產階級在革命中 的任務)	371—478
初版序言	371
再版序言	372
第一章 階級社會和國家	373
1. 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	373
2. 特別的武裝隊伍, 監獄等等	376
3. 國家是剝削被壓迫階級的工具有	379
4. 國家“消亡”和暴力革命	382
第二章 國家與革命 1848—1851年的經驗	388
1. 革命的前夜	388
2. 革命的總結	392
3. 1852年馬克思對問題的提法	398

第三章 国家与革命 1871年巴黎公社的经验	
马克思的分析	400
1. 公社社员这次尝试的英雄主义何在?	400
2. 用什么东西来代替被打碎的国家机器呢?	404
3. 议会制的消灭	408
4. 民族统一的建立	414
5. 消灭寄生虫式的国家	417
第四章 续前 恩格斯的补充说明	419
1. “住宅问题”	419
2. 同无政府主义者的论战	422
3. 给倍倍尔的信	426
4. 爱尔福特纲领草案批判	429
5. 1891年为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所写的序言	435
6. 恩格斯论民主制的消除	441
第五章 国家消亡的经济基础	443
1. 马克思对这个问题的提法	443
2. 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	446
3. 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	451
4. 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	454
第六章 马克思主义被机会主义者庸俗化了	461
1. 普列汉诺夫与无政府主义者的论战	462
2. 考茨基与机会主义者的论战	463
3. 考茨基与潘涅库克的论战	470
初版跋	479
注释	480—503
列宁生平事业年表	504—510

譯后記	511
-----------	-----

插 圖

1917年8月列宁的“关于陰謀的謠言”手稿第1頁	235
1917年8月30日(9月12日)列宁給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中央委员会的信的第1頁	279
1917年9月10—14日(23—27日)列宁的“大难临头, 出路何在?”手稿第1頁	313
1917年8—9月列宁的“国家与革命”手稿第1頁	372—373

全俄工兵代表苏維埃 第一次代表大会¹

(1917年6月3—24日〔6月16日—7月7日〕)

关于对临时政府的态度演說

(6月4日〔17日〕)

同志們，在給我的短短的時間里，我只能談一談執行委員會報告人和后面發言的幾位同志提出的一些基本的原則問題，我想這樣好一些。

擺在我們面前的第一個基本問題，就是我們現在出席的是什麼會議，現在召開全俄代表大會的蘇維埃是怎麼一回事，人們為了掩蓋自己毫不了解革命民主制並且完全背棄了它，就在這裡大談特談的革命民主制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在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上談論革命民主制，但是抹殺這個組織的性質、階級成分和它在革命中的作用，對這些問題一字不提，同時卻以民主派自居，真是怪事。他們把西歐所有的資產階級議會制共和國的綱領給我們描述了一番，把現在所有的資產階級政府（我國政府也在內）都承認的改革綱領給我們描述了一番，同時卻又對我們談革命民主制。他們是在什麼人面前說這些話呢？是在蘇維埃面前。那我就來問問你

們，在歐洲哪一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里有這種多少有點像蘇維埃的機關呢？你們一定會回答說：沒有。這種機關任何地方都沒有，也不可能，因為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資產階級政府，以及剛才向我們描述的、在所有國家里都提過幾十次但仍然是一紙空文的改良“計劃”，或者是人們現在都向它提出自己的要求的機關，革命創造出來的新型的“政府”。這樣的政府只是在革命巨大高潮的年代有過先例，例如 1792 年和 1871 年在法國、1905 年在俄國。蘇維埃，這是任何一個通常的資產階級議會制國家都沒有的機關，而且決不可能與資產階級政府同時存在。這是我們在黨的決議中把它叫做農民—無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的那種更民主的新式國家，在這樣的國家里，唯一的政權是屬於工兵代表蘇維埃的。如果認為這是一個理論問題，如果認為可以避而不談這個問題，或者想用現在有某種機關正和工兵代表蘇維埃同時存在的事實來支吾搪塞，那都是徒勞無益的。不錯，它們是同時存在的。但正是由於這種情形，才發生了空前多的誤會、衝突和摩擦。正是由於這種情形，俄國革命在第一次高漲、第一次前進之後發生了停滯，發生了現時在我國聯合政府中、在一切對內對外政策中因準備帝國主義的進攻而表現出來的那種倒退現象。

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成立通常的資產階級政府，這樣就不需要農民、工人、士兵等等的蘇維埃了，它們不是被那些手裡有軍隊、從來不注意克倫斯基部長演說的反革命將軍解散，便是無聲無臭地消滅。這些機關沒有別的道路可走，不能後退，也不能停在原地，只有前進才能生存。這種國家形式不是俄國人空想出來的，而是革命創造出來的，因為沒有它，革命便不能勝利。在全俄蘇維埃內部，各政黨間必然會發生摩擦和爭奪政權的鬥爭。但是各種可

能产生的錯誤和幻想是要由群众根据亲身政治經驗来消除的（喧声），而不是部长們做做报告，根据他們昨天說的、明天写的、后天要許的諾言就能消除的。同志們，从俄国革命創立的、現在能不能存在还成問題的机关看来，这是很可笑的。苏維埃不能够按照現在的样子繼續存在下去。工人和农民又不是小孩子，竟要开会通过那些沒有任何根据的決議，听那些沒有任何根据的报告！这样的机关是向一种新型的共和国过渡的机关，这种共和国将不是口头上而是实际上的沒有警察和常备軍的坚强政权，这样的政权在西欧还不能存在，而俄国革命沒有这种政权就不能取得胜利，就不能战胜地主和帝国主义。

沒有这样的政权，就談不到我們自己会取得这样的胜利，并且愈深入地研究人們在这里向我們建議的綱領和我們面临的事实，二者之間的基本矛盾就愈清楚地显现出来。像报告人和其他發言的人所說的一样，人們都說第一次成立的临时政府真糟糕！以前布尔什維克，命运多乖的布尔什維克說“不給这个政府任何支持和信任”的时候，人們紛紛責罵我們是“無政府主义者”，現在大家都說以前的政府很糟糕，可是由准社会主义者当部长的联合政府又怎样呢？它和以前的政府有什么区别呢？难道空談綱領、草案还談得不够嗎？难道还不到实行的时候嗎？从5月6日联合政府成立以来，一个月已經过去了。請大家看看事实，看看俄国和所有卷入帝国主义战争的国家經濟破坏的情形吧。怎么会發生經濟破坏呢？这是資本家的掠夺造成的。这是真正的無政府状态。这是報紙上公开承認的事实，而且并不是我們的報紙，并不是什么布尔什維克的報紙，老天在上，而是內閣派的“工人报”²。这个報紙上說：“革命”政府提高了煤炭的工業价格！联合政府也絲毫沒有改变

这种状况。有人說，俄国是否可以立刻实行社会主义，是否可以立刻全面地进行根本的改造。同志們，这些都是空話。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学說，正像他們經常闡述的那樣：“我們的学說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³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沒有而且在战争期間也不可能有向純粹的社会主义过渡的純粹的資本主义，只有某种中間的、新的、前所未有的东西，因为几万万入卷入了資本家之間的罪恶战争，他們正处在生死的关头。問題不在于答应进行一些改革——这是空話——問題在于去做我們現在所需要的事情。

如果你們想拿“革命的”民主制做借口，那就請把这个概念同資本家內閣的改良主义民主制清楚地区别开来，因为現在应当抛掉“革命民主制”的空談，不再拿“革命民主制”来互相庆賀，現在應該是按馬克思主义和一般科学社会主义教导我們的那樣来作阶级评价的时候了。人們建議我們实行資本家內閣的改良主义民主制。也許从西欧通常的范例来看，这很好。可是，現在許多国家处在灭亡的前夕，那些实际的办法似乎正像上面發言的邮电部长先生所說的那樣，复杂得簡直难于实行，必須特別加以研究，——其实这些办法是十分清楚的。他說，俄国沒有一个政党会表示决心要夺取全部政权。我回答說：“有的！任何一个政党都不会放弃这样做，我們的党也一样，它随时都准备夺取全部政权。”（掌声，笑声）你們尽可以随便發笑，但是，如果部长先生在这个問題上把我們和右派政党相提并論，那他一定会得到应有的回答。任何一个政党都不会放弃这一点。在还有自由的时候，在逮捕和流放西伯利亚等等威胁——这些威胁来自同我們的准社会主义者部长們共事的反革命分子——还只是威胁的时候，任何一个政党都会說：相信我們吧，我們會拿出我們的綱領的。

我們 4 月 29 日的代表會議已經提出我們的綱領⁴。可惜人們不重視這個綱領，不按這個綱領去做。看來需要對這個綱領作一番通俗的解釋。現在我竭力把我們的決議、我們的綱領向郵電部長先生作一番通俗的解釋。我們綱領中關於挽救經濟危機的辦法就是：要求立刻——不要拖延——公布資本家所獲得的高達 500—800% 的駭人聽聞的利潤。他們的這些利潤並不像“純粹”資本主義制度下的資本家那樣是在自由市場上獲得的，而是靠軍事訂貨獲得的。這才是真正需要而且可能實行工人監督的地方。這就是你們這些自稱為“革命”民主派的人應該代表蘇維埃實行的辦法，而且可以立刻實行。這不是社會主義。這是讓人民看清什麼是真正的無政府狀態，什麼是玩弄帝國主義的把戲，玩弄人民財產、玩弄幾十萬人生命的行為。這幾十萬人明天就會因我們繼續扼殺希臘而喪命的。把資本家老爺們的利潤公布出來吧，逮捕 50—100 個最大的百萬富翁。哪怕是以軟禁尼古拉·羅曼諾夫的優待條件拘留他們幾個星期也行，這樣做只有一個目的，就是迫使他們說出各種綫索、騙人的把戲、卑鄙醜態自私自利的勾當，這些東西使我國甚至在新政府管理下每天也得損失千千萬萬的財富。這就是無政府狀態和經濟破壞的基本原因，因此我們說：我國一切都是老樣子，聯合政府並沒有改變什麼東西，只是多了一大堆宣言和動聽的聲明而已。不管人們多么誠懇，不管他們多么誠懇地希望勞動者過好日子，但是情況並沒有改變，掌握政權的仍舊是原來那個階級。現在實行的政策並不是民主政策。

人們對我們說，要使“中央政權和地方政權民主化”。難道你們真不知道這些話只有對俄國才是新鮮的嗎？在其他國家不是已經有幾十個准社會主義者部長向全國許過這樣的諾言了嗎？我們

面前摆着活生生的具体事实：地方政权机关由居民选举，而中央却硬要指定人选或规定地方政权机关的人选必须經中央批准，这样来破坏起码的民主，試問这些諾言还有什么意义呢？資本家还在盜窃人民的财产。帝国主义战争还在进行。而人們却答应我們改革，改革，改革，这些改革在現在这个范围内根本不能实现，因为战争压倒一切，决定一切。有人說，战争并不是为了資本家的利潤。你們为什么不同意这种說法呢？标准何在呢？这首先在于哪一个階級当权，哪一个階級繼續做主，哪一个階級繼續利用銀行業務和財政業務榨取几千亿的利潤。这个階級仍然是資產階級，因此战争仍然是帝国主义战争。第一次成立的临时政府也好，由准社会主义者担任部长的政府也好，都沒有改变任何东西：秘密条約还是秘密条約，俄国还是为爭夺海峽而战，为繼續貫徹利亚霍夫对波斯的政策⁵等等而战。

我知道，你們不希望这样做，你們当中大多数人都不希望这样做，部长們也不希望这样做，因为决不会希望去做这种杀害几万万条人命的事情。可是讓我們看一看米留可夫和馬克拉柯夫之流現在大談特談的进攻吧。他們完全懂得这是怎么一回事；他們知道，这同政权問題、革命問題有关。有人說，應該把政治問題和战略問題区别开来。提出这样的問題是很可笑的。立宪民主党人明明知道現在摆着的問題是政治問題。

至于說从下面發动的爭取和平的革命斗争可能导致单独媾和的結局，这是誣蔑。如果我們掌握政权，那我們要实行的第一个步驟就是逮捕資本巨头，斬断他們进行陰謀活动的一切綫索。否則，說多少不割地不賠款的和平也都是空話。我們所要实行的第二个步驟就是把各国人民和他們的政府分开，单独向人民宣布：我們認

为所有的资本家都是强盗，不论是捷列申柯——捷列申柯丝毫不比米留可夫好些，不过比他稍微蠢些，——还是法国的、英国的和其他一切国家的资本家。

你们自己的“消息报”⁶弄糊涂了，不说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而提议保持 status quo[⊖]。不，我们不是这样理解“不割地”的和平的。甚至农民代表大会⁷在这个问题上都比较接近真理，它谈到了要建立“联邦”共和国，这就是说，俄罗斯共和国不愿意用新的或旧的方式压迫任何一个民族，不愿意用暴力强迫任何一个民族，无论是芬兰或乌克兰，都要与它同居共处，而陆军部长却向芬兰和乌克兰百般挑衅，造成不能容许的冲突。我们所希望的是一个有坚强政权的、统一而不可分割的俄罗斯共和国，但是这个坚强的政权是要各族人民自愿才能建立起来的。“革命民主”是庄严的字眼，可是被人用在卑鄙地向乌克兰和芬兰挑衅、使问题复杂化的政府身上了！其实乌克兰和芬兰并不愿意分离，只不过是说，不要把起碼的民主拖延到立宪会议召开时才实行罢了。

只要你们不放弃自己的割地，就不能缔结不割地不赔款的和约。要知道，这是很可笑的，这是一种把戏，欧洲每个工人都会嘲笑说：他们口头上说得很漂亮，号召各国人民打倒银行家，而自己却把本国银行家送进内阁去。逮捕银行家，拆穿他们的把戏，查出各种线索，这些事情你们都没有做，尽管你们拥有不容抗拒的权力机关。你们经历了1905年和1917年，你们知道，革命是不能预定的，其他国家的革命都是通过流血起义的艰苦道路干起来的，而在俄国没有一个团体、一个阶级能够同苏维埃政权抗衡。在俄国，这个革命可能例外地成为和平革命。这个革命如果立刻同一切资本

⊖ 意即现状，这里是指战前状况。——编者注

家階級決裂，立刻向各國人民提議和平，那末在極短時期內就會得到法國人民和德國人民的贊同，因為這些國家快要滅亡了，因為德國已經陷於絕境而不能自拔，因為法國……

（主席說：“您發言的時間到了。”）

再有半分鐘我就講完了……（喧聲，會場上有人請求繼續講下去，有人反對，有人鼓掌。）

（主席說：“我向大會征求意见，主席團建議延長發言時間，誰反對？大多數贊成延長。”）

我剛才談到，假如俄國的革命民主派不是口頭上的民主派，而是真正的民主派，那它就會推動革命前進，而不是同資本家妥協，不是空談不割地不賠款的和平，而是取消俄國自己的割地，並且公開宣布，它認為任何兼併都是犯罪的強盜行為。這樣才能避免因瓜分波斯和巴爾干而使千百萬人受死亡威脅的帝國主義的進攻。這樣才能開辟通向和平的道路。我們並不認為這條道路是一條平坦的道路，它並不排斥真正的革命戰爭。

我們提出這個問題，並不像巴札羅夫今天在“新生活報”⁸上提出的那樣；我們只是說，俄國現在的情況使它在帝國主義戰爭結束時要執行的任務比原來想像的要容易一些。俄國的地理條件非常好，假如列強敢於憑它的資本、憑資本掠奪來的利益來反對俄國工人階級和同它聯合的半無產階級即貧農，那末這將是它們最困難的任務。德國已經到了死亡的邊緣，美國想吞併墨西哥，大概很快就要同日本打起來，在美國參戰以後，德國的情況更加不可收拾了，它一定會被消滅的。法國的地理位置使它遭受的苦難最多，使它疲憊不堪。這個國家的飢荒雖然沒有德國厲害，但人力的損失比德國大得多。如果你們第一步先限制俄國資本家的利潤，剝奪

他們榨取几万万利潤的一切可能性，如果你們向 各 国 人 民 提 議 和 平，反 对 一 切 国 家 的 資 本 家，并 且 公 开 声 明，你 們 决 不 同 德 国 資 本 家 以 及 一 切 直 接 或 間 接 縱 容 他 們 或 者 同 他 們 勾 結 在 一 起 的 人 进 行 任 何 談 判 和 發 生 任 何 关 系，决 不 同 英 法 資 本 家 談 判，那 末 你 們 才 会 在 工 人 面 前 斥 責 他 們。你 們 也 就 不 会 把 發 給 麦 克 唐 納 出 国 护 照 这 件 事⁹ 看 成 是 一 个 胜 利，麦 克 唐 納 从 来 沒 有 进 行 过 反 对 資 本 的 革 命 斗 爭，允 許 他 出 国，是 因 为 他 沒 有 表 示 过 反 对 英 国 資 本 家 的 革 命 斗 爭 的 思 想、原 則、实 践 和 經 驗，而 我 們 的 馬 克 林 同 志 和 其 他 几 百 个 英 国 社 会 主 义 者 就 是 因 为 进 行 这 个 斗 爭 而 坐 牢 的，我 們 的 李 卜 克 內 西 同 志 也 是 因 为 这 个 緣 故 而 坐 牢 的，他 被 关 在 苦 工 牢 里 就 是 因 为 他 說 过：“德 国 士 兵 們，向 你 們 自 己 的 凱 撒 开 槍 吧。”

临时政府的大多数委員在特別召开的第三届杜馬會議上（我不知道这届杜馬算是第三届还是第四届），每天都揚言要把我們送去做苦工，司法部也正在拟定关于这一問題的新法令草案，其实，把帝国主义者資本家送去做苦工豈不更正确嗎？馬克林和李卜克內西才是把反帝国主义的革命斗爭思想付諸实现的社会主义者。他們說的就是应当向各国政府說的話。为了爭取和平，必須向各国人民控訴各国政府。这样，你們就能使一切帝国主义政府陷于混乱的境地。現在你們自己却陷于混乱的境地了，因为你們一方面在3月14日向人民發表的和平宣言¹⁰上說：“推翻你們的皇帝、你們的国王和你們的銀行家吧”，但另一方面，我們虽然掌握了工兵代表苏維埃这样一种空前未有的、数量多、經驗丰富、有强大的物質力量的組織，却同我們的銀行家訂立联盟，成立准社会主义者的联合政府，还拟定一些在欧洲已經写了几十年的改良草案。欧洲在嘲笑这种爭取和平的斗爭。只有苏維埃夺取了政权并且采取

革命行动的时候，欧洲人才能了解这种斗争。

現在世界上只有一个国家能够以阶级的规模反对资本家，能够采取不经过流血革命而停止帝国主义战争的步骤。这样的国家只有一个，那就是俄国。只要工兵代表苏维埃存在一天，俄国就始终是这样的国家。苏维埃不可能同普通形式的临时政府长期共存。只有不实行进攻，苏维埃才能存在下去。转入进攻是俄国革命的整个局面的转变，即从期待和平，从准备由下面举行革命起义来获得和平，转为恢复战争。从一条战线上的士兵联欢，进到所有战线上的士兵联欢，从冒着服苦役的危险用面包皮同饥饿的德国无产者交换铅笔刀的自发联欢，进到自觉的联欢，这就是已经显示出来的道路。

我们把政权拿到了自己手里，我们就要制裁资本家，那时，战争就不是现在所进行的这种战争了，因为战争的性质是由哪个阶级进行战争来决定的，而不是由纸上写的什么东西来决定的。在纸上随便什么东西都可以写的。只要资本家阶级在政府中占大多数，那末无论你写什么，无论你说得多漂亮，无论有多少准社会主义者当部长，战争还是帝国主义战争。这是大家都知道、都看到的。阿尔巴尼亚的例子，希腊和波斯¹¹的例子，都最明显不过地表明了这一点，所以我很奇怪，为什么大家都攻击我们关于进攻问题的书面声明¹²，可是没有人举出一个具体的例子！答应拟定一些方案是容易办到的，而具体的措施总是拖延不实行。草拟关于不割地的和平的宣言是容易的，但是要知道，阿尔巴尼亚、希腊和波斯的事件却是在联合政府成立以后发生的。“人民事业报”¹³关于这些事件写道：扼杀希腊是对俄国民主制的侮辱。大家都知道，这个报纸不是我党的机关报，它是政府的机关报，部长的机关报。米留可夫，这个被你们当做大人物看待的米留可夫，其实不过是他们

党里一个普通党员，他跟捷列申柯没有任何区别，连他也写道，协约国的外交扼杀了希腊。战争仍然是帝国主义战争，因此不管你们多么愿意和平，不管你们多么真诚地同情劳动者，也不管你们多么真诚地希望和平，——我完全相信，群众对和平的愿望不会不是诚恳的——但你们还是无能为力的，因为除了继续推进革命以外，没有其他办法能够结束战争。俄国革命一开始，来自下面的争取和平的革命斗争也就开始了。如果你们掌握了政权，如果革命机关掌握了政权，并且用它来进行反对俄国资本家的斗争，那时你们就会得到其他国家劳动者的信任，就可以提议和平。那时我们的和平至少可以从两方面得到保证，即从筋疲力尽、大势已去的两个国家德国和法国方面得到保证。如果那时的形势使我们不得不进行革命战争，——这一点谁也不知道，我们也不能担保不会有这种情形发生——那我们就会说：“我们不是和平主义者，如果革命阶级掌握了政权，如果它真正消除了资本家对施政方针的任何影响，使他们无法扩大经济破坏，无法获得几万万利润，那我们是不拒绝进行战争的。”革命政权会向一切国家的人民宣布说，各国人民都应该是自由的，德国人民不应该为保有亚尔萨斯和洛林而战，法国人民也不应该为保有法国的殖民地而战。因为法国如果为它的殖民地而战，俄国也有希瓦和布哈拉，这也是类似殖民地的地区，那时就会开始瓜分殖民地了。怎样进行瓜分，按照什么标准呢？按照力量。而力量已经起了变化，资本家已经除了战争别无他路可走了。一旦你们取得革命政权，你们就可以通过革命道路来达到和平：向各国人民发出革命号召，用你们的事例来说明策略。那时在你们面前就会展开一条用革命方法取得和平的道路，你们就很有可能使几十万人免于死亡。那时你们就可以肯定，德国人民和法国人民是拥护你们的。即使英美日的资本家想进行反对革命工

人階級的戰爭，但是由於資本家已經被制服、被排除，監督權轉到了工人階級手中，使工人階級的力量增加 10 倍，他們 99% 是進行不了的。你們只要聲明你們不是和平主義者，你們要保衛自己的共和國，保衛工人的無產階級的民主制不受德國、法國和其他國家資本家的侵犯，只要做到這一點，就能够保證和平了。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認為我們關於進攻問題的聲明具有根本的意義。整個俄國革命史上的轉變關頭已經到來了。俄國革命開始時，英國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幫助了它，英國資產階級以為俄國是同中國和印度相似的国家。可是，俄國除了地主和資本家占大多數的政府外，還產生了蘇維埃這種按力量來說是世界上空前未有的代表機關，雖然你們參加資產階級聯合政府的行動使它受到了損害。而且俄國革命還使下層群眾反對資本家政府的革命鬥爭在各個国家中都獲得了極大的同情。現在的問題是：前進還是後退。革命時期停留在原地不動是不可能的。因此，從政治、經濟的意義來說，而且從政策的意義來說，進攻是敵人換取革命的權衡之計。

二

关于战争的演說

(6月9日〔22日〕)

同志們，为了分析战争問題，讓我們先来看看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蘇維埃3月14日向各国發出的宣言中的两段話。在这个宣言中說：“起来同各国政府的侵略意圖坚决斗争的时候已經到了，各国人民自己来解决战争与和平問題的时候已經到了。”宣言的另一段話是对德奧同盟国的無产者說的：“別再給国王、地主和銀行家充当侵略和压迫的工具了。”这两段話的意思用各种各样的說法在俄国工人和农民的几十、几百以至几千个決議中重复着。

我認为，这两段話最清楚不过地表明革命工农因孟什維克和民粹主义者的現行政策而陷入了十分混乱的矛盾的境地。他們一方面支持战争，另一方面又屬于对各国政府的侵略意圖不感兴趣的階級，因此他們不能不这样說。这种心理和意識無論怎样模糊不清，差不多在每个工人和农民心中都是根深蒂固的。他們意識到战争是由各国政府的侵略意圖造成的。但并不是十分清楚地了解或者甚至不了解，一个政府不管它的統治形式如何，总是代表一定階級的利益，因此，使全体人民同政府对立起来，像我引的第一段話那样，就会在理論上造成極大的混乱，在政治上陷于完全孤立的境地，并且必然使自己的行动和自己的全部政策搖擺不定。我所引的第二段話的結語也有同样的情形。“別再給国王、地主和銀行家充当侵略和压迫的工具了。”——这种絕妙的呼吁真是好極

了，但是这里沒有包括“本国的”地主和銀行家，因为德奧两国的政府和統治階級，同俄国、英国、法国的資本家和銀行家一样，都在进行强盜式的掠夺战争，如果俄国的工人和农民对这两国的工人和农民說：“別再給你們的銀行家充当工具了”，自己却把本国的銀行家送进內閣，讓他們同社会党人部长們并肩而坐，那你們就是把你們的一切宣言变成廢紙，实际上推翻了自己的全部政策。你們实际上就表現出自己並沒有这种良好的意圖或願望，因为你們在帮助俄国进行同样的帝国主义战争，进行同样的掠夺战争。你們同你們所代表的群众是矛盾的，因为这些群众永远不会接受米留可夫、馬克拉柯夫等人公开表示过的資本家观点：“認為战争是为了資本的利益的 思想是最罪恶不过的。”

我不知道这种思想是不是罪恶的思想，我相信，在那些今天半存在而明天也許就不存在的人看来，这种思想是罪恶的思想，但这是唯一正确的思想，只有它才表現了我們对这个战争的理解，只有它才表現了被压迫階級的利益，这就是要对压迫者进行斗争；我們說这个战争是資本主义战争，是侵略战争，不應該对它抱幻想，这决不是說，个別人、个别国王的罪行引起了这场战争。

帝国主义是世界資本發展的一定阶段；几十年来資本主义發展的結果是：英、法、德、美这 4 个最富强的国家积累了数以千亿計算的大量財富，这些財富集中在大銀行和大資本家手里，这样的大銀行和大資本家在这些国家里只有两三个，最多不过半打，他們是一种巨大的力量，这种力量伸展到全世界，从領土、从占有殖民地來說，簡直是瓜分了整个地球。地球上的一切地方都有这些强国的殖民地。这些国家在經濟上重新瓜分了全球，因为地球的每一塊土地上都有租界，都有財政資本滲入。这就是兼并的基础。兼

并不是臆想，兼并之所以产生，并不是因为有人突然从自由的爱好者变成了反动分子。兼并是必然从资本主义中产生的大银行统治的政治表现和政治形式，不是由于谁的罪过，因为股票是银行的基础，而股票的积累是帝国主义的基础。用数千亿资本统治整个世界、把整个工业部门同资本家和垄断者的联合会结合起来的大银行，就是把全世界分成三个豪富的掠夺者集团的帝国主义。

在欧洲离我们比较近的第一个集团是以英国为首的，另外两个集团以德国和美国为首。其他的国家只要资本主义关系保持一天，总是被迫帮助它们作恶的。因此，如果你们弄清楚了事情的这个实质，每一个被压迫者都本能地意识到这个实质，俄国每一个工人和绝大多数农民都本能地意识到这个实质，那末你们就会明白，用谈话、宣言、传单、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来反对战争的想法是多么可笑。这种想法之所以可笑，是因为不管你们发出多少这样的宣言，不管你们做出多少政治改革，不管你们怎样在俄国推翻了尼古拉·罗曼诺夫，在一定程度上建立了共和国，使俄国大大前进了一步，几乎一下子赶上了在不同条件下用 100 年才做到这一点的法国，但是，俄国仍然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银行仍然主宰一切，资本家仍然存在。如果说资本家受了一些限制，那他们在 1905 年也受到了限制，但是这难道就是把他们搞垮了吗？如果说这对俄国人说来是新东西，那末在欧洲，每次革命都表明，随着每次革命浪潮的高涨，工人们虽然多得到了一点东西，但是资本家的权力仍然是资本家的权力。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只能是世界范围内的革命阶级反对统治阶级的斗争。这里说的统治阶级不是指地主，虽然俄国有地主，而且他们在俄国所起的作用比其他任何国家的地主要大得多，但这不是造成帝国主义的那个阶级。造成帝国主

义的阶级，是以最大的财政巨头和银行家为首的资本家阶级。这个阶级统治着同我们党纲中叫做半无产者的贫苦农民结成联盟的被压迫的无产者，不推翻这个阶级，便不能摆脱这场战争。只有从狭隘的俄国人的观点出发，才会产生幻想，认为你们用宣言和告各国人民书就能把全世界的劳动者团结起来。持这种观点的人，不知道西欧报纸是怎样嘲笑这类空话和宣言的。在西欧，工人和农民已经习惯于政治改革，而且已经看到过几十次。他们不知道，俄国的工人群众已经真正站起来了，绝大部分都已了解各国资本家是在进行掠夺，因而严正地斥责这种行为，希望各国人民从银行家的压迫下解放出来。但是这些欧洲人有一个问题弄不明白：既然你们有了世界上其他任何一国人民都没有的工农兵代表苏维埃这种有武装的组织，那为什么还把你们的社会主义者送去当部长。你们终究是把政权交给了这些银行家。在国外，人们不只是责备你们太幼稚，这倒没有什么，因为欧洲人是不会了解这种政治上的幼稚的，不会了解在俄国有千千万万的人是第一次苏醒过来，还不知道什么是阶级和政府之间的联系，什么是政府和战争之间的联系。战争无非是资产阶级政策的继续。战争的政策也是统治阶级决定的。战争不过是一种政策，是这些阶级用不同方法来实现同一目的的继续。因此，当你们在自己的告工农书中说“推翻你们的银行家”的时候，每个有觉悟的欧洲工人不是嘲笑你们，便是痛哭流涕地说：“在那里，人们已经推翻了他们的皇帝——一个半野蛮的白痴和魔鬼，这些东西我们早已清除了，这是我们的全部罪过，而现在他们却和‘准社会主义者’部长们共同去支持俄国银行家了，那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呢？！”

银行家们仍然掌握着政权，通过帝国主义战争来执行他们的

對外政策，並且全力支持尼古拉二世在俄國簽訂的那些條約。在俄國，這種情形特別明顯。俄國對外的帝國主義政策的一切原則，不是現在的資本家確定的，而是以前的政府和已被我們推翻的尼古拉·羅曼諾夫確定的。他簽訂了這些條約，這些條約至今還是秘密的，資本家不會把這些條約公布出來，因為他們是資本家。但是沒有一個工人或農民會了解這種混亂的情形，他們心里想，如果我們要求打倒其他國家的資本家，那我們首先應該打倒本國的銀行家，否則誰也不會相信我們並嚴肅地對待我們，人們只會對我們說：“你們這些幼稚的俄國蠻子盡講些十分動聽的話，但是沒有政治內容。”或者想得更壞些，會認為我們是偽君子。這種議論你們可以在外國報紙上看到，如果各種各樣的外國報紙能夠自由地通過國境來到俄國，不在托尼歐被英法當局扣留的話。只要從外國報紙上挑出一段話來，你們就會確信你們已陷入十分明顯的矛盾之中，就會確信你們認為召開社會主義者代表會議，在大會上與社會主義者妥協就能反對戰爭的想法是多麼可笑，多麼錯誤。如果帝國主義是個別人的過錯和罪惡，那末社會主義會仍然是社會主義。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發展的最后階段，這時帝國主義已經瓜分了全世界，兩大集團卷入了生死的搏鬥。或者為這個集團服務，或者為那個集團服務，或者把這兩個集團都打倒，其他的道路是沒有的。你們拒絕單獨媾和，理由是不願意為德帝國主義服務，這是完全對的，因此，我們也反對單獨媾和。但是，你們實際上違背了自己的心願，繼續為抱着侵略和掠奪意圖的英法帝國主義服務，俄國資本家在尼古拉·羅曼諾夫幫助下還把這些意圖變成了條約。我們不知道這些條約的條文，不過凡是注意政治書刊的人，凡是讀過一本關於經濟或外交的書籍的人，都會知道這些條約的內容。我

还記得米留可夫曾在他的書中談到这些条約和諾言，說他們要掠夺加里西亚、海峽、阿尔明尼亚，保持从前的割地，并得到一批新的割地。这些事尽人皆知，可是关于条約却繼續保守秘密，而且还對我們說，如果你們要废除这些条約，就等于同协約国决裂。

关于单独媾和問題我已經說过，我們是不会这样做的；就我們党的決議来看，也絲毫不必怀疑我們是拒絕单独媾和的，正像我們拒絕同資本家进行任何妥协一样。我們認為，单独媾和就是同德国强盜妥协，因為他們也像其他强盜一样在进行搶劫。但是同俄国临时政府中的俄国資本家妥协，也是这样的单独媾和。沙皇簽訂的条約仍然有效，根据这些条約还在搶劫和扼杀其他国家的人民。每个俄国工人和农民都說要“不割地不賠款的和平”，因为生活教他們这样說，因為他們对銀行的利潤不感兴趣，因為他們要活下去，可是你們这些工兵代表苏維埃中的民粹主义者和孟什維克的領袖，却把这个口号弄糊塗了。他們在自己的“消息报”上說，這句話的意思是維持 status quo，即維持战前的形勢，恢复战前的狀況。这难道不是資本主义的和平嗎？而且这是怎样一种資本主义的和平！要知道，如果你們提出这个口号，事变的进程会使你們的党取得政权，这在革命时期是可能的，你們必須照你們所說的去做。如果你們現在提出不割地的和平，德国人一定会接受，而英国人却不会接受，因为英国資本家一寸土地也沒有丧失，并且在世界各地搶了很多东西。德国人搶了很多东西，可是也丢了不少东西，不仅如此，还面临着美国这个强大的敌人。你們建議要不割地的和平，如果你們把这种和平了解为保持 status quo，那就会使人从你們的建議中得出要同資本家单独媾和的結論，因為你們提出这一点，德国資本家看見美国和意大利站在自己面前（德国資本家以

前曾同它們訂過條約)，就會說：“好，我們接受這個不割地的和平。這對我們來說不是失敗，而是對美國和意大利的勝利。”你們客觀上走上了你們責備我們要實行的同資本家單獨媾和的道路，這是因為在你們的政策中，實際上是在你們的實際措施中，你們還沒有同你們和你們的“社會主義者”部長們在臨時政府中所支持的銀行家——全世界帝國主義統治的代表從原則上實行決裂。

因此，你們就使自己處於搖擺和矛盾之中，以致群眾不大能夠了解你們。對割地不感興趣的群眾說：我們不願意為任何一個資本家去打仗。有人對我們說，各國社會主義者召開代表大會達成協議就可以終止這種政策，我們卻認為，如果帝國主義是由個別罪犯造成的，那也許會這樣；但是帝國主義是世界資本主義的發展，而且也影響到工人運動。

帝國主義的勝利是各國社會主義者必不可免地分裂為兩個陣營的開始。現在誰要是還把各國社會主義者看做一個整體，或者認為可以成為一個整體，那就是自欺欺人。在大家一致簽名的巴塞爾宣言¹⁴宣布這次戰爭是帝國主義資本主義的產物以後，戰爭的整個過程，兩年半的戰爭，已經引起了這種分裂。在巴塞爾宣言中沒有一個字談到“保衛祖國”。在戰爭爆發以前，決不會寫出其他的宣言，這正像現在沒有一個社會主義者會提議草擬一個在日美戰爭中“保衛祖國”的宣言一樣，因為日美戰爭還沒有觸及到他們自己的利益，還沒有觸及到他們的資本家和部長們的利益。請你們為國際代表大會寫一個決議吧！大家知道，日美之間的戰爭已經成熟了，這個戰爭已經準備了好幾十年，它不是偶然的；策略並不是由誰先開火來決定的。如果這樣看，那就太可笑了。大家都很清楚，日本資本主義和美國資本主義同樣都是掠奪成性的。

双方都会說这是“保衛祖国”；这种說法是罪恶，不然就是由于要“保衛”我們的敌人資本家們的利益而产生的極大弱点。所以我們說，社会主义的分裂已經是無可挽救的了。完全背弃了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者，已經跑到本国政府或者本国銀行家、本国資本家那方面去了，尽管还在避开他們，指責他們。問題不在于指責。而且有时指責德国人支持本国的資本家，只不过是替俄国人維護同样的“罪恶”进行掩飾而已！既然你們指責德国社会沙文主义者这些口头上的社会主义者（也許其中有許多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实际上的沙文主义者，指責他們实际上不是保衛德国人民，而是保衛肮脏的、貪婪的、强盜一样的德国資本家，那末你們也就不要保衛英国、法国和俄国的資本家了。德国社会沙文主义者并不比我們政府中那些繼續执行秘密外交政策和掠夺政策的人更坏些，这些人以善良質朴的願望来掩飾他們繼續执行这种政策的罪恶。在这些願望当中有許多是好东西，从群众的观点来看，我承認它們是絕對真誠的，但是，我不承認也不能承認其中有什么政治真理。这只是你們的願望罢了，战争仍然是帝国主义战争，仍然是为了秘密条約！你們号召別国人民打倒銀行家，自己却支持本国的銀行家！你們也談和平，但是，你們沒有說是什么样的和平。当我们指出以維持 status quo 为基础的和平的显著矛盾时，沒有一个人回答我們这个問題。在关于不割地的和平的決議中，你們說这不是維持 status quo。你們不能說这是維持 status quo，即恢复战前状况。那末，怎么办呢？从英国手里夺走德国的殖民地嗎？你們試試用和平协商的办法这样做做看！大家都会笑你們的。你們試試不用革命的办法而从日本手里夺走它搶去的胶州灣和太平洋島嶼¹⁵！

你們已陷入不能自拔的矛盾中了。我們說“不割地”，那是說，

在我们看来，这个口号只不过是反对全世界帝国主义的斗争的一个从属部分。我们说，我们要解放各国人民，并且从解放本国人民开始。你们谈论反对兼并的战争和不割地的和平，可是你们在俄国国内却继续实行兼并政策。这是听都没有听到过的事情。实际上你们和你们的政府、你们的新部长们在继续对芬兰和乌克兰实行兼并政策。你们无端指责乌克兰代表大会，通过你们的部长来禁止乌克兰代表大会开会¹⁶。这还不是兼并吗？这种政策是对一个民族的权利的侮辱，这个民族因为自己的儿女要使用本民族语言而受尽了沙皇的折磨。这就是说你们害怕共和国分离。在工人和农民看来，这并不可怕。让俄国成为一个自由共和国的联盟吧。工农群众是决不会为阻碍这件事而战的。让每个民族都获得解放吧，首先让那些跟你们一起在俄国进行革命的民族获得解放。如果不这样做，那你们就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你们在口头上是“革命民主派”，实际上你们的全部政策却是反革命的政策。

你们的对外政策是反民主反革命的，而革命政策会迫使你们进行革命战争。但这也不一定。关于这一点报告人和最近的报纸谈得很多。我也很想谈一谈。

我们实际上认为摆脱这次战争的出路是什么呢？我们认为摆脱这次战争的唯一出路是革命。支持受资本家压迫的阶级起来革命吧，推翻本国的资本家阶级，给其他国家树立榜样。这才是社会主义，这才是反对战争。其他一切都只是诺言、空话或纯朴善良的愿望而已。在世界各国，社会主义已经分裂。而你们还是糊里糊涂，同那些支持本国政府的社会主义者来往，忘记了英国和德国那些代表群众的社会主义的真正社会主义者是孤立的，是在坐牢。但是，只有他们才是代表无产阶级运动的利益的。如果俄国被压

迫階級取得了政權，那會怎麼樣呢？要是有人問我們：你們將怎樣使自己單獨脫離戰爭？那我們就回答：使自己單獨脫離戰爭是決不可能的。我們黨的每一個決議，我們在群眾大會上的每一次演說都說，要想使自己單獨脫離這次戰爭是愚蠢的。幾萬萬人、幾千萬萬資本都卷入了這次戰爭。沒有別的办法能擺脫這場戰爭，只有把政權轉到革命階級手里，轉到這個真正能夠破壞帝國主義，即破壞財政的、銀行的以及侵略的活動綫索的階級手里。只要事實上沒有做到這一點，那就是什麼也沒有做。目前的革命僅僅限於用徹頭徹尾的帝國主義准共和國代替了沙皇制度和帝國主義，這個共和國雖然以革命工農為代表，但是還不能民主地對待芬蘭和烏克蘭，還不敢讓它們分離。

有人說我們在力謀單獨媾和，這不是事實。我們說，不同任何資本家，首先是俄國資本家，進行任何單獨媾和。同俄國資本家單獨媾和的是臨時政府。打倒這種單獨媾和！（鼓掌）我們不承認同德國資本家進行的任何單獨媾和，不同他們進行任何談判，也不同英法帝國主義者進行任何單獨媾和。有人對我們說，同英法帝國主義者決裂，就等於同德國帝國主義者妥協。這是不對的，應當立即同他們決裂，因為這是一個掠奪同盟。有人說，條約是決不能公布的，因為這樣做就是在每個工人和農民面前污辱我們整個政府，污辱我們全部政策。如果把这些條約公布出來，並且在各種集會上，特別是在每個偏僻的小村莊里，明白地告訴俄國工人和農民說：你們現在就是為這些東西而戰，為海峽而戰，為控制阿爾明尼亞而戰，那末他們每個人都會說：我們不願意打這樣的仗。（主席說：“您發言的時間到了。”有人喊：“講吧！”）再講十分鐘就完了。（喊聲：“講吧。”）

有人認為，我們“或者同英國帝國主義者在一起，或者同德國帝國主義者在一起”，如果同德國帝國主義者講和，那就要同英國帝國主義者打仗，如果同英國帝國主義者講和，那就要同德國帝國主義者打仗。我說，這種對立的說法是不正確的，對那些沒有同本國的資本家和銀行家決裂而同他們訂立某種盟約的人是有利的，對我們是不利的。我們是說我們要保護同被壓迫階級、被壓迫民族的聯盟。要忠實於這種聯盟，這樣你們才是革命民主派。這個任務是不容易的。這個任務不容許我們忘記：在一定的條件下，非進行革命戰爭不可。任何一個革命階級都不能發誓不進行革命戰爭，否則就必然會陷入可笑的和平主義。我們不是托爾斯泰主義者。如果革命階級奪取了政權，如果在這個階級的国家里不再有兼併的事情，如果政權不再屬於銀行和大資本——要在俄國做到這一點並不容易，——那末它才不是在口頭上而是在實際上進行了革命戰爭。決不能發誓不進行這種戰爭。這樣做就是陷入了托爾斯泰主義，陷入了庸俗習氣，把馬克思主義的科學和歐洲一切革命的經驗忘得干乾淨淨。

單單俄國一國是絕對擺脫不了戰爭的。但是，俄國有廣大的同盟者在成長，這些同盟者現在不相信你們了，正是因為你們的立場是矛盾的、幼稚的，正是因為你們勸別國人民“打倒兼併”而自己却在實行兼併。你們叫別國人民推翻銀行家，自己却不推翻本國的銀行家。請你們試試別的政策吧。把條約公布出來，在每個工人和農民面前、在各種會議上譴責它們吧。說這樣的話吧：不同德國資本家簽訂任何和約，同時跟英法資本家徹底決裂。讓英國人滾出土耳其，別再為爭奪巴格達而戰了。讓他們滾出印度和埃及去。我們不願意為保持掠奪來的贓物而戰，也不願意費絲毫力氣去幫

助德国强盜保持他們的贓物。如果你們这样做，——你們只是說說而已；在政治上，說空話是沒有人相信的，不相信空話是完全对的，——如果你們不仅說說，而且去做，那末現在所有的同盟者就会把他們的力量拿出來的。請看一看每个被压迫的工人和农民的情緒吧，他們同情你們，又惋惜你們是这样的軟弱，因为你們自己手里有武器，却讓銀行家存在。你們的同盟者是各国被压迫的工人。1905年的革命实际显示的情形，現在又将發生。这个革命在开始时非常軟弱。可是它在国际上所产生的后果怎样呢？这个政策和1905年的历史，是怎样决定了俄国革命的对外政策呢？現在，你們完全是同資本家一起来执行俄国革命的对外政策。而1905年已經表明俄国革命應該采取怎样的对外政策。明显的事实是：1905年10月17日以后，在維也納和布拉格的街上都爆發了群众的騷动，还修筑了街垒。在1905年以后，1908年在土耳其，1909年在波斯，1910年在中国都發生了革命运动¹⁷。如果你們是向真正的革命民主派，被压迫的工人階級呼吁，而不去同資本家妥协，那你們的同盟者将不是压迫階級，而是被压迫階級，将不是压迫階級現在暫時占优势的民族，而是正在被宰割的民族。

在这里，使我們想起了德国战綫；在德国战綫上，除了自由散發我們那些一面印有俄文一面印有德文的传单外，誰也沒有建議进行任何改变。这些传单上写道：两国的資本家都是强盜。赶走他們才是实现和平的步驟。但是还有其他战綫。土耳其战綫有我們的軍隊，我不知道人数有多少。假定說有300万。这批軍隊現在还留在阿尔明尼亚进行侵略，你們虽然有力量和政权，却容忍这种侵略行为，同时又向別国人民宣传不割地的和平。如果这些軍隊轉而实行这个綱領，使阿尔明尼亚成为一个独立的阿尔明尼亚共

和国，把英法財閥从我們身上榨取的錢送給他們，那最好不过了。

据說，沒有英法在財政上的援助，我們是活不下去的。但是这种“援助”却是把繩子套在我們的脖子上吊起来。讓俄国的革命階級說：打倒这种援助，不承認我們欠法国和英国資本家的債，我們号召大家起来反对資本家。不同德国資本家簽訂任何和約，也不同英国人和法国人訂立任何同盟！如果在实际上执行这种政策，那我們在土耳其的軍隊就可以調到其他战綫上去，因为亚洲各国人民将会看到，俄国人民不仅是在口头上根据民族自决的原則宣布不割地的和平，而且俄国的工人和农民实际上是在領導各被压迫民族。对于俄国的工农說来，反帝国主义的斗争不是空洞的願望，不是部长們的庄严宣言，而是革命的切身利益。

我們的情况是这样的：革命战争可能發生，但并非不可避免，如果你們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号召俄国周围的人民，英国帝国主义者就未必能够对我們进行战争。应当向人們証明：你們要解放阿尔明尼亚共和国，要同每个国家的工农代表苏維埃訂立协定，主张建立一个自由的共和国；这样，俄国革命的对外政策才会成为真正革命的真正民主的对外政策。現在，这个政策只在口头上是这样，而实际上是反革命的，因为你們被英法帝国主义束縛了，不过不願意公开說出这一点，害怕承認这一点。如果你們不是去号召“推翻外国銀行家”，而是直接对俄国人民、对工人和农民說：“我們太軟弱了，我們擺脫不了英法帝国主义者的羈絆，我們是他們的奴隶，所以我們只好打仗。”如果你們这样做，那还好一些。这固然是痛苦的事实，但它具有革命意义，它能真正促使这次掠夺战争趋于結束。这样做比同法国和英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訂立协定，召开有他們参加的代表大会，繼續实行你們实际上害怕跟一国的帝国

主义者决裂、同时又要做别国的同盟者的政策，要好千倍。你们可以依靠欧洲各国的被压迫阶级，依靠沙皇时代受俄国摧残而且现在还被它摧残的比較弱小的国家（如现在的阿尔明尼亚）的人民；依靠他们，给他们自由，帮助他们的工农委员会，这样你们就能领导一切被压迫阶级、一切被压迫民族来进行反对德国帝国主义和英国帝国主义的战争。德国帝国主义和英国帝国主义不可能联合起来对付你们，因为它们正在进行生死的搏斗，因为它们正处于不可挽救的困难境地，在这种情况下，俄国革命的对外政策，同被压迫阶级、被压迫人民的真诚同盟，就会获得胜利，百分之九十九会获得胜利！

不久以前，在莫斯科我们的党报上刊登了一个农民写的一封信，他说出了我们的纲领。让我引用这封信中的几句话来结束我的演说，这些话表明这位农民是怎样了解我们的纲领的。这封信登载在莫斯科我们党的报纸“社会民主党人报”¹⁸第59号上，“真理报”¹⁹第68号也转载了。这段话是这样的：

“应该对资产阶级施加更大的压力，把它压得粉碎。这样战争才会结束。如果对资产阶级的压力不够大，那就糟了。”（鼓掌）

载于1917年7月13日（6月30日）、
7月14日（1日）和15日（2日）
“真理报”第95、96、97号

按“真理报”原文刊印，并根据列宁
修改过的速记记录做过校订

經濟破坏和無产階級同它的斗争

这一号我們刊載了工厂委员会代表會議²⁰通过的关于同經濟破坏作斗争的經濟措施問題的決議。

这一決議的基本思想，就是提出真正監督資本家、監督生产的条件来对付資產階級和市僧官吏們关于監督的空談。資產者騙人，用保證資本家获得3倍甚至10倍利潤的国家計劃来冒充“監督”。小資產者一半由于幼稚，一半由于自私，信任了資本家和資本家的国家，滿足于官吏們空洞的監督計劃。工人通过的決議則把主要的东西提到了首位：（1）怎样才能真正做到“不保护”資本家的利潤；（2）怎样才能使商業秘密公开；（3）怎样才能使工人在監督机关中占多数；（4）怎样才能使“全国范围内”的監督和領導組織由工兵农代表苏維埃掌握，而不由資本家掌握。

不做到这一点，所有关于監督和調節的話都是空話，甚至是欺騙人民的謊話。

每一个有覺悟有思想的工人都很容易理解这个真理，但是我們小資產階級的領袖民粹主义者和孟什維克（“消息报”、“工人报”）却反对它。遺憾的是，多次动摇在我們和他們之間的“新生活报”的著作家們，这次也滾到他們那边去了。

阿維洛夫和巴札罗夫两位同志用听起来很像馬克思主义的論据来掩盖他們“掉进了”小資產階級的輕信、妥協和官吏們的空洞

計劃的泥潭中去的實情。現在我們就來看看他們的論據。

似乎我們“真理報”派捍衛組織局的決議(代表會議已通過)就是背棄馬克思主義而轉向工團主義!!阿維洛夫同志和巴札羅夫同志,你們應該感到羞恥,只有“言論報”²¹和“統一報”²²才會這樣疏忽大意(或這樣強詞奪理)!我們根本沒有說過鐵路要交給鐵路工人、制革廠要交給制革工人這類可笑的話,我們說的是工人監督,這種監督要逐步做到由工人來全面調節生產和分配,做到“在全國組織”糧食同工業品等等的交換(“廣泛吸收城鄉合作社”參加),我們說的是要“把全部國家政權交給工兵農代表蘇維埃”。

只有沒有讀完這個決議或者不會讀的人,才真的會在這個決議中看出工團主義。

只有像司徒盧威那樣“理解”馬克思主義的學究和一切自由主義的官吏,才會這樣議論:“要跨過國家資本主義是一種空想”,“我國調節的形式本身也應當含有國家資本主義的性質”。

請看糖業辛迪加、俄國的官辦鐵路或石油大王等等。這不是國家資本主義是什麼?難道可以“跳過”已經存在的東西嗎?

問題正是在於,現實生活已經實際上在俄國把工業中的辛迪加和農村中的小農經濟結合起來了,而那些把馬克思主義變成了某種“資產階級的、死板的”學說的人,卻用彷彿有見解的而實際上是最空洞的關於“不斷革命”、“實行”社會主義以及其他亂七八糟的議論來逃避現實生活所提出的具體任務。

要實際一些,要實際一些!少來些遁詞,多接觸些實際!是否仍然要維持高達500%的軍事訂貨利潤等等呢?是否仍然要保護商業秘密呢?讓不讓工人實行監督呢?

阿維洛夫同志和巴札羅夫同志都沒有答復這些實際問題,而

且不自覺地墮落到用听起来“差不多像馬克思主义”的“司徒卢威式”的議論来帮助資产階級的地步。資产者最希望人們用社会主义是“空想”的“高見”来答复人民就軍火出售者的駭人听聞的利潤和經濟破坏問題所提出的質問。

这种說法荒唐到了可笑的地步，因为社会主义在客观上不能实现是与小經濟有关的，我們不仅不想剝夺小經濟，而且根本不想調节和监督它。

孟什維克、民粹主义者和一切官吏(他們还吸引了阿維洛夫同志和巴札罗夫同志)談論“国家調节”来推卸責任，制定“国家調节”的空洞計劃来保护資本家的利潤，高談“国家調节”来保护商業秘密；而我們正是竭力使这种国家調节不致成为騙局。亲爱的准馬克思主义者們，問題就在这里，而不在“实行”社会主义！

不是資本家階級来調节和监督工人，而是相反，——这就是問題的所在。不要像路易·勃朗之流那样信賴“国家”，而要建立一个由無产者和半無产者领导的国家，——同經濟破坏的斗争应当这样来进行。其他任何解决办法都是空話和欺騙。

載于1917年6月17日(4日)

“真理报”第73号

按“真理报”原文刊印

資本家的第一千零一次的謊話

“言論報”今天發表社論說：

“如果德國有自己的列寧，在國外也有羅伯特·格里姆和拉柯夫斯基之流的盛情援助，那就可以斷言，國際並不願意妨礙偉大的俄國革命鞏固自己的陣地，大力加強自己的基礎。但現在德國人卻客氣地回答說，他們並不需要共和國，他們對本國的威廉感到滿意。例如《Vorwärts》²³更為親切地表明，俄國民主派不應當容忍秘密條約，而關於德國民主派，社會黨的機關報卻謙遜地保持緘默。”

說“羅伯特·格里姆和拉柯夫斯基之流”曾經給過布爾什維克某種“援助”（他們從來都不同意布爾什維克），那是撒謊。

把“德國的”普列漢諾夫派（正是他們而且只有他們在《Vorwärts》上面寫文章）同成百地關在德國監獄里的德國革命國際派（如卡爾·李卜克內西）混為一談，是“言論報”和一般資本家最卑鄙最無恥的第一千零一次的謊話。

現在有兩個國際：（1）普列漢諾夫派的國際，即普列漢諾夫、蓋得、謝德曼、桑巴、托馬、韓德遜、王德威爾得、比索拉蒂等等轉到本國政府方面的社會主義叛徒的國際。（2）革命國際派的國際，他們就是在戰爭時期也到處進行反對本國政府、反對本國資產階級的革命鬥爭。

“偉大的俄國革命”，只有當它不支持帝國主義的“聯合”政府，

不支持这个政府所进行的帝国主义战争，不支持整个資本家阶级的时候，才能成为“伟大的”革命，才能“巩固自己的陣地”和“加强自己的基础”。

載于1917年6月17日(4日)

“真理报”第73号

按“真理报”原文刊印

六三派頑固分子主張立即進攻

六三派老爺們，這些在 1905 年以後幫助尼古拉·羅曼諾夫把我國淹沒于血泊之中，殘殺革命志士、恢復地主和資本家專橫統治的人，在蘇維埃代表大會召開的同時，也召開了自己的會議²⁴。

當策烈鐵里淪為資產階級的俘虜，企圖用種種遁詞來抹殺立即進攻這一政治問題的迫切性、重要性和緊急性時，屠夫尼古拉和絞手斯托雷平的同黨六三派頑固分子，地主和資本家們，却並不害怕直截了當地公開提出問題。下面就是他們最近一致通過的關於進攻問題的最重要的決議：

“國家杜馬(??)認為，只有立即進攻，只有與盟國密切交往，才能保證戰爭立即結束，人民永享自由。”

這是很清楚的。

這是一些政客，是一些講究實際的人，是本階級即地主資本家的忠實奴僕。

而策烈鐵里、切爾諾夫之流是怎樣為本階級服務的呢？他們在口頭上用善良的願望來敷衍搪塞，實際上卻支持資本家。

策烈鐵里硬說，關於立即進攻的問題連提都不能提，要是他策烈鐵里部長知道“立即”進攻，那他這位部長是不會把這件事告訴任何人的。策烈鐵里這樣說卻沒有料到（多么天真！）六三派頑固分子已經把他駁倒了，已經用事實把他駁倒了，因為他們毫不害

怕甚至在決議中高談進攻，並且不是一般的進攻，而是立即進攻。他們這樣做是對的，因為這是一個政治問題，是我們整個革命的命運問題。

這裡沒有中間道路：不主張“立即進攻”，就是反對“立即進攻”，棄權是不行的；用軍事秘密的借口或暗示來支吾搪塞是和一個負責的政治家完全不相稱的。

主張立即進攻，就是主張繼續進行帝國的戰爭，主張為了扼殺波斯、希臘和加里西亞以及巴爾干的各族人民等等而使俄國工農遭到屠殺，主張讓反革命勢力復活和加強，主張把“不割地的和平”的詞句也完全拋棄，主張為割地而戰。

反對立即進攻，就是主張全部政權轉歸蘇維埃，主張激發被壓迫階級的革命首倡精神，主張各國被壓迫階級立即提出“不割地的和平”，即確切規定推翻資本壓迫、解放一切殖民地和一切被壓迫或沒有充分權利的民族的和平。

第一條道路是同資本家一起，為了資本家的利益，為了達到他們的目的而行動的道路，即信任資本家的道路，這些資本家兩年多來一直答應把世界上的一切甚至更多的東西給我們，只要我們“繼續”作戰“直到勝利”。

第二條道路是同資本家決裂，不信任資本家並制止他們謀求卑鄙的私利和靠訂貨發數億橫財的道路，是信任各國被壓迫階級、首先是信任工人，信任反對資本的國際工人革命，全力支持這一革命的道路。

只能在這兩條道路中間進行選擇。策烈鐵里、切爾諾夫之流是中間道路的愛好者。但是這裡，中間道路是沒有的，因此，如果他們動搖不定或用空話敷衍搪塞，那末他們，策烈鐵里、切爾諾

夫之流最后必然淪为反革命资产阶级手中的工具。

載于1917年6月19日(6日)

“真理报”第74号

按“真理报”原文刊印

为制止革命而結成的联盟

新的联合政府正是資本家同民粹主义分子和孟什維克的領袖們为了制止革命而結成的联盟,这一点远不是所有的人都了解的,也許連这两个政党的部长們也不了解。然而这是事实。

这一点可以从下面的事情上看得特別清楚:6月4日,星期天,早晨報紙上剛刊登了米留可夫和馬克拉柯夫在第三届反革命分子杜馬(按照尼古拉·罗曼諾夫和絞手斯托雷平的传统,称为“国家杜馬”)會議上的演說报道,晚上策烈鉄里和其他部长就在工兵代表苏維埃全国代表大会上發表演說,为政府辯护,为进攻政策辯护。

米留可夫和馬克拉柯夫,像一切有点兒用的資本家和反革命派的領袖一样,是講究实际的人,当問題涉及到他們的階級的时候,他們是非常了解階級斗争的意义的。因此,他們把进攻問題提得十分明确,决不从战略上空談进攻,說些策烈鉄里用来自欺欺人的空話。

不,立宪民主党人是十分聰明的。他們知道,目前实际生活提出来的进攻問題,完全不是一个战略問題,而是一个政治問題,一个要把俄国革命完全摧毀的問題。像布尔什維克和国际主义者在星期六晚上給苏維埃代表大会主席团的書面声明中所提出的那样,立宪民主党人也正是从政治上把這個問題提到“国家杜馬”上来的。

絞手斯托雷平的著名幫凶馬克拉柯夫宣稱：“俄國的命運掌握在它自己的手中，這個命運很快就可以決定了。”（對！對！）“如果我們真正能夠不只是用決議、用群眾大會上的演說和街頭招展的旗幟來進攻和作戰，而是像我們從前作戰那樣認真地來作戰的話，”（聽吧！聽吧！“像我們從前作戰那樣”，這真是資本家的領袖的具有歷史意義的名言！）“那末很快就會使俄國充分健全起來。”

這幾句話真是妙不可言，應當把它牢牢記住並且反復思索。說它妙不可言，是因為它說出了階級真理。米留可夫也說過這一真理，但是稍有不同，他責備彼得格勒蘇維埃“為什麼在（它的）聲明中根本沒有談到進攻”，他還着重指出，意大利帝國主義者提出了一個“無關緊要的”（這是米留可夫先生的挖苦話！）“問題：你們進攻不進攻？但是他們也沒有得到”彼得格勒蘇維埃“對這個問題的肯定答復”。這裡，馬克拉柯夫向克倫斯基表示了“深深的敬意”，而米留可夫解釋這一點說：

“我很耽心，我們的（對！我們的，也就是資本家掌握下的！）陸軍部長安排好了的事情又會因此而弄糟，我們會錯過還能（請注意這個“還”字！）對我們盟國的問題（我們是否進攻）作出既使我們又使他們滿意的答復的最後機會。”

“既使我們又使他們”，那就是既使俄國帝國主義者又使英法及其他帝國主義者！進攻“還能”使他們“滿意”，也就是說進攻能夠幫助他們扼殺波斯、阿爾巴尼亞、希臘、美索不達米亞，保全他們從德國人那裡掠奪來的東西並奪取德國強盜搶來的東西。實質就在這裡。關於進攻的政治意義的階級真理就在這裡。滿足俄國、英國及其他帝國主義者的胃口；延長帝國主義掠奪戰爭；不是走不割地的和平的道路（這條道路只有繼續革命才有可能），而是走為割地而戰的道路。

从对外政策的观点来看，进攻的实质就是这样。而馬克拉柯夫在上面所引的这句具有历史意义的名言中，是从对内政策的观点来断定这一实质的。馬克拉柯夫口中的“使俄国充分健全起来”，意思就是讓反革命派取得完全的胜利。誰要是沒有忘記馬克拉柯夫关于 1905 年和 1907 到 1913 年这个时期的精彩演說，誰就几乎可以从他的每一次演說中看出，这个判断是正确的。

“像我們从前作战那样”来进行战争（这里的“我們”也就是以沙皇为首的資本家），来进行这次帝国主义战争，就是使俄国“健全起来”，也就是保証資本家和地主的胜利。

这是一个阶级真理。

从軍事观点来看，进攻的一切可能的結局都意味着在政治上加强帝国主义的精神、帝国主义的情緒、帝国主义的狂热，加强軍隊中沒有更換过的旧指揮人員（“像我們从前作战那样来作战”），并巩固反革命派的基地。

不管策烈鐵里和克倫斯基、斯柯別列夫和切尔諾夫是否願意，也不管他們是否意識到这一点，他們（不是作为个人，而是作为民粹主义政党和孟什維克政党的領袖）支持了反革命派，轉到了（在这紧要关头）反革命派方面，同他們結成联盟，以便制止革命，“像我們从前作战那样”来繼續进行战争，并在这个联盟內占有一定的地位。

关于这一点，不必再自己騙自己了。

載于 1917 年 6 月 19 日（6 日）

“真理报”第 74 号

按“真理报”原文刊印

感 激 之 至

我們非常感激沙文主义的“人民意志报”²⁵在6月4日轉載了我們关于取道德国一事的文件。从这些文件中可以看出，还在那时我們就認為格里姆的行为“曖昧不明”，并且拒絕了他的帮助。

这是事实，事实是不能避而不談的。

至于对“人民意志报”的不明不白的暗示，我們回答說：先生們，別胆小，公开地責备我們犯了什么罪行或錯誤吧！試一試吧！采取不明不白的暗示的办法或者不敢用自己的名义提出責备，都是不正派的，这难道还不容易了解嗎？

載于1917年6月19日(6日)

“真理报”第74号

按“真理报”原文刊印

有沒有通向公正的和平的道路？

有沒有通向資本家強盜們不交換割地（占領地）、不瓜分贓物的和平的道路呢？

有的，那就是各國都進行反對資本家的工人革命。

俄國現在比任何國家都更接近於發生這樣的革命。

現在只有在俄國能夠不經過起義，和平地立即把政權轉歸現成的機關蘇維埃，因為資本家不能反抗工兵農代表蘇維埃。

在這種政權轉變的條件下，就可以制服那些靠訂貨發了數十億橫財的資本家，揭穿他們的一切勾當，逮捕盜竊國庫的百萬富翁，摧毀他們的專橫統治。

只有在政權轉歸被壓迫階級之後，俄國才能成為各國被壓迫階級的榜樣，才能立即向他們切實提出達到普遍和平的明確條件，而不是對他們說空話，發表空洞的宣言。

在這個建議立即停戰的宣言中可以寫道：各國的工人和勞動者同志們！血流够了。和平是可能的。公正的和平是不要割地、不要占領地的和平。讓德國的資本家強盜們以及戴皇冠的強盜威廉知道，我們不同他們協商，我們不僅認為他們在戰爭爆發後奪到的地盤是占領地，而且認為亞爾薩斯、洛林以及屬於普魯士的丹麥和波蘭的土地也是占領地。

我們認為波蘭、芬蘭和烏克蘭等非大俄羅斯的土地都是俄國

沙皇和資本家的占領地。

我們認為英法等国所有的殖民地如爱尔兰等等都是这些国家的資本家的占領地。

我們俄国的工人和农民决不用强力扣留任何一塊非大俄罗斯的土地或殖民地(像土尔克斯坦、蒙古、波斯)。打倒資本家瓜分殖民地、瓜分割地(占領地)、瓜分贓物的战争!

至少德国和法国这两个大国的工人和劳动者必然会仿效俄国工人的榜样,这也許不是在明天(革命不是預定的),但是他們必然会仿效的。

这两个国家正在趋于灭亡,德国是由于飢荒,法国是由于人口减少。不管它們的資本家政府願不願意,这两个国家是会根据我們的公正条件簽訂和約的。

摆在我們面前的是一条通向和平的道路。

如果英国、日本和美国的資本家企圖反抗这种和平,俄国和其他各国的被压迫階級就敢于进行反对資本家的革命战争。在这个战争中,他們不仅会战胜这三个远离俄国、彼此角逐的国家的資本家,而且会战胜全世界的資本家。

摆在我們面前的是一条通向公正的和平的道路。我們决不害怕走上这条道路。

載于1917年6月20日(7日)

“真理报”第75号

按“真理报”原文刊印

論人民公敵

不久以前，普列漢諾夫派的“統一報”（連社會革命黨的“人民事業報”也公正地認為它是同自由資產階級統一的報紙）想起了1793年法蘭西共和國關於人民公敵的法律。

這是十分及時的。

1793年的雅各賓派是18世紀最革命的階級即城鄉貧民的代表。當時，這個階級已經在實際上（而不是口頭上）用最革命的辦法、直到用上斷頭台的辦法制服了本國的君主、地主以及溫和的資產者，而歐洲的君主就聯合起來用戰爭反對這個階級，反對這個18世紀真正革命的階級。

雅各賓派宣布“協助聯合起來的暴君策動反對共和國的陰謀”的人是人民公敵。

雅各賓派的榜樣是很有教益的。直到現在它還沒有過時，只不過應當使它適合於20世紀的革命階級，即工人和半無產者。對於20世紀的這個階級來說，人民公敵已不是君主，而是地主和資本家階級。

如果政權轉到20世紀的“雅各賓派”即無產者和半無產者手中，那他們就應當宣布那些靠帝國主義戰爭、也就是靠瓜分贓物和利潤的戰爭發了數十億橫財的資本家是人民公敵。

20世紀的“雅各賓派”可以不必讓資本家上斷頭台了。學習

好的榜样不是死搬硬套。只要逮捕 50—100 个銀行資本的巨头和大王以及盜竊國庫、利用銀行进行搶劫的主犯，把他們关上几个星期，就足以揭穿他們的勾当，足以向全体被剝削者表明“誰需要战争”了。揭穿了銀行大王的勾当之后，就可以释放他們，把銀行、資本家的辛迪加和所有为国家“工作的”包工头置于工人的監督之下。

1793 年的雅各宾派是以掌握了整个国家政权的劳动者和被压迫者階級同剝削者階級进行真正革命斗争的伟大典范而載入史册的。

可怜的“統一报”（孟什維克护国派由于同它結成联盟而感到慚愧）想仿效的是雅各宾主义的字句而不是它的精神，是它的外表而不是政治內容。这實質上無异于背叛 20 世紀的革命，不过是打着效法 18 世紀革命者的虛伪幌子罢了。

載于 1917 年 6 月 20 日（7 日）

“真理报”第 75 号

按“真理报”原文刊印

短 評

下面这段話摘自 6 月 6 日的“新时报”26，

“在自由的日子里，忽然从什么地方伸出一只黑手，牵引着俄国民主派傀儡，这是怎么一回事？列宁！……有千千万万个列宁。在每一个十字路口列宁都会突然出现。显然，力量不在列宁本身，而在無政府状态和愚蠢行为容易滋长的土壤。”

資本家从訂貨中获得駭人听聞的利潤，我們称之为無政府状态；資本家为瓜分割地、瓜分利潤而进行战争，我們称之为愚蠢行为。如果“在每一个十字路口”都有人同意这个观点，那是因为它正确地反映了無产阶级的利益，正确地反映了全体被剝削劳动群众的利益。

載于 1917 年 6 月 20 日(7 日)

“真理报”第 75 号

按“真理报”原文刊印

“大 撤 退”

执行委员会的报告人在星期日把成立联合政府和过去的社会主义者参加内阁²⁷说成是“资产阶级从政府中的大撤退”。

这句话只有后面 3 个字是正确的。“大撤退”真正说明了 5 月 6 日成立联合政府的意义。“大撤退”正是在那时真正开始的，或者确切些说，正是在那时特别明显地表现出来的。不过这不是资产阶级从政府中的大撤退，而是孟什维克和民粹主义者的领袖从革命中的大撤退。

现在正在举行的工兵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意义，就在于它非常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5 月 6 日是资产阶级交好运的日子。它的政府已濒于死亡。群众显然以无比愤怒的心情反对这个政府，与这个政府誓不两立。只要苏维埃中民粹主义者和孟什维克的领袖说一句话，临时政府就得乖乖地把政权交出来，李沃夫在玛丽亚宫的会议上也不得不公开承认这一点。

资产阶级玩弄巧妙的手法，这种手法使俄国小资产者和广大群众感到新奇，使孟什维克和民粹主义者的有学识的领袖陶醉，因为它正确地估计到他们的路易·勃朗式的本性。我们记得，路易·勃朗是著名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他 1848 年参加政府，1871 年臭名远扬。路易·勃朗以“劳动民主派”或“社会主义民主

派”(后面这个名詞 1848 年在法国是常用的, 正像 1917 年在 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維克的書刊上时常用它一样)的 領袖 自居, 而实际上却是資產階級的 尾巴, 資產階級手中的玩具。

在这将近 70 年中, 西方資產階級一再玩弄使俄国感到新奇的那一套手法。这套手法的实質, 就是使“脱离”社会主义和“脱离”革命的“社会主义民主派”的領袖在資產階級政府中充当对資產階級無害的 附屬品, 靠准社会主义部长們的帮助使人民看不清这个政府的真面目, 用“社会主义的”內閣主义这块光輝夺目的金字招牌来掩盖資產階級的反革命性。

法国資產階級精心制定的这套办法, 在盎格魯撒克逊国家、斯堪的那維亞半島上的国家以及許多拉丁語系的国家中試用过多次。1917 年 5 月 6 日在俄国也正是玩弄这套手法。

“我們的”准社会主义部长們正是处于这种情况下: 資產階級借他們的手从火中取栗, 通过他們 来做那些沒有他們就永远做不到的事情。

通过古契柯夫决不能吸引群众繼續进行掠夺性的帝国主义战争, 即以瓜分 殖民地和兼并为 目的的战争。正像米留可夫和馬克拉柯夫所老老实实在地承認的, 資產階級只有通过克倫斯基和策烈铁里(他衛护捷列申柯甚于衛护邮电职工)才能做到这一点, 才能繼續“布置”这场战争。

通过盛加略夫, 即使在立宪會議以前也保不住地主的土地(馬克拉柯夫曾經說过, 如果举行进攻, 那就会使“俄国充分健全起来”。也就是說, 連立宪會議也会“健全起来”), 通过切尔諾夫才能做到这一点。虽然农民不太願意, 他們硬要农民接受这样的思想, 即在立宪會議召开以前, 取得地主本人的同意租佃土地是一种

“制度”，而立刻废除地主土地所有制，向人民租佃过去地主的土地，則是“無政府状态”。如果不通过切尔諾夫，这种地主的反革命思想是决不能貫徹的。

通过柯諾瓦洛夫决不能維持和提高（見內閣派報紙“工人报”有关煤矿主的資料）軍事訂貨的駭人听聞的利潤。通过斯柯別列夫或者在他的参与下，才能在維持原状的幌子下，在所謂“馬克思主义”否認社会主义可以“实行”的幌子下維持这种利潤。

社会主义是不可能实行的，因此資本家不是靠純粹資本主义經營而是靠軍事訂貨和国家訂貨获得的駭人听聞的利潤是可以向人民隱瞞的！——这就是司徒卢威式的妙論，捷列申柯、李沃夫和“馬克思主义者”斯柯別列夫就是在这种論調下联合起来的。

通过李沃夫、米留可夫、捷列申柯、盛加略夫之流决不能影响国民會議和苏維埃。通过策烈鉄里、切尔諾夫之流才能使它們接受这种資產階級潮流的影响，才能借助于非常响亮的和听起来非常“善意的”詞句来执行这种資產階級的帝国主义政策，甚至否認有选举地方行政长官和拒絕由上級委任和批准这些行政长官的最起碼的民主权利。

过时的社会主义者策烈鉄里、切尔諾夫之流否認有这种权利，他們实际上已不自覺地变成了过时的民主主义者。

無疑的，这是一次“大撤退”！

載于1917年6月21日（8日）

“真理报”第76号

按“真理报”原文刊印

就本質論战的益处

可愛的“新生活報”的作家同志們！你們不滿意我們的批評，說它太粗暴。現在我們就盡量溫和一些，客氣一些。

我們就从你們提出的兩個問題開始吧。

不排除“商業秘密的不可侵犯性”，能不能認真地談論對生產的監督（姑且不談調整）呢？

我們肯定地說，“新生活報”對這個“實際”問題沒有答复。“新生活報”反駁說，“即使”在“工人報”上也可以“找到”這個問題的答案。

可愛的同志們，我們沒有找到！你們也永遠找不到。好好地找一找吧，可是你們是找不到的。

對不起，“新生活報”的罪過正是在於它高談“監督”，而沒有實事求是地提出關於商業秘密不可侵犯性的實際問題。

第二個問題：能不能把立即實行社會主義（“新生活報”反對這樣做，而我們也並沒有建議這樣做）同立即對銀行和辛迪加實行實際監督混為一談呢？我們在回答這個問題時指出，對於小經濟，我們既不剝奪，也不調整，更不去監督，而“新生活報”卻表示反對說：這是“寶貴的坦白”，這是“合情合理的”，但是搞得“太倉卒”了。

天哪，可愛的同志們，這裡有什麼“倉卒”可言！這不過是把我們代表會議的一大篇詳盡的決議簡短地敘述一下而已。也許你們

沒有兴趣讀这个決議吧？

就本質进行論战是有益的。用模稜两可的話来迴避这个論战是有害的。

載于1917年6月21日(8日)

“真理报”第76号

按“真理报”原文刊印

輕信的流行病

“同志們，資本家的反抗看来已經打垮了。”

这个可喜的消息我們是从彼舍霍諾夫部长的演說中得来的。真是一个惊人的消息！“資本家的反抗已經打垮了”……

人們經常听到部长們的这类演說，經常鼓掌欢迎部长們的这类声明。这怎么不是染上了輕信的流行病呢？

他們最喜欢用“無产階級专政”来吓唬自己和吓唬別人。可是，“無产階級专政”这个概念同打垮資本家的反抗究竟有什么区别呢？根本没有什么区别。無产階級专政是一个科学术语，这个术语規定了在这方面起作用的階級以及称为专政的特殊政权形式。这种政权依靠的不是法律，也不是选举，它直接依靠某一部分人民的武装力量。

無产階級专政的意义和作用何在呢？正是在于打垮資本家的反抗！如果說俄国“資本家的反抗看来已經打垮了”，那就等于說俄国“無产階級专政看来已經实现了”。

不幸的“仅仅”是：我們听到的不过是部长的一句空話。这就像斯柯別列夫揚言“要抽 100% 的利潤”²⁸ 一样。这是今天在俄国到处传揚的“革命民主主义的”漂亮詞句中最美妙的一句話，这句話使小資产階級如醉如痴，使人民群众堕落和愚蠢，使大量輕信的病菌到处散布。

在一部法国喜剧中（法国人好像比其他民族更好地研究了在社会主义內閣中耍把戏的課程）描写了一架留声机，这架留声机在法国各个角落的选民大会上重复“社会主义”部长許願的演說。我們認為彼舍霍諾夫先生應該向放送留声片的社会传达自己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話：“同志們，資本家的反抗看来已經打垮了。”用世界各国的語言来播送这句话将是非常恰当而有益的（对于資本家來說），因为据說这是在俄国实验資產階級同社会主义者組織联合內閣的輝煌成就！

現在，彼舍霍諾夫部长先生同策烈鉄里和切尔諾夫一起进入內閣以后，已被孟什維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称为社会主义者（1906年他們曾在报刊上同他断絕关系，正像同向右轉得太过分的小資產者断絕关系一样），所以彼舍霍諾夫部长先生回答一下下面这个簡單而普通的問題也并不算錯：

我們要打垮資本家的反抗應該从何下手呢？我們不應該向工人联合会和所有最大的政党揭露資本家获得了空前的利潤嗎？不應該取消商業秘密嗎？

关于“無产階級专政”（“打垮資本家的反抗”），我們應該从何談起呢？揭露盜竊國庫的行为不是更好嗎？

如果像內閣派的“工人报”所报道的，革命政府提高了煤的訂貨价格，那末这算不算盜竊國庫的行为呢？哪怕是每星期公布一次銀行的“保證書”和其他有关軍事訂貨及其价格的文件，不是比高談“打垮資本家的反抗”更好嗎？

載于1917年6月21日（8日）

“真理报”第76号

按“真理报”原文刊印

天上的仙鶴不如手中的家雀

彼舍霍諾夫部長在演說中談到了許多非常美妙的事情：既談到了“平均分配我們所有的東西”，又談到了“資本家的反抗看來已經打垮了”，此外還談到了許多諸如此類的事情。

但是，他舉出的確切數字只有一個。他的演說中指出的確切事實只有一件，而這件事實在共占八欄的演說中只占六行。這件事實就是：釘子從工廠賣出是 20 個戈比一斤，而賣給居民則高達兩個盧布一斤。

如果“資本家的反抗已經打垮了”，那末能不能通過一項法律，規定必須公布：（1）關於訂貨價格的全部保證書、（2）所有國家訂貨的價格、（3）交給國家的產品的成本以及（4）能不能讓工人組織來檢查所有這一類的事情？

載于 1917 年 6 月 21 日（8 日）

“真理報”第 76 號

按“真理報”原文刊印

实行社会主义还是揭露 盗窃国库的行为？

在俄国不能实行社会主义，这已经决定并签字了。米留可夫先生繼孟什維克內閣派的“工人报”之后，在六三派頑固分子會議上証明了这一点（差不多完全是按照馬克思主义的觀點）。同意这一点的有全国最大的、在苏維埃代表大会上也是最大的政党社会革命党。它不仅是最大的政党，它对繼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感到的思想上的（無私的）恐惧也是最大的。

老实說，只要查一下1917年4月24—29日布尔什維克代表會議的決議就可以証明，布尔什維克也認為不能立即在俄国“实行”社会主义。

那末爭論的究竟是什么呢？究竟为什么叫嚷呢？

他們大声叫嚷反对在俄国“实行”社会主义是为了支持（很多人都沒有認識到这一点）那些反对揭露盗窃国库行为的人。

先生們，我們不来爭論这些話！这样爭論不仅对于“革命民主主义者”是不值得的，甚至对于一般成年人也是不值得的。我們不来談“大家”都拒絕“实行”社会主义。我們来談談揭露盗窃国库的行为。

資本家为国防即为国家工作，这已經不是“純”資本主义了（这是明显的事实），而是国民經济的一种特殊形式。純資本主义是商

品生产。商品生产是为不可知的自由市场工作的。为国防“工作”的资本家则完全不是为市场“工作”，而是按照国家订货甚至往往是为了得到国家贷款而“工作”的。

我们认为，掩盖这种特别交易中的利润量，攫取高于实际参加生产者必需的生活费的利润，就是盗窃国库的行为。

如果你们不同意，那末你们显然是同绝大多数居民的意见不一致。丝毫不用怀疑，俄国工人和农民的绝大多数是同意这种意见的，只要不是委婉曲折地用外交辞令向他们提出问题，他们是会直截了当地表达这种意见的。

如果你们同意，那末就一起来同诡辩和借口作斗争吧。

为了在共同的事业中即在这个斗争中表示最大的让步，为了表示最大限度的温和，让我们向苏维埃代表大会提出下面的决议草案：

“颁布一项法令，取消与国家订货或整个国防订货有关的各部门的商业（包括银行）秘密，这不仅是调整生产和分配的第一步，而且是监督生产和分配的第一步（这里说明一句，但不必写在决议本文中：甚至彼舍霍诺夫部长也答应竭力做到“平均分配我们所有的东西”），是同经济破坏和全国面临的灾难认真进行各种斗争的第一步。法令颁布后，立即制定一项法律，规定凡对下列享有全权的个人或团体隐瞒有关商业秘密的文件或事实，无论直接隐瞒或间接隐瞒，均予以刑事处罚：

（甲）任何工人、士兵或农民代表苏维埃；

（乙）任何工人或职员等等的工会；

（丙）任何大的政党（就“大”党这个概念的确切定义而论，根据选民的人数也可以）。”

大家都同意，在俄国不能立即实行社会主义。

大家是否同意，必须立即揭露盗窃国库的行为呢？

载于1917年6月22日(9日)

“真理报”第77号

按“真理报”原文刊印

思想混乱和惊惶失措的人們

現在，恐惧与惊慌的气氛籠罩着彼得堡，簡直达到了空前未有的程度。

在我們党决定于星期六举行的游行示威遭到禁止这个大事件²⁹發生以前，有一件小事情就已經說明了这一点。

这就是关于占用杜尔諾沃別墅的事情。彼列維尔节夫部长最初下令騰出杜尔諾沃別墅，后来却又在代表大会上声明要把別墅的花园留給人民，而別墅里的工会組織也完全不用搬出去了！据說，仅仅是要逮捕几个無政府主义者³⁰。

如果說占用杜尔諾沃別墅是违法的，那末把花园留給人民、把工会組織留在別墅里都是不行的。如果說逮捕是有法律根据的，那末逮捕人同別墅没有任何关系，因为人在不在別墅里，逮捕都一样进行。結果是：別墅也沒有“騰出来”，逮捕也沒有进行。政府显然是思想混乱和惊惶失措了。如果不是这些人神經过敏，那就不会發生这场“風波”，因为一切仍然同以前一样。

大事件就是游行示威。我党中央委员会和其他許多組織（包括总工会在內）决定在首都的大街上举行和平示威。在一切有宪法的国家里，举行这种游行示威是公民不容置疑的权利。任何一个自由国家的任何法律，也不会認為街头和平示威、提出修改宪法或更換政府成員的口号是什么违法行为。

思想混亂和驚惶失措的人們，特別是蘇維埃代表大會的大多數，從這次遊行示威中編出一個聞所未聞的“故事”來。蘇維埃代表大會的大多數通過了一個嚴厲的、充滿極其辛辣的反對我們黨的字眼的決議，禁止我們在三天內舉行任何遊行示威，其中包括和平示威。

當這項正式決議通過時，我黨中央委員會已經在星期五夜里2時決定取消遊行示威。星期六早晨，在有各個區的代表參加的緊急會議上宣布了這個決定。

現在有一個問題：我們的第二“政府”即蘇維埃代表大會禁止遊行示威是什麼原因？當然，自由國家里的任何一個政黨都有權舉行示威，而任何一個政府也可以宣布戒嚴，禁止示威，但是這個政治問題還是沒有解決：為什麼要禁止示威？

下面就是蘇維埃代表大會決議中明白指出的唯一的政治理由：

……“我們获悉，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想利用你們的（我黨所組織的）發動”……

這就是禁止和平示威的理由。蘇維埃代表大會“获悉”有“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而他們正想“利用”我黨所策劃的發動。

這是蘇維埃代表大會極其重要的聲明。必須再三強調這是合乎事實的聲明，不同於對我們的一連串謾罵。但是我們的第二政府採取了哪些措施來對付“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呢？這個政府所“获悉”的到底是什麼呢？反革命分子到底想怎樣利用這種或那種口實呢？

人民是不能也不會消極地容忍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發動的。

我們的第二政府要是不願意用下禁令和謾罵來掩蓋他們的思

想混乱和被右边来的威胁吓倒的事实，那它就應該多向人民說說“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多想些办法来同他們进行認真的斗争。

載于1917年6月24日(11日)

“真理报”第79号

按“真理报”原文刊印

暗 示

疯狂的、凶恶的、狂怒的、咬牙切齿的、用辱骂和恶毒的字眼不断诬蔑我们党的人们，从来不是公开地指责我们，而是用“暗示”。

暗示什么呢？

也只能暗示一点：布尔什维克想举行政变，他们是一伙卡提利纳³¹，所以他们是应该千刀万剐的坏蛋和恶棍。

我们的敌人不敢公开说出这种蠢话，于是就来“暗示”，就来“胡说八道”。星期四我们决定要在星期六举行和平示威，星期六早晨就宣布执行，如果说这是制造政变，那简直是愚蠢到了极点！先生们，你们用这种愚蠢的暗示究竟想使谁惊奇呢？

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决议说：“要求推翻临时政府。”难道赶走临时政府的一部分部长（有的旗帜上写着：打倒资产阶级的政府委员）就是政变吗？

为什么谁也没有试图、谁也没有威胁说，要把无数次举着“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旗帜走到彼得堡街上的人们送交法庭呢？

这些疯狂的人是在自己吓唬自己。

一个政府如果知道它的全体成员都是以大多数人民的意志为依据的，那它就不会害怕预先宣布的游行。

它就不会禁止这些游行。

只有自己知道多数人不在他那一边、人民群众都不赞成他的人，才会这样野蛮地发作，才会在恶毒的文章里这样暗示。

载于1917年6月24日(11日)

“真理报”第79号

按“真理报”原文刊印

“扰乱人心的謠言”

临时政府今天号召“市民”对“市内流传的扰乱人心的謠言”保持鎮靜。

苏維埃代表大会決議中有一句話是这样說的：“我們获悉，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想利用你們的（布尔什維克的）發勁。”這句話不会比其他各种“謠言”更扰乱人心，加倍地扰乱人心嗎？

难道这种“更荒唐的謠言”不会扰乱人心嗎？

載于1917年6月24日（11日）

“真理报”第79号

按“真理报”原文刊印

謎

普通的資產階級政府同不普通的、革命的、不認為自己是資產階級政府的政府有什麼區別呢？

據說區別在於：

普通的資產階級政府只要根據憲法事先宣布戒嚴，就可以禁止游行。

不普通的和准社會主義的政府根據只有它自己知道的“事實”，不需要任何理由，就可以禁止游行示威。

載於 1917 年 6 月 24 日（11 日）

“真理報”第 79 號

按“真理報”原文刊印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 及布尔什维克党团委员会就 禁止游行示威向全俄苏维埃 代表大会提出的声明草案³²

我們認為，工兵农代表苏维埃这样的特殊机关，是最能够代表大多数人民意志的全民机关，是最革命的議會。

我們过去和現在都在原則上拥护全部政权轉归这样的机关掌握，尽管它現在还操縱在敌視無产階級政党的护国派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手里。

苏维埃內部有矛盾，搖摆不定，对反革命無能为力，这是由于它容忍反革命的巢穴存在：10个資產階級的部长还没有同英法帝国主义資本断絕关系。这种搖摆不定就是現在苏维埃中大多数人神經过敏并且对指出它搖摆不定的人肆意辱罵的原因。

我們决不会讓我們反对反革命的斗争同护国主义內閣主义政党的“斗争”配合和协调起来。

只要10个具有十足的米留可夫精神和屬於米留可夫階級的資產階級反革命部长还在，我們就不能承認苏维埃的決議是正确的政权机关的正确決議。即使苏维埃取得了全部政权（这是我們所盼望的，也是我們始終支持的），即使苏维埃成了全权的革命議

会，我們还是不会服从它那些限制我們的宣传自由的決議的，如不許在后方或前綫散發传单，不許举行和平游行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我們宁願成为一个公开被迫害的秘密的党，也决不背弃自己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的原则。

我們是会这样做的，如果苏維埃代表大会要在俄国全体居民面前正式把我們当做“人民的敌人”或者“革命的敌人”。

禁止在三天內举行游行的那些理由中，我們在一定条件下只承認一点是正确的，即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想暗中利用这次游行。如果这是有事实根据的，如果整个苏維埃都知道反革命分子的名字（我們是从李伯尔和执行委员会其他人的口头通知中非正式地知道的），那就必然会立即宣布这些反革命分子是人民的敌人，逮捕他們，并且审讯他們的走狗和帮凶。

苏維埃沒有采取这些措施，因此它的正确理由只是在一定条件下才是正确的，或者完全是不正确的。

写于1917年6月11日(24日)

第一次載于1924年

“往事”杂志第24期

按手稿刊印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 彼得格勒委员会会议上 关于取消游行示威的发言

(1917年6月11日〔24日〕)

大多数同志对取消游行示威表示不满是十分正当的，但是中央不能不这样做，理由有二：第一、我们接到了半政权机关不许游行示威的正式禁令；第二、这个禁令所持的理由是：“我们获悉，暗藏的反革命势力想利用你们的发动。”为了证实这个说法，他们还向我们说出一些人的名字，其中有一位是将军，并且答应三天后逮捕他；又说黑帮分子要在6月10日举行游行示威，他们准备破坏我们的游行示威，把游行变成一场混战。

甚至在通常的战争中也会发生由于战略上的原因而取消已经决定的进攻的；在阶级斗争中，由于中间的小资产阶级的动摇，这种事情就更是可能了。要善于估计情况，当机立断。

取消游行是绝对必要的，后来的事件证实了这一点。今天策烈铁里发表了有历史意义的歇斯底里的演说³³。今天革命已经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他们已经禁止我们在三天内举行和平示威，还想禁止我们在代表大会召开期间举行示威，要求我们服从代表

大会的決議，并且用驅逐出代表大会来威胁我們。但是，我們已經声明过：我們宁願被逮捕，决不放弃宣传自由。

策烈鉄里的演說表明他是露骨的反革命分子，他声言不能用空話，不能用決議来同布尔什維克进行斗争，而是要剝夺他們手中的一切武器。资产階級革命的总结是：起初武装無产階級，然后解除它的武装，使它不能繼續前进。如果到了必須禁止和平示威的时候，那情况就已經是非常严重了。

策烈鉄里从临时政府内部来到代表大会上，明确地表示了他要解除工人武装的愿望。他表现得十分野蛮、疯狂，要布尔什維克站在革命民主派行列之外。工人应该冷靜地考虑，現在根本談不到举行和平示威了。情况比我們預料的要严重得多。我們举行和平示威，是要对代表大会的決議施加最大的压力，这是我們的权利，然而遭到了人們的指控，說我們进行陰謀活动，要逮捕政府人員。

策烈鉄里說，除布尔什維克外，沒有別的反革命分子。代表大会主席团、工兵代表苏維埃执行委员会全体、代表大会各党党团委员会，共同召开了一次特别庄严的大会来审判我們；在这个大会上，他們向我們說出了全部真相，宣布向我們进攻。

無产階級的回答是：最大限度地保持鎮靜、警惕、坚毅、有組織，牢牢記住，和平游行已經是过去的事情了。

我們不應該給人家进攻的口实，讓他們来进攻吧，工人很清楚，他們是在侵害無产階級的生存。但是，生活是有利于我們的，他們的进攻能否得手还不得而知，因为前綫軍隊的不滿情緒非常厉害，后方物价昂貴，經濟遭到破坏等等。

中央委员会不想对你們的決議施加压力。你們有权利对中央

委员会的行动提出抗議，这是合法的，你們是可以自由做出決議的。

第一次載于 1923 年“紅色史料”

杂志第 9 期

按 1917 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

彼得格勒委员会會議記錄原文刊印

轉 变 前 夕

俄国革命在其發展的第一阶段把政权交給了帝国主义資產階級，同时成立了与这个政权并列的苏維埃政权；在苏維埃中占多数的是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在革命的第二阶段（5月6日），形式上把公然無耻的帝国主义代表米留可夫和古契柯夫赶出了政府，实际上則使苏維埃中的多数党变成了执政党。我們党無論在5月6日以前或以后都处在反对党少数的地位。这是必然的，因为我們是站在国际主义立場上的社会主义無产階級政党。在帝国主义战争期間，站在国际主义立場上的社会主义無产階級，不能不反对进行这次战争的任何政权，不管它是君主政权、共和政权，还是“社会主义者”护国派的政权。社会主义無产階級政党一定会把由于战争长期拖延而遭到破产的人民大众愈来愈多地团結在自己周圍，因为人民不再相信这一伙为帝国主义效劳的“社会主义者”了，正如他們过去不相信真正的帝国主义者一样。所以从革命最初几天起就开始了反对我党的斗争。不管立宪民主党人和普列汉諾夫派的先生們反对無产階級政党的斗争采取怎样卑鄙下流的形式，它的實質总是清清楚楚的。这个斗争同帝国主义者和謝德曼分子反对李卜克內西和弗·阿德勒（德国“社会主义者”的中央机关报把他們两人說成是“疯子”，更不必說資產階級的报刊了，它們干脆把这两位同志說成是替英国效劳的“叛徒”）的斗争是一样的。这是

整个资产阶级社会（也包括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不管他们是怎么怎么革命）反对社会主义国际主义的无产阶级的斗争。

在俄国，这个斗争竟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帝国主义者企图借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领袖策烈铁里、切尔诺夫等人之手，猛烈地坚决地一举消灭无产阶级政党日益壮大的力量。于是，策烈铁里部长找到了反革命惯用的手法：指控我们阴谋叛国，把它作为进行坚决打击的借口。这种指控只不过是一个借口。问题的实质在于：听命于俄国和协约国帝国主义者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一定要把社会主义者国际主义者消灭干净。他们认为打击的时机成熟了。他们在主子的鞭策下，惶恐地决定：现在再不下手可就完了。

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和我们党应该尽量保持镇静，应该有高度的坚定性和警惕性。让未来的卡维涅克³⁴分子先动手吧。我们党在自己的代表会议上早就警告说他们会来的。彼得格勒无产阶级决不容许他们推卸责任。彼得格勒无产阶级要等待，要积蓄力量，准备在这些先生敢于采取实际行动的时候给他们回击。

载于1917年6月26日(13日)

“真理报”第80号

按“真理报”原文刊印

給編輯部的信

有人問我为什么不出席星期日晚上举行的执行委员会、代表大会主席团和党团委员会的联席会议。这是因为我主张布尔什维克应坚持原则，不要参加这次会议，同时要发表书面声明：我们不参加任何讨论这类问题（禁止游行）的会议。

尼·列宁

载于1917年6月26日（13日）

“真理报”第80号

按“真理报”原文刊印

俄国革命的对外政策

認為可以把对外政策同国内政策割裂开来的思想是一种最錯誤最有害的思想。这种严重的錯誤在战争期間显得更加严重。资产阶级做了它可能做到的和不可能做到的一切事情来支持和散布这种思想。人民群众对对外政策的了解比对国内政策差得多。連最自由的资本主义国家、最民主的共和国也严守外交“秘密”。

我国政府在对外政策的“事务”上巧妙地欺騙人民群众，使我們的革命三次遭到挫折。千百万份资产阶级报纸到处散布欺騙的毒素。

同两个最富强的帝国主义强盜集团中的一个集团結成联盟，——这就是资本主义现实所提出的目前对外政策的根本問題。资本家阶级就是这样提这个問題的。自然，那些仍然持有陈腐的资产阶级观点和偏見的广大小资产阶级群众也是这样提問題的。

那些在思想上跳不出资本主义关系的圈子的人不了解，为什么有觉悟的工人阶级不会拥护任何一个帝国主义强盜集团。反过来说，工人也不了解，为什么有人要攻击始終忠于反对各国资本家的各国工人兄弟联盟的社会主义者，說他們想同德国人单独媾和或实际上为这种事情效劳。这样的社会主义者（自然也包括布尔什維克）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贊同各国资本家之間的任何单独媾和。决不同德国资本家单独媾和，决不同英法资本家結成联盟，——这

就是觉悟的無产階級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

我国的孟什維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害怕同“英法”决裂，坚决反对这个綱領。他們在实际上执行資本主义的对外政策綱領，用“修改条約”、拥护“不割地的和平”等等冠冕堂皇的空話来粉飾他們的綱領。所有这些善良的願望都必将成为泡影，因为資本主义现实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問題：或者受某一个集团的帝国主义者支配，或者参加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

在这种斗争中有没有同盟者呢？有。那就是欧洲各被压迫階級，首先是無产階級；还有就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各国人民，首先是我們的邻居亚洲各国的人民。

孟什維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自称为“革命民主主义者”，但是他們实际上执行的是反革命反民主的对外政策。如果他們是革命者，那他們就会劝告俄国工人和农民去領導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各国人民和各被压迫階級。

惊惶失措的庸人們表示反对說：“如果那样做，其他各国資本家就会联合起来反对俄国。”这也有可能。“革命”民主派沒有权利發誓不进行任何革命战争。但是进行这种战争的实际可能性并不大。英帝国主义者和德帝国主义者不会“重修旧好”来反对革命的俄国。俄国革命早在1905年就引起了土耳其、波斯和中国的革命，現在如果能够同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工农結成真正革命的联盟来反对暴君和可汗，把德国人逐出土耳其，把英国人逐出土耳其、波斯、印度、埃及等地，那就会使德英帝国主义者陷于非常困难的境地。

法国和俄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喜欢援引1793年的历史，用这种有声有色的引証来掩盖自己对革命的背叛。俄国真正“革命的”

民主派能够而且应当本着 1793 年的精神来对待被压迫的落后的民族,而我們这里的人恰恰不願意考虑这一点。

同帝国主义者結成“联盟”,即可耻地依附他們,——这就是資本家和小资产者的对外政策。同先进国家的革命者和被压迫国家的人民結成联盟,反对所有的帝国主义者,——这就是無产阶级的对外政策。

載于 1917 年 6 月 27 日(14 日)

“真理报”第 81 号

按“真理报”原文刊印

矛盾的立場

今天報紙上刊載了代表大會譴責我們黨的決議，無疑地，一切覺悟的工人和士兵都會把它拿來同今天“真理報”發表的我們黨向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提出的聲明³⁵（11日宣讀的）作一個比較的。

代表大會的決議暴露了代表大會領袖們立場的矛盾，我們的聲明也非常清楚地揭露了這種矛盾。

代表大會決議的第一點也是最重要的一點這樣說道：“整個革命民主派——工人、士兵和農民的團結一致，是俄國革命成功的基礎和革命力量的基礎。”在這裡如果把“團結一致”理解為反對反革命的團結一致，那末這一點當然是十分正確的。但是，如果有一部分“工人、士兵和農民”通過他們的領袖去同反革命聯合和團結，那又怎麼辦呢？正是這部分“民主派”實際上已經不是“革命的”了，這難道還不清楚嗎？

我們認為某一部分“工人、士兵和農民”去同反革命“團結”是可能的，是可以想像的，這一點想必會使民粹主義者（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大為憤怒。

誰企圖用這種憤怒來抹殺我們的論據和掩蓋事情的實質，那我們只須援引那個決議的第三點來回答他們：“……有產階級中反革命階層的反抗正在增長。”這是實事求是的見解！如果不說“有產階級”（因為富裕的小資產階級也包括在“有產階級”之內）而說

資產階級或資本家和地主的反抗正在增長，那是完全正確的。

毫無疑義，資產階級的反抗正在增長。

但是要知道，臨時政府中的大多數正是操縱在資產階級手中，而同這個大多數團結在一起的——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組織上，在一個機關內，在內閣內——就是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的領袖！

這就是蘇維埃的領袖立場矛盾的關鍵所在，這就是他們的全部政策搖擺不定的根本原因。他們通過政府同資產階級結成聯盟，他們在政府中受大多數資產階級部長的支配，但同時他們又不得不承認“有產階級中反革命階層的反抗正在增長”！！

革命的無產階級政黨在這種情況下顯然只能“不肯定地”承認同聲名狼藉的“革命”（口頭上的，而不是實際上的）民主派“團結一致”。他們同反革命作鬥爭，我們就同他們團結一致；他們同反革命團結在一起，我們就不同他們團結一致。

現實生活已經把反革命資產階級的“反抗正在增長”這個問題提到日程上來了，因此，泛泛地談論“革命民主派已經行動一致、團結一致”來迴避這個主要的根本的問題，抹殺一部分革命民主派同反革命行動一致、團結一致的事實，都是不合邏輯的，不明智的。

由此可見，代表大會的決議中指責我們“秘密”準備遊行示威，堅持群眾性的發動和遊行必須事先通知蘇維埃或得到它的同意才能舉行等等，在原則上是站不住腳的。這些言論沒有任何意義。無產階級政黨決不承認這些言論。正如我們向公推代表大會提出的

执掌国家政权。苏維埃現在的領袖先生們，你們执政吧，——我們拥护你們执政，虽然你們是我們的政敌——这样你們才有权禁止或命令。現在你們還沒有执掌全国政权，还容忍 10 个資產階級部长来支配你們，你們是犯了軟弱和不果斷的毛病。

用“意志的明显表現”之类的空話来搪塞是不行的：意志如果是国家的，就應該表現为 政权机关 所制定的 法律，否則“意志”这两个字只是毫無意义的空气震动而已。先生們，只要你們考虑到法律，你們就不能不想到自由共和国的宪法是不会禁止任何政党、任何团体的和平游行和任何群众性的發动的。

矛盾的立場使革命思想即同反革命斗争的思想变得非常古怪，使国家（立宪）思想即一般的法律思想变得非常古怪。对我党的粗野的辱罵听不見了，一点也沒有了，完全沒有了！

把我們的游行倡議粗野地辱罵了一頓以后，又决定游行……几星期以后举行。

載于 1917 年 6 月 27 日（14 日）

“真理报”第 81 号

按“真理报”原文刊印

烏 克 兰

新的联合的临时政府的政策愈来愈明显地破产了。乌克兰中央拉达颁布并經全乌克兰軍人代表大会 1917 年 6 月 11 日通过的关于乌克兰国家结构的“万有法令”，就直接了当地揭露了这一政策，确鑿地証明了它的破产。

該法令宣布：“不脱离整个俄国，不同俄罗斯国家决裂，讓乌克兰人民自己有权利在自己的土地上安排自己的生活…… 确定乌克兰制度的一切法律，只有我們的乌克兰大会才有权颁布；确定整个俄罗斯国家領土上的制度的法律，应由全俄議會颁布。”

这些話說得非常明白。这些話極其确切地表明，乌克兰人民現在不願意脱离俄国。他們要求自治权，但是絲毫沒有否認“全俄議會”的必要性和最高权力。任何一个民主主义者都不会否認乌克兰人的要求是完全合理的，更不用說社会主义者了。任何一个民主主义者都不会否認乌克兰有自由脱离俄国的权利：只有無条件地承認这种权利，才有可能宣传乌克兰人和大俄罗斯人的自由联盟，宣传两个民族自願联合成一个国家。只有無条件地承認这种权利，才能实际地坚决徹底地同万恶的沙皇制度过去的一切决裂。万恶的沙皇过去采取一切手段使語言、居住地区、性格、历史十分相近的各族人民互相疏远，把大俄罗斯人变成乌克兰人民的劊子手，千方百計地使乌克兰人民仇視那不許乌克兰兒童使用和

學習本族語言的大俄羅斯人。

俄国革命民主派要想成为真正革命的真正民主派，就必须同过去的一切决裂，必须使乌克兰工人和农民重新像兄弟一样信任自己，信任俄国的工人和农民。不完全承认乌克兰的权利，包括自由分离的权利，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

我们不赞成分裂成许多小国家。我们主张各国工人结成最紧密的联盟，反对“本国的”和一切国家的资本家。但是这个联盟必须是自愿的，俄国工人决不相信俄国资产阶级，也不相信乌克兰资产阶级，而主张现在就让乌克兰人有分离权；同时不能硬要他们接受自己的友谊，要取得这种友谊，就要平等相待，把他们看做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中的同盟者和兄弟。

* * *

恶毒的半疯狂的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的“言论报”，对乌克兰人，对他们“擅自”做出的决议进行了粗暴的攻击。“乌克兰人的行为”似乎“是公开的违法行为，应该立即给予严厉的法律制裁”。横蛮的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的这种攻击是最明显不过的了。打倒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自由乌克兰的自由农民和工人同革命俄国的工人和农民的自由联盟万岁！

载于1917年6月28日(15日)

“真理报”第82号

按“真理报”原文刊印

什么是现在和“将来” 卡維涅克分子产生的阶级根源？

孟什維克策烈鐵里部长在他那篇臭名远扬的演说中曾威胁说要解除彼得格勒工人的武装，而这个党的机关报“工人报”却在第80号上对我们说：“一旦真正的卡維涅克出现，我们就会同你们在一个队伍里一起进行斗争。”

“工人报”这句意味深长的话特别明显地暴露了俄国的两个执政党孟什維克党和社会革命党的主要错误，因此值得大家注意。你们找卡維涅克找得不是时候，不是地方，——这就是内閣派机关报这句话的含义。

让我们来回忆一下卡維涅克的阶级作用。1848年2月，法国的君主制被推翻。资产阶级共和派上台执政。他们像我国的立宪民主党人一样，想建立“秩序”，说建立秩序就是恢复和加强警察、常备军、享有特权的官吏等君主制压迫群众的工具。他们像我国的立宪民主党人一样，想消灭革命，仇视革命无产阶级及其当时表现得还不很明显的“社会的”（即社会主义的）倾向。他们像我国的立宪民主党人一样，极端仇视要把法国革命传到整个欧洲去的政策，极端仇视要把法国革命变成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政策。他们像我国的立宪民主党人一样，巧妙地利用了路易·勃朗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让他当部长，使他从社会主义工人的领袖变成

他想要变的資產階級的随从和走狗。

这就是統治階級的階級利益、階級立場和階級政策。

另一种主要的社会力量是小資產階級，他們动搖不定，被紅色的怪影吓得魂不附体，并且受了反对“無政府主义者”的叫囂的影响。小資產階級幻想和空談“社会主义”，喜欢把自己称做“社会主义民主派”（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維克現在竟也用起这个名詞来了！），但他們不敢相信革命無產階級的領導，不了解这种恐惧心理必然会使自己去信任資產階級。因为在資產階級同無產階級进行残酷的階級斗争的社会里，特别是在革命必然使这个斗争尖銳化的情况下，“中間”路綫是不可能有的。而小資產階級的階級立場和它的意向的全部實質，就是想要有不可能有的东西，渴望有不可能有的东西，也就是渴望有这条“中間路綫”。

第三种起决定作用的階級力量是無產階級，他們所爭取的不是同資產階級“和解”，而是战胜資產階級，大胆地推进革命，而且在国际范围内推进革命。

这就是产生卡維涅克的客观历史基础。小資產階級的动搖不定使它“失去了”積極的活动家的作用，而法国的立宪民主党人卡維涅克將軍就利用小資產階級不敢相信無產者的心理，解除了巴黎工人的武装，大批槍杀工人。

革命就被这次历史上有名的屠杀断送了；在数量上占优势的小資產階級在政治上始終軟弱無力，一直做資產階級的尾巴，因此过了3年，在法国又以一种特別丑恶的形式恢复了君主制。

策烈鐵里在6月11日發表那篇有历史意义的演說，显然是受立宪民主党人卡維涅克分子指使的（可能是直接受資產階級部長們的指使，也可能是間接的，即受了資產階級报刊和資產階級輿論

提示，这个区别并不重要)。这篇有历史意义的演说之所以出名，并且具有历史意义，是因为策烈铁里非常天真地吐露了整个小资产阶级(包括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隐疾”。这种“隐疾”就是：第一、完全没有能力执行独立的政策；第二、不敢相信革命无产阶级，不敢全心全意地支持它的独立政策；第三、因此就必然会投靠立宪民主党人或一般资产阶级(即投靠卡维涅克分子)。

这就是问题的所在。策烈铁里或切尔诺夫本人，甚至克伦斯基，都不配扮演卡维涅克的角色，干这一手的是另一些人，他们在必要时会向俄国的路易·勃朗们说：“躲开！”但是策烈铁里、切尔诺夫之流却是执行那种使卡维涅克分子的出现成为可能和必要的小资产阶级政策的首领。

“一旦真正的卡维涅克出现，我们就会同你们在一起。”这是多么漂亮的诺言，多么善良的心愿！可惜这种诺言和心愿暴露了多愁善感、胆小怕事的小资产阶级所特有的对阶级斗争的不了解。卡维涅克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他并不是在特定的时间内“产生”的。卡维涅克是反革命资产阶级的代表，是这个阶级的政策的执行者。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先生们，你们现在所支持的正是这个阶级，正是这种政策！你们目前在国内外占显著的大多数，但是你们却让这个阶级及其政策在政府中占优势，即占优越的地位。

实际上，在全俄农民代表大会上几乎占统治地位的是社会革命党人。在全俄工兵代表大会上绝大多数代表是属于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联盟的。在彼得格勒区杜马选举时情形也是这样。事实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现在是执政党。而这个执政党却自愿地把政权(在政府中占多数)交给卡维涅克分子的政党！！

有墳就有鬼。有不坚定的、动摇的、害怕革命向前發展的小資產階級，就一定会有卡維涅克分子出現。

俄国目前的革命和法国 1848 年的革命有許多不同的地方，例如：現在在进行帝国主义战争；我国的近邻是比較先进的国家，而法国当时是与比較落后的国家为邻；土地运动和民族运动在开展。但是这一切只能改变卡維涅克分子出現的形式、時間、外因等等。这一切改变不了問題的实質，因为問題的实質是階級的相互关系。

路易·勃朗在口头上也和卡維涅克大不相同。同革命工人“在一个队伍里”一起反对資產階級反革命分子，这类諾言路易·勃朗也不知許下了多少。可是任何一个馬克思主义的历史家，任何一个社会主义者都决不会怀疑，正是由于路易·勃朗之流的軟弱、动摇、信任資產階級，才有卡維涅克产生，才使他获得了胜利。

以立宪民主党人为首的俄国資產階級的反革命性，以及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維克的小資產階級政党的动摇、懦怯、不坚定，必然产生俄国的卡維涅克分子。至于俄国的卡維涅克分子的成敗，那就完全要看俄国革命工人的坚定性和警惕性如何，力量如何。

載于 1917 年 6 月 29 日(16 日)

“真理报”第 83 号

按“真理报”原文刊印

怎样同反革命作斗争

几天以前，策烈铁里部长还在他那篇“有历史意义的”演说中声言不存在任何反革命势力。而今天在內閣派的“工人报”上所刊载的“可怕的征兆”一文中，却出现了完全不同的论调。

“到处都可以看到反革命正在动员的明显迹象。”

幸亏终于有人承认了这事实。

但是內閣派的机关报接着说：“我们不知道它的（反革命的）司令部在什么地方，不知道它组织得如何。”

原来如此！你们不知道反革命的司令部在什么地方吗？让我们来帮你们弄明白吧。先生们！组织起来的反革命的司令部在临时政府里，就在有你们6位同志参加的联合內閣里。反革命的司令部就在第四届国家杜馬的会议上；这次会议的首脑人物是米留可夫、罗将柯、叔尔根、古契柯夫、盛加略夫、曼努伊洛夫之流，而参加联合內閣的立宪民主党人则是米留可夫之流的左右手。反革命的司令部是由几个反动的将军组成的。在反革命的司令部里还有几个退休的高级官员。

如果你们不仅仅是埋怨反革命而还想同他们作斗争，那你们就应该同我们一起说：打倒10个资本家部长……

“工人报”接着指出，反革命的主要工具是狂热地鼓吹反犹太主义，唆使群众反对犹太人的报刊。这不错。但结论是什么呢？先

生們，你們不是执政党嗎？你們采取了一些什么办法来制裁这种下流的反革命报刊呢？你們既然自称为“革命民主派”，那末你們怎么能拒绝对这种为所欲为的显然是反革命的报刊采取革命措施呢？其次，你們为什么不讓国家机关报刊登广告，来杜絕下流的反革命报刊的主要收入来源，从而使它們基本上無法欺騙人民呢？实际上怎么能說，为了出版“新时报”、“小报”³⁶、“俄罗斯意志报”³⁷以及其他资产阶级的御用报纸，現在必須使成千上万的人脱离真正的生产劳动呢？

在同集中一切力量来攻击我們党的反革命报刊的斗争中，你們做了些什么呢？你們什么也沒有做！你們自己为他們的攻击提供材料。你們忙于同左边来的危险进行斗争。

先生們，你們会自食其果的。

如果你們仍然在资产阶级立場与革命的無产阶级立場之間动摇不定，那末过去如此，将来还会如此。

藏于1917年6月30日(17日)

“真理报”第84号

按“真理报”原文刊印

乌克兰問題和俄国执政党的失敗

在乌克兰問題这样一个極重大的問題上，俄国的执政党，即在政府中占多数、在經濟上拥有万能的資本的立宪民主党人和現在在国内占大多数的（但是在我們这个資本主义国家的政府中、在經濟方面是軟弱無力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維克，在全国范围内分明都遭到了失敗。

立宪民主党人的临时政府，即反革命資產者的临时政府，沒有履行自己基本的民主义务，沒有宣布贊成乌克兰自治，贊成它有分离的完全自由，而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維克竟容忍了这种行为。正如切尔諾夫部长今天在“人民事業报”上所說的那樣，乌克兰人的要求是最低的，他們只要求“临时政府頒布一項特別法令，宣布它不反对乌克兰人民自治”。这是一个最低最合理的要求，此外还有两个同样低的要求：（1）由乌克兰当地居民选出1名代表参加俄国中央政府；这个要求低到什么程度可以从下面的事实中看出来：1897年大俄罗斯人占俄国居民的43%，乌克兰人占17%，也就是說，乌克兰人可以要求在16个部长席位中占6个席位，而不是占1个席位！！（2）在乌克兰應該“由当地居民选出1名俄国中央政府的代表”，——难道还有比这些要求更合理的嗎？民主主义者憑什么权利可以违背“上級不应任命地方行政长官”这个已經由理論和民主主义革命的經驗証实了的原則呢？？

临时政府拒絕了这些最低最合理的要求，这是一件空前未有的丑事，这是反革命分子極端卑鄙的行为，这是大俄罗斯“警察”政策的真正表现，而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維克竟污辱了他們自己的党綱，容忍政府的这种行为，并且現在还在自己的报纸上为这种行为辯护！！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維克墮落到了多么可耻的地步！他們的机关报“人民事業报”和“工人报”近来的詭辯是多么可鄙！

混乱、騷动、“民族問題上的列宁主义”、無政府状态——这就是这两家报纸像野蛮的地主那样向乌克兰人發出的叫囂。

現在我們暫且撇开不談这种叫囂。請問他們的論据究竟是什么？

在立宪會議開幕以前，决不能“正确地”解决乌克兰的疆界問題、自决問題、征稅的权利問題等等，——这就是他們唯一的論据。他們要求“保證正确”，——“工人报”的一篇社論中所說的这类話就是他們的論据的全部实質。

但是，先生們，这显然是反革命分子的謊言，显然是他們的無耻行为，提出这种論据实际上就是帮助那些出卖革命的真正叛徒！！

“保證正确……”——請你們稍微想一想这种說法吧。在俄国的任何地方，無論在中央政府內 或是在某个地方机关內（除了彼得堡区杜馬这样小的机关以外），都不能保證正确，甚至根本不正确。国家杜馬和国家參議院的存在本身显然就不“正确”。临时政府的組成显然就不“正确”，因为这种組成是对俄国大多数农民、工人和士兵的意志和認識的侮辱。苏維埃（工农兵代表苏維埃）的組成显然就不“正确”，因为这种机关到現在还不能真正保證选举的普遍性和民主精神，但这并不妨碍我們党和全体工农群众認為它們在目前是大多数人民的意志的最好的表达者。俄国到处都不能

而且也不可能(在这样的革命时机从来就不能)“保証正确”，这一点大家都明白，誰也不会要求别的，大家都意識到这是不可避免的。

“我們”仅仅在乌克兰問題上要求“保証正确”!

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維克先生們，你們吓昏了，你們受了以罗将柯、米留可夫、李沃夫、捷列申柯、涅克拉索夫、盛加略夫之流为首的大俄罗斯地主和資本家的反革命叫囂的影响。你們現在已經完全被新出現的(和“暗藏的”)卡維涅克分子吓倒了。

無論在乌克兰人的決議中或是在他們的要求里，絲毫沒有可怕的东西，絲毫沒有混乱和無政府状态。答应这些最低最合理的要求吧，这样你們在乌克兰的威信也会像苏維埃(不能“保証正确”的苏維埃!!)在俄国各地单独享有的那样高。未来的議會，未来的立宪會議将不单单在乌克兰問題上，而且在所有問題上向你們和我国各族人民“保証正确”，因为現在在俄国，显然任何一个問題的处理都是不正确的。向乌克兰人讓步吧，——这才是明智的，否則事情会弄得更糟。强力压制不了乌克兰人，只能引起憤怒。向乌克兰人讓步吧，——这样你們才能为两个民族的互相信任、为締結平等的兄弟般的联盟开辟道路!

作为执政党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維克在乌克兰問題上遭到了失敗，因为他們受了反革命的立宪民主党人卡維涅克分子的影响。

載于1917年6月30日(17日)

“真理报”第84号

按“真理报”原文刊印

惩办包庇奸細的罗将柯 和鐘柯夫斯基！

根据檢察委员会对奸細馬林諾夫斯基案件所做的結論，可以确定这样一事实：

鐘柯夫斯基和罗将柯在1914年5月7日以前就已經知道馬林諾夫斯基是奸細³⁸。

这两个活动家都沒有告訴杜馬中各政党的代表、首先是布尔什維克的代表，說奸細藏在他們中間！！

这难道不是犯罪行为嗎？

在这以后，难道还可以認為鐘柯夫斯基和罗将柯是清白的公民嗎？

每一个政党請想一想吧！請說一說你們的意見吧！

載于1917年6月30日(17日)

“真理报”第84号

按“真理报”原文刊印

莫名其妙的歪曲

昨天“日报”³⁹和“新生活报”比别的报纸更加详细地登载了检察委员会⁴⁰的结论，并且引用了我的一段谈话。“交易所报”⁴¹没有登这段话，但在某些方面更全面地叙述了这个结论。

上述两个报纸登载的我的谈话是这样开头的：“我不相信这里有奸细活动。”前面没有加省略号。这简直是胡闹，意思是说我现在还“不相信”。

只有像这两个报纸那样莫名其妙地进行歪曲，才会出现这种无稽之谈。实际上我是这样说的：“我个人不止一次地这样想过（在馬林諾夫斯基的奸细活动被揭发以前）；在阿捷夫案件⁴²以后，无论什么事情都不会使我惊奇。但是我之所以不相信这里有奸细活动，不仅因为我沒有看到罪证，也因为……”（以下同“日报”所说的一样：即使馬林諾夫斯基是奸细，暗探局还是得不到它想得到的东西，因为我们这里的一切事情都是通过两个合法基地进行的，等等。）

由此可见，在我的谈话中所说的是过去。“日报”和“新生活报”^①却莫名其妙地把它歪曲了，无中生有地说我说的是现在。

① 在这两个报纸上还有一个地方印错了：“布尔什维克不举行武装起义”中“不”字应改成“要”字。

这就同我实际上所說的完全相反了。

载于1917年6月30日(17日)

“真理报”第84号

署名:尼·列宁

按“真理报”原文刊印

执政的和負責的党

苏維埃代表大会和农民苏維埃执行委员会要共同成立一个統一的或者說联合的中央委员会，这是最近几天的事。已經提到日程上来的这个問題不久就会解决。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維克在成立中央委员会的方法問題上發生的小小“爭吵”，一点也不值得注意，因为这不过是两个同样持有护国主义（即支持掠夺战争）和內閣主义（即支持反革命资产阶级的政府）观点的政党之間的小小的爭执而已。

成立中央委员会这件事有很大的意义，它突出地說明了目前的政局与以往不同。現在大多数居民是跟着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維克（大家知道他們結成了联盟）走的，这一点最清楚地說明了目前的政局。

全俄农民苏維埃、正在开会的全俄士兵和工人代表苏維埃代表大会以及彼得堡区杜馬的选举，最清楚地表明了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維克的联盟是俄国的执政党。

这个联盟現在显然拥有大多数人民。毫無疑問，在即将成立的統一的或联合的苏維埃中央委员会（或者叫做苏維埃會議，——名称看来还没有确定）中，它也会占多数。

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維克党是执政的和負責的党。

这就是說明目前政局的主要事实。如果說在彼得堡选举以前，在农民代表大会以前，在苏維埃代表大会以前，孟什維克和社

会革命党人还可以拿多数人的意志沒有明显地表达出来、立宪民主党人似乎也会拥有多数这类理由来蒙蔽大家，那末現在就不能再这样支吾搪塞了。人为的迷雾已經消散了。

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維克先生們，你們拥有多数，你們是执政党，或者确切些說，是执政的联盟。你們是負有責任的。

在一般的宣传鼓动方面，特別是在立宪會議的选举运动中，我們現在的主要任务是：極其詳尽地、实事求是地和明明白白地向广大的工农群众說明，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維克是执政党，他們現在要对我国的政策負責。到現在为止，他們並沒有对我国的政策負責，因为他們的党还没有明确自己是大多数，宁願把自己說成是立宪民主党执政下的“在野党”。但是現在的情况無疑是：多数人是跟着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維克走的。

他們要对国家的全部政策負責。

他們現在要对“联合內閣”执政一个半月以来的后果負責。

他們要对政府中多数部长来自反革命資產階級的政党这一点負責。人人都知道、看到和感觉到，如果沒有苏維埃代表大会和全俄农民苏維埃的同意，这些部长是一天也当不成的。

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維克要对政策的主要矛盾負責，这些矛盾愈来愈尖銳，愈来愈严重，愈来愈清楚地說明群众对这个政策是不滿的。

——口头上“斥責”掠夺战争和“要求”不割地的和平。实际上正是繼續进行掠夺战争，同臭名昭彰的掠夺者——英法等国的帝国主义者勾結在一起。实际上是根据这些盟国的要求、根据尼古拉二世为了使俄国地主和資本家發財致富而簽訂的掠夺性的秘密条約准备进攻。

实际上是执行兼并政策，即强迫一些民族（阿尔巴尼亚、希腊）并入一个国家或一个帝国主义者集团。在“革命的”（但是在反革命道路上行进的）俄国内部也执行着这种兼并政策，把芬兰和乌克兰看成被兼并的民族，而不把他们看成真正自由的、真正平等的、具有不容置疑的自治权和分离权的民族。

——口头上说“资本家的反抗看来已经打垮了”，像执政联盟的部长彼舍霍诺夫所吹嘘的那样。实际上就连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决议也不得不承认，“有产阶级”（即反革命资产阶级，它在16个部长席位中占10个席位，并且在经济方面实际上完全占着统治的地位）“的反抗正在增长”。

——口头上答应实行监督和调节，答应要抽100%的利润（斯柯别列夫部长）。实际上一个半月以来什么也没有做！没有采取一项切实可行的严厉措施来对付实行同盟歇业的资本家，对付进行投机倒把的商人和银行巨头！！

现在不来一一列举那些显而易见的矛盾了。上面指出的已经足够了。

经济破坏即将到来。危机已经迫近。灾难以不可阻挡之势来临了。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还在告诫资本家，还在威胁他们说要抽100%的利润，还在吹嘘什么资本家的反抗已经打垮；还在写决议和空洞的计划，写空洞的计划和决议。

灾难临头了。执政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联盟要对此负全部责任。

载于1917年7月1日（6月18日）

“真理报”第86号

按“真理报”原文刊印

又是一个委员会

經濟破坏已經开始了。資產階級正在展开全綫进攻。必須采取坚决的措施。

临时政府想采取些什么措施呢？

为了挽救俄国，为了同經濟破坏作斗争，为了組織經濟生活，它拟定了成立新組織的草案以及同經濟崩潰作斗争的詳細計劃。

領導“組織国民經濟和劳动”的全部工作的是經濟委员会。

終於采取措施了，并且从言論轉到了行动。好極了，早就是时候了！

但是，这个經濟委员会的成員是怎样的呢？

誰去同經濟破坏作斗争呢？誰去同資本家、企業主和厂主的罪恶政策作斗争呢？

原来在这个委员会里資本家占压倒的多数。这不是开玩笑嗎？！

請看这个可敬的机关的成員吧：

資產者部长	6 人
資本家(銀行理事会、証券交易和农業等)的代表	9 人

总 計 15 人

工人(工兵代表苏維埃)代表.....	3人
工会代表	3人
农民代表苏維埃代表	3人
<hr/>	
总 計	9人

此外还有陆軍部长和劳动部长各一人以及合作社的代表三人参加。

可見,决定一切的将是資本家。

还要成立一个机关,这个机关即使是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不会带来任何好处。

此外,照例又要成立多得不可胜数的大小委员会、常委会等等。

他們就是想这样来同經濟破坏作斗争的。

真是害死人……

載于1917年7月1日(6月18日)

“真理报”第85号

按“真理报”原文刊印

六月十八日

不管怎么說，六月十八日在俄国革命史上是一个轉变的日子。

各階級間的相互关系，它們在斗争中的相互关系，它們的力量，特别是各政党的力量对比，——这一切都在星期日的游行示威中暴露得非常清楚、非常明白、非常深刻，因此，無論今后發展的进程和速度如何，人們的覺悟和認識总是有了很大的提高。

游行示威在数小时內像吹散一撮塵土似的吹散了布尔什維克是陰謀家的謠傳，并且十分清楚地表明，俄国劳动群众的先鋒队，首都的工業無产階級和軍隊，絕大多数是拥护我們党一向主张的口号的。

工人和士兵大队的步伐很整齐。約有 50 万人参加游行示威。他們一致行动。他們一致团結在口号的周围，最普遍的口号是：“全部政权归苏維埃”，“打倒 10 个資本家部长”，“决不同德国人单独媾和，决不同英法資本家簽訂密約”等等。凡是看到游行示威的人，都不怀疑这些口号在俄国工人和士兵群众的有組織的先鋒队中的胜利。

六月十八日的游行示威，成了革命無产階級的力量和政策的示威，無产階級指出了革命的方向，指出了摆脱絕境的道路。星期日游行示威的伟大历史意义就在这里，它同革命烈士安葬日和五一的游行示威的原則性区别就在这里，那两次游行示威是全体人

民对革命的最初胜利和对革命英雄的敬礼，是人民对自己最迅速最顺利地走向自由的第一阶段的回顾。五一是充满着愿望和希望的日子，这些愿望和希望是同全世界工人运动的历史以及它的和平和社会主义的理想联系着的。

前两次游行示威都没有想要指出革命今后发展的方向，也不可能指出这一方向。前两次游行示威都没有在群众面前并且代表群众提出具体的、明确的和迫切的问题，革命应当向哪里走，应当怎样走。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六月十八日的游行示威是第一次有行动的政治示威；它说明（不是在书本或报纸上，而是在大街上；不是通过领袖，而是通过群众）各阶级为了推进革命，正在怎样行动和想要怎样行动。

资产阶级躲藏起来了。在各政党自由提出口号的情况下，在主要目的是反对反革命的情况下，资产阶级拒绝参加显然是大多数人民举行的和平的游行示威。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资产阶级也就是反革命。资产阶级躲避人民，策划真正的反革命阴谋来反对人民。现在俄国的执政党即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在六月十八日这个有历史意义的日子，清清楚楚地表明自己是动摇的党。他们的口号表现出动摇，大家看得很清楚，赞成他们的口号的是少数。站在原地不动，一切照旧，——他们的口号、他们的动摇就是这样劝告人民的。但是，人民已经感觉到，他们自己也已经感觉到，这是不可能的。

俄国无产阶级先锋队，俄国工人和士兵群众的先锋队说：动摇得够了。的确动摇得够了。信任资本家，信任他们的政府、他们的改良主义的挣扎、他们的战争和他们的进攻政策，——这种信

任的政策是要落空的。这种信任的政策很快就会破产，并且一定会破产。这也将是执政党即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的破产。经济破坏日益逼近。除了掌握政权的革命阶级采取革命办法以外，是无法避免这种破坏的。

讓人民同信任資本家的政策决裂吧，讓人民信任革命的阶级無产阶级吧。無产阶级，只有無产阶级，才是力量的源泉。無产阶级，只有無产阶级，才能保證为大多数人的利益服务，才能保證为受战争和資本压迫但有能力战胜战争和資本的被剥削劳动群众的利益服务。

空前未有的危机已經逼近俄国和全人类。唯一的出路是信任被剥削的劳动群众最有組織的先进部队，拥护它的政策。

我們不知道人民是否很快就会懂得这个道理，同时在实际上貫徹得怎样。但是，我們深知，除此以外沒有其他摆脱絕境的出路；我們深知，一切可能發生的动摇或反革命的暴行是不会有什麼結果的。

除了人民群众完全信任自己的領導者無产阶级以外，沒有別的出路。

載于1917年7月3日(6月20日)

“真理报”第86号

按“真理报”原文刊印

革命、进攻和我們的党

策烈鉄里在向苏維埃代表大会报告进攻⁴³已經开始的时候說：“俄国革命的轉变关头已經到来。”是的，不仅俄国革命的轉变关头，而且世界大战整个进程的轉变关头也已經到来。俄国政府經過三个月的动搖之后，实际上是根据“盟国”政府的要求做出了决定。

进攻被說成是为了和平。于是各国帝国主义者就“为了和平”而把军队投入战斗，每次进攻的时候，每个交战国的將軍們都給士兵打气說，这次进攻一定会迅速地取得和平。

各国帝国主义者这种慣技被俄国的“社会主义者”部长們用最漂亮的詞句裝飾起来，在这些詞句里，社会主义、民主、革命这些字眼就像灵巧的魔术师手中的道具一样被玩弄得有声有色。但是，任何漂亮的詞句都掩盖不了下面这个事实：俄国的革命军队被派去作战是为了达到英国、法国、意大利、日本和美国帝国主义者的目的。过去的齐美尔瓦尔得派、現在的劳合一乔治的伙伴切尔諾夫的任何詭辯都不能掩飾这一点：即使俄国军队和俄国無产階級确实沒有抱侵略的目的，也絲毫不会改变两大世界托拉斯的斗争具有的帝国主义掠夺的性質。只要使俄国同其他国家的帝国主义者联結在一起的密約还没有修訂，只要俄国的同盟者利鮑、劳合一乔治和索尼諾还在繼續談論他們的对外政策的侵略目的，俄国軍

队的进攻就永远是为帝国主义者服务的。

策烈铁里和切尔諾夫之流反駁說：但是要知道，我們曾經再三声明我們拒絕进行任何侵略。我們說，这就更坏，这恰巧說明你們的言行不一致，因为实际上你們是在为俄国的和外国的帝国主义服务。你們一开始積極地帮助“盟国的”帝国主义，那你們就是積極地为俄国的反革命效劳。一切黑帮分子和一切反革命分子都对你們政策上的坚决轉变表示高兴，这就再明显不过地証实了这一点。是的，现在是俄国革命的轉变关头。以“社会主义者”部长为代表的俄国政府，竟做出了帝国主义者部长古契柯夫和米留可夫都做不出的事情，它把俄国军队交給这样的司令部和外交官去指揮，那些人是依据尚未废除的密約、为了这些密約、为了利鮑和劳合一乔治公开宣布的目的而行动的。但是，政府之所以能够完成自己的任务，就是因为军队相信它，跟着它走。军队肯去牺牲，就因为他們相信自己是为了自由、为了革命、为了更迅速地取得和平而献出生命的。

军队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它也是在革命現阶段跟着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維克党走的人民的一部分。大多数人目前还相信孟什維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依賴資本家的小資产階級政策，这个总的和基本的事实决定了我們党的立場和行动。

我們要努力不懈地繼續揭露政府的政策，仍然要像过去那样郑重地警告工人和士兵們不要对分散的、無組織的行动抱有奢望。

問題在于全民革命所处的阶段。策烈铁里和切尔諾夫之流依附了帝国主义，他們正在使这个阶段充滿小資产階級的幻想和小資产階級的空話，以便掩飾这个最無耻的帝国主义。

这个阶段应当結束了。我們要促使这个阶段更快地毫無痛苦

地結束。結束这个阶段一定会使人民摆脱最后的小资产阶级的幻想，一定会使政权轉到革命阶级的手中。

載于1917年7月4日(6月21日)

“真理报”第87号

按“真理报”原文刊印

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維克 先生們，你們同普列汉諾夫的 區別究竟在哪里？

“人民事業報”屢次指責“統一派”是社会帝国主义者。“工人報”也正式表示过反对同“統一派”建立选举联盟（在所有区杜馬几乎都进行了选举以后）。

目前开始的进攻驅散了这些言論散布的烟幕，向人民揭露了一个赤裸裸的事实。每个人都看到，普列汉諾夫同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維克的領袖們，对开始进攻这个重大的实际問題的态度是一致的。

“社会帝国主义者”（按照“人民事業報”的說法）就是你們所有的人，——既是“統一派”，也是克倫斯基和切尔諾夫、策烈鐵里和斯柯別列夫。

載于1917年7月4日（6月21日）

“真理報”第87号

按“真理報”原文刊印

罗将柯怎样为自己辩护

“俄罗斯意志报”第 143 号刊载了罗将柯的谈话，罗将柯认为“真理报”和“工人报”谴责他包庇马林诺夫斯基是“不公正的”。原来马林诺夫斯基早在 1914 年 4 月 22 日就对罗将柯说过，马林诺夫斯基是个奸细，但是要求罗将柯“保证”（!!!）不把这件事情告诉任何人。

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但是这是事实。罗将柯向暗探提出了“保证”，并且没有把这件事报告杜马议员。不论是我们党或是整个社会都因奸细马林诺夫斯基继续在它们中间活动而感到困惑……因为罗将柯已经向暗探提出“保证”不告发奸细了。

难道这是可以容忍的吗？

难道可以认为罗将柯不是罪犯吗？

截于 1917 年 7 月 4 日（6 月 21 日）

“真理报”第 87 号

按“真理报”原文刊印

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維克 把革命引导到哪里去？

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維克引导革命去服从帝国主义者。

进攻就是重新挑起帝国主义战争。彼此交战的两大资本家同盟的相互关系没有发生任何重大的变化。俄国在2月27日的革命之后，仍然是那些同英法帝国主义资本结成同盟并保留以前沙皇密约的资本家把持大权。继续进行战争，它的经济性质和政治性质仍旧和从前一样；仍旧是那个帝国主义的银行资本统治着经济生活，仍旧是那些密约在起作用，仍旧是实行一个帝国主义者集团反对另一个帝国主义者集团的对外政策。

孟什維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过去和现在所讲的都是空话，实际上不过是用甜言蜜语来掩饰重新挑起帝国主义战争的勾当罢了，这种勾当自然而然地博得了一切反革命分子、整个资产阶级和普列汉诺夫的一片热烈的赞许声。孟什維克的“工人报”说普列汉诺夫是“跟着资产阶级报刊转”的，其实它自己也是跟着一帮社会沙文主义者转的。

只是不要忘记目前重新挑起的帝国主义战争的特点。重新挑起战争是经过三个月的动摇之后开始的，当时工农群众曾千百次地谴责侵略战争（这时俄国实际上正在继续支持进行侵略、掠夺的资产阶级政府）。群众摇摆不定，他们好像要在本国履行3月14

日告全世界人民書向 別國 人民提出的忠告：“拒絕充当 銀行家 手中的侵略和壓迫工具。”而在我們這裡，即在“革命民主的”俄國，群眾實際上正是成了“銀行家手中的”侵略和壓迫工具。

這種情況的特點在於：它是由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黨在比較有自由來組織群眾的條件下造成的。目前正是這些黨取得了大多數，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和全俄農民蘇維埃都確定無疑地證明了這一點。

現在正是這些黨要對俄國的政政策負責。

正是這些黨要對重新挑起帝國主義戰爭的做法負責，要對實際上是一伙資本家為了“戰勝”另一伙資本家而重新造成千百萬人的犧牲負責，要對因進攻而必然使經濟破壞再度尖銳化負責。

在我們這裡，小資產階級群眾顯然是在自己欺騙自己，而資產階級則在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的幫助下欺騙小資產階級群眾。口頭上這兩個黨是“革命民主派”。實際上正是它們把人民的命運交給了反革命資產階級，交給了立憲民主黨人，正是它們從革命退到了繼續進行帝國主義戰爭，正是它們在政權問題上（例如由上面“批准”地方上居民選舉的政權）、土地問題上（無論是孟什維克或社會革命黨人都放棄了他們的綱領，即支持農民的革命進攻，直到沒收地主的土地）和民族問題上（為立憲民主黨對烏克蘭和芬蘭的反民主主義態度辯護），從主張民主退到了向立憲民主黨人“讓步”。

小資產階級群眾不能不搖擺在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各國的情形，特別是 1789—1871 年各國的情形，都是如此。俄國現在的情形也是如此。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引導群眾去服從反革命資產者的政策。

目前形势的实质就在于此。进攻的意义就在于此。目前的特点是：不是暴力而是对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信任使人民走上了迷途。

这种情况会保持很久吗？

不会很久的。群众一定会从亲身的经验中学到东西。战争的新阶段（现在已经开始）的惨痛经验，因进攻而加剧的新的经济破坏的惨痛经验，必然导致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的政治崩溃。无产阶级政党的任务首先就是帮助群众理解和正确估计这个经验，正确地准备这个大崩溃，这个崩溃将向群众指明，他们的真正领袖是有组织的城市无产阶级。

载于1917年7月5日（6月22日）

“真理报”第88号

按“真理报”原文刊印

用“雅各宾主义”能够 吓倒工人阶级嗎？

“社会主义思想”（不要笑！）的机关报，即资产阶级沙文主义的“日报”第91号又提到了6月18日“言论报”的那篇十分有趣的社论。“日报”完全不了解，这篇社论正好是历史学家兼凶恶的反革命资产阶级写的。“日报”从社论中得知“立宪民主党人退出联合政府的意志是坚定不移的”。

这算不了什么。立宪民主党人进行威胁是想吓唬一下策烈铁里和切尔诺夫之流。这没有什么了不起。

重要的和有趣的是写6月18日“言论报”社论的人是怎样从历史学家的观点来提出政权问题的。

他写道：“如果过去的政府人员还能够对俄国革命的进程实行某种领导，那末显然，现在俄国革命一定会按照一切革命的自發规律发展下去……政府人员配备不当的状况继续存在是不恰当的，这个问题不仅由布尔什维克”（注意这一点：不仅由布尔什维克！）提出过……“也不仅由苏维埃的大多数提出过……问题还应当由资本家部长自己提出来”。

历史学家正确地认为，不仅布尔什维克，还有各个阶级的全部相互关系，即整个社会生活也把“政府人员配备不当的状况继续存在是不恰当的”这个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了。实际情况就是动摇。

帝国主义资产阶级走向胜利的可能出路就是进攻。是否有别的可能出路呢？

历史学家在“言论报”上回答这个问题说：

“苏维埃取得‘全部政权’后，很快就会发现它的权力是很小的。它应当用历史上经过考验的青年土耳其党和雅各宾党的办法去弥补权力的不足……把全部问题重新提出之后，苏维埃是愿意向下滚到雅各宾主义和恐怖手段呢，还是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呢？这就是在最近几天应当解决的迫切问题。”

历史学家说得对。不管是不是在最近几天，反正很快就应当解决这个问题。或者是进攻，转向反革命，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事业取得胜利（能保持很久吗？），切尔诺夫和策烈铁里之流“袖手旁观”。

或者是实行“雅各宾主义”。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们认为雅各宾主义是堕落（“向下滚”）。无产阶级的历史学家们认为雅各宾主义是被压迫阶级争取解放的斗争极其高涨的一种表现。雅各宾党人给法国做出了民主革命的最好榜样和打击反对共和政体的君主联合的最好榜样。雅各宾党人没有取得完全的胜利，主要是因为18世纪法国的周围大陆上都是极端落后的国家；法国本身也没有实行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没有银行，没有资本家辛迪加，没有机器工业和铁路。

在20世纪的欧洲或横跨欧亚的地方，“雅各宾主义”就是革命阶级即无产阶级的统治。得到贫苦农民支持的无产阶级，依靠现在已经具备的实行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不仅能够做出18世纪雅各宾党人做过的伟大的、不可磨灭的、令人难忘的一切，而且能够在世界范围内把劳动者引导到彻底的胜利。

資产階級生来就仇視雅各宾主义。小資产階級生来就害怕雅各宾主义。覺悟的工人和劳动者确信政权会轉归革命的被压迫的階級,因为雅各宾主义的实質以及摆脱危机、破产和战争的唯一出路就在这里。

載于1917年7月7日(6月24日)

“真理报”第90号

按“真理报”原文刊印

論建立俄国农业工人工会的必要性

第一篇文章

必須向正在彼得堡举行的全俄工会代表會議⁴⁴提出一个極端重要的問題，就是成立全俄农业工人工会的問題。

俄国的一切階級都組織起来了。但是最受剝削、生活最苦、最分散和最受摧殘的俄国农业雇佣工人階級似乎被遺忘了。在一些非俄罗斯的边疆地区，例如在拉脫維亞边区，有农业雇佣工人的組織。但是在大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絕大多数省份中，还没有农业無产階級的階級組織。

俄国無产者的先进部队——产业工人工会的最伟大的义不容辞的責任，就是帮助自己的弟兄农业工人。組織农业工人有很大的困难，这是很明显的，所有資本主义国家的經驗也都証实了这一点。

因此，必須尽量迅速地積極地利用俄国的政治自由，立即成立全俄农业工人工会。正是工会代表會議才能够而且应当去做这件事。正是現在出席代表會議的經驗較多、修养較好、觉悟較高的無产階級代表，才能够而且应当向农业工人發出号召，号召他們靠攏自己，参加独立組織起来的無产者队伍，参加他們的工会队伍。正是工厂的雇佣工人应当發揮主动性，应当利用遍布全国的工会基

層組織、小組和分会，推动农业工人去进行独立的活动，积极争取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捍卫自己的阶级利益。

也许有许多人认为，目前甚至可能是大多数人都认为，全国农民已经组织起来，已经宣布了废除土地私有制和“平均”使用土地的办法，现在来成立农业工人工会是不恰当的。

恰恰相反。正是在这个时候，成立农业工人工会是非常恰当和迫切需要的。下面是布尔什维克在1906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并为孟什维克所接受的一个原理，从那时起它一直包含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党纲中，凡是持有无产阶级阶级的阶级观点的人，都不会怀疑它的正确性。这个原理是这样的：

“在民主土地改革的一切场合和一切情况下，党的任务是：始终不渝地为建立农业无产阶级的独立的阶级组织而努力；向农业无产阶级说明他们的利益和农业资产阶级的利益是不可调和地对立的；警告他们不要被小经济制度迷惑住，因为在商品生产条件下的小经济制度是永远不能消灭群众的贫困的；最后，指出必须进行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说明这是消灭一切贫困和一切剥削的唯一手段。”

任何一个觉悟的工人，任何一个工会会员，都不会不承认这个原理是正确的。既然问题涉及到农业无产阶级的独立的阶级组织，那末使这个原理成为现实正是工会应做的事情。

我们希望，正是在革命时期，当一般劳动群众特别是工人生气勃勃地力图显示自己的力量，为自己开辟道路，坚持由工人自己独立解决劳动问题来建立新的生活方式的时候，工会不要局限于狭隘的行会利益，不要忘记自己的比较软弱的弟兄农业工人，而要用一切力量来帮助他们成立俄国农业工人工会。

在下一篇文章中，我們試圖指出这方面应当采取的几个实际步骤。

第二篇文章

在前一篇文章中，我們論述了俄国农业工人工会问题的原则意义。现在再来谈一谈这个问题的若干实际方面。

俄国农业工人工会应包括所有在农业企业中主要地甚至部分地从事雇佣劳动的工人。

至于是否有必要把这样的工会分成纯粹农业工人的工会和只是部分地从事雇佣劳动的工人的工会，这要由实际经验来表明。这一点无论如何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所有出卖自己劳动力的人的基本阶级利益是一致的，把所有靠给“别人”做工来取得全部或部分生活资料的人团结在一起是绝对必要的。

城市中、工厂中的雇佣工人同农村中的雇佣工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前者向后者发出的号召不会得不到响应。但是不应仅仅限于号召。城市工人具有更多的经验、知识、人力和物力。应当实实在在拿出一部分力量来帮助发动农业工人。

必须规定一个日子，一切有组织的工人都应当把这一天所得的工资拿出来，用于发展和巩固城乡雇佣工人联合的整个事业。拨出一部分款子完全用在城市工人帮助农业工人实现阶级联合的事业上。拿这笔钱来印发许多最通俗的传单，出版农业工人的报纸（即使最初是周刊也好），派遣哪怕是少数鼓动员和组织员到农村去，立即在各地进行建立农业雇佣工人工会的工作。

只有这种工会本身的经验，才有助于找到今后开展工作的正

确道路。每一个这样的工会的首要任务，应当是改善在农业企业中出卖自己劳动力的工人的生活状况，争取更高的工资和更好的食宿条件等等。

必须展开最坚决的斗争来反对这样一种看法，即以为将来废除了土地私有制就能够使每一个雇农和短工“得到土地”，就能够把农业中的雇佣劳动连根除掉。这是一种错误的看法，而且是极端有害的看法。废除土地私有制是一个重大的而且无疑是进步的改革，这种改革无疑是符合经济发展的利益和无产阶级的利益的，每一个雇佣工人都会全心全意地支持它，但是这种改革还丝毫不能废除雇佣劳动。

土地是不能吃的。没有牲畜、农具、种子，没有存粮和钱，要经营土地是不可能的。相信有人会“帮助”农村雇佣工人得到牲畜、农具等等的“诺言”（不管是谁说的），是最严重的错误，是不可饶恕的幼稚。

一切工会运动的基本规则的第一信条，就是不要相信“国家”，只要相信本阶级的力量。国家是统治阶级的组织。

不要相信诺言，只要相信本阶级团结和觉悟的力量！

因此，农业工人工会的迫切任务应当是：不仅要一般地争取改善工人的生活状况，而且特别要在即将开始的伟大的土地改革中捍卫本阶级的利益。

农民和社会革命党人常常这样议论：“雇工必须受乡委员会的支配。”农业雇佣工人阶级的看法则恰恰相反：乡委员会必须受“雇工”的支配！这种对比清楚地表明了雇主的立场和雇佣工人的立场。

“土地归全民所有”，这是正确的。但是人民还分为各个阶级。

每一个工人都知道、看到、感觉到、体验到这个被资产阶级故意抹杀和被小资产阶级经常忘记的真理。

誰也帮助不了单个的贫农。如果农村雇佣工人——雇工、短工、贫苦农民、半无产者不能自己帮助自己，那末任何“国家”都帮助不了他们。自己帮助自己的第一个步骤就是成立农业无产阶级的独立的阶级组织。

我們希望全俄工会代表会议能够用最大的力量来做这件事，向全国发出号召，向农村无产者伸出援助的手，伸出有组织的无产者先锋队的强有力的手。

載于1917年7月7日（6月
24日）、7月8日（6月25日）
“真理报”第90、91号

署名：尼·列宁

按“真理报”原文刊印

松 懈 的 革 命

“一切都是布尔什維克的过錯”，——無論是領導反革命的立宪民主党人，或者是自称“革命民主派”但每天都违反民主和革命的“社会革命党人”同孟什維克結成的亲密集团，都同意这种說法。

“一切都是布尔什維克的过錯”，——經濟破坏日益严重，沒有同它进行任何斗争，粮食状况很糟，临时政府在乌克兰和芬兰問題上的“失利”，这一切都应当怪布尔什維克。也許可以認為某个可恶的布尔什維克潛入温和謙遜、謹慎小心的芬兰人当中而“煽动了”全体人民吧！

反对布尔什維克的恶毒的和疯狂的普遍叫嚣，卑鄙的扎斯拉夫斯基之流的先生們和“言論报”、“工人报”匿名作者的卑鄙的誹謗活动，都不过是松懈的革命的代表者因为一連串的政治“失利”而必然产生的“發泄”而已。

立宪民主党是反革命资产阶级的政党。在俄国执政的社会革命党人同孟什維克的联盟也承認这一点，这个联盟在苏維埃代表大会的決議中宣称，有产阶级的反抗正在增长，形成了反革命的基础。同时，这个由于沒有气节而每天受“言論报”責难的联盟，又同立宪民主党人結成了联盟，并且这是一个靠参加临时政府而巩固起来的最奇怪的联盟！

两个联盟——社会革命党人同孟什維克的联盟以及这个联盟

同立宪民主党人的联盟統治着俄国，而立宪民主党人又同比他們更右的一切政党結成了联盟。革命的松懈必然由此产生。因为这个执政的“联盟的联盟”的每一部分都是松懈的。

立宪民主党人自己也不相信自己的共和主义了，目前躲在立宪民主党人背后并投票拥护他們的形形色色的十月党人和保皇党人，也愈来愈不相信共和主义了。立宪民主党人不相信“社会联盟派”，情願用他們派遣的部长去“进行”种种“安撫”，同时因农民群众和部分工人的“过分要求”而大发雷霆，可是农民群众和部分工人听了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維克的冠冕堂皇的諾言（“既滿足劳动者，又不得罪资本家”）就相信了他們，居然下賤地等待和要求真正实现这些諾言！

社会联盟派是互不信任的，社会革命党人不信任孟什維克，孟什維克也不信任社会革命党人。直到現在还没有一个“最亲爱的一半”敢于比較明确地、公开地、原則性地向大家正式表明，司徒卢威式的“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和“土地权”的拥护者是怎样联合起来的，由于什么联合起来的，为了什么联合起来的，联合到了什么程度。这两个“最亲爱的一半”中的一个的内部也是四分五裂：社会革命党人的代表大会以 136 票对 134 票“反掉了”克倫斯基，这使“老太婆”⁴⁵ 退出了中央委员会，而中央委员会的解释是，沒有选举克倫斯基似乎完全是因为要他担任的内閣职务太繁重（不像切尔諾夫那样）。“右派”社会革命党人在“人民意志报”上責罵自己的党及其代表大会，左派則挤在“土地和自由报”⁴⁶ 上大胆地談出了群众不要战争，并且仍然認为战争是帝国主义的战争。

以受到“統一派”（昨天在彼得堡的选举中还同整个孟什維克党保持联盟）“青睐”的波特列索夫为首的右翼孟什維克轉移到了

“日报”方面。左翼对国际主义表示同情并且正在创办自己的报纸。銀行通过“日报”同波特列索夫分子结成联盟，包括波特列索夫和馬尔托夫在内的所有孟什維克通过“統一的”孟什維克党结成联盟。

这不是松懈嗎？

“护国主义”掩盖不住这个松懈的革命，因为甚至在現在，甚至在重新挑起帝国主义战争以后，甚至在进攻所引起的狂欢的情况下，在一个同盟中，波特列索夫的拥护者向波特列索夫的反对者的“进攻”更加激烈了，在另一个同盟中，克倫斯基的拥护者向克倫斯基的反对者的“进攻”也更加激烈了。

“革命民主派”不再相信革命，他們害怕民主，最怕同英法資本家决裂，怕俄国資本家不滿。（“我們的革命是資產階級革命”——这就是切爾諾夫部长“本人”信仰的同时被唐恩、策烈鐵里和斯柯別列夫可笑地歪曲了的“真理”。）立宪民主党人仇視革命和民主。

这不是松懈嗎？

反对布尔什維克的野蛮的、恶毒的和疯狂的普遍叫嚣，正是立宪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維克对本身的松懈的普遍抱怨。

他們是大多数。他們掌握政权。他們互相结成联盟。他們也看到自己一事無成！！怎么能不对布尔什維克大發雷霆呢？

革命提出了异常困难的、極其重要的、具有世界意义的問題。不实行依靠被压迫被剝削群众忘我的英雄主义的最坚决的革命措施，不使这些群众信任和支持自己的有組織的先鋒队無产階級，就不能战胜經濟破坏，也不能从帝国主义战争的可怕的铁鉗下掙脱出来。

群众目前还在試圖“比較容易地”，即通过立宪民主党人同社

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維克的联盟結成的联盟去寻找出路。

出路是沒有的。

載于 1917 年 7 月 8 日(6 月 25 日)

“真理报”第 91 号

按“真理报”原文刊印

階級变动

任何革命，只要是真正的革命，归根到底都是階級变动。因此，提高群众覺悟的最好方法，揭露用革命誓言欺騙群众的行为的最好方法，就是分析这一革命中究竟發生了和正在發生怎样的階級变动。

在1904—1916年沙皇統治的最后几年，俄国的階級对比表现得特別鮮明。以尼古拉二世为首的一小撮农奴主和地主掌握了政权，他們同那些在欧洲获得了空前利潤的財政資本巨头結成最緊密的联盟，在外交上簽訂了对自己有利的掠夺性条約。

以立宪民主党人为首的自由資產階級采取了反对立場。但它害怕人民比害怕反动势力还要厉害，它通过同君主制的妥协接近了政权。

在被迫轉入地下的領導者領導下的人民即工人和农民是革命的，他們是無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革命民主派”。

1917年2月27日的革命消灭了君主制，使自由資產階級掌握了政权。自由資產階級曾經直接同英法帝国主义者达成協議，想搞一个小小的宮廷政变。它無論如何也不想超过有产者的立宪君主制一步。当革命真正發展到要徹底消灭君主制建立苏維埃（工兵农代表苏維埃）的时候，自由資產階級就完全成了反革命的階級。

現在，政變已經過去4個月了，立憲民主黨這個自由資產階級的主要政党的反革命性已經暴露無遺。大家都看到了這種反革命性，而且不得不承認這種反革命性。但遠不是所有的人都願意正視這個真理並且考慮它的意義。

現在，俄國是一個民主共和國，由各個在人民中間進行自由鼓動的政党進行自由協商來管理國家。在2月27日以後的4個月中間，所有比較大的政党都完全團結起來和組織起來了，在選舉（蘇維埃和地方機關的選舉）中出頭露面了，這些政党同各階級的联系也暴露出來了。

現在，在俄國掌握政權的是反革命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即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黨已經成了反革命資產階級“陛下的反對派”。這些黨的政策的本質就是同反革命資產階級妥協。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為了執掌政權，首先佔據了地方機關（就像自由派在沙皇制度下首先奪取地方自治局一樣）。現在這個小資產階級民主派想同資產階級分掌政權而不推翻資產階級，這跟過去立憲民主黨人想同君主制分掌政權而不推翻君主制一模一樣。小資產者和大資產者的深厚的階級血緣關係使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同立憲民主黨人妥協，就像資本家和20世紀的地主的階級血緣關係使他們圍繞在“崇高的”君主周圍一樣。

妥協的形式改變了：在君主制度下，這種形式是笨拙的，沙皇只准許立憲民主黨人在國家杜馬中佔一個角落。在民主共和國時代，妥協已經成了歐洲式的巧妙的妥協，准許小資產者在內閣中佔無害的少數，起無害（對資本家來說）的作用。

立憲民主黨人佔據了君主的位置。策烈鐵里和切爾諾夫之流佔據了立憲民主黨人的位置。無產階級民主派佔據了真正革命民

主派的位置。

帝国主义战争空前迅速地加快了一切的发展。没有帝国主义战争，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很可能望着部长的肥缺兴叹几十年。但是这个战争正在继续加快一切的发展。战争不是改良主义地、而是革命地提出了问题。

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可能给俄国提出不少同资产阶级妥协的改良办法。但是客观的世界政治形势是革命的，改良不能改变这种形势。

帝国主义战争蹂躏着、摧残着各国人民。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大概只能短时期地延缓各国人民的死亡。只有革命的无产阶级才能使他们得救。

载于1917年7月10日(6月27日)

“真理报”第92号

按“真理报”原文刊印

革命毅力的奇迹

我們的准社会主义部长們正在發揮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毅力。彼舍霍諾夫說，“資本家的反抗看来已經打垮了”，在我們神聖的俄罗斯，一切都要“平均”分配。斯柯別列夫声称，要抽資本家100%的利潤。策烈鐵里声称，無論从民主或社会主义的观点来看，在帝国主义战争中实行进攻是最正义的事情。

但是，切尔諾夫部长無疑是打破了这一切奇妙毅力的記錄。在临时政府最近一次會議上，切尔諾夫要立宪民主党的先生們听他作他那个部的一般政策报告，并且宣称，他已經提出整整十項法案！

这豈不是革命毅力的奇迹嗎？从5月6日到現在还不到6个星期，在这短短的时期內竟許下了整整十項法案！都是些什么法案呢？內閣派的“人民事業报”报道說，这些法案“包括了农村經濟生活的一切基本表現”。

不多不少，正好是“一切表現”…… 干嗎要發誓呢？

可疑的一点是：內閣派的報紙用100多行的篇幅来列举这些宏伟的法案中的若干法案，但是对任何一項法案都沒有加以說明。“取消某些关于农民的法令”……那些法令，不知道。最有趣的是“关于調解室”的法案。調解誰和誰，怎样調解，不知道。“調整租佃关系”是完全令人莫解的；是不是指租佃那些無償地征用的

地主土地，也不知道。

“改革是要使地方土地委员会更加民主化”……編造冠冕堂皇的諾言的先生們，你們馬上举出哪怕是十个地方土地委员会，确切地說明它們的成分在現在，即在革命后仍然不完全是民主的（照你們的自供），这不是更好嗎？

切尔諾夫部长以及上面提到的其他部长的積極活动，非常清楚地說明了自由派官吏和革命民主派之間的區別，这就是問題的實質。

自由派官吏向“上司”即向李沃夫、盛加略夫先生等作的是关于几百項造福人类的法案的大报告，而送給人民的呢……送給人民的只是一大堆廢話、諾言和諾茲德烈夫^①式的謊話（如抽100%的利潤和前綫的“社会主义”进攻等等）。

革命民主派在向“上司”提出报告的同时，甚至在提出报告之前，就向群众揭露一切弊病和一切缺点，向人民的毅力呼吁。

“农民們，揭露地主，揭露他們借‘地租’之名向你們搜刮了多少錢，揭露他們在‘調解室’或地方土地委员会捞了多少錢，揭露他們如何制造許多麻煩来阻挠种地，阻挠把地主的农具分配給农民、特别是貧苦农民使用的工作！农民們，你們大家来揭露，而我，‘革命俄国的部长’，‘革命民主派的部长’，要帮助你們把这些材料全部公布出来，通过你們在下面的压力和我在上面的压力来消灭一切压迫!!!”真正革命民主派的言行难道不是这样的嗎？

哪兒会有这样的事！他們根本不会这样做！請看內閣派的报纸是用什么口吻来談切尔諾夫向李沃夫先生等作的“报告”的。

^① 諾茲德烈夫是果戈里的小說“死魂灵”中的人物，是一个专講廢話、喜欢吹牛的典型。——譯者注

“維·米·切尔諾夫不否認某些省份在土地問題上發生过一系列的过火行为，但同时認為，整个說来，农村比預料的要平穩得多”……

在談到“停止土地买卖”这项唯一提得明确的法案时，对于延期执行这项法案的原因却只字未提。早就答应了农民立刻停止土地买卖，早在5月就答应了，而6月25日的消息却說，切尔諾夫已經作了“报告”，但是临时政府“尚未做出最后决定”!!!

載于1917年7月10日(6月27日)

“真理报”第92号

按“真理报”原文刊印

空話与事实

斯柯別列夫部长發表了一篇告全国工人書。他以“我們”(就是这样說的)社会主义理想的名义,以革命的名义,以革命民主派的名义,以……的名义,向工人宣传“調解室”的作用,并且严厉地斥責各种各样的“越軌”行动。

請看,这位准社会主义者,这位孟什維克斯柯別列夫部长唱得多么好听:

“你們(工人們)完全有理由对有产階級在战争期間大發其財表示憤怒。沙皇政府濫用了人民的几十亿金錢。革命政府应当把这些錢归还人民的国庫。”

唱得倒好听,……可是天晓得做不做!

斯柯別列夫先生的告工人書是6月28日發表的。联合內閣是5月6日組成的。在这一段時間內,国家面临着非常严重的破产和崩潰,可是政府并没有对發了“几十亿”財的资本家采取任何有效措施!要把这几十亿“归还人民的国庫”,在5月7日就应当頒布一条法律,废除商業秘密和銀行秘密,立即对資本家的銀行和辛迪加实行監督,否則,不仅無法“归还”这几十亿,而且根本不可能找到它。

現在好几个星期已經过去了,孟什維克斯柯別列夫部长能够办到和必須办到的都没有办到,难道他認為工人是用不兌現的諾

言(把“几十亿归还人民的国庫”是不可能的,只要能停止盜窃国庫,退还个把亿,也就謝天謝地了)就能騙得过的小孩子嗎?

不幸就在孟什維克斯柯別列夫部长拿着一筐子最精彩的关于共和国的、革命的和“社会主义的”空話在工人面前散播的时候,就在这一天,主张把护国派(就是沙文主义者)同工人“联合”起来的阿維洛夫同志却妙不可言地恰好在“新生活报”上写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沒有結論,但是有事实。

世界上再沒有比这些普通事实更雄辯的东西了。

5月5日联合內閣組成了。在庄严的宣言中,它答应……实行监督,甚至还要“組織生产”。5月16日,彼得格勒苏維埃执行委员会通过了一項“指令”并把它交給自己的部长們,要求“立即(請注意!)最坚决地实行(千真万确,就是这样写的!)国家調整生产”以及其他等等。

于是就开始坚决地实行国家調整生产了。

5月19日柯諾瓦洛夫辞职,并且發表了一篇非常“坚决”的声明来反对……“極端的社会主义者”!6月1日召开了全俄工商業代表會議,會議表示坚决反对监督。在柯諾瓦洛夫走了以后,留下来的三位副部长“坚决地实行了”以下几項措施:第一副部长斯切潘諾夫在頓巴斯煤矿主的糾紛(用意大利式的罢工破坏生产)中,支持……企業主。从此,企業主就不再接受斯柯別列夫的任何調解了。

第二副部长帕尔欽斯基对“燃料會議”实行怠工。

第三副部长薩文想建立一种“部門協商會議”来調整生产,实际上这对調整生产是一种“拙劣的甚至是愚蠢的諷刺”。

6月10日,第一副部长斯切潘諾夫交給临时政府一个“报

告”，……对执行委员会的綱領提出了异議。

6月21日，苏維埃代表大会又通过了決議……

下面自己起来建立了供应委员会。上面答应成立总的“經濟委员会”。第二副部长帕尔欽斯基解释說：“該机构(經濟委员会)何时开始工作，还很难确定”……

听起来这簡直是笑話，但这是事实。

資本家嘲弄工人和人民，他們一方面繼續实行隱蔽的同盟歇業政策和隱藏不正当利潤的政策，另一方面却打發斯柯別列夫、策烈鉄里、切尔諾夫之流用空話去“安慰”工人。

載于1917年7月12日(6月29日)

“真理报”第94号

按“真理报”原文刊印

資本家先生們是怎樣 把利潤隱藏起來的

(关于監督的問題)

大家对監督談得真多！可是这許多談話的內容却很少。人們用一般的空話、夸夸其談的詞句、庄严的“草案”（这种草案注定永远是草案）掩盖了問題的本質！

問題的本質在于，如果不废除商業秘密和銀行秘密，不立即頒布商業賬目必須对工会公开的法令，那末一切关于監督的言論，一切关于監督的草案就都是空談。

这就是对这个問題的一个小小的然而值得十分注意的說明。一位同志是銀行職員，他告訴了我們以下的材料，这些材料說明資本家怎样把利潤藏在正式的決算表里面。

在1917年5月7日的“財政通報”第18期上，公布了彼得格勒貼現放款銀行的決算表。根据这个決算表，該銀行的純利一共是1300万卢布（准确数字是1296万，本文打算用整数，把准确数字放在括号內）。

但是，只要仔細研究一下決算表，內行的人立刻就会看出，这远不是全部利潤，很大一部分利潤都狡猾地藏其他項目里面了，如果不徹底废除商業秘密和銀行秘密，任何一种“捐稅”，任何“强制性的公債”，以及一切財政措施，都不可能捉住这部分利潤。实际上，特种后备資本的項目上有550万卢布。正是在这种所謂准

备金或后备資本的項目上，往往列入了想要隱藏的利潤。比方我是一个百万富翁，得到了 1700 万卢布的利潤，要拿出 500 万儲存备用，那只要把这 500 万列入“后备資本”，事情就保險了！关于“国家監督”、“国家征收利潤稅”等等的法令都管不着了！！

其次，在这个決算表中，利息和手續費收入項目上的金額差不多有 100 万卢布（825 000 卢布）。这个銀行職員写道：“如果收到的利息不記在利潤項目上，那末請問，一般說來銀行的利潤是由哪些款項构成的呢？”

第三、前几个年度利潤結余項目上的金額为 30 万卢布，可是在利潤總額中沒有列入这一笔錢！！这就是說，連前面提到的一項总共隱藏了一百多万的利潤。同样，一笔“沒有發給股東的股息”224 000 卢布也沒有列在利潤總額內，而股息由純利支付是人人知道的事情。

第四、決算表中還有“結余金額”3 800 万卢布。銀行職員写道：“这是一笔什么結余金額呢？沒有直接参加这个工作的人是很难确定的。只能这样說：在編制決算表时，在‘結余金額’的名义下可以隱藏部分利潤，然后再从这里轉移到‘应当轉移的地方去’。”

結論是：所謂 1 300 万卢布的利潤，实际上大概是 1 900 万到 2 400 万，达到 3 000 万固定資本的 80%。

在沒有廢除商業秘密和銀行秘密以前，政府对資本家的威胁啦，政府向工人許下的諾言啦，政府征收大資本家 90% 的利潤的草案和法令啦，都不过是一些空話，这不是很清楚的嗎？

截于 1917 年 7 月 12 日（6 月 29 日）

“真理報”第 94 号

按“真理報”原文刊印

危机日益逼近，破坏日益严重

每天都有警报。各式各样的蠢人对我們大肆攻击，說我們“过于着急”要把全部国家政权轉到工兵农代表苏維埃手中，說“更合适更妥当的”是安安靜靜地“等待”循規蹈矩的立宪會議。

現在連这些小資產階級蠢人中最蠢的人都能看出，生活是不会等待的，不是我們“着急”，而是經濟破坏逼迫得紧。

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維克的小資產階級懦弱性促使他們作出这样的决定：目前我們还是把政权留在資本家手中吧，也許經濟破坏会“等待”立宪會議！

每天的事实都在說明，經濟破坏大約是不会等待立宪會議的，崩潰已經提前發作了。

就拿今天公布的事实來說吧。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維埃执行委员会經濟部决定“通知临时政府”：“莫斯科地区（15个省）五金工業的情况極其危險”，“古讓工厂管理处显然在瓦解生产，有意識地使企業停工”，因此“国家政权”（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維克恰巧是要把这个政权留在古讓的党手中，即留在实行同盟歇業的反革命資本家的政党手中）“应当自己管理这个工厂，……供給它流动資金”。

要求立即撥給 500 万卢布的流动資金。

協商會議（由經濟部和莫斯科工人代表苏維埃供給部代表組

成)“請临时政府注意”(可怜的、天真的、幼稚的临时政府啊!它是不知道这一点的!它是無罪的!它一定会明白过来,唐恩、切列万宁、阿夫克森齐也夫、切尔諾夫之流是会劝告它、忠告它的!),“莫斯科工厂协商會議和莫斯科地区供給委员会临时局已經被迫阻止科洛姆納机車制造厂以及別热茨克的索尔莫夫斯克工厂和布良斯克工厂停工。尽管如此,索尔莫夫斯克工厂現在还是因工人罢工而停工,其余的工厂每天都可能停工”……

灾难是不等待的。它异常迅速地逼近我們。阿·桑多米尔斯基了解頓巴斯的情况,他掌握的事实無疑是有根据的,今天他在“新生活报”上写道:

“情况愈来愈严重了,缺乏煤,缺乏五金,缺乏机車和机車車輛,生产停頓。在这个时候,煤却被烧掉了,有的工厂把五金囤积起来,需要五金的地方却得不到五金。”

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維克支持的政府公然阻挠同經濟破坏进行斗争。阿·桑多米尔斯基报道了一件事实:由于工厂主發出了怨言,商業部副部长帕尔欽斯基(实际上是同策烈鉄里、切尔諾夫之流一伙的)知道頓巴斯委员会要調查五金数量,就禁止(!!)“擅自”(!!)成立的监督委员会进行調查。

請考虑一下,这会成为一种什么样的疯人院呢? 國家正在毁灭,人民处于飢餓和破产的前夕,虽然有煤和鉄,但是很不够。頓巴斯委员会要通过工兵代表苏維埃对五金数量进行調查,也就是給人民寻找鉄。工厂主和資本家的奴僕帕尔欽斯基部长却同策烈鉄里、切尔諾夫之流一起禁止这种調查。危机不断增长,灾难日益逼近。

从什么地方、用什么方法才能拿到錢呢? 一个工厂“要”500

万卢布还容易办,但是必須懂得,把所有的工厂需要的加起来就多得多了,这不是很明显的嗎?

不实行我們在四月初要求的和宣传的那种措施,不把所有的銀行合并成一个銀行并且对这个銀行实行监督,不废除商業秘密,就拿不到錢,这不是很明显的嗎?

古讓之流和其余的資本家在帕尔欽斯基这些人的帮助下,“有意識地”(这是执行委员会經濟部所用的字眼)使企業停工,政府是站在他們那一边的。策烈铁里和切尔諾夫之流不过是一种裝飾品、一种傀儡罢了。

先生們,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維克作为一个政党,必須在人民面前对这些灾难負責,这一点現在难道还不明白嗎?

載于1917年7月13日(6月30日)

“真理报”第95号

按“真理报”原文刊印

怎么办？

“工人报”对进攻的政治意义感到不安。该报一位撰稿人甚至责备另一位撰稿人说，他的支吾搪塞的詞句最終是等于承認，現在俄国革命軍队客观上不是为不割地的和平流血，而是为协約国資產階級的掠夺計劃流血（“工人报”第93号第二版小品第一栏）。

請看，进攻的这种“客观”意义已經不能不使一部分还追随孟什維克的工人群众感到不安了。这种情緒就反映在“工人报”上面。该报不願同工人公开决裂，总是想把“进攻”同革命無产階級爭取和平的斗争联系起来。可是，刚刚相反，这里根本不能建立任何联系，这就是狡猾的編輯部倒霉的地方。

很难想像还有比这个可尊敬的編輯部更可怜更混乱的了，这些人被他們自己和社会革命党人招来的陰魂吓倒了。

一方面，“工人报”报道說：“現在西方把俄国进攻的意义完全理解錯了。英国和法国的資產階級报纸認为这种进攻就是放弃苏維埃的‘空想’計劃。在向克倫斯基和进攻的革命軍队致敬的幌子下，通过了沙文主义的決議。在俄国进攻的雷鳴般的战鼓声中，加紧对拥护俄国民主派并且和他們承認同一个和平綱領的人进行迫害。”

这种自供真是宝貴極了！尤其是出現在內閣派的报纸上，因为这个报纸昨天还認为我們預先指出进攻的必然后果是別有用心

的。原来，問題不在于布尔什維克“別有用心”，而在于苏維埃的領袖們執行的政策有自己的一套邏輯，遵循這套邏輯的結果就是國內外反革命力量的加強。

這正是“工人報”總想掩蓋的不愉快的事實。編輯部建議的辦法是極其簡單的：“工兵代表蘇維埃代表大會中央執行委員會必須同農民代表蘇維埃一起立即明確地莊重地聲明：對俄國民主派來說，戰爭的目的仍然和從前一樣”等等。請看，孟什維克是多麼堅決地反對帝國主義戰爭，他們準備再作一次緊急的莊重的聲明。他們不知道作過多少次這種最“緊急”、最“莊重”、最“熱情”的聲明了。他們用最迅速的方式不知道重複過多少次這種最莊重的聲明，目的不過是想用這些話來稍微緩和一下政府（內閣派的“工人報”是全力支持這個政府的）的處境。

先生們，你們錯了，最“莊重的”詞句、宣言和照會並不能沖淡你們自己報道的事實。要改變這種情況，只有拿出行動來，真正拋棄繼續進行帝國主義戰爭的政策。但是李沃夫、捷列申柯、盛加略夫、克倫斯基和策烈鐵里的政府是不可能這樣做的。這個政府對芬蘭和烏克蘭的怯懦可憐的政策，只是証實自己完全不能實現關於“不兼併”和關於自決“權”的最“莊重的”聲明。在這種情況下，所有講空話的宣言都是用來迷惑群眾的幌子。用響亮的宣言來迷惑群眾，而不展開“無產階級爭取和平的鬥爭”，這就是“工人報”的綱領，這就是該報對反革命力量因進攻而加強的真正回答。

載于1917年7月13日(6月30日)

“真理報”第95號

按“真理報”原文刊印

他們是怎樣欺騙和 為什麼要欺騙農民的？

大家都知道，在全國的農民代表來到彼得格勒參加全俄農民代表蘇維埃會議時，社會革命黨人和政府都答應過農民要立刻禁止土地買賣。

彼列維爾節夫部長最初確實想履行這個諾言，並且發出電報禁止土地買賣。但是後來不知是誰的一隻看不見的手干預了這件事，於是彼列維爾節夫部長便從公證人那里收回自己的電報，就是說，又准許土地買賣了。

農民焦急不安了。如果我們沒有弄錯，那他們是派了一個特別代表團到內閣去的。

有人來安慰他們，說服他們，像哄小孩一樣，要他們相信：馬上就會頒布禁止土地買賣的法律，“只是”為了頒布這項法律才“耽擱了”彼列維爾節夫的臨時命令。

社會革命黨人安慰了農民，用諾言滿足了他們。農民相信了，放心了，就都回去了。

時間一周一周地過去。

6月24日（一直到6月24日），報紙上出現了一條消息，說社會革命黨領袖切爾諾夫部長向政府提出了關於禁止土地買賣的法案（還僅僅是法案）。

6月29日，報紙上發表了关于国家杜馬在6月28日举行“非正式會議”的消息。据“言論报”（这是在临时政府中占多数的党的报纸）报道，在这次會議上，罗将柯先生

“在他的結束語中就政府采取新”（哦，的确非常新！新到極点！）“措施談到了土地买卖問題。他說，如果禁止土地买卖，那就会使土地失去价值，”（对誰來說失去价值呢？显然是对地主！！但是要知道，农民正要把土地从地主手里夺过来！）“使貸款的抵押品贬值，而土地占有者”（过去的土地占有者，罗将柯先生！）“便得不到任何貸款。于是米·弗·罗将柯先生問道：土地占有者将怎样向銀行償清自己的債務呢？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債款都已經逾期，而根据这项法案的規定，将不經拍賣而立刻取消土地所有权。

因此，米·弗·罗将柯建議會議委托一个临时委员会去考虑，設法阻撓这项不是摧毁土地所有制而是危害国家的法律实现”。

請看，那只“看不見的手”已經清清楚楚地暴露出来了！請看，联合政府和准社会主义部长們的这套“巧妙的把戏”，已經被过去是国家杜馬的主席、地主、劊子手斯托雷平的亲信、奸細馬林諾夫斯基的庇护人——說話不小心的罗将柯先生揭穿了！

我們就假定說，現在，在这位罗将柯先生如此愚蠢地泄漏了秘密之后，禁止土地买卖的法律还是頒布了，最后还是頒布了！

但是要知道，問題不仅在这里。問題还在于，通过这个鮮明的例子，我們应当理解，并且应当帮助农民群众理解，农民是怎样受騙和为什么会受騙的。因为这畢竟是無可爭辯的不容置疑的事实：农民受騙了，他們在全俄农民代表苏維埃會議上答应农民要立刻实行的措施并没有立刻实行。

他們是怎样欺騙农民的呢？用諾言来满足他們。这就是世界上一切联合內閣，即有社会主义的叛徒参加的資產階級內閣的“巧妙把戏”。在这种內閣中，以前的社会主义者就是（不管他們是否

意識到这一点)資本家欺騙群众的工具。

他們为什么要欺騙农民呢？因为作为欺騙工具的社会革命党人本身不了解階級統治的巧妙把戏和目前操縱俄国的階級政策(根据對他們的最好假設)。社会革命党人沉溺于空談。但实际上正像罗将柯“事件”極其明显地証实的那样，統治俄国的是两个集团的集团，两个联盟的联盟。

一个是立宪民主党人和保皇党地主的集团，罗将柯先生則是这个集团的首脑。在彼得堡选举的时候，一切黑帮报纸以及一切比立宪民主党更右的报纸都支持立宪民主党人，这就証实了这个集团在俄国的出現已經成为一个政治事实。这个集团能够在政府中占多数，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維克的过錯。这个集团阻挠禁止土地买卖的措施，这个集团支持地主和实行同盟歇業的資本家。

另一个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維克的集团，这个集团用空洞的諾言来欺騙人民。斯柯別列夫和策烈鉄里，彼舍霍諾夫和切尔諾夫都曾經許下一大堆諾言。許諾言是容易的。“社会主义的”部长用諾言欺騙人民的手法在一切先进国家中都試用过，結果到处都遭到破产。而俄国的特点則是：由于国内的革命形势，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維克党的破产将会更加徹底，将会来得更快。

讓每个工人和每个士兵都通过这个对农民特別有教益的例子，好好地向农民解释他們是怎样受騙和为什么会受騙的！

农民决不能同資本家結成联盟(同盟)，农民只有同工人結成联盟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

載于1917年7月14日(1日)

“真理报”第96号

按“真理报”原文刊印

誰的責任？

在內閣派的“工人報”上，恩·羅斯托夫先生從一些士兵的來信中摘錄了幾段話，說明農村極端愚昧無知。作者說：他擁有（作者自己的話）工兵代表蘇維埃執行委員會鼓動部的一大包全國各地的來信，這些信件都發出同樣的呼聲：報紙！請送報紙來！

孟什維克作家恍然大悟，驚慌地叫喊起來：“如果不能使農民在實際上清楚地看到革命對他們的極大好處，那末他們就會起來反對革命”……農民“仍舊是愚昧無知的”。

擁有這包信件的孟什維克內閣官員未免醒悟得晚了一點。從5月6日起，即從孟什維克為資本家效勞時起，已經有7個多星期了，在這個時期，資產階級和反革命的謊言，他們對革命的誹謗，通過處於優勢地位的資產階級報紙，通過孟什維克所支持的資本家政府的直接間接的奴僕和擁護者，已經自由地泛濫到農村去了。

假如不是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出賣革命，假如不是他們支持反革命的立憲民主黨，政權在5月初就轉到執行委員會手中了，執行委員會就能夠馬上對報紙上的私人廣告實行國家壟斷，用這個辦法就能夠獲得幾千萬份報紙，免費分送農村。那時，大規模的印刷廠和大量的紙張才会在執行委員會的掌握下為教育農村而“服務”，再不讓那些實際上在新聞事業中占優勢的資產階級反革命報紙去蒙蔽農村。

那时,执行委员会就能够解散国家杜馬,从而节省一笔人民的金錢(其他方面更不用說了),用这笔錢就可以派遣一千个甚至几千个鼓动員到农村去。

在革命时期,延迟革命有时就等于完全背叛革命。迟迟不把政权交給工人、士兵和农民,迟迟不采取革命的措施教育愚昧無知的农村,这完全应当由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維克負責。他們在这一点上背叛了革命。他們使工人和士兵在同反革命的資產階級报纸和鼓动作斗争时不得不局限于目前的“手工業”方式,虽然工人和士兵是能够而且应当握有全国性的宣传武器去进行这种斗争的。

載于1917年7月14日(1日)

“真理报”第96号

按“真理报”原文刊印

立宪民主党人退出內閣 是指望什么？⁴⁷

产生这个问题是很自然的。为了采取一定的策略来正确地应付事变，就必须正确地了解这些事变。怎样来了解立宪民主党人的退出內閣呢？

是由于气愤嗎？是由于在乌克兰問題上發生了原則性的分歧嗎？当然不是。誰要是以为立宪民主党人还有什么原則性，以为資產階級还能够由于气愤而行动，那簡直是可笑。

事情决不是这样。只能这样理解：立宪民主党人退出內閣是經過一番考虑的結果。他們是怎样考虑的呢？

要管理一个完成了一次大革命、还没有稳定下来的国家，又是在全世界發生了帝国主义战争的时候，那就需要一种極其勇敢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充滿忘我热情的首創精神以及真正的革命階級的气魄。或者是用暴力鎮压真正革命的階級（立宪民主党从5月6日起就这样宣传了），或者是服从它的領導。或者是同帝国主义資本結成同盟：这就必須实行进攻，必須成为資本的忠順奴僕，必須受資本的奴役，必須抛弃無償地废除土地私有制的空想（請看李沃夫在“交易所报”上反对切尔諾夫綱領的言論）；或者是反对帝国主义資本：这就必須立刻向各国人民提出确切的和平条件，因为他們已經被战争弄得筋疲力尽了，必須在实际上而不是在

口头上勇敢地巧妙地举起世界無产階級向資本革命的旗帜，必須十分坚决地把俄国的革命向前推进。

立宪民主党人在商業上，在財政上，在維護資本的利益上，都是十分精明內行的，在政治上也是如此。立宪民主党人正确地估計到，客觀形势是革命的。他們同意改良，他們願意同改良主义者策烈鉄里和切尔諾夫之流分掌政权。但是改良沒有用。靠改良是摆脱不了危机，摆脱不了战争和破坏的。

从本階級的利益出發，从帝国主义者剝削者的階級利益出發，立宪民主党人打算得很好：我們退出內閣，这就是我們的最后通牒。我們知道，策烈鉄里和切尔諾夫之流現在不是真正相信革命階級，不是真正要实行革命政策。我們不过吓唬吓唬他們。失去了立宪民主党人，就是失去了控制全世界的英美資本的“帮助”，就是也要革英美資本的命。不会的，策烈鉄里和切尔諾夫之流不敢这样做！他們一定会向我們讓步。

如果情况不是这样，革命竟来反对資本，那末讓它来吧，它是不会成功的，我們可以卷土重来。

立宪民主党人就是这样指望的。我們要重复一遍：从剝削階級的利益出發，这种打算是对的。

如果策烈鉄里和切尔諾夫之流不是站在动摇的小資本階級的立場上，而是站在被剝削階級的立場上，那他們就会同革命無产階級一起采取正确的政策，来回答立宪民主党人的如意算盘。

写于1917年7月3日(16日)

載于1917年7月28日(15日)

“無产階級事業报”第2号

按手稿刊印

全部政权归苏維埃!

“你把空气赶出門外，它又从窗口进来”^①…… 大家都看到，执政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維克党一次又一次地亲身“体验”了这个普通的真理。他們既然做了“革命民主派”，既然站在革命民主派的地位上，就应当做出任何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所应当做出的結論来。

民主就是多数人的統治。但是他們在多数人的意志尙未表明，或者尙未清楚地表明的时候，在“民主”政府的招牌下把反革命资产者的政府送給了人民。不过这种局面是不会拖延很久的。在2月27日以后的几个月里，占我国人口压倒多数的工人和农民中大多数人的意志，不仅在一般的形式中表明了，而且在群众的組織工兵农代表苏維埃中表明了。

难道可以反对把全部国家政权交給苏維埃嗎？这正是背弃民主！这正是把一个显然不是通过民主的方法，即通过真正自由真正全民的选举产生和維持下去的政府强加在人民身上。

不管初看起来多么奇怪，但事实上正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維克忘記了这个最普通、最清楚、最明显的真理！他們所处的伪善的地位，使他們糊塗、迷惘，以至不能“捉摸”这个被他們遺忘了

^① 这句諺語的意思是說自然規律不可抗拒；这里指政权是注定要归苏維埃的。
——譯者注

的真理。通过彼得堡和莫斯科的选举，通过全俄农民苏维埃和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召开，各阶级和各政党已经向全国清清楚楚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除了神经失常和假装糊涂的人以外，谁也不会认不清这一点。

对立宪民主党部长、立宪民主党政府或者立宪民主党的政策的容忍，就是对民主和民主主义的挑战。这是2月27日以来历次政治危机的根源，也是我国政权体系动摇不定的根源。他们在采取每一个步骤的时候，在每天甚至每小时，都以最高国家机关和代表大会的名义，向人民的革命性和民主主义呼吁，但同时，政府的总的政策、特别是对外政策和经济政策，却都丧失了革命性，破坏了民主主义。

这样下去是不行的。

由于种种原因而出现的这种动摇是不可避免的。固执并不是很聪明的政策。经过推进和突变，一定会使我党早已提出的政权转归苏维埃的口号得到实现。

写于1917年7月4日(17日)以前

载于1917年7月18日(5日)

“真理报”第99号

按报纸原文刊印

政权在哪里？反革命在哪里？

对于这个问题，人们往往回答得非常简单：反革命根本就沒有，或者我們不知道它在哪里；至于政权，我們知道得很清楚，它掌握在全俄工兵代表苏維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監督下的临时政府手里。这就是通常的回答。

像大多数各种各样的危机揭露了一切假象、消除了各种錯觉一样，昨天的政治危机⁴⁸发生后，我們前面所說的目前一般人对任何革命的根本问题的回答中表现出来的錯觉，也就烟消云散了。

曾任第二届国家杜馬代表的阿列克辛斯基还活在世上，但是在他沒有恢复自己的名誉以前，也就是說在他沒有証明自己是正直的以前，工兵农代表苏維埃的执政党 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維克就拒絕讓他参加工兵代表苏維埃执行委员会。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为什么执行委员会公开地正式表示不信任阿列克辛斯基，要求他証明自己是正直的，認為他是一个身敗名裂的人呢？

因为阿列克辛斯基是以誹謗出名的，巴黎各党派的記者都宣布他是一个誹謗者。阿列克辛斯基沒有向执行委员会証明自己是正直的，却在普列汉諾夫的“統一报”中藏身下来，起初用縮写的名字發表文章，后来胆子大了，就公开发表文章。

昨天（7月4日）白天，有几个布尔什維克从熟人那里得到警告，說阿列克辛斯基告訴彼得堡記者协会一个新的誹謗性消息。

大多数人知道了以后，絲毫沒有重視，他們对阿列克辛斯基和他的“職業”都表示非常厭惡。但是有一个布尔什維克，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員朱加施維里(斯大林)，他是格魯吉亞社会民主党人，老早就認識齐赫澤同志，他在中央执行委员会會議上同齐赫澤同志談起了阿列克辛斯基这一新的卑鄙的誹謗活动。

当时夜已深了，但是齐赫澤表示，中央执行委员会对害怕中央执行委员会审讯和偵查的人的造謠誹謗，決不会置之不理。他立刻就用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和临时政府閣員策烈鐵里的名义，打电话給各报編輯部，建議它們拒絕刊登阿列克辛斯基的誹謗。他告訴斯大林說，大多数报纸表示一定遵照他的要求，只有“統一报”和“言論报”有些“装聋作哑”（“統一报”我們沒有看到，“言論报”沒有轉載这一誹謗）。結果，只有大多数知識分子都不知道的由阿·姆·烏曼斯基編輯和出版的黄色小报“活的言語报”⁴⁹（第51号〔总404号〕）刊載了这一誹謗性消息。

現在，誹謗者都要受法庭审判。这样說来，問題很簡單，并不复杂。

这一誹謗显然是十分荒唐的：第16西伯利亚步兵团有一个叫什么叶尔莫連科的准尉在“4月25日被派到(?)第6集团軍战綫的后方，向我們宣传尽速单独对德媾和”。大概这是一个脫逃的俘虏。“活的言語报”刊登的“文件”又說：“叶尔莫連科是在他的同志再三請求下接受这次任务的!!”

由此已經可以断定，对这个人是不可以相信的，因为他竟無耻到同意接受这种“任务”!……証人是一个不知羞耻的人。这是事实。

那么这个証人說了些什么呢?

他說：“德国总參謀部的軍官希季茨基和留別尔斯告訴他，在

俄国进行这种宣传的还有德国总参谋部的间谍、‘乌克兰解放协会’⁵⁰乌克兰分会主席阿·斯柯罗皮西—约尔土霍夫斯基和列宁。列宁的任务是竭力使俄国人民不信任临时政府。”

于是，德国军官为了要叶尔莫连科从事可耻的勾当，就在他面前恬不知耻地诬蔑列宁。但是，正像大家所知道的，正像布尔什维克党全党所正式声明的，列宁一直是坚定不移地断然摒弃单独对德媾和的！！德国军官的谎话是如此明显、笨拙和荒诞，任何一个有见识的人都会毫不迟疑地说，这是谎话。而一个有政治见识的人更会毫不犹豫地說，把列宁同约尔土霍夫斯基(?) 这等人以及同“乌克兰解放协会”相提并论，显然是荒谬绝伦的，因为列宁和一切国际主义者在战争期间屡次公开同这个可疑的社会爱国主义的“协会”划清界限！

被德国人收买的叶尔莫连科或德国军官的笨拙谎话，本来完全可以置之不理，如果“文件”不加上所谓“新到消息”的话（谁收到的消息，怎样收到的，从谁那里收到的，什么时候收到的，这一切都不清楚）。据这个消息說，“宣传经费”是“经过”“可靠的人”，即“布尔什维克”弗尤尔斯田别尔格（加涅茨基）和柯兹洛夫斯基“领到”的（谁领到的？“文件”不敢直截了当地說列宁已经被人告发并被人怀疑了！！文件沒有說出是誰“領到”的！），并且，似乎还有銀行匯款的证据，“軍事書报检查机关已經断定，德国间谍同布尔什维克首領之間不断地(!)有政治和金錢方面的电报来往”！！

这同样是極其笨拙的谎话，它的荒诞無稽是可以一眼看穿的。如果这里有一句話是真的，那末試問：(1) 为什么在不久以前还讓加涅茨基自由地进入俄国，又自由地离开俄国呢？(2) 为什么沒有在报上公布加涅茨基和柯兹洛夫斯基的罪行之前就把他們

逮捕起来呢？如果总参謀部确实掌握了关于匯款、电报等等多少有些可靠的情报，难道会不逮捕加涅茨基和柯茲洛夫斯基，反而讓阿列克辛斯基之流和黄色报纸走漏風声嗎？我們現在所碰到的不过是报纸上下流的誹謗分子的別脚貨色，这还不明白嗎？

我們再补充一点，加涅茨基和柯茲洛夫斯基都不是布尔什維克，他們是波兰社会民主党党员，加涅茨基是該党的中央委員，我們是在倫敦代表大会上（1903年）同他相識的，波兰代表当时退出了这次代表大会，以及其他等等。無論从加涅茨基那里或者柯茲洛夫斯基那里，布尔什維克都沒有得到过半文錢。这一切都是徹头徹尾的謊話。

这种謊話的政治意义是什么呢？第一、布尔什維克的政敌不撒謊、不誹謗是不行的。这班敌人就是这样卑鄙和下流。

第二、我們找到了本文标题所提出的那个問題的答案。

关于“文件”的报告早在5月16日就送交克倫斯基了。克倫斯基既是临时政府的閣員，又是苏維埃的委員，也就是說，他是两个“政权”的成員。从5月16日到7月5日，時間是很多的。政权既然是政权，它就能够而且应当亲自研究这些“文件”，传問証人，逮捕嫌疑分子。两个“政权”，無論临时政府或中央执行委员会，都是能够而且应当这样做的。

但是两个政权都沒有行动。而总参謀部却同因为进行誹謗活动而不能参加苏維埃执行委员会的阿列克辛斯基有某种关系！总参謀部恰恰在立宪民主党人退出政府的时候（当然是偶然的）把自己的正式文件交給阿列克辛斯基去公布！

政权沒有行动。如果說列宁、加涅茨基和柯茲洛夫斯基值得怀疑，那末为什么克倫斯基、临时政府或苏維埃执行委员会連想也

沒有想过要逮捕他們？昨天（7月4日）夜里，齐赫澤和策烈鉄里要求各家报纸不刊登这种十分明显的誹謗。但是过了不久，在深夜里，波洛夫策夫却派士官生和哥薩克搗毀了“真理报”，使它不能出版，并且逮捕了出版人，抄走了賬簿（似乎是为了检查一下其中有没有可疑的款項），同时，黄色的下流醜態的“活的言語报”就登出了卑鄙的誹謗，想煽起狂热，污辱布尔什維克，造成行凶的气氛，替搗毀“真理报”的波洛夫策夫、士官生和哥薩克找到漂亮的借口。

只要不是閉眼不看真情实况的人，就不会迷惑。須要行动的时候，两个政权都沒有行动，这是因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信任”立宪民主党人，不敢触怒他們，而立宪民主党人不願意由政权出面行动，他們宁願从事幕后活动。

十分明显，幕后的反革命就是立宪民主党人、总參謀部的某些人物（我党的決議把他們叫做“军队的高级指揮官”）和形迹可疑的半黑帮报纸。看吧，他們不是沒有行动，他們是齐心协力地在“工作”。正是这批人在制造行凶的气氛和陰謀，槍杀游行等等等等。

只要不是故意閉眼不看真情实况的人，就不会再迷惑下去。

在政权轉归苏維埃，从而奠定建立政权的基础以前，不存在政权，也不会有政权。反革命正在利用这种無政权的局面，把立宪民主党人同军队的某些高级指揮官以及黑帮报纸联合在一起。这是可悲的现实，但这是现实。

工人和士兵們！你們要坚定、刚强和警惕啊！

写于1917年7月5日（18日）

載于1917年7月19日（6日）

“真理小报”

按报纸原文刊印

黑幫報紙和阿列克辛斯基 的卑鄙誹謗

“活的言語報”顯然是一種黑幫性質的報紙，今天，它刊登了一個卑鄙下流的誹謗，誣蔑列寧。

“真理報”在7月4日夜里被士官生搗毀，無法出版，因此我們不能立即詳盡地駁斥這種卑鄙的誹謗。

我們暫且聲明，“活的言語報”登載的消息是誹謗，齊赫澤在4日夜里曾經打電話給各大報館，要求它們不要刊登這種誹謗中傷的東西。各大報紙都遵照了齊赫澤的要求，7月5日，除了卑鄙醜惡的“活的言語報”以外，沒有一家報紙登出這一卑鄙的誹謗。

至於阿列克辛斯基則是一個臭名遠揚的誹謗者，因此，在他沒有恢復名譽以前，也就是說在他沒有證明自己是正直的以前，人們不允許他參加蘇維埃執行委員會。

公民們！不要相信卑鄙的誹謗者阿列克辛斯基和“活的言語報”。

下面這一點就足以揭穿“活的言語報”的誹謗，該報寫道：總參謀部在6月16日就把控告列寧的公函（第3719號）送交克倫斯基了。十分明顯，如果克倫斯基稍微有一點相信這個控告或認

为这种怀疑多少有些根据,那就应当立即逮捕列宁*并且由政府进行侦查。

写于1917年7月5日(18日)

载于1917年7月19日(6日)

“真理小报”

按报纸原文刊印

誹謗和事实

7月3日和4日的游行示威發生以后，無数的謾罵和誹謗落到了布尔什維克身上。

有人甚至給布尔什維克加上了“力圖占領城市”、“强奸”苏維埃的意志、“侵犯苏維埃政权”等等等等的罪名。

但是事实說明，尽管群众已經武装起来了，布尔什維克仍然沒有占領（虽然能够占領）而且也沒有打算占領城市的一个角落甚至一座建筑物或一个机关。

事实說明，对机关使用暴力的唯一政治事件是發生在7月4日的夜里，士官生和哥薩克根据波洛夫策夫的命令，沒有通知苏維埃，不顧苏維埃的意志，搗毀了“真理报”。

这才是事实。

这才是經過周密考虑的、蓄謀已久的对整个机关使用暴力的行为，这才是事实上的而不是口头上的“侵犯”和“强奸”。如果临时政府或者苏維埃曾經批准这种做法，那末这次侵犯行为是合法的，但是，没有一个政权这样做过。搗毀“真理报”的暴徒們無論在苏維埃中或者在临时政府中都沒有得到贊許。

布尔什維克曾經号召开始行动的士兵采取和平的有組織的行动。

临时政府和苏維埃都沒有号召士官生、哥薩克和波洛夫策夫

采取和平的有組織的行動，採取合法的行動。

* * *

但是他們對我們說，當時有人開槍。

是的，當時確實有人開槍。但是誰開的槍呢？誰敢不經過偵查就給人加上開槍的罪名呢？

你們如果樂意，可以聽一下資產階級方面目擊者所講的話。

這個目擊者就是“交易所新聞”（7月4日的晚刊）；大概世界上不會有人懷疑這個目擊者偏袒布爾什維克吧！它說道：

“下午二時正，武裝示威群眾經過花園街和涅瓦大街的十字路口，許多人聚集在那裏安靜地看他們，這時，從花園街的右方傳來了一聲震耳的槍聲，接着開始了連珠般的射擊。”

資產階級報紙這位目擊者也不得不承認真實的情況，承認槍聲首先是从花園街右方發出的！！難道這还不清楚地表明有人向示威群眾開槍嗎？

示威群眾如果真要使用暴力或者企圖使用暴力，他們就必然會向某一機關派出隊伍（像波洛夫策夫向“真理報”派出士官生和哥薩克一樣），這難道不好理解嗎？但是相反，既然有許多水兵被打死，既然資產階級報紙的目擊者說，“武裝示威群眾經過時”，“花園街右方”有人開始射擊，這難道还不清楚地證明，使用暴力的或企圖使用暴力的不正是黑幫分子，不正是民主的敵人，不正是同立憲民主黨人接近的那些集團嗎？

寫于1917年7月5日（18日）

截于1917年7月19日（6日）

“真理小報”

按報紙原文刊印

接近了本質

柴可夫斯基先生7月4日晚在中央执行委员会會議上的發言，令人惊异地接近事情的本質。

他反对苏維埃掌握政权，并且提出了一个可以說“有决定意义的”理由：我們必須打仗，而打仗沒有錢是不行的，如果政权掌握在“社会主义者”手中，英国人和美国人就不肯借錢給我們，只有立宪民主党人参加政府，他們才肯借錢。

这是接近了本質。

要参加帝国主义战争，就不能不向資本家老爷借款，就不能不“参加”資本主义奴役人民的勾当。

要真正地起来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就必须割断同資本联系的一切綫索，大胆地讓工人和农民监督銀行、监督生产和調整生产。

我們也这样想：沒有立宪民主党人作担保，英国人和美国人是不会借錢的。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为立宪民主党人效劳，为資本效劳，得到帝国主义的借款（也就不要“革命”民主派的称号，而接受帝国主义民主派这个公正的綽号）；或者是同立宪民主党人一刀两断，同資本家一刀两断，同帝国主义一刀两断，在战争問題上也要成为真正的革命者。

柴可夫斯基接近了本質。

写于1917年7月5日(18日)

載于1917年7月19日(6日)

“真理小报”

按报纸原文刊印

是不是新的德雷福斯案件？

“活的言語報”上登載了一則令人憤怒的卑鄙粗暴的誹謗（我們已在另一篇文章中作了詳盡的駁斥），閱讀之後，我不禁要問：我們總參謀部的某些“長官”是不是要重演德雷福斯案件⁵¹？

在德雷福斯案件中，法國總參謀部不惜採取各種錯誤的、不正直的、甚至是罪惡的（卑鄙的）手段來加罪于德雷福斯，結果不幸在全世界面前可耻地丟了臉。

我們的總參謀部好像是第一次公開通過……通過黑幫的“活的言語報”（這是妄誕的、聳人聽聞的、難以置信的）在反布尔什維克“案件中”出面了。該報刊登了一個非常明顯的誹謗，說列寧是間諜。這條消息開頭說：

“最高總司令部總參謀長于1917年5月16日把審訊記錄（叶爾莫連科的）隨第3719號公函送交陸軍部長。”

難道可以設想，在工作多少是正常的情況下，參謀部的審訊記錄可以在進行偵查和逮捕嫌疑分子以前在黑幫報紙上公布嗎？

參謀部管理偵查工作，這一點是無可爭辯的。但是5月16日發出的、克倫斯基早已收到的文件，不是由克倫斯基而是由黑幫報紙來引用，這樣的偵查工作難道可以設想嗎？

實質上，這同德雷福斯案件中採取的那些手段又有什麼區別呢？

載于1917年7月19日（6日）
“真理小報”

按“真理小報”原文刊印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 彼得格勒委员会执行委员会通告

为了执行昨天公布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决议
(在决议上签署的也有彼得格勒委员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
格勒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号召工人从明天(7月7日)早晨起开始复
工。

維波尔格区工人代表会议同意上述决议。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格勒委员会执行委员会

写于1917年7月6日(19日)

1928年第一次刊载于

“列宁文集”第7卷

按手稿刊印

德雷福斯案件重演

沙皇制度換湯不換藥地使用旧的一套剝削手段和迫害手段，共和制的俄国也是这样。反革命資產階級对国际革命無产階級的政党布尔什維克，除了进行政治迫害以外，还加以極端卑鄙無耻的誹謗，在报刊上展开“攻势”，同法国教权派和君主派报刊在德雷福斯案件中的攻势一模一样。

無論如何要給德雷福斯加上間諜活動的罪名！——这是那时的口号。無論如何要給一个布尔什維克加上間諜活動的罪名！——这是現在的口号。黃色報紙及一切資產階級報紙非常熱心地展开無耻的誹謗，顛倒是非，撒謊，狡猾地迷惑讀者。它們往往瘋狂地發出野獸般的吼叫，不仅听不出有什么論据，就連一个字也听不清楚。

下面就是最近在我們共和制国家發生的德雷福斯案件中采用的几种手段。最初他們“搬出”三个主要“論据”：叶尔莫連科；柯茲洛夫斯基的2 000万；同帕尔烏斯的关系。

第二天，鼓吹屠杀的主要報紙“活的言語报”就刊登了两点“更正”，認為布尔什維克的“領袖”不是被人收买，而是狂热分子，同时把2 000万改成了2万。另一份報紙則說叶尔莫連科的口供無足輕重。

在7月6日的“真理小报”上，我們已經指出，叶尔莫連科的口供完全是荒誕無稽的[⊖]。显然，引用他的口供是不恰当的。

这一期“真理小报”还刊登了柯茲洛夫斯基駁斥誹謗的一封信。遭到駁斥之后，2000万减到了2万，但这仍然不是一个确切的数字，而是一个“整数”！

他們把帕尔烏斯扯在里面，竭力捏造說帕尔烏斯同布尔什維克有某种联系。其实，布尔什維克在日内瓦“社会民主党人报”⁵²上，就已經把他叫做叛徒[⊖]，像对德国的普列汉諾夫那样無情地加以斥責，表示永远不再同这种社会沙文主义者往来。布尔什維克在有瑞典左派社会党人参加的斯德哥尔摩欢迎会⁵³上，就坚决拒絕同帕尔烏斯交談，而且不讓他以任何身分，甚至以来宾的身分参加欢迎会。

加涅茨基是个商人，他供职的那家公司有帕尔烏斯的股份。有关商务和資金的通信当然要經過检查机关，完全有可能受到检查。有人却毫無根据地竭力把商务同政治混为一談！！

甚至还有这样可笑的事情：人們指責“真理报”，就因为“真理报”拍給瑞典及其他国家社会党报纸的电报（当然也經過检查机关，检查机关是了解得清清楚楚的）被德国报纸轉載了，有时还是加以歪曲的轉載！好像电报被人轉載或者遭到恶意的歪曲也应当受指責似的！

当代的德雷福斯案件，由于疯狂的政治仇恨而采取撒謊和誹

⊖ 見本卷第143—147頁。——編者注

⊙ 見“列宁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1卷第400—401頁。——編者注

謗的攻勢…… 那些用誹謗來偷換思想鬥爭的人該是多麼卑鄙醜
齷啊!

寫于1917年7月6—7日
(19—20日)

1925年第一次載于
“列寧文集”第4卷

按手稿刊印

辟 謠

7月6日的“真理小报”詳尽地駁斥了黑帮报纸对列宁等人的卑鄙誹謗[⊖]，另外，还以我党中央名义印行了同样的但是比較簡短的駁斥。

我們所要补充的就是回答人們提出的一个問題：傳說列宁、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等人已經被捕，是否确实？不，这种傳說不确实。这里提到的几个被卑鄙齷齪、专事誹謗的报纸攻击得特別厉害的布尔什維克，都是全俄工兵代表苏維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員。我們再一次請求每一个正直的公民不要相信卑鄙齷齪的誹謗和来历不明的謠言。

写于1917年7月7日(20日)

1928年第一次載于

“列宁文集”第7卷

接手稿刊印

⊖ 見本卷第143—149頁。——編者注

三次危机⁵⁴

在对布尔什维克的誹謗和誣蔑愈来愈厉害的这些日子里，我們应当更加沉着，应当駁斥謠言和誹謗，考察事件的历史联系和目前革命进程的政治意义即阶级意义。

为了駁斥謠言和誹謗，我們只要在这里再一次引証7月6日的“真理小报”，并請讀者特別注意發表在后面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确鑿地証明，7月2日布尔什维克进行了反对發动的鼓动（社会革命党的报纸承認这一点），7月3日群众情緒沸騰，不願我們的劝告發动起来，7月4日我們在传单（社会革命党人的“人民事業报”轉載过这篇传单）中号召举行和平的有組織的游行示威，7月4日夜里我們决定停止游行示威。誹謗家們，你們誹謗吧！你們永远也駁不倒这些事实及其紧密的联系的决定意义！

現在我們来談談事件的历史联系的問題。早在4月初，我們反对支持临时政府的时候，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就攻击过我們。但是实际生活証明了什么呢？

4月20日和21日、6月10日和18日、7月3日和4日这三次政治危机証明了什么呢？

它們証明了：第一、群众对临时政府的资产阶级多数派的资产阶级政策日益不滿。

值得指出的是，执政的社会革命党的“人民事業报”虽然極端

敌視布尔什維克，但是它在7月6日不得不承認7月3日和4日的运动有深刻的經濟和政治的原因。說这个运动是人为的，說發動是布尔什維克鼓动起来的，这种愚蠢透頂、卑鄙無耻的謠言将日益被揭穿。

上述三次政治危机总的原因，总的由来，总的深刻的根源是清楚的，如果用科学的观察政治的方法，从相互联系中来观察这三次政治危机，那就更加清楚了。認為这样的三次危机可能是人为的，这种看法是荒謬的。

第二、深入考察一下什么是三次危机中共同的东西，什么是个别的東西，是大有教益的。

共同的东西就是群众对資產階級及其政府表示極端的不滿和憤慨。誰要是忘記、抹杀或輕視問題的这一實質，誰就是背弃社会主义关于階級斗争的起碼常識。

讓自称为社会主义者并且知道一点欧洲革命的階級斗争的那些人想想俄国革命的階級斗争吧。

三次危机中个别的東西是：第一次（4月20—21日）是自發的、完全沒有組織的冲动，引起了黑帮分子对示威群众射击，对布尔什維克进行空前粗暴的誣蔑。爆發之后就是政治危机。

第二次，布尔什維克决定举行游行示威，在苏維埃代表大会提出威胁性的最后通牒并明令禁止之后，决定取消这次游行示威；6月18日在布尔什維克的口号显然占上風的情况下举行了总示威。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維克自己在6月18日晚承認，假如前綫不發動攻势，政治危机可能就爆發了。

第三次危机是在7月3日自發地展开的，尽管布尔什維克在7月2日竭力制止，它却在7月4日达到了頂点，在5日和6日便

走向了彻底的反革命。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表现了动摇，斯皮里多诺娃和其他许多社会革命党人主张政权转归苏维埃，过去反对这样做的孟什维克国际主义者也是这样主张了。

最后，从考察事件的联系中得出的最后的、也许是最有教益的结论就是：在革命和反革命针锋相对、中间分子较长时间被“洗刷”的动荡不定（迅速的高涨和急遽的低落）的条件下，所有这三次危机都向我们表明了我国革命史上不曾有过的某种更加复杂的游行示威的某种新形式。

这三次危机期间的运动形式都是游行示威。反政府的游行示威，——从形式上看，这是对事件最确切的说明。但是实质上，这不是普通的游行示威，这是某种比游行示威大得多而比革命小一些的事件。这是革命和反革命的同时爆发，这是由于无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猛然露面而使中间分子激烈地、有时几乎是突然地被“洗刷”。

这方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每一次运动中，所有中间分子都责备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有决定性的阶级力量。请看一看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吧：他们拼命大叫大嚷，说布尔什维克用非常手段帮助反革命，同时又认定立宪民主党人（他们在政府中同立宪民主党人结成了联盟）是反革命的。昨天的“人民事业报”写道：“与一切右倾分子、直到好战成性的‘统一派’（补充一句，社会革命党人在选举中同‘统一派’结成了联盟）断然划清界限，——这就是我们的迫切任务。”

请拿今天（7月7日）的“统一报”同这些话比较一下吧，普列汉诺夫为该报写的社论不得不确认下述无可争辩的事实：苏维埃（即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经过了“两周的考虑”；如果政权归

苏維埃，那就“等于列宁分子取得胜利”。普列汉諾夫写道：“如果立宪民主党人不遵守愈坏愈好的規則……那末他們自己将不得不承認他們犯了大錯”（退出內閣），他們“便利了列宁分子的工作”。

难道这不是值得注意的嗎？中間分子譴責立宪民主党人便利了布尔什維克的工作，同时又譴責布尔什維克便利了立宪民主党人的工作！！應該用階級名称代替政治名称，这样我們就能看到小資产階級抱有無产階級同資产階級的階級斗争已經消失的幻想，——这难道是难以理解的嗎？小資产階級埋怨無产階級同資产階級进行的階級斗争嗎？如果不是最深刻的經濟原因和政治原因使無产階級行动起来，世界上任何布尔什維克連一次“人民运动”也無力“挑起”，更談不上三次了；如果不是同样深刻的原因使資产階級具有反革命性，任何立宪民主党人和保皇派都無力共同“从右边”挑起任何运动，——这难道是难以理解的嗎？

在4月20—21日的运动期間，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維克責罵我們和立宪民主党人都一样固执、極端和过火，甚至譴責（不管这是如何荒謬）布尔什維克在涅瓦大街开枪射击，而在运动結束以后，这些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維克在自己的統一的正式机关报“消息报”上写道，“人民运动”“清除了帝国主义者米留可夫等等”，也就是說，他們贊揚了运动！！难道这不是值得注意的嗎？难道这不是特別清楚地表明小資产階級不了解無产階級同資产階級的階級斗争的奧妙（实質）嗎？

客觀情况是这样的：国内絕大多数居民的生活状况、特别是思想状况是小資产階級的。但是大資本通过銀行、首先是通过辛迪加統治着全国。城市無产階級已有一定的覺悟，能够走自己的路，但是还不能一下子把大多数半無产者吸引到自己方面来。由于这

个基本的即階級的事实，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我們所研究的这三次危机，并且产生了危机的这种形式。

当然，将来危机的形式可能改变，但是事情的实质是不会改变的，即使社会革命党的立宪会议在10月召开。社会革命党人向农民許了願：（1）废除土地私有制；（2）把土地轉交劳动者；（3）沒收地主土地，無偿地轉交农民。要实现这些伟大的改革，不采取最坚决的革命措施反对资产階級是絕對不可能的。要采取这些措施，只有使貧苦农民同無产階級联合起来，只有把銀行和辛迪加收归国有。

輕信的农民暂时还会相信同资产階級达成協議就可以得到这些美妙的东西，他們对于無产階級为了真正实现社会革命党人的諾言而同资产階級进行尖銳的階級斗争必然会感到失望和……“不滿”（說得輕一点）。过去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

写于1917年7月7日（20日）

載于1917年7月19日

“女工”杂志第7期

按手稿刊印

关于布尔什維克領袖 出庭受审的問題⁵⁵

根据个别談話来判断,对这个问题有两种意見。

沉醉在“苏維埃气氛”中的同志們往往主张出庭受审。

与工人群众的关系比較密切的同志們显然不主张出庭受审。

从原則上說,問題首先在于怎样評价通常所謂而立宪幻想。

如果認為,在俄国有或者可能有正确的政府和正确的法庭,可能召开立宪會議,那末是可以得出应当出庭受审的結論的。

但是这种意見是根本錯誤的。最近(7月4日以后)的一些事件已經最清楚地表明,召开立宪會議是不可能的(如果不發生新的革命),在俄国(現在)沒有而且不可能有正确的政府和正确的法庭。

法庭是政权的工具。自由派有时忘記了这一点。对馬克思主义者來說,忘記这一点就是犯罪。

那末政权在什么地方呢?誰在掌握政权呢?

沒有政府。它每天都在变动。它不起作用。

起作用的是軍人专政。在这里談“审判”是可笑的。这并不是“审判”,而是內战的一个插曲。这就是那些主张出庭受审的人毫無理由地拒絕了解的东西。

彼列維尔节夫和阿列克辛斯基是“案件”的策划者!!在这里談

审判难道不可笑嗎？認為在这种条件下法庭还能够进行什么分析、判断和調查，这难道不是一种幼稚的想法嗎？

政权掌握在軍事独裁者手里，如果不进行新的革命，这个政权就会在一定的时期、首先是在战争时期得到巩固。

“我没有做任何违法的事情。法庭是公正的。法庭一定会进行調查。审判一定会公开进行。人民是会理解的。我要出庭受审。”

这种天真的想法簡直是幼稚。这不是审判，而是对国际主义者的迫害，这正是政权所要做的。把国际主义者拘禁起来，这正是克倫斯基先生之流所要做的。过去（在英国和法国）是这样，将来（在俄国）也是这样。

讓国际主义者尽自己的力量秘密地工作吧，但是决不能讓他們去做那种自願出庭受审的蠢事！

写于1917年7月8日(21日)

第一次載于1925年“無产階級革命”

杂志第1期(总第36期)

按手稿刊印

政治形勢⁵⁶

反革命組織起來了，巩固起來了，并且實際上已經取得了國家政權。

反革命已經完全組織起來，巩固起來，三個主要的反革命力量在經過周密考慮以後已經聯合起來了。這三個主要的反革命勢力是：（1）立憲民主黨，即組織起來的資產階級的真正領袖，它退出了內閣，向內閣提出了最後通牒，為反革命推翻這個內閣掃清了道路。（2）軍隊的總司令部和高級將領，他們在克倫斯基（現在連最著名的社會革命黨人都稱他為卡維涅克）有意識的或半有意識的幫助下，實際上已經把國家政權奪到手中，并且開始槍殺前綫的革命軍隊，解除彼得堡和莫斯科的革命軍隊和工人武裝，在下新城進行鎮壓，不經法庭判決、甚至不經政府批准就逮捕布爾什維克并封閉他們的報館。現在俄國基本的國家政權形式實際上已是軍人專政，可是這個事實还被許多口頭上革命而實際上軟弱無力的機關掩蓋着。這是無庸置疑的事實，是非常重要的，不了解它就根本不能了解政治形勢。（3）黑幫保皇派和資產階級的報刊，它們已經從瘋狂地攻擊布爾什維克轉而攻擊蘇維埃，攻擊“煽動者”切爾諾夫等，這就再清楚不過地表明，現在掌握大權并受到立憲民主黨人和保皇派支持的軍人專政的政策真正意圖，就是準備解散蘇維埃。目前在蘇維埃中占多数的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的許多領

袖，在最近几天已經承認了这一点，吐露了真情，但是，由于他們是真正的小資產者，他們又用最空洞最响亮的詞句来掩飾这个可怕的事实。

苏維埃以及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維克的領袖們，以策烈鐵里和切爾諾夫为首，已經徹底出賣了革命事業，把革命事業交給反革命分子，使自己和自己的党以及苏維埃变成了反革命的遮羞布。

这是已經証實了的事实。因为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維克出賣了布尔什維克，一声不响地讓人搗毀布尔什維克的報館，甚至不敢直接地公开地告訴人民，这是他們干的，以及他們为什么这样做。他們使解除工人和革命軍武装的行为合法化，从而就使自己失去了一切实权。当反动势力即将完成解散苏維埃的最后准备时，他們成了帮助反动势力“控制”人民注意力的最無聊的空談家。不了解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維克党以及目前苏維埃的多数这种完全的徹底的破产，不了解他們的“执政內閣”以及其他假面具的徹头徹尾的虛伪性，就根本不能了解目前的整个政治形勢。

俄国革命和平發展的一切希望都徹底破灭了。客观情况是：或者是軍人專政最終取得胜利，或者是工人的武装起义取得胜利。工人的武装起义要取得胜利，就只有同經濟破坏和延长战争所引起的反政府反資產階級的广大群众运动結合起来。

全部政权归苏維埃的口号是革命和平發展的口号，在4月、5月、6月，甚至7月5—9日以前，即政权实际轉到軍事独裁者手中以前，革命和平發展还是可能的。現在这个口号已經不正確了，因为它沒有估計到这种轉变，沒有估計到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維克实际上已經完全背叛革命。冒險，騷动，分散地对反动势力进行反抗，进行分散的沒有希望的抵抗，——这些对事業都沒有帮助。应

該清楚地了解形勢，發揮工人階級先鋒隊堅忍不拔的精神，準備力量舉行武裝起義。目前要使武裝起義取得勝利是非常困難的，但是在上面所指出的事實和運動相結合的情況下，仍然是可能的。不要對憲法和共和國、對一切和平道路抱任何幻想，不要進行任何分散的活動，現在不要接受黑幫和哥薩克的挑釁，必須聚集力量，重新組織力量，只要危機的進程允許進行真正群眾性的全民的武裝起義，就應當堅定地準備武裝起義。現在，不舉行武裝起義就不可能使土地轉歸農民，因為反革命在取得政權之後，已經完全同地主階級聯合起來了。

武裝起義的目的只能是使政權轉到受貧苦農民支持的無產階級手中，來實現我黨的綱領。

工人階級的黨決不放棄合法活動，但一分鐘也不對合法活動抱過高的希望，同時，應當像在 1912—1914 年那樣把合法活動和非法活動結合起來。

一分鐘也不要放棄合法活動。但是也不要對立憲和“和平道路”抱幻想。立即在各地建立秘密的組織或支部，來印發傳單等等。立即沉着地堅定地在各方面重新部署。

要像在 1912—1914 年那樣進行活動，當時我們已經談得上通過革命和武裝起義去推翻沙皇制度了；無論在國家杜馬、保險基金會、工會或在其他方面，都有合法的基地。

寫於 1917 年 7 月 10 日（23 日）

載於 1917 年 8 月 2 日（7 月 20 日）

“無產階級事業報”第 6 號

署名：W。

按手稿刊印

給“新生活報”編輯部的信

同志們，由於我們黨的報紙被迫停刊，請允許我向你們這些好客的人求助。有些報紙對我們進行瘋狂的攻擊，指責我們進行間諜活動或同敵人的政府勾通。

下面一些簡單的事實證明這種攻擊是多麼……荒唐（這個字還不恰當，太輕了）。“活的言語報”最初說列寧是間諜，後來又裝腔作勢地發表了一個于事無補的“更正”，聲明並沒有說他進行間諜活動！最初他們搬出了叶爾莫連科的口供，後來又不得不承認，把這樣一個人的這樣一些口供當做憑據簡直是愚蠢，可恥。

他們提到帕爾烏斯的名字，但是沒有提到，還在1915年，誰也沒有像我們在日內瓦編輯的“社會民主黨人報”那樣無情地尖銳地斥責過帕爾烏斯，在該報的“墮落到了極點”一文中痛斥帕爾烏斯是“向興登堡搖尾乞憐”的“叛徒”等等[⊖]。任何有知識的人都知道或者很容易知道，我們和帕爾烏斯根本談不上有什麼純粹的政治關係或者其他關係。

他們提到蘇緬松這樣一個名字，我們不僅從來沒有和這個人打過交道，而且從來沒有見過她。他們又扯到加涅茨基和柯茲洛夫斯基的商業活動，但是沒有舉出一個事實來說明商業活動究竟

[⊖] 見“列寧全集”1959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1卷第400—401頁。——編者注

是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以及怎样掩护間諜活动的。我們不仅从来没有直接或間接参加过商業活动，而且根本没有从上面提到的两个同志那里为个人或者为党領过一个戈比。

他們甚至因德国报纸轉載了(加上歪曲)“真理报”的电訊而指責我們，但是“忘記”提到“真理报”在国外出版德文和法文的新聞簡报⁵⁷，轉載这上面的电訊是完全自由的！

阿列克辛斯基是公認的出名的誹謗者，大家拒絕讓他参加苏維埃。但是所有这一切都是在这个人的参加下甚至倡导下进行的！！难道还不能理解，对我們采取这种手段就是法律暗杀嗎？一般說来，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員出庭受审的条例問題，無疑是为了整飭紀律。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維克党是不是想参加法律謀杀的陰謀活动呢？是不是想不指出我們究竟犯了間諜罪还是謀反罪就进行审判？对罪行不經過任何法律上的切实調查就进行审判？想通过显然是別有用心的审判来阻挠明明是党指定的立宪會議代表候选人当选？是不是想在立宪會議召开前夕也在俄国制造一个德雷福斯案件呢？

在不久的将来这些問題都会得到回答。我們認為，公开提出这些問題是自由报刊的責任。

关于資產階級的报刊我們就不談了。不言而喻，米留可夫一口咬定我們进行間諜活动或者領取德国的津貼，就像馬尔柯夫和查梅斯洛夫斯基一口咬定犹太人喝兒童的血一样。

但是自己干的是什么事，米留可夫及其同伙是知道的。

載于1917年7月11日(24日)

“新生活报”第71号

按“新生活报”原文刊印

給“無产階級事業報”編輯部的信

同志們！

我們改變了本來的打算，決定不服從臨時政府逮捕我們的命令，理由如下：

從星期日“新時報”刊登的前任司法部長彼列維爾節夫的信中，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列寧等人從事“間諜活動”的“案件”，完全是反革命政黨捏造的。

彼列維爾節夫簡直公開承認：他毫無根據就進行控告，是為了激起士兵反對我黨的狂熱（他的用語）。承認這一點的是昨天的司法部長，是昨天還自稱為社會主義者的人！彼列維爾節夫辭職了。但是，誰也不敢說新的司法部長的手法僅僅限於彼列維爾節夫—阿列克辛斯基的這一套。

反革命資產階級企圖製造新的德雷福斯案件。它們一口咬定我們從事“間諜活動”，正如製造貝里斯案件⁵⁸的俄國反动派領袖一口咬定猶太人喝兒童的血一樣。目前在俄國沒有任何法律的保障。

自認是俄國民主勢力的全權代表機關的中央執行委員會，決定成立一個委員會來調查間諜案件，但是在反革命的壓力下又把這個決定取消了。中央執行委員會既不想直接批准也不想否定逮捕我們的命令。它袖手旁觀，事實上是把我們交給反革命。

控告我們進行“陰謀活動”和在“精神上”“煽動”叛亂，其目的是十分明確的。無論是臨時政府或者蘇維埃，都沒有對這種惡空捏造的罪行作出任何法律上的準確判斷，它們明明知道，說7月3—5日的運動有什麼“陰謀”，根本是無稽之談。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的領袖不過是想博得已經在對他們施加壓力的反革命的同情，按照反革命的指示把我黨的這些黨員交給反革命。現在，在俄國根本沒有什麼合法的權利，就連正常的資產階級國家中存在的憲法保障也談不到。現在把自己交給當局，就是把自己交給米留可夫、阿列克辛斯基、彼列維爾節夫之流，交給瘋狂的反革命分子，在這些反革命分子看來，對我們的一切控告，只不過是內戰的一個插曲而已。

在7月6—8日的事件發生以後，沒有一個俄國革命者還會抱着立憲主義的幻想。革命和反革命正在進行決定性的戰鬥。我們要像以前一樣站在革命方面進行鬥爭。

我們要像以前一樣盡力幫助無產階級的革命鬥爭。如果立憲會議召開，並且不是由資產階級召開的，那就只有立憲會議才對臨時政府發出的逮捕我們的命令發表自己的意見。

載于1917年7月28日(15日)

“無產階級事業報”第2號

按“無產階級事業報”原文刊印

論 口 号

在历史急剧轉变的关头，往往連先进的政党也会在相当一段時間內不能理解新的局势而重复旧的口号，这些口号在昨天是正确的，但在今天已經失去任何意义。历史的轉变来得如此“突然”，这些口号也是如此“突然”就失去了意义。

显然，全部国家政权归苏維埃的口号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形。在我国革命过去的一个时期，即在2月27日至7月4日这些一去不复返的日子里，这个口号是正确的。現在，它显然已經不正确了。不懂得这一点，就根本不能了解当前的迫切問題。每一个口号都应当根据一定政治局势的整个特点来提出。而目前7月4日以后俄国的政治局势，同2月27日—7月4日这段时期的局势是根本不同的。

那时候，在过去的这一革命时期，国内存在着所謂“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無論在物質上或形式上，国家政权都处于不稳定的过渡状态。我們决不能忘記，政权問題是一切革命的根本問題。

那时候，政权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临时政府和苏維埃双方同意分掌政权。苏維埃是由不受任何外力压制的自由群众和武装的工人以及士兵的代表組成的。武器掌握在人民手中，沒有外力压制人民，——这就是問題的实质。这就提供了并保證了整个革命有和平發展的可能。“全部政权归苏維埃”的口号就是在这条和平

發展的道路跨出第一步、跨出直接能够实现的一步的口号。这是革命和平發展的口号，在2月27日至7月4日这段时期內，和平發展是可能的，而且确实是最合乎願望的，但是現在，革命無疑已經不可能和平發展了。

十分明显，不是所有拥护“全部政权归苏維埃”的口号的人都充分考虑到这是革命和平發展的口号。說革命有和平發展的可能，不仅仅是由于当时(2月27日至7月4日)沒有一個人、沒有一個階級、沒有一種严重的力量能够反对和阻碍政权归苏維埃。不仅仅是如此。說当时革命有和平發展的可能，还由于苏維埃內部各階級間和各政党間的斗争在全部国家政权及时轉归苏維埃的条件下，是可以最和平最無痛苦地进行的。

人們对于后面这一点也还是注意不够的。苏維埃按其階級成分來說，是工农运动的机关，是工农专政的現成形式。如果苏維埃掌握全部政权，那末小資產階級各階層的主要缺点、主要毛病，即对資本家的輕信态度，就会在实践中得到克服，就会被他們的实际工作經驗糾正。在苏維埃独掌全部政权的基础上，执政的各階級和各政党的替換在苏維埃內部是有可能和平地进行的；苏維埃內部的一切政党同群众的联系还是可以巩固的，还是不会削弱的。必須时刻注意到，只有苏維埃內部的各个政党同群众的这种最密切的、可以自由地扩展和深入的联系，才有助于和平地消除那种同資產階級妥协的小資產階級幻想。政权归苏維埃这一事实本身，不会改变而且也不能改变各階級間的相互关系；它絲毫不能改变农民的小資產階級性。但是它会及时地大大促使农民离开資產階級而接近工人，并且同工人联合起来。

政权及时轉归苏維埃，本来是很可能实现的。这对人民來說

是最輕松也是最有利的的事情。这是一条最無痛苦的道路，所以当时应当以最大的努力来爭取这条道路。但是現在，这个爭取政权及时轉归苏維埃的斗争已經結束。和平發展的道路已經不可能了。已經开始走上了非和平的、最痛苦的道路。

我們所以說7月4日事变是一个轉折点，是因为在这次事变以后客觀形势起了急劇的轉变。政权不穩定的局面不存在了，政权基本上已經轉到反革命手中。在小資產階級的政党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維克党同反革命的立宪民主党妥协的基础上，各个政党的發展使这两个小資產階級的政党实际上参与了反革命的屠杀，成了反革命的帮凶。由于小資產者不自觉地輕信資本家，他們在各政党斗争的进程中就墮落到自觉地去支持反革命分子的地步。各政党間进行斗争的發展时期已告結束。2月27日，各階級是一起反对君主制的。7月4日以后，反革命資產階級同保皇派和黑帮勾結在一起，用威胁的手段把小資產階級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維克吓住，实际上把国家政权交給了卡維涅克分子，交給了在前綫槍杀违抗命令的士兵和在彼得堡残杀布尔什維克的那帮軍閥。

政权归苏維埃的口号現在听起来好像是唐·吉訶德的怪想，或者是一种笑料。这个口号在客觀上会欺騙人民，会使人民产生一种錯覺，似乎現在只要苏維埃願意取得政权或作出这种决定，它就可以取得政权，似乎在苏維埃內还有一些政党并没有因帮助劊子手而玷污了自己，似乎可以抹杀过去的事实。

如果以为革命的無产階級会因为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維克贊助过残杀布尔什維克、贊助过在前綫槍杀士兵和解除工人的武装而要实行“报复”，“拒絕”支持他們去反对反革命势力，那是極端錯誤的。这样提問題首先就是把市儈的道德观念强加在無产階級头

上（为了事業的利益，無产階級不仅一向帮助动摇的小資產階級，而且也帮助大資產階級）；其次（这是主要的）就是企圖像市僧那样用“道德观念”来模糊問題的政治實質。

問題的實質在于，用和平方法現在已經不可能取得政权了。現在能够取得政权的唯一方法，就是进行坚决的斗争，战胜目前真正的执政者，即依靠調到彼得堡来的反动军队、依靠立宪民主党人和君主派的那帮軍閥卡維涅克分子。

問題的實質在于，只有革命的人民群眾才能够战胜这些新的执政者，而發展群众运动的条件，不仅是要由無产階級領導人民群眾，而且要人民群眾离弃已經背叛革命事業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維克党。

誰把市僧的道德观念混杂在政治問題中，誰就会这样議論：就算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維克贊助过卡維涅克分子解除無产階級和革命部队的武装，犯了“錯誤”，但也应当給他們改正“錯誤”的机会；“不要阻难”他們改正“錯誤”；要使小資產階級比較容易地倒向工人方面来。这种議論，如果不是对工人的又一次欺騙，也是一种幼稚的甚至愚蠢的見解，因为小資產階級群众倒向工人方面来，正是說明而且只是說明他們离弃了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維克。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維克党現在只有宣布策烈鉄里、切尔諾夫、唐恩和拉基特尼科夫是劊子手的帮凶，那才能算是改正“錯誤”。我們完全無条件地同意这种“改正錯誤”的办法……

我們說过，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政权問題。現在应当作一补充：正是在革命中，随时随地都会發生弄不清楚真正的政权在在哪里的情形，都会發生形式上的政权和实际的政权分离的情形。这也正是一切革命时期的主要特点之一。1917年3、4月間，人們不知道

实际的政权是在政府手中，还是在苏維埃手中。

現在特別重要的是要使觉悟的工人冷靜地觀察一下革命的根本問題：目前国家政权是在誰的手里。只要你想一想政权的物質表現是什么，而不把空話当做事实，那就不难回答这个問題。

恩格斯写道，国家首先就是武装队伍以及監獄之類的物質附屬机构⁵⁹。在現在，那就是士官生和特地調到彼得堡来的反动的哥薩克，就是那些把加米涅夫等人关在監獄里的人，就是那些封閉“真理报”的人，就是那些解除工人和某一部分士兵武装的人，就是那些槍杀某些士兵的人，就是那些在軍隊中对某些人进行屠杀的人。正是这些劊子手实际上掌握着政权。策烈鐵里和切尔諾夫之流是沒有实权的部长，是傀儡部长，是贊助屠杀的政党的領袖。这是事实。策烈鐵里和切尔諾夫本人也許“不贊成”屠杀，他們的报纸羞羞答答地推卸屠杀的責任，但是这件事是改变不了的，这种政治上改头換面的把戏是改变不了問題的實質的。

封閉彼得格勒 15 万选民的机关刊物，士官生因工人沃伊諾夫把“真理小报”从印刷厂拿出来就把他杀害（7 月 6 日）。这难道不是劊子手的行为嗎？这难道不是卡維涅克分子干的勾当嗎？有人会对我們說：这不是政府的“过錯”，也不是苏維埃的“过錯”。

我們回答說，这样对政府和苏維埃來說才更糟糕，因为这就是說它們等于零，它們是傀儡，实际上不掌握政权。

人民首先应当很好地知道事情的真相，应当知道实际上是誰掌握着国家政权。必須把全部真相告訴人民：政权掌握在那帮軍閥卡維涅克分子（克倫斯基、某些將軍和軍官等）手里，而整个資產階級都支持他們，这个階級以立宪民主党为首，包括通过所有黑帮报纸，通过“新时报”、“活的語言报”等等进行活动的保皇派在內。

必須推翻这个政权。否則一切关于同反革命势力作斗争的話都是空話，都是“欺騙自己，欺騙人民”。

策烈鐵里部长和切尔諾夫部长以及他們的政党現在也是拥护这个政权的；必須向人民說明他們充当着劊子手的角色，并且說明这些政党在4月21日、5月5日、6月9日和7月4日犯了“錯誤”以后，在他們贊同进攻政策（这种政策已經十分之九預先决定了卡維涅克分子在七月的胜利）以后，是必然会有这种“結局”的。

必須改进对人民的全部鼓动工作，进行鼓动必須考虑到当前革命的具体經驗，特別是七月事变的具体經驗，也就是說，应当清楚地指出人民的真正敌人是那帮軍閥，是立宪民主党人和黑帮，并且应当明确地揭露小资产阶级的政党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維克党一直起着劊子手帮凶的作用。

必須改进对人民的全部鼓动工作，必須說明，不推翻軍閥的政权，不揭露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維克党，不使他們失去人民的信任，农民絕對沒有希望获得土地。在资本主义“正常”發展的条件下，这是一个漫长的極其困难的过程，但是战争和經濟破坏会大大加速这一过程。这种“加速器”可以使一个月甚至一个星期相当于一

年。

对于上述言論，大概会有两种反对意見：第一种反对意見是，現在談坚决斗争就是鼓励分散的發动，这正好帮助了反革命势力；第二种反对意見是，摧毁反革命势力仍然是使政权轉到苏維埃手里。

我們对第一种反对意見回答說，俄国工人已經有很高的覺悟，决不会在显然对自己不利的时刻受人挑拨。他們現在起来反抗对反革命有利，这一点是無庸爭辯的。只有广大群众重新掀起革命

高潮，才能进行坚决的斗争，这一点也是無庸争辩的。但是只是一般地談論革命高潮、革命来潮、西方工人的援助等等是不够的，必須从我們过去的事件中作出一定的結論，必須考虑的正是我們所取得的教訓。吸取了这种教訓就一定会提出同夺得了政权的反革命势力进行坚决斗争的口号。

第二种反对意見也是以極一般的議論来代替具体的真理。除了革命的無产階級以外，沒有任何力量能够摧毁資產階級反革命势力。正是革命的無产階級，在取得 1917 年 7 月的經驗以后，应当独立地掌握国家政权，否則革命就不可能胜利。無产階級掌握国家政权，貧农或半無产者支持这个政权，这是唯一的出路，而且我們已經回答过，那些情况能够使这一点很快实现。

在这次新的革命中可能而且一定会出現苏維埃，但是不是現在的这种苏維埃，不是同資產階級妥协的机关，而是同資產階級进行革命斗争的机关。到那时候，我們會主张按照苏維埃的形式来組織整个国家，这是必然的。这并不是一般苏維埃的問題，而是同目前的反革命势力，同目前的苏維埃的背叛行为作斗争的問題。

用抽象的概念来代替具体的东西，这是革命中一个最主要最危险的錯誤。現在的苏維埃垮台了，苏維埃由于被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維克党所操縱而完全破产了。現在，这些苏維埃像是一群被牵去宰割、在屠刀下咩咩哀叫的綿羊。現在，苏維埃在节节胜利的反革命势力面前显得軟弱無力，一筹莫展。可能有人会把政权归苏維埃的口号了解为“只是”号召把政权交給現在的苏維埃，如果这样說，如果号召这样做，那在目前情况下就是欺騙人民。而欺騙是最危险的行为。

从 2 月 27 日至 7 月 4 日这个俄国階級斗争和政党斗争的發展

时期已告结束。新的时期开始了，在这个时期参加活动的不是旧的阶级、旧的政党、旧的苏维埃，而是在斗争火焰中更生的并在斗争中经过锻炼、训练和改造的新的阶级、新的政党、新的苏维埃。不要向后看，而要向前看。应当运用七月事变以后的新的阶级和政党的范畴来思考问题，而不应当运用旧的范畴来思考问题了。在新的时期开始时，必须以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已经取得胜利这一事实作为出发点；反革命势力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是因为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同它妥协，而只有革命的无产阶级才能战胜它。当然，在这个新的时期，无论是反革命势力获得彻底的胜利，无论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遭到彻底的失败（不经过斗争），或是重新掀起革命高潮，都还要经过许多不同的阶段。但是关于这一点，只好放在以后，在这些阶段到来的时候分别来谈了……

写于 1917 年 7 月中旬

1917 年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

喀琅施塔得委员会印成单行本

按小册子原文刊印

感謝李沃夫公爵

临时政府前任总理李沃夫公爵在同临时政府記者协会的代表們告別的談話中，作了寶貴的坦白，工人們一定会感謝他的。

李沃夫說：“最近國內發生的事件大大加強了我的樂觀精神。我相信，對於俄國說來，我們‘縱深突破’列寧戰綫，比德國人突破我們的西南戰綫，意義要重大得多。”

工人怎能不感謝公爵評論階級鬥爭的這種冷靜態度呢？工人們不僅感謝李沃夫，還要向他學習。

所有的資產者、地主以及跟着他們走的社会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反對“內戰”的言論是多麼虛偽，多麼冠冕堂皇！看一看李沃夫公爵的寶貴坦白，你們就會明白，他正是從內戰的觀點十分冷靜地來評論俄國國內形勢的。領導反革命力量的資產階級縱深地突破了革命工人的陣綫，這就是公爵的坦白中所包含的一點真理。兩個敵人、兩個敵對的營壘，一個突破另一個的陣綫，這就是李沃夫公爵所總結的俄國國內形勢。我們衷心感謝李沃夫公爵的坦率！要知道，他比社会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這些傷感的市僧正確一千倍，因為他們還認為，在革命時期必然會尖銳到極點的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會因他們的詛咒和懇求而消失。

兩個敵人、兩個敵對的營壘，一個突破另一個的陣綫，這就是李沃夫公爵的正確的历史哲學。他沒有把第三個營壘即小資產階

級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維克算在里边，这是对的。第三个营垒看来很大，事实上却不能独立解决任何事情；冷靜地發表議論的公爵明白这一点，每一个懂得小資產階級經濟地位的馬克思主义者也明白这一点，并且每一个考虑革命历史教訓的人也明白这一点，因为革命历史教訓始終表明，在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斗争尖銳的时候，小資產階級政党总是軟弱無力的。

甚至在战争时期，国内的阶级斗争也比同国外敌人的斗争重要得多，——大小資產階級分子是多么野蛮地謾罵布尔什維克承認这个真理！無数喜欢大談“統一”、“革命民主”等等冠冕堂皇的話的人是多么迅速地擯弃了这个真理！

但是到了严重的决定关头，李沃夫公爵立刻完全承認这个真理了，他公开宣称，对国内阶级敌人的“胜利”，比对外战线上的情况更重要。这是一个不容争辯的真理。这是一个大有教益的真理。工人們将十分感謝李沃夫公爵，感謝他承認、提示和传播了这个真理。为了感謝公爵，工人們将运用党的力量，使最广泛的被剝削劳动群众更好地了解和掌握这个真理。在工人阶级争取解放的斗争中，没有什么东西比这个真理更有用的了。

李沃夫公爵談得津津有味的內战战綫的“突破”是指什么呢？这个问题應該特別仔細地來談一談，使工人們能够好好地向李沃夫學習。

这一次內战“战綫的突破”，首先是指資產階級以無数謔言和誹謗加在自己的阶级敌人布尔什維克身上，在这个最卑鄙最肮脏的誣蔑政敌的勾当中表现了空前未有的頑强精神。这就是所謂“突破阶级斗争战綫的”“思想准备”。

其次是物質的、关系事物實質的“突破”，即逮捕敌对政派的人

員，宣布他們是非法的，不經判決就在街上把他們的一部分人打死（7月6日沃伊諾夫從“真理報”印刷廠拿報紙出來時被殺），查封他們的報紙，解除工人和革命士兵的武裝。

這就是“突破階級敵人的戰綫”。讓工人們好好地考慮一下這種辦法，以便在時機成熟時也能用來對付資產階級。

無產階級在任何時候都不會進行誹謗。它要查封資產階級報紙的時候，就會根據法律、根據政府的命令公開宣布資本家及其辯護者是人民的敵人。以我們的敵人即政府為代表的資產階級，以蘇維埃為代表的小資產階級，根本不敢直接公開地說要封閉“真理報”並且說出封閉它的原因。無產階級不會進行誹謗，只會講真話。無產階級會向農民和全體人民說明資產階級報紙是怎樣的，說明究竟為什麼必須把它封閉。

與小資產階級的空談家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不同，無產階級一定會深刻地了解什麼是事實上的階級鬥爭“戰綫的突破”，怎樣才能制服敵人，制服剝削者。李沃夫公爵幫助無產階級認識了這個真理。我們感謝李沃夫公爵。

載于1917年8月1日（7月19日）

“無產階級事業報”第5號

按“無產階級事業報”原文刊印

論立憲幻想⁶⁰

立憲幻想是一種政治錯誤，這表現在人們把正規的、合法的、合乎規範的、法定的制度，簡單地說就是“立憲的”制度，當做現存的制度，雖然這種制度實際上並不存在。乍看起來，也許會認為在今天的俄國，在1917年7月，在憲法根本還沒有制定的時候，不可能產生立憲幻想。但是這種想法是絕對錯誤的。實際上，俄國目前政治形勢的實質就是絕大多數人民群眾中都充滿了立憲幻想。不了解這一點，就根本不能了解俄國目前的政治形勢。如果不把重點放在有系統地和無情地揭穿立憲幻想上面，不揭露這些幻想的一切根源並指出正確的政治前途，那就決不能正確地提出當前俄國的策略任務。

現在我們來看看目前抱有立憲幻想的人的三種最典型的意見，並且仔細地加以分析。

第一種意見是，我國正處於立憲會議召開的前夕，因此目前的一切措施都是臨時的、過渡的、不大重要的、不肯定的，不久立憲會議就會加以審查並最後確定。第二種意見是，某些黨，例如社會革命黨、孟什維克黨或這兩個黨的聯盟，顯然擁有人民的絕大多數或者在蘇維埃這樣“最有威信的”機關內占絕大多數，因此在共和制的、民主的、革命的俄國，這些政黨的意志，這些機關的意志，就像大多數人民的意志一樣，不可忽視，更不可違背。第三種意見是，

某種措施，例如查封“真理報”，既沒有經過臨時政府批准，也沒有經過蘇維埃認可，因此只是一件小小的事故，一件偶然的事情，決不能認為它具有某種決定性的意義。

現在我們就來分析這几种意見。

一

召開立憲會議還是第一次成立的臨時政府許下的諾言。它認為召開立憲會議是自己的主要任務。第二次成立的臨時政府決定9月30日為召開立憲會議的日期。第三次成立的臨時政府在7月4日以後又極其鄭重地確定要在這個日期召開會議。

但是，立憲會議百分之九十九在那一天是開不成的。在第二次俄國革命取得勝利以前，即使在那一天召開了立憲會議，它百分之九十九會像第一屆杜馬那樣軟弱無力和毫無用處。只要稍微避開一下那種嘈雜的令人頭痛的空談、許願和胡扯，而來看一看社會生活中基本的決定一切的東西即階級鬥爭，就會深信這一點的。

俄國資產階級已經同地主極其緊密地結合在一起，這一點是很明顯的。所有的報刊、所有的選舉、立憲民主黨和比它更右的各個政黨的全部政策以及“有關”人士在各種“代表大會”上的發言都證明了這一點。資產階級非常清楚地了解社會革命黨人和“左派”孟什維克這些小資產階級空談家所不了解的東西，那就是：如果不給贖金，不進行一次大規模的經濟革命，不把銀行置于全民的監督之下，不實行辛迪加國有化，不對資本採取一些最嚴厲的革命措施，在俄國就不可能廢除土地私有制。資產階級非常清楚地了解這一點。同時他們也不能不知道，不能不看到和覺察到，現在俄國

絕大多數農民不僅主張沒收地主土地，而且表現得比切爾諾夫要左得多。資產階級比我們更清楚地知道，就在5月6日至7月2日這一段時期內，切爾諾夫對於不立即滿足和不全部滿足農民的種種要求的問題向他們做了多少局部的讓步，右派社會革命黨人（要知道，切爾諾夫在社會革命黨人眼中是個“中心人物”！）在農民代表大會和全俄農民代表蘇維埃執行委員會上，曾經費了多少心血去“安慰”農民，用諾言哄騙他們。

資產階級不同於小資產階級的地方，就在於它從自己的經濟和政治經驗中了解到保存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秩序”（即奴役群眾）所必需的条件。資產者都是講實際的人，都是善於做大買賣的人，他們也習慣於以嚴格的求實態度對待政治問題，不相信空話，處事果斷。

在今天的俄國召開立憲會議，比社會革命黨人更左的農民就會占大多數。資產階級是知道這一點的。它既然知道這一點，就一定要最堅決地反對立刻召開立憲會議。在立憲會議召開後，要本着尼古拉二世所簽訂的秘密條約的精神進行帝國主義戰爭，要保護地主的土地或贖金，就不可能或者非常困難了。戰爭是無情的。階級鬥爭是無情的。2月28日至4月21日這樣一段短短的時期，就很清楚地表明了這一點。

從革命一開始，對於召開立憲會議就有兩種看法。完全浸沉在立憲幻想中的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以小資產者不願意了解階級鬥爭的輕率態度看待問題，說什麼立憲會議已經宣布召開啦，立憲會議就要召開啦，這就夠了！至於別的，那都是鬼話！但是，布爾什維克却說：只有鞏固蘇維埃的力量和政權，才能保證立憲會議的召開和會議的勝利。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把重心放

在法律行為上：宣布，許諾，公告要召開立憲會議。布爾什維克則把重心放在階級鬥爭上：如果蘇維埃取得勝利，召開立憲會議就有保證，否則就沒有保證。

事實也正是這樣。資產階級一直或明或暗地反對召開立憲會議，企圖把立憲會議拖延到戰爭結束後召開，一拖再拖，不確定召開會議的日期。在6月18日以後，在聯合內閣成立一個多月以後，當召開立憲會議的日期終於確定下來的時候，莫斯科一家資產階級報紙宣稱，這是受了布爾什維克鼓動的影響。“真理報”曾一字不差地引用了這家報紙的這段話。

在7月4日以後，因為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表現胆怯，並且向反革命獻媚，使反革命取得了“勝利”，這時“言論報”上就出現了妙不可言的一句話：“趕緊”召開立憲會議！！7月16日，“人民意志報”和“俄羅斯意志報”發表短評，說立憲民主黨人鑒於立憲會議“不可能”在這樣“短促的”期間內召開，要求推遲開會日期。於是，向反革命搖尾乞憐的孟什維克策烈鐵里就根據這篇短評的意見同意延期到11月20日召開！

毫無疑問，發表這種短評是違背資產階級的意志的。這種“揭露”對資產階級不利。但是口袋里是裝不住錐子的。7月4日以後變得更加猖狂的反革命就洩露了這一點。反革命資產階級在7月4日以後奪得了政權，就立刻採取措施（而且是非常重要的措施）反對召開立憲會議。

這是事實。這個事實暴露了立憲是虛無縹緲的幻想。如果俄國不重新發動一次革命，如果不推翻反革命資產階級（首先是立憲民主黨人）的政權，如果人民仍然信任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黨這種同資產階級妥協的政黨，立憲會議不是永遠開不成，就是會變成

“法蘭克福清談館”⁶¹，變成軟弱無力的毫無用處的小資產者的會議，這種小資產者被戰爭和資產階級要“抵制政權”吓得要死，無力地掙扎着不要由資產階級而要由自己來當權，同時卻又害怕沒有資產階級會一事無成。

召開立憲會議的問題服從於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的進程和結局的問題。記得有一次“工人報”曾經脫口說出立憲會議將成為國民大會。這是我國反革命資產階級的奴僕孟什維克的那種空洞、可鄙、可憎的豪言壯語的范例之一。為了使立憲會議不致成為“法蘭克福清談館”或第一屆杜馬，而能成為國民大會，必須具有無情地打擊反革命而不同它們妥協的勇氣、本領和力量。為此，必須使現代最先進、最堅決、最革命的階級掌握政權。為此，必須使全體城鄉貧民（半無產者）擁護這個階級。為此，必須無情地鎮壓反革命資產階級，首先是立憲民主黨人和軍隊中的高級將領。這就是召開國民大會的真正的、階級的物質條件。只要明確地列舉這些條件，就可以很好地了解“工人報”的豪言壯語是多麼可笑，以及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認為在今天的俄國能夠召開立憲會議的立憲幻想是多麼愚蠢。

二

馬克思在斥責 1848 年的小資產階級“社會民主派”時，特別嚴厲地抨擊他們把“人民”和“人民大多數”這樣的字眼隨便亂用⁶²。在分析第二種意見時，在分析“大多數”的立憲幻想時，回憶一下這件事是必要的。

要使大多數真正能夠決定國家大事，必須具備一定的實際條

件。必須巩固地建立一种有可能按照大多数的意志决定問題并能保証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政权。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必須使这个大多数在階級成分上，即在内部(和外部)各階級的相互关系上，能够协调地有效地共同管理国家大事。任何一个馬克思主义者都知道，在关于人民大多数的問題上，在按照这个大多数的意志管理国家事务的問題上，这两个实际条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維克的各种政治書刊，特别是他們的全部政治行动，都暴露了他們根本不了解这两个条件。

如果国家政权掌握在同大多数的利益一致的階級手中，那末国家的管理就能够真正符合大多数的意志。如果政权掌握在同大多数的利益不一致的階級手中，那末任何根据大多数的意志进行的管理都不可避免地要变成对这个大多数的欺騙或压制。一切資产階級共和国都向我們提供了千百个这样的例子。俄国資产階級無論在經濟上或政治上都占着統治地位。它的利益同大多数的利益極不一致，特别是在帝国主义战争时期更是如此。因此，如果根据唯物主义的、馬克思主义的觀點，而不是根据形式主义的、法律的觀點来看問題，那末問題的關鍵就在于揭露这种不一致，就在于起来反对資产階級欺騙群众的行为。

相反地，我国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維克却完全証明和表明自己真正充当了資产階級欺騙群众(“大多数”)的工具，充当了进行这种欺騙的媒介和帮凶。不管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維克中个别的人是怎样真誠，但是他們基本的政治(当然还有經濟)思想在客观上总是小資产階級对自己的欺騙，也是資产階級对群众(“大多数”)的欺騙，因为他們認為，沒有無产階級专政和社会主义的胜利，也能摆脱帝国主义战争走向“不割地不賠款的和平”，也能把土

地無償地交給人民并且对生产实行“監督”以維護人民的利益。

下面就是我們对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即对路易·勃朗式的社会主义者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維克在大多数問題的提法上所做的第一个主要的“修正”：如果“大多数”本身只是一种形式，而在物質上、在实际上这个大多数只是資產階級用来进行欺騙的各政党的大多数，那末这个大多数实际上又有什么价值呢？

現在我們来談第二个“修正”，来談上面指出的第二种基本情况。不用說，只有弄清这种欺騙的階級根源和階級意义，才能正确地理解这种欺騙。这不是个别人的欺騙行为，不是“訛詐行为”（說得厉害一些），这是因階級的經濟地位而产生的欺騙思想。小資產者所处的經濟地位及其生活条件使它不能不欺騙自己，并且必然不自觉地时而傾向資產階級，时而傾向無產階級。他們在經濟上是不可能有独立的“路綫”的。

他們的过去使他們向往資產階級，他們的未来使他們向往無產階級。他們的明見使他們傾向后者，他們的偏見使他們傾向前者（馬克思的名言）。为了使人民大多数能够成为管理国家的真正的大多数，成为大多数的利益的真正服务者，成为大多数的权利以及其他等等的真正維護者，就必须具备一定的階級条件。这个条件就是：至少在紧要关头和紧要的地方，使小資產階級的大多数同革命無產階級联合起来。

不具备这个条件，大多数就是空的，虽然能够維持一个时候，出些風头，熱鬧一陣，显赫一时，但是終究是要破产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維克的大多数在1917年7月俄国革命中所遭到的破产就是这样。

其次，革命与国家的“正常”状态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国家生活

中有爭論的問題在革命時期是直接通過階級鬥爭、群眾鬥爭以至階級間的武裝鬥爭來解決的。既然群眾是自由的而且是武裝的，也就不能不這樣。從這個主要事實中可以得出結論說，在革命時期，僅僅表明“大多數的意志”是不夠的；不，在緊要關頭和緊要的地方，應當表現得更有力，應當贏得勝利。從中世紀德國“農民戰爭”開始，經過歷次大的革命運動和階段，直到1848年和1871年，直到1905年，我們看到無數這樣的例子：組織性較強、覺悟較高、武裝較好的少數怎樣迫使大多數服從自己的意志並且戰勝大多數。

恩格斯特別強調16世紀德國農民起義和1848年德國革命在一定程度上取得的共同的經驗教訓，這個教訓就是：被壓迫群眾因其小資產階級生活地位的限制而行動分散，缺乏集中性⁶³。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問題，我們就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小資產階級群眾的大多數本身還沒有決定過任何問題，而且也不可能決定任何問題，千百萬分散的農村小業主只有在資產階級或者無產階級領導下，才能有組織地行動，才能在政治上有意識地行動並且具有為取得勝利而必需的集中性。

大家知道，社會生活中的問題歸根到底都是通過階級鬥爭的最尖銳最激烈的形式即內戰的形式解決的。在這種戰爭中，像在其他任何戰爭中一樣，起決定作用的是經濟，這也是大家都知道而且在原則上誰也不會反駁的事實。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不論是社會革命黨人或是孟什維克，“在原則上”都不否認這一點，並且也很清楚地知道今天的俄國具有資本主義的性質，但是，他們不敢冷靜地正視真理。他們害怕承認這樣一個真理：任何資本主義國家，包括俄國在內，基本上有三種根本的主要的力量，即資產階級、小資

产階級和無产階級。人們常常談到第一種力量和第三種力量，都承認這兩種力量，但是對第二種力量卻不願意從經濟上、政治上和軍事上去冷靜地估計，而這種力量在數量上恰恰是占大多數！

真理的光芒是刺眼的，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害怕自我認識的原因就在這裡。

三

在開始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查封“真理報”只是一件“偶然的”事情，還沒有得到政府當局的批准。但是現在，在7月16日以後，政府當局已經正式把“真理報”封閉了。

如果從歷史觀點全面地看，從準備到實行這一措施的整個過程來看，這次查封非常清楚地說明了俄國“立憲的實質”和立憲幻想的危害。

大家知道，以米留可夫和“言論報”為首的立憲民主黨，從4月起就要求對布爾什維克採取鎮壓手段。這種要求採取了各種不同的形式，從“言論報”發表“權威性的”文章起，到米留可夫屢次叫喊“逮捕”列寧和其他布爾什維克止，如果要求鎮壓不是立憲民主黨人在革命中的政治綱領的主要組成部分，也是主要組成部分之一。

6、7月間，阿列克辛斯基之流在捏造罪名，無耻地誣告布爾什維克充當德國間諜和領取德國的津貼，並且不顧眾所周知的事實和公布的文件，誣告布爾什維克組織“武裝暴動”、策動“叛亂”，可是遠在這種事情發生以前，立憲民主黨就一直堅決要求對布爾什維克採取鎮壓手段。現在既然已經滿足了這種要求，那末，對於

那些忘記或者假裝忘記產生這種要求的真正階級根源和黨派根源的人的誠實和機智，究竟應當怎樣看待呢？既然現在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竭力假裝他們相信7月4日對布爾什維克採取鎮壓手段的“理由”是“臨時湊出來的”，是“片面的”，那末為什麼不能說他們的行為是最粗暴的捏造或政治上的極度低能呢？要知道，歪曲不容爭辯的歷史事實究竟是有限度的！

只要把4月20—21日的運動和7月3—4日的運動比較一下，就立刻會相信這兩次運動具有共同的特點：群眾都是自發地表示不滿和憤怒；挑釁性的射擊都來自右邊；在涅瓦大街上槍殺群眾；資產階級特別是立憲民主黨人大叫大嚷地誣蔑“列寧分子在涅瓦大街上開槍”；無產階級群眾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鬥爭極端殘酷和尖銳；小資產階級政黨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黨吓得手足無措，在政策上和國家政權問題上搖擺不定。所有這些客觀事實都說明了這兩次運動的特點。而6月9—10日和18日又以另一種形式向我們展示出一幅與此完全相同的階級圖畫。

事變的進程是非常清楚的：群眾的不滿和憤怒在日益增長，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鬥爭特別因雙方爭奪小資產階級群眾而日趨尖銳，由此就產生了為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投靠反革命立憲民主黨人而準備條件的兩大歷史事件。一個事件是5月6日聯合內閣的組成，在這個內閣中，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成了資產階級的奴僕，愈來愈同資產階級妥協和勾結，百般地為資產階級“效勞”，遲遲不執行最必要的革命措施。另一個事件是前綫的進攻。進攻必然重新挑起帝國主義戰爭，使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影響、勢力和作用大大加強，使沙文主義在群眾中廣泛傳播，最後——last but not least（最後並不等於不重要）——使政權，最

初是軍權，然後是整個國家政權，轉到軍隊中的反革命高級將領手中。

歷史事變的進程就是如此，這一進程在4月20—21日到7月3—4日的期間中加深了階級矛盾，使階級矛盾日趨尖銳，使反革命資產階級在7月4日以後有可能為所欲為，他們的這些勾當早在4月20—21日就已經十分明顯地成了他們的綱領和策略，成了他們的初步目標以及用來達到這一目標的“純潔的”手段。

關於7月4日事變，市僧們哭喪着臉說，布爾什維克“畢竟”給自己帶來了失敗，他們的“冒險主義”促成了他們的失敗，等等等等。這種市僧的叫苦（馬爾托夫也在這樣叫苦）從歷史觀點來看是最空洞的，在理論上是最可憐的，在實踐上是最可笑的。所有這些叫苦、這些議論（說“不應當”使群眾完全正當的不滿和憤怒具有“和平的和有組織的”性質！！），不是布爾什維克內部發出的背棄革命的言論，就是小資產者驚惶失措的一般表現。事實上就像春去夏來一樣，7月3—4日的運動不可避免地是經過4月20—21日的運動而發展起來的。無產階級政黨的義不容辭的職責就是和群眾在一起，竭力使群眾的正當的發動具有最和平最有組織的性質，而不是躲在一邊，像彼拉多那樣採取旁觀的態度，學究般地舉出理由來說什麼群眾沒有完全組織起來，說什麼在群眾運動中有過火行為（似乎4月20—21日的運動沒有發生過火行為！似乎歷史上真有过什麼大的群眾運動沒有發生過火行為！）。

布爾什維克在7月4日以後遭受失敗的歷史必然性是在過去整個事變的進程中產生的：小資產階級群眾及其領袖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在4月20—21日還沒有同意進攻，還沒有因為同資產階級勾結而束縛在“聯合內閣”內，到了7月4日，他們已經把自

已束縛起來，並且到了不能不同反革命立憲民主黨人合作（進行鎮壓、誹謗和屠殺）的地步。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之所以在7月4日完全掉到反革命的污水坑里去，是因為他們在5、6月間就使勁往這個污水坑里滾了，又組織聯合內閣，又贊同他們的進攻政策。

表面看來，我們似乎有些離開本題，離開了查封“真理報”的問題而去談7月4日事變的歷史評價問題了。但這只是表面如此而已，因為不談後一個問題就不能了解前一個問題。如果考察一下問題的實質和歷次事件之間的聯繫，我們就可以看到，查封“真理報”、逮捕布尔什維克以及用其他辦法迫害布尔什維克，都不過是在執行反革命特別是立憲民主黨人的舊綱領罷了。

現在來看一下究竟是誰用什麼辦法貫徹了這個綱領是大有教益的。

現在我們來看事實。7月2日和3日，運動開展起來了，群眾因為政府不起作用、物價高漲、經濟雕蔽和前綫進攻而大為憤怒。立憲民主黨人退出了政府，玩弄“以守為攻”的把戲，並且向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提出最後通牒，讓他們這些毫無實權的人對失敗和群眾的憤怒負責。

布尔什維克在7月2日和3日曾經設法制止發動。甚至連“人民事業報”的一個目擊者也承認這一點，他敘述了7月2日在精選團里發生的事情。7月3日晚上，運動擴大了，於是布尔什維克草擬了一篇宣言，說明必須使運動具有“和平的和有組織的”性質。7月4日，來自右邊的挑釁性射擊增加了雙方死亡的人數。這裡必須強調指出，執行委員會答應對槍殺事件進行調查，答應每天發表兩次公報以及其他等等，都不過是空洞的諾言！社會革命

黨人和孟什維克什麼也沒有做，甚至連雙方死亡者的詳細名單都沒有公布！！

3 日夜里，布尔什維克草拟了关于停止發动的宣言，这篇宣言当夜就在“真理报”上發表。但是就在那天夜里，第一、反革命的軍隊开始进入彼得堡（显然，这是社会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及其苏維埃請求的，或者得到他們的同意的，他們对于这“微妙的”一点始終絕口不談，虽然这已經絲毫沒有保守秘密的必要！）。第二、就在那天夜里，士官生及其他部队显然奉司令官波洛夫策夫和总參謀部的命令，开始屠杀布尔什維克。4 日夜里“真理报”被搗毀，5 日和6 日“真理报”的“劳动”印刷所被搗毀，工人沃伊諾夫从印刷厂拿着“真理小报”出来就在白天被杀害，布尔什維克被搜查被逮捕，革命部队被解除武装。

这一切是誰开始干的呢？不是政府，也不是苏維埃，而是那帮反革命軍閥，这帮人以总參謀部为中心，借“反間諜机关”的名义进行活动，散布彼列維尔节夫和阿列克辛斯基的誹謗言論以“激怒”軍隊，以及其他等等。

政府不見了，苏維埃也不見了；它們对自己的命运非常憂慮，它們得到許多消息，說哥薩克要来消灭它們。专门攻击布尔什維克的黑帮和立宪民主党的报刊开始攻击苏維埃了。

社会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的手脚被自己的全部政策束縛住了。这些手脚被束縛住的人，請求調（或者說容忍調）反革命軍隊到彼得堡来。可是这把他們束縛得更紧了。他們沉到可憎的反革命泥潭的底下去了。他們胆怯地解散了自己成立的調查布尔什維克“案件”的委員會。他們卑鄙地把布尔什維克出卖給反革命。他們为了吻反革命分子的手而可耻地参加了安葬哥薩克的游行。

他們是一些手脚被束縛住的人。他們沉到泥潭底下去了。

他們四出奔走，把部長職位奉獻給克倫斯基，到卡諾薩去⁶⁴求見立憲民主黨人，在莫斯科舉行“縉紳會議”或者說反革命政府的“加冕典禮”⁶⁵。克倫斯基撤換了波洛夫策夫。

但是他們的忙碌完全徒勞無益，絲毫沒有改變問題的實質。克倫斯基雖然撤換了波洛夫策夫，却肯定了波洛夫策夫的措施和政策，使它合法化，他查封了“真理報”，用死刑對付士兵，禁止在前綫召開群眾大會，繼續按照阿列克辛斯基的計劃逮捕布尔什維克（連柯倫泰也在被捕之列！）。

俄國“立憲的本質”顯然是由下面的事實決定的：在前綫實行進攻，在後方同立憲民主黨人的聯合使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滾入反革命的泥潭。實際上，國家政權已經轉到反革命手中，轉到那幫軍閥手中了。克倫斯基和策烈鐵里及切爾諾夫政府只不過是反革命的擋箭牌，他們事後不得不使反革命的措施、步驟和政策合法化。

克倫斯基、策烈鐵里和切爾諾夫同立憲民主黨人的討價還價只有次要的意義，甚至沒有什麼意義。在這次討價還價中，立憲民主黨人是否能占便宜，策烈鐵里和切爾諾夫是否還能“單獨”堅持下去，這都不能改變問題的實質，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轉向反革命（這個轉變是由5月6日以來他們的全部政策造成的）始終是基本的、主要的、有決定意義的事實。

各政黨的發展時期已告結束。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在泥潭中愈陷愈深，2月28日對克倫斯基表示“信任”，5月6日倒向反革命，7月5日則沉到反革命泥潭底下去了。

新的時期開始了。反革命的勝利使群眾對社會革命黨和孟什

維克党感到失望，并且为群众轉向拥护革命無产阶级的政策开辟了道路。

写于1917年7月26日(8月8日)

载于1917年8月4、5日

“工人和士兵报”第11号和第12号

按手稿刊印

答 复

7月22日的报纸上都登载了“由彼得格勒法院检察官签署的”关于彻查7月3—5日事件并以叛国和组织武装暴动的罪名控告我和其他几位布尔什维克的通告。

政府是被迫公布这个通告的，因为这整个卑鄙无耻的事情闹得太不像话了；这件事情显然（对于每一个稍有见识的人都很显然）是为了满足反革命的立宪民主党的宿愿和要求而在诽谤者阿列克辛斯基参与下捏造出来的。

但是，策烈铁里之流的政府公布这个通告是使自己大大出丑，因为现在使人对捏造行为的粗暴性看得特别清楚了。

我因病在6月29日（星期四）离开彼得格勒，7月4日（星期二）早晨才回来。当然，对于我党中央以及全党所采取的一切步骤和措施，我是要负全部的绝对的责任的。不过我必须声明我曾离开彼得格勒，这说明我对于某些细节并不了解，而我所引证的也主要是报纸上发表的文件。

显然，正是这类文件，尤其是出现在敌视布尔什维克的报刊上的这些文件，检察官首先应当仔细收集，汇总一起加以分析。但是执行策烈铁里“社会主义”部长的政策的“共和国”检察官恰恰不愿

意履行他这个最主要的职责！

距7月4日不久，在内閣派的“人民事業报”上，有人承認7月2日布尔什維克在精选团發表演說宣传反对發动是事实。

試問檢察官有沒有权利不提到这个文件呢？試問他有沒有理由撇开这位証人的証詞呢？

这篇証詞肯定了头等重要的事实：运动是自發地展开的，布尔什維克不是竭力加速而是竭力延緩这一發动。

其次，該报还刊载了一个更加重要的文件，即在7月3日夜里拟定的并由我党中央签署的宣言。这篇宣言的拟定和付印都是在运动已經泛滥开来以后（虽然我們竭力制止这次运动，或更确切些說，竭力調节这次运动），在發动已經成为事实以后。

策烈鉄里的檢察官的極端卑鄙下流和絕無信义就在于他迴避这一問題：發动是在什么时候开始的，是在哪一天，几点鐘，在布尔什維克的宣言發表以前还是以后。

在这篇宣言里曾談到必須使运动具有和平的和有組織的性質！

在3日夜里，即在有决定意义的那一天前夜，我們組織發表了只主张举行“和平的和有組織的發动”的宣言。难道还有比控告这样的組織“組織武装暴动”更可笑的嗎？还有一个問題：策烈鉄里“社会主义”部长的“共和国”檢察官完全不提到这篇宣言，他同审理德雷福斯案件或貝里斯案件的檢察官又有什么区别呢？

其次，我們党中央在4日夜里拟定了停止游行示威的公告，并在“真理报”上刊载了这个公告，但就在那天夜里“真理报”报館被一支反革命部队搗毀了，檢察官对于这件事情也一字不提。

其次，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在7月4日向到塔夫利达宮来

的工人和士兵們發表幾次演說，在演說中号召他們在表明了自己的心意之后立即解散。檢察官对于这件事情也一字不提。

成千上万的人听了这几篇演說。讓每一个不願使自己的国家因制造“貝里斯案件”而受到耻辱的正直的公民来注意一下这件事情：听到这几篇演說的人，不管他是哪个政党的党员，都来向檢察官提出書面声明（把底稿留下），說明托洛茨基和季諾維也夫的演說中有沒有号召解散的話。一个正派的檢察官本来自己会向人民發出这种号召的。但是怎么能想像在克倫斯基、叶弗列莫夫、策烈鉄里之流的內閣里会有这种正派的檢察官呢？不是已經到了俄国公民應該自己来关心不讓“貝里斯案件”在本国重演的时候了嗎？

順便再談一点。我本人因病仅仅7月4日在克舍辛斯卡婭宮的陽台上講过一次話。檢察官提到了这次講話，并試圖叙述它的內容，但是，他不仅沒有指出証人，而且竟一字不提报刊上所提供的証詞！我不可能有全份的报纸，但我还是在报上讀到了两篇証詞：（1）在布尔什維克的“無产階級事業报”（喀琅施塔得）上；（2）在孟什維克的內閣派的“工人报”上。为什么不根据这些文件和我向人民所作的公开号召来审查我那次講話的內容呢？

那次講話的內容如下：（1）我因有病只能講几句话，我对这表示歉意；（2）代表彼得堡工人向革命的喀琅施塔得人致敬；（3）不管历史道路多么曲折，深信我們“全部政权归苏維埃”的口号必定胜利而且就要胜利；（4）号召大家要有“坚毅精神和警惕性”。

我現在来談一談这些細节，以免把为数不多然而真正确实的材料忽略过去，而檢察官只是非常草率非常随便地提到（仅仅提到）这些材料。

当然，主要的不是細节，而是7月4日的总的情况和总的意

义。但是，即使只要檢察官考虑一下这一点，那也是根本不能办到的。

首先，报刊上有一篇关于这个问题的極宝贵的証詞，这一篇証詞是由布尔什維主义的仇敌、狂暴地大罵和詛咒我們的一个內閣派“工人报”記者提供的。这位記者距7月4日不久發表了他亲自观察所得的实录。他确切查明的事实使他的观察和体验分为截然不同的两部分，他觉得事情發生“良好的轉变”这句话，使第二部分和第一部分自相矛盾起来。

他的体验的第一部分是說他試圖在汹涌的人群中保衛几位部长。他受到了侮辱和暴力的袭击，最后还被扣留起来。他听到一些激动到極点的呼声和口号，其中他記得特別清楚的是：“揍死克倫斯基”（由于他采取了进攻，“使4万人牺牲”等等）。

作者体验的第二部分就是他所說的使他的事情有“良好的”轉变的那部分，轉变是从汹涌的人群把他帶到克舍辛斯卡婭宮去“受审”那时候开始的。在那里人們立即把他释放了。

使这位記者有理由把布尔什維克罵个不停的事实就是这些。一个政敌謾罵我們是很自然的事情，特别是当这个政敌是孟什維克，当他感覺到受資本和帝国主义战争压迫的群众不跟他走而竟反对他的时候。但是，謾罵改变不了事实，布尔什維克的最疯狂的敌人本人所叙述的事实，說明和証明憤怒的群众甚至提出了“揍死克倫斯基”的口号，但布尔什維克組織却向运动提出一个总的“全部政权归苏維埃”的口号；只有布尔什維克組織才在群众面前享有道义上的威信，才能劝导群众放弃使用暴力。

事实就是这样。讓自覺的和不自覺的資產階級奴仆們因这些事实而叫囂和謾罵吧！讓他們譴責布尔什維克“放縱自發势力”等

等吧！我們是革命的無产階級政党的代表，我們要說，在被压迫群众因物价高涨，因“社会主义”部长們的無能和叛变，因帝国主义战争及战争的拖延而表示万分正确的正当的憤怒时，我們党过去一直是、将来永久是同他們站在一起的。我們党履行了自己义不容辞的义务，在7月4日那天和义憤填膺的群众走在一起，竭力使他們的运动或發动具有和平的和有組織的性質。因为在7月4日还有可能使政权和平地轉归苏維埃，还有可能使俄国革命和平發展。

誰也不否認，7月4日出現在彼得格勒街头的武装士兵和水兵中間，絕大多数是站在我們党方面的。从这一事实就可以看出檢察官所說的“組織武装暴动”的童話愚蠢到什么程度了。当时我們党完全有可能撤換和逮捕几百个官員，占領几十座国家政府机关的大厦等等。但是这类事情我們並沒有做。只有那些糊塗到甚至把反革命立宪民主党人所散布的种种神話人云亦云地背誦的人，才看不出那种說7月3日或4日是“組織武装暴动”的武断是多么可笑和荒謬。

如果审讯还有一点像审讯的話，那首先就应当提出誰先开枪的問題，其次再提出双方死伤的人数、每一起死伤事故發生的情况等問題。如果审讯还有一点像审讯的話（而不像唐恩、阿列克辛斯基之流在机关刊物上發表的攻击文章），那末檢察員的責任就是就这些問題公开审讯証人，并且把审讯記錄立即公布。

当英国还是一个自由国家的时候，英国的偵查委员会总是这样做的。苏維埃执行委员会在最初，即还没有因害怕立宪民主党人而完全不問自己的良心的时候，也觉得这样做或近似这样做是自己的义务。大家知道，那时候执行委员会曾在报刊上答应每天出版两次偵查委员会的工作通报。大家也知道，执行委员会（即社

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維克) 欺騙了人民, 許下这个諾言却并没有履行。但是这个諾言已留在历史上, 它表明我們的敌人也承認每一个稍微正直一点的檢察員应当怎样做。

在切齿痛恨布尔什維主义的資产階級報紙中, “交易所报”晚刊是最先报道7月4日槍杀消息的報紙之一, 指出这一点無論如何是有好处的。从这家報紙的报道中正可以看出, 并不是示威游行先开槍, 最初是对着示威游行者开槍的!! 自然, “社会主义”內閣的“共和国”檢察官是不願意提到“交易所报”的这篇証詞的!! 但是这家無疑是敌視布尔什維主义的“交易所报”的証詞, 同我們党对事件总情况的看法完全一致。如果这次事件是武装暴动, 那末暴动者当然不会向反示威游行者开槍, 而会去包围一定的兵营、一定的大厦, 并歼灭一定的軍隊等等。相反, 如果这次事件只是反对政府的游行示威和保衛政府的反游行示威, 那末反革命分子首先开槍是十分自然的事情, 这一方面是因为他們痛恨广大的示威群众, 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們抱着挑衅的目的, 而示威游行者开槍还击也就很自然了。

死亡者名单虽然难免有遺漏, 但終究在几家報紙上(記得是在“言論报”和“人民事業报”上)登出了。审讯的最重要的直接的任务就是核对、补充和正式公布这些名单。迴避这一点, 就等于隱匿反革命分子首先开槍的証据。

实际上, 只要大略看一看已經發表的名单, 就可以知道, 两个主要的截然对立的集团即哥薩克和水兵的死亡人数几乎相等。假如1万名武装水兵在7月4日那天到达彼得堡同工人和士兵特别是同拥有很多机槍的机槍手們联合行动, 假如他們的目的是武装暴动, 那末試問, 情况会不会这样呢?

假如是那样，哥薩克和其他反对暴动者方面的死亡人数显然就会多上十来倍，因为誰也不否認，7月4日在彼得堡大街上的武装人們中布尔什維克是占绝对优势的。关于这一点，报上登了許許多多来自我們党的反对者方面的証詞，毫無疑問，稍微公正一点的审訊都会收集和公布这一切証詞的。

既然双方死亡的人数几乎相等，这就表明首先开槍的正是反对示威游行者的反革命分子，而示威游行只是还击而已。否則，死亡的人数是不可能相等的。

最后，报上所發表的消息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哥薩克被槍杀的事件是在7月4日示威游行者和反示威游行者互相射击开始后知道的。这种互相射击的事情就是平常在人民相当激动的时候也时常發生；例如在拉丁語系的国家里（特别是在南方）这类事情就时常發生。而布尔什維克被槍杀的事件也是在7月4日以后知道的，那时激动的示威游行者和反示威游行者沒有任何接触，因此那时武装的人們槍杀手無寸鉄的人簡直就是公开屠杀。7月6日布尔什維克沃伊諾夫在什帕列尔街上就是这样被杀害的。

如果連报上已經發表的关于双方死亡的人数、發生每一起流血事故的时间 and 情况等等材料也不好好收集，那又叫什么审訊呢？这不是审訊，而是对审訊的嘲笑。

显然，不可能期望这种“审訊”能够历史地評價7月4日的事件。但是每一个願意用审慎的态度看待政治問題的人都必須对此作出評價。

誰想历史地評價7月3—4日的事件，誰就不能閉眼不看这次运动与4月20—21日的运动完全相同的地方。

这两次运动都是群众憤慨的自發表現。

这两次运动都是武装群众走上街头。

这两次运动都是示威游行者和反示威游行者互相射击，双方都有一定的（几乎相等的）死亡。

这两次运动都是革命群众同反革命分子即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白热化的表现，有妥协倾向的中间分子暂时退出阵地。

这两次运动都是特殊形式（特殊性已如上述）的反政府示威游行，是同政权的深刻而长久的危机有关的。

差别在于7月3—4日的运动比4月20—21日的运动更剧烈，在于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在4月20—21日还保持中立，但是以后就投靠了反革命的立宪民主党人（通过联合内阁和进攻政策），因此在7月3—4日他们就站在反革命方面了。

反革命的立宪民主党在4月20—21日以后也曾无耻地撒谎和叫嚣，说什么“列宁分子在涅瓦大街开枪了”，并且装模作样地要求彻查。立宪民主党人及其同伙当时在政府中占多数，因此彻查工作也就完全操纵在他们手里。他们开始了这个工作，但是又扔下了，什么也没有公布。

为什么？显然因为事实怎么也不能证明立宪民主党人所想证明的东西。换句话说，事实“扑灭了”4月20—21日事件的彻查，事实证明首先开枪的是反革命分子，是立宪民主党人及其同伙。这是很明显的。

7月3—4日的事变看来也是这样，因此检察官先生就非常粗暴地捏造事实，他为了讨好策烈铁里之流，竟蔑视一切稍微公正一点的审讯规则。

7月3—4日的运动是用游行的方式促使苏维埃掌握政权的最后一次尝试。从那时起，苏维埃，也就是在苏维埃中占统治地位

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維克，实际上把政权交给了反革命，把反革命军队调到彼得堡来，解除革命部队和工人的武装，解散部队和工人组织，赞许和容忍残暴地虐杀布尔什維克的行为，以及在前线采用死刑等等。

现在军权，实际上也就是国家政权，已经落到以立宪民主党人代表并得到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維克支持的反革命手里。现在俄国革命已经没有和平发展的可能了，历史提出的问题是：或者是反革命完全胜利，或者是重新发动革命。

二

控告我们同德国勾结并且进行间谍活动，——这纯粹是貝里斯案件的再版。关于这一点我想很简单地谈一谈。在这里，“审讯”只不过是重复臭名昭彰的诽谤者阿列克辛斯基的诽谤言论，非常粗暴地捏造一些事实。

说1914年我和季諾維也夫在奥地利被捕，这话不对。被捕的只有我一个人。

说我因为是俄国人才被捕的，这不对。我被捕的原因是当地的宪兵把我笔记本上的土地统计图表当做了“军事计划”而怀疑我是一个间谍！显然，这位奥地利宪兵完全够得上阿列克辛斯基和“统一派”的水平。我似乎在追求国际主义方面毕竟打破了记录，因为交战国双方都把我当做间谍来加以迫害，在奥地利是宪兵，在俄国是立宪民主党人和阿列克辛斯基之流。

说在奥地利营救我出狱的是加涅茨基，这不对。营救我出狱的是谴责奥地利当局的維克多·阿德勒。营救我出狱的是波兰人，

他們因波兰發生逮捕俄国革命者这种卑鄙行为而感到羞耻。

說我同帕尔烏斯勾結，到过俘虏营等等，这都是無耻的謊言。沒有而且也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在帕尔烏斯的“鐘声”杂志⁶⁶的最初几期出版以后，我們的“社会民主党人报”曾把帕尔烏斯称做叛徒，称做德国的普列汉諾夫[⊖]。帕尔烏斯是德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正像普列汉諾夫是俄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一样。我們是革命的国际主义者，我們無論同德国的、俄国的或乌克兰的社会沙文主义者（“乌克兰解放协会”）都沒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什么共同之处。

施泰因別尔格是斯德哥尔摩俄侨委员会的委員。我第一次見到他是在斯德哥尔摩。施泰因別尔格是在4月22日左右或者更晚一些来到彼得堡的，我記得，他是来为俄侨协会請求津貼的。檢察官要查对这件事是很容易的，只要他願意查对。

檢察官竟玩弄花样，說帕尔烏斯同加涅茨基有联系，而加涅茨基則同列宁有联系！这簡直是騙人的手法，因为大家都知道，加涅茨基和帕尔烏斯之間有金錢关系，而我和加涅茨基之間却沒有任何关系。

加涅茨基是一个商人，是替帕尔烏斯服务的，或者是同他合伙經商的。但是有許多在报上自称为俄国侨民的人都是在帕尔烏斯的企业和机关里服务的。

檢察官竟玩弄花样，說商業上的往来可以掩盖間諜活动。有趣的是，按照这个絕妙的方法，不知有多少立宪民主党人、孟什維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会因为商業上的往来而要被控告啊！

既然檢察官手头有加涅茨基給苏緬松的一些电报（这些电报

⊖ 見“列宁全集”第4版第21卷第384--385頁。——編者注

已經發表),既然檢察官知道蘇緬松什麼時候在哪一家銀行里存有多少錢(檢察官公布了這方面的一些數字),那末檢察官為什麼不傳訊兩三個辦事員或商業人員呢?他們不是在兩天之內就可以把所有商業往來賬和銀行賬完全給他誊寫出來嗎?

檢察官只舉出了一些不完全的數字,說蘇緬松半年內在活期存款中提取了 750 000 盧布,還剩下 180 000 盧布,恐怕沒有再比這種做法更明顯地暴露出“貝里斯案件”的性質的了!!既然把數字公布出來,為什麼又不把詳細情形全部公布出來?為什麼不說明蘇緬松的錢“在半年內”是從誰那里得來的,是在什麼時候,又給了誰?究竟是在什麼時候取得商品的,取到的究竟是哪些商品?

難道還有比收集這全部數字材料更容易的事嗎?這只要用兩三天的時間就可以做好而且一定會做好!這就可以公布加涅茨基和蘇緬松的全部營業範圍!這就可以使檢察官指東說西的卑鄙手段沒有施展的余地!

內閣的官吏們策烈鐵里之流給阿列克辛斯基的最卑鄙醜惡的誹謗穿上了“合法的”外衣,——你們瞧,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墮落到了怎樣下流的地步!

三

如果把策烈鐵里、克倫斯基之流的內閣為反對布爾什維克而提起的“訴訟”看做真正的訴訟,那自然是太天真了。那是一種完全不可饒恕的立憲幻想。

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在 5 月 6 日同反革命的立憲民主黨人結成了聯盟,並採取了進攻政策即重新挑起和延長帝國主義戰

爭的政策，這樣他們就必然成為立憲民主黨的俘虜。

既然做了俘虜，也就不得不參與立憲民主黨人最卑鄙的活動和最無恥的誹謗性的勾當。

切爾諾夫“案件”使得落后的人也很快明白過來了，這就是說，它證明了我們上述的看法是正確的。“言論報”在攻擊了切爾諾夫之後，現在又在攻擊策烈鐵里了，說他是“偽君子”和“齊美爾瓦爾得派”了。

現在就連瞎子也會看見，石頭也會說話了。

反革命勢力團結起來了。立憲民主黨人就是反革命的骨幹。司令部、軍事首腦和克倫斯基都掌握在他們手里，黑幫的報紙在為他們效勞，——這些就是資產階級反革命的同盟者。

卑鄙無恥地誹謗政敵的行為會使無產階級更快地了解到反革命在什麼地方，並且會為了自由與和平，為了給飢餓者以麵包、給農民以土地而去掃蕩反革命。

載于1917年7月26、27日

“工人和士兵報”第3、4號

署名：尼·列寧

按手稿刊印

拿破侖主义的开始

現在，当克倫斯基、涅克拉索夫、阿夫克森齐也夫之流的內閣⁶⁷組成以后，馬克思主义者可能犯的最大的最致命的錯誤就是把空談当做事实，把虛假的外表当做实質，或者一般地当做某种重要的东西。

讓孟什維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去干这种事情吧，他們已經直接充当了拿破侖主义者克倫斯基的小丑。事实上，克倫斯基显然是在立宪民主党人的授意下，同涅克拉索夫、捷列申柯和薩文柯夫組成了某种类似秘密执政內閣的东西，閉口不談立宪會議和7月8日的宣言⁶⁸，在告人民書中宣揚各階級的神聖統一，根据誰也不知道的条件同提出最無耻的最后通牒的科尔尼洛夫締結協定，繼續实行令人痛恨的逮捕政策；而切尔諾夫、阿夫克森齐也夫和策烈鐵里之流却在这时装腔作势地高談闊論，——难道这不是丑事嗎？

切尔諾夫在这种时候来传訊米留可夫；阿夫克森齐也夫声言狹隘的階級观点不适用；策烈鐵里和唐恩在苏維埃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一些空空洞洞、毫無意义的決議，这些決議使人想起了在沙皇制度面前軟弱無力的第一届立宪民主党杜馬的悲慘时刻。难道这不是丑事嗎？

立宪民主党人在1906年玷污了俄国第一届国民代表會議，使它在日益加强的沙皇反革命面前变成了可怜的清談館，社会革命

黨人和孟什維克也是一樣，在 1917 年玷污了蘇維埃，使它在日益加強的拿破侖主義反革命面前變成了可憐的清談館。

毫無疑問，克倫斯基內閣是拿破侖主義的第一步。

我們看見了拿破侖主義的基本歷史特征：依靠軍閥（軍隊中的壞分子）的國家政權在勢均力敵的兩個敵對階級和敵對力量之間看風使舵。

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已經尖銳到了極點：在 4 月 20—21 日和 7 月 3—5 日，內戰有一觸即發之勢。難道這種社會經濟條件不是拿破侖主義的階級基礎嗎？要知道，除了這個條件外，還有同這個條件十分相近的其他條件；資產階級非常敵視蘇維埃，但是還沒有力量立刻解散蘇維埃，而被策烈鐵里先生、切爾諾夫先生之流玷污了的蘇維埃已經沒有力量對資產階級進行有力的抵抗了。

地主和農民也處在內戰的前夜：農民要求土地和自由，只有向各階級許下了最無恥的諾言、但一個諾言也沒有履行的拿破侖主義政府才能夠——如果能夠的話——制服他們。

當拯救祖國的言論（用來掩飾想拯救資產階級的帝國主義綱領的願望）特別流行的時候，再加上冒險進攻引起軍事失敗的事實，——你們就會看到拿破侖主義的社會政治情況的一幅最完整的圖畫。

我們不會被空話所欺騙。我們不會因為只看到拿破侖主義的第一步而陷入迷途。正應該善於識破這第一步，使自己不致像愚蠢的庸人一樣陷於可笑的境地；對第二步表示惋惜，雖然自己幫助了第一步。

現在如果還抱着立憲主義的幻想，認為現在的內閣也許比以

前各屆內閣更左一些（見“消息報”），蘇維埃的善意批評能夠糾正政府的錯誤；或者認為任意逮捕人和查封報紙只是個別事件，應該相信這種事件不會再發生，認為札魯得尼是一位正直的人，在民主共和制的俄國會出現公正的法庭，大家都應該出庭受審等等，——這不過是愚蠢、庸俗罷了。

這些立憲主義的庸俗幻想是很愚蠢的，這一點十分明顯，用不着特別加以駁斥。

不，同資產階級反革命進行鬥爭要求我們冷靜，要求我們善于看出和說出真實情況。

拿破侖主義在俄國出現不是偶然的，它是一個資本主義相當發達、革命無產階級已經誕生的小資產階級國家的階級鬥爭發展的自然產物。4月20—21日、5月6日、6月9—10日、6月18—19日、7月3—5日這些歷史階段，都是清楚地表明了拿破侖主義準備情況的標志。認為民主環境可以清除拿破侖主義，那是很大的錯誤。正好相反，拿破侖主義正是在這種環境中（法國的歷史兩次証實了這一點）、在一定的階級關係和階級鬥爭下生長起來的。

但是承認拿破侖主義不可避免，決不等同於忘記了它的必然破產。

如果我們只是說俄國的反革命取得了暫時的勝利，這就是敷衍塞責。

如果我們仔細分析拿破侖主義的產生，大胆正視現實，告訴工人階級和全體人民，拿破侖主義的開始已經成為事實，那末我們就會為嚴肅而頑強地打倒拿破侖主義的鬥爭，為這個以深刻的階級利益為依據的廣泛的政治鬥爭打下基礎。

1917年的俄国拿破侖主义同1799年和1849年开始的法国拿破侖主义比起来，有很多条件是不同的，例如，在我国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任务得到了解决。为解决土地問題和民族問題而进行的斗争，現在才开始激烈起来。

克倫斯基和把他当做走卒的反革命立宪民主党人，無論是規定日期召开立宪會議，或者推迟会期，都不能不使革命加深。拖延帝国主义战争而造成的大灾难，正以較前大为迅速猛烈之势向我們逼近。

俄国無产階級先进队伍能够在我国6月和7月的日子里避免大規模的流血惨剧。無产階級政党完全有可能选择一种策略、方式或者組織形式，使拿破侖主义者的突然的（似乎是突然的）迫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終止無产階級政党的存在，都不能制止它繼續不断地把自己的話向人民說出来。

党要更清楚更响亮地向人民說出全部真相：我們这里已經出現了拿破侖主义；克倫斯基、阿夫克森齐也夫之流的“新”政府只是用来掩飾反革命立宪民主党人和掌握了政权的好战集团的幌子；不徹底消灭反革命势力，人民就得不到和平，农民就得不到土地，工人就得不到八小时工作制，挨餓的人就得不到面包。党要把这些都說出来，而局势的每一步發展都会証实党的正确。

我国大多数人民輕信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維克这些小資产階級政党的整个时代已經很快地过去了。現在，大多数劳动群众已經由于这种輕信而开始受到残酷的惩罚。

一切迹象都表明，局势正以最快的速度繼續向前發展，国家将要进入另一个时代，那时大多数劳动者不得不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給革命無产階級。革命無产階級将夺取政权，开始社会主义革命，

不顧發展中的一切困難和可能的波折，把一切先進國家的無產者引向社會主義革命，戰勝戰爭和資本主義。

1917年7月29日

“工人和士兵報”第6號

按“工人和士兵報”原文刊印

革命的教訓

一切革命都是广大人民群众生活中的急剧转变。这种转变如果没有成熟，便不能发生真正的革命。每一个人生活上的任何转变，都会使他学到许多东西，使他体验和感受许多东西，革命也是一样，它能使全体人民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到最有内容最宝贵的教訓。

在革命时期千百万人民一个星期内学到的东西，比他们平常在一年糊塗的生活中所学到的还要多。因为当全体人民的生活发生急剧转变时，可以特别清楚地看出什么阶级抱有什么目的，他们拥有多大的力量，他们采用什么手段进行活动。

每一个觉悟的工人、士兵和农民都应当仔细考虑俄国革命的教訓，特别是现在7月底，可以清楚地看出我国革命的第一阶段已经因为失败而告终的时候，更应当如此。

—

我們看一看：工农群众进行革命究竟是要得到什么？他们期待于革命的是什么？大家知道，他们期待的是自由、和平、面包和土地。

現在我們看到的情形是怎样的呢？

不是给人們自由，而是开始恢复从前的专橫。对前綫士兵采

用死刑，审判自己起来夺取地主土地的农民。捣毁工人报纸的印刷所。非法查封工人报纸。常常甚至沒有提出任何罪名，或提出显然是誣告的罪名，就逮捕布尔什维克。

也許有人会反駁說，惩办布尔什维克并不是破坏自由，因为这只是根据一定的罪名惩办一定的人。这种反駁显然是故意胡說，即使个別人犯了罪，即使这种罪名已經由法庭証明和承認，那也不能因此而捣毁印刷所和查封报纸。如果政府公布一条法律，宣布整个布尔什维克党以及它的方針和观点都是违法的，那是另一回事。但是誰都知道，自由俄国的政府不能这样做，也沒有这样做。

地主和資本家的报纸因布尔什维克进行反对战争、反对地主、反对資本家的斗争而疯狂地攻击布尔什维克，甚至在还没有找到一个罪名来加在任何一个布尔什维克身上的时候，就公开要求逮捕和惩办布尔什维克，这是揭穿那些对布尔什维克进行誣蔑性控告的主要証据。

人民要求和平。而自由俄国的革命政府，却根据从前沙皇尼古拉二世为了使俄国資本家便于掠夺別国人民而同英法資本家签订的密約，再一次發动掠夺战争。这些密約一直沒有公布。自由俄国的政府借詞推托，始終沒有向各国人民提議締結公正的和約。

粮食沒有了。飢荒又要来了。大家都看到，資本家和富人靠供应軍需品丧心病狂地盜窃国庫（現在战争每天要耗費人民5000万卢布），抬高物价，榨取空前多的利潤，但是，在認真地計算产品的生产和把产品分配給工人方面，簡直什么也沒有做。資本家愈来愈猖狂了，他們把工人赶到街头，而且正是在人民苦于商品缺乏的时候。

絕大多数农民都在許多次代表大会上响亮而明确地發表声

明，宣布地主土地私有制是不合理的，是一种搶劫。但是自称为革命的和民主的政府却一連好几个月都在愚弄农民，用諾言和拖延手段欺騙农民。資本家一連好几个月不讓切尔諾夫部长頒布关于禁止土地买卖的法律。可是，在这个法律終于公布出来之后，資本家便对切尔諾夫进行無耻的誹謗和攻击，而且直到現在还在攻击。政府在保护地主方面是这样的卑鄙無耻，竟开始把“擅自”夺取土地的农民送交法庭审判。

愚弄农民，劝他們等待立宪會議。資本家則一再拖延，推迟召开这个會議。現在，由于布尔什維克的压力，这个會議已定于9月30日召开，可是資本家又公开地叫嚷，說这个期限“太”短了，要求延期召开立宪會議…… 資本家和地主的政党“立宪民主”党或者說“人民自由”党的最有势力的党员，如帕宁娜，就公开鼓吹把立宪會議召开的日期推迟到战争結束之后。

解决土地問題要等到召开立宪會議。召开立宪會議要等到战争結束。結束战争要等到完全胜利。結果就是这样。在政府中占多数的資本家和地主簡直是在嘲弄农民。

二

在推翻了沙皇政权的自由国家里，怎么能够發生这样的事情呢？

在不自由的国家里，管理人民的是未經任何人选举的皇帝和一小撮地主、資本家与官吏。

在自由的国家里，管理人民的只能是人民自己选举出来的人。在选举时，人民分屬於不同的政党，一般都是每一个阶级分別建立自己的政党，例如，地主、資本家、农民和工人都各自建立自己的政

党。因此，在自由的国家里，管理人民是通过政党的公开斗争以及它们之间的自由协议来进行的。

1917年2月27日推翻沙皇政权以后，俄国是一个自由的国家，在将近四个月中，就是通过各个自由组成的政党的公开斗争以及它们之间的自由协议来进行管理的。因此，为了了解俄国革命的发展，首先必须研究哪些政党是主要的，这些政党维护哪些阶级的利益，所有这些政党的相互关系怎样。

三

在推翻沙皇政权以后，国家政权转到第一次成立的临时政府手中。这个政府是由资产阶级的代表资本家以及同他们连成一气的地主组成的。资本家的主要政党“立宪民主”党占最重要的地位，它是资产阶级的执政党或者说政府党。

政权落到这个政党手中并不是偶然的，虽然当时同沙皇军队斗争、为争取自由而流血的根本不是资本家，而是工人和农民，水兵和士兵。政权之所以落到资本家政党手中，是因为这个阶级有财富，有组织，有知识。在1905年以后，特别是在大战期间，俄国的资本家阶级和同它勾结在一起的地主在本身的组织方面取得的进展最大。

立宪民主党一直是保皇党，1905年是这样，1905年到1917年还是这样。在人民战胜沙皇暴政以后，这个党就宣布自己是共和党了。历史经验表明，当人民战胜了君主制的时候，资本家的政党总是愿意成为共和党的，只要能够保住资本家的特权和它对人民的统治。

立宪民主党在口头上拥护“人民的自由”，实际上它拥护的是

資本家，于是所有的地主、保皇派和黑帮分子馬上就站到它那边去了。报刊和历次的选举都証明了这一点。在革命以后，所有资产阶级的报纸和所有黑帮的刊物都同立宪民主党人唱一个调子。一切保皇派虽然还不敢公开活动，但是在选举中，例如在彼得格勒的选举中，就支持立宪民主党。

立宪民主党人在取得政权以后，便集中全力繼續进行掠夺性的侵略战争，这个战争是同莫法资本家签订掠夺性密约的沙皇尼古拉二世开始进行的。根据这个条约，俄国资本家在战争胜利后可以占领君士坦丁堡、加里西亚和阿尔明尼亚等地。对于人民，立宪民主党政府则用种种空话和诺言支吾搪塞，把关系到工农利益的一切重要问题都推给立宪会议去解决，但是又不确定召开立宪会议的日期。

人民利用了自由，开始自动组织起来。占俄国人口压倒多数的工人和农民的主要组织是工兵农代表苏维埃。这些苏维埃在二月革命时已开始形成，二月革命以后过了几个星期，在俄国多数大城市和许多县城，工人阶级和农民中间的一切有觉悟的先进分子就通过苏维埃团结起来了。

苏维埃的选举是完全自由的。苏维埃是真正的人民群众的組織即工农的組織。苏维埃是真正的大多数人民的組織。工人和穿着軍服的农民已经武装起来了。

不言而喻，苏维埃能够而且应当把全部国家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在立宪会议召开以前，除了苏维埃以外，决不应该有任何其他的政权存在。只有这样，我国革命才能成为真正人民的真正民主的革命。只有这样，真正要求和平、真正厌恶侵略战争的劳动群众，才能够开始坚定不移地实行结束侵略战争和争取和平的政策。

只有这样，工人和农民才能制裁那些“靠战争”大发横财而使国家遭到破产和饥荒的资本家。但是，在苏维埃中，只有少数代表拥护革命工人的政党，即拥护要求全部国家政权归苏维埃的社会民主党人布尔什维克，多数代表则拥护反对政权归苏维埃的社会民主党人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这两个政党不但不主张推翻资产阶级政府而用苏维埃政府来代替，反而主张支持资产阶级政府并同它成立协议，同它组织共同的政府。获得多数人民信任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的这种同资产阶级妥协的政策，就是从革命开始以来在整整 5 个月内全部发展进程的主要内容。

四

我們首先看一看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是怎样同资产阶级妥协的，然后再来探讨多数人民信任他们的原因。

五

在俄国革命的各个时期，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是通过不同的形式同资本家妥协的。

在 1917 年 2 月底，当人民刚刚推翻沙皇政权而取得胜利的时候，资本家的临时政府就把克伦斯基当做“社会主义者”拉到政府中去了。其实克伦斯基根本不是社会主义者，他不过是个劳动团分子，直到 1917 年 3 月才成为“社会革命党人”，因为这时候已经没有危险了，而且还有好处。克伦斯基当时是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副主席，资本家的临时政府马上尽量通过他来拉拢和软化苏维埃。而苏维埃，也就是在苏维埃中占多数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却心甘情愿地在资本家的临时政府成立后马上就同意“支持它”，

“只要”它履行自己的諾言。

苏維埃自己認為是检查和監督临时政府行动的机关。苏維埃的領袖們成立了所謂“聯絡委員會”，也就是同政府聯絡、接洽的委員會⁶⁹。在这个委員會中，苏維埃的領袖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維克經常同資本家政府进行談判，实际上他們已經成了不管部部长或無任所部长了。

整个3月間和几乎整个4月間的情况就是这样的。資本家推来推去，支吾搪塞，竭力爭取時間。在这个时期中，資本家政府沒有采取一項比較認真的措施来推动革命。甚至对于召开立宪會議这种最迫切的任务，政府也沒有采取任何措施，沒有向各地提出这个問題，甚至还没有成立中央的筹备委員會。政府所关心的只有一件事情，就是暗中恢复由沙皇同英法資本家簽訂的掠夺性国际条約，尽量小心謹慎地不露形迹地阻撓革命，什么都答应，什么都不执行。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維克在“聯絡委員會”里当了傻瓜，他們被美丽的詞句、諾言和“明天就办”的空話喂饱了。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維克就像一篇著名的寓言中的烏鴉一样，經不起阿諛奉承，听见資本家說保証尊重苏維埃、未經苏維埃同意决不采取任何措施，就心滿意足了。

实际上時間一天天过去了，資本家政府并没有为革命做任何事情。但是为了反对革命，它在这个时期恢复了掠夺性的密約，更确切些說，就是批准了这些条約，并且又同英法帝国主义的外交官进行秘密談判，加强了这些条約的“生命力”。为了反对革命，它在这个时期为作战軍队的將軍和軍官的反革命組織奠定了基础（至少使他們互相接近了）。为了反对革命，它在这个时期开始把工業家、厂主組織起来，这些人在工人的压力下本来已不得不一再讓

步，同时开始怠工（破坏生产），准备一到适当的时机就停止生产。

但是把先进的工人和农民組織到苏維埃中去的工作在不断地向前發展。被压迫階級的优秀分子已經感觉到，尽管政府同彼得格勒苏維埃达成了協議，尽管克倫斯基吹得天花乱墜，尽管有了“聯絡委員會”，这个政府仍然是人民的敌人，革命的敌人。群众已經感觉到，如果不粉碎資本家的反抗，和平、自由、革命的事業就必然遭到失敗。群众已經愈来愈憤怒了，愈来愈不能忍耐了。

六

群众的憤怒在4月20—21日爆發了。运动是自發的，誰也沒有去准备它。这个运动非常猛烈地反对政府，有一个团甚至全副武装出动，到瑪丽亚宮去逮捕各部部长。大家都非常清楚地看到，政府已經維持不下去了。苏維埃是能够（而且应当）把政权夺过来的，不会遇到任何方面的任何反抗。可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維克不但沒有这样做，反而支持搖搖欲墜的資本家政府，同它更紧密地勾結在一起，并且采取了更加危险的断送革命的步驟。

革命迅速地徹底地教育了各个階級，这是在平常和平时期不曾有过的。組織得最好、在階級斗争中和政治上經驗最多的資本家学得最快。他們看到政府已經無法維持，于是就采取了其他国家資本家在1848年以后的几十年中所用过的那种愚弄、分裂和削弱工人的手段。这种手段就是組織所謂“联合內閣”，即由資產階級和社会主义的叛徒組成共同的內閣。

在自由、民主和革命工人运动同时并存最长久的国家，如英国和法国，資本家曾多次利用这种手段，而且收到很大的效果。“社会主义的”領袖們加入資產階級內閣后，必然成为資本家的傀儡、

玩物和挡箭牌，成为欺騙工人的工具。俄国的“民主的、共和的”資本家所运用的正是这种手段。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維克馬上就上了鈎，于是切尔諾夫和策烈鉄里之流的参加“联合”內閣也就在5月6日成了事实。

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維克党的傻瓜們欢天喜地，沐浴在領袖入閣的荣幸的光輝中洋洋自得。資本家也高兴得手舞足蹈，他們得到了“苏維埃的領袖”做反人民的帮手，得到了这些人答应支持“在前綫發动进攻”的諾言，即支持恢复已經中斷的帝国主义掠夺战争。資本家知道这些領袖外强中干，知道資產階級关于监督以至組織生产的諾言、关于和平政策的諾言是永远不会实行的。

結果正是这样。在革命發展的第二阶段，即从5月6日到6月9日或18日，完全証實了資本家的算盘打得正确，他們的确毫不費力就愚弄了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維克。

彼舍霍諾夫和斯柯別列夫宣称要抽資本家100%的利潤，“資本家的反抗已經打垮了”等等，这种花言巧語既騙了自己又騙了人民，資本家却不断地在巩固自己的力量。实际上在这段時間內根本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去制裁資本家。那些背叛了社会主义的部长已經成了轉移被压迫階級視綫的留声机，而整个管理国家的机关实际上仍然操在官僚和資產階級手中。大名鼎鼎的工業部副部长帕尔欽斯基就是这个机关的典型人物，他对任何反对資本家的措施都加以阻挠。部长們从事空談，一切仍然照旧。

策烈鉄里部长更是資產階級用来反对革命的工具。当喀琅施塔得的革命者大胆地起来撤換政府任命的政治委員时，策烈鉄里就被派到那里去做“安撫”工作。資產階級在自己的報紙上对喀琅施塔得大肆进行恶毒的疯狂的造謠、誹謗和攻击，給它加上企圖

“脫離俄國”的罪名，並且用各種各樣的調子重複這種無稽之談，來吓唬小資產階級和庸人。而策烈鐵里就是被吓壞了的庸人中最典型的一個，他比誰都“真心地”相信了資產階級的攻擊，比誰都熱心地“抨擊和安撫了”喀琅施塔得，可是就不明白自己是做了反革命資產階級的奴僕。結果他就成了政府的工具，政府通過他同革命的喀琅施塔得成立了一項“協議”：喀琅施塔得的政治委員不能簡單地由政府任命，而是由地方選舉，政府批准。背叛社會主義而投靠資產階級的部長們就是把全部時間花在進行這類可恥的妥協上面的。

凡是資產階級的部長不能出面替政府講話的地方，如在革命工人面前或在蘇維埃中，“社會主義的”部長斯柯別列夫、策烈鐵里和切爾諾夫等便出現了（確切些說，是資產階級派去的），他們忠實地執行資產階級的任务，拚命替內閣辯護，替資本家掩飾，一次又一次地用諾言欺騙人民，勸大家等待，等待，再等待。

切爾諾夫部長同自己的資產階級同僚做生意，顯得特別忙碌，直到7月間，直到在7月3—4日的運動後新的“政權危機”發生，直到立憲民主黨人退出內閣，切爾諾夫部長一直忙於辦一件有益的、有趣的、深孚眾望的事情，即“開導”自己的資產階級同僚，勸告他們至少要同意禁止土地買賣。禁止土地買賣的諾言是在彼得堡全俄農民代表大會（蘇維埃）上鄭重其事地向農民宣布的。但是諾言仍舊是諾言。切爾諾夫無論在5月或6月都沒有實現這個諾言。直到7月3—4日，由於革命的浪潮自發地起來了，恰好立憲民主黨人又退出內閣，這樣他才有可能實行這項措施。但是就在當時，這也是一項孤立的軟弱無力的措施，不能使農民反對地主、爭取土地的鬥爭得到真正的幫助。

这时候，要执行在前綫恢复帝国主义强盗战争这一帝国主义反革命的任务，人民痛恨的古契柯夫是不能胜任的，而新出爐的社会革命党党员“革命民主主义者”克倫斯基却順利地出色地执行了这个任务。克倫斯基沉醉在自己美妙的言詞中了，而那些把他当做傀儡玩弄的帝国主义者則恭維他，奉承他，崇拜他，因为他誠心誠意地为資本家服务，劝导“革命军队”同意恢复战争，以履行沙皇尼古拉二世同英法資本家签订的条約，使俄国資本家得到君士坦丁堡和里沃夫，得到埃尔斯倫和达拉布松。

从5月6日到6月9日，俄国革命的第二阶段就这样結束了。反革命资产階級在“社会主义”部长的掩护和保衛下，加强和巩固了自己的力量，准备好了进攻，要对外部敌人發动攻势，又要向内部敌人即革命工人进攻。

七

6月9日，革命工人的党布尔什維克党准备在彼得堡举行示威，使群众中日益增长的不可抑制的不滿和憤怒有組織地表現出来。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維克的領袖被自己同资产階級成立的協議所牵制，被帝国主义的进攻政策所束縛，感到自己在群众中失去了威信而非常恐慌。到处都發出反对游行示威的狂吠声，反革命的立宪民主党人这一次同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維克联合起来了。由于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維克实行同資本家妥协的政策，在他們的领导下，小资产階級群众轉向同反革命资产階級联盟的形势就完全确定了，并且非常明显。6月9日危机的历史意义和階級意义就在这里。

布尔什維克取消了举行示威的决定，他們决不願意在这个时

候引导工人去同联合起来的立宪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維克作殊死的斗争。可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維克为了要在群众中間多少保持一点威望，不得不定于6月18日举行总示威。资产阶级怒不可遏，它正确地看出，这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倒向无产阶级方面的表现，于是决定在前綫发动攻势来阻挠民主派的行动。

果然，6月18日使革命无产阶级的口号即布尔什維克的口号在彼得堡的群众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而6月19日资产阶级和拿破侖主义者[⊖]克倫斯基庄严地宣布的前綫的进攻正是6月18日开始的。

这次进攻实际上是为了资本家的利益而恢复掠夺战争，这是违背绝大多数劳动人民的意志的。因此，进攻一方面必然使沙文主义大大加强，使軍权（因而也使政权）轉到拿破侖主义者这一帮軍人手中，另一方面必然对群众采取暴力，迫害国际主义者，取消鼓动自由，逮捕和枪杀反对战争的人。

如果說5月6日是用繩索把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維克綁在资产阶级胜利的战車上，那末6月19日則是用鎖鏈把他們当做资本家的奴僕鎖住了。

八

由于重新挑起掠夺战争，群众的愤怒自然更加迅速更加激烈地增长起来。7月3—4日，群众的愤怒爆發了，布尔什維克本想阻

⊖ 拿破侖主义（因法国两个名叫拿破侖的皇帝而得名）是用来称呼这样一种政府的，这种政府利用资本家政党和工人政党之間的極端尖銳的斗争，竭力装做无党派政府的政府。实际上这种政府是替资本家服务的，它最善于用諾言和小恩小惠欺騙工人。

止，当然，他們是应当使这个运动具备最有組織的形式的。

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維克是被自己的主人資產階級鎖住了的奴隶，他們同意一切照办：同意把反动軍隊开进彼得堡，同意恢复死刑，同意解除工人和革命軍隊的武装，同意逮捕、通緝人犯和查封報紙可以不通过法庭。于是执政的資產階級不能完全掌握的而苏維埃又不願意掌握的政权，就落到拿破侖主义者这一帮軍人手中，当然，立宪民主党人和黑帮分子、地主和資本家是完全支持他們的。

一級一級地滾下去了。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維克既然躺在同資產階級妥协的斜坡上，就不能不往下滾，一直滾到底。2月28日，他們在彼得格勒苏維埃答应有条件地支持資產階級政府。5月6日，他們把資產階級政府从破产中拯救出来，甘願做它的奴僕和衛士，并且同意实行进攻。6月9日，他們同反革命資產階級一起对革命無產階級大肆进行恶毒的攻击、造謠和誹謗。6月19日，他們支持重新挑起的掠夺战争。7月3日，他們同意把反动軍隊調来：这就是把政权完全交給拿破侖主义者的开端。一級一級地滾下去了。

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維克党落得这样可耻的下場决不是偶然的，这是小業主即小資產階級的經濟地位造成的結果，欧洲的經驗已經多次証明了这一点。

九

当然，誰都看見过小業主怎样拚命掙扎，想“出人頭地”，想做真正的主人，想上升到“大”老板的地位，即資產階級的地位。在資本主义統治下，小業主不是自己成为資本家（在一百个小業主中，

至多有一个能达到这个目的),就是破产,成为半無产者,最后成为無产者,别的出路是沒有的。在政治上也是一样: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特别是它的領袖們,总是跟着資產階級跑。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領袖們总是用諾言和保證来安慰自己的群众,說同大資本家达成协议是可能的,可是,他們頂多能在極短的時間內使資本家对劳动群众中的少数上層分子作些小小的讓步,而在一切有决定意义的問題上,在一切重要問題上,小資產階級民主派总是做資產階級的尾巴,成为資產階級的軟弱無力的附屬品,成为財政大王手中的順从的工具。这是英国和法国的經驗多次証明了的。

当事变發展得非常迅速的时候,特别是在帝国主义战争以及它所造成的極深刻的危机的影响下,俄国革命的經驗,也就是从1917年2月到7月这一时期的經驗,非常明显地証实了馬克思主义关于小資產階級不稳定这一条老真理。

俄国革命的教訓是:劳动群众要想从战争、飢餓和地主資本家奴役的铁鉗下解放出来,就只有同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維克党完全决裂,認清他們是叛徒,拒絕同資產階級实行任何妥协,坚决地站到革命工人这一边来,只有革命工人(如果貧苦农民支持他們的話)才能粉碎資本家的反抗,引导人民無偿地夺取土地,获得完全的自由;战胜飢荒,消除战争,爭取正义的持久的和平。

后 記

根据这篇文章的內容,可以看得出它是在7月底写的。

8月間革命的进程完全証实了本文所談到的問題。后来在8月底發生了科尔尼洛夫暴动,造成了革命的新轉变,从而向全体人

民清楚地表明，立宪民主党人勾结反革命将军是想解散苏维埃，恢复君主制。革命的这一新转变究竟有多大的力量，它能不能取消同资产阶级妥协的政策，不久的将来自有分晓……

尼·列宁

1917年9月6日

本文写于1917年7月底

后记写于1917年9月6日（19日）

本文载于1917年9月12、13日（8月

30、31日）“工人日报”第8、9号

在第8号上署名尼·柯夫

在第9号上署名尼·列宁

后记载于1917年“波濤”出版社出版

的单行本：尼·列宁“革命的教训”

按单行本原文刊印

論加米涅夫在中央執行委員會上 關於斯德哥爾摩代表會議的發言⁷⁰

8月6日加米涅夫同志在中央執行委員會上關於斯德哥爾摩代表會議的發言，不能不引起忠實於自己的黨、自己的原則的布爾什維克的反擊。

加米涅夫同志在發言中一開始就正式聲明，他的發言只代表個人，“我們的黨團沒有討論過這個問題”。這個聲明使他的發言具有了駭人聽聞的性質。

第一、從什麼時候起，在一個有組織的政黨內個別黨員能夠“代表個人”對重要問題發表意見？既然黨團沒有討論過這個問題，加米涅夫同志就沒有權利發言。這是從他的發言中得出的第一個結論。

第二、加米涅夫同志有什麼權利忘記黨中央關於反對參加斯德哥爾摩代表會議的決定？這個決定如果沒有被代表大會或中央的新的決定所取消，它就仍然是黨的法律。如果這個決定被取消了，那末加米涅夫同志就不能不提到這件事，就不能說過去“我們布爾什維克一直對斯德哥爾摩代表會議抱否定態度”。

仍然是同樣的結論：加米涅夫沒有權利發言，他公然違反黨的決議，公然發言反對黨，破壞黨的意志，只字不提他必須遵守的中央的決定。而這個決定當時在“真理報”上登載過，上面還說，如果

齐美尔瓦尔得代表會議主張參加斯德哥尔摩代表會議，我黨代表就要退出齊美爾瓦爾得代表會議^①。

加米涅夫不正確地敘述了布爾什維克“以前”對參加斯德哥尔摩代表會議抱否定態度的理由。他沒有提到：社會帝國主義者將參加這次會議，對革命的社会民主黨人說來，同這種人交往是可恥的。

不管多麼令人痛心，也必須意識到：經常弄錯事情的斯塔羅斯亭所表達的革命的社會民主黨的观点，要比加米涅夫高明一千倍，正確一千倍，真實一千倍。同社會帝國主義者、部長們、俄國屠殺政策的幫兇們在一起開會，——這是恥辱和背叛。根本談不上什麼國際主義。

加米涅夫所持的實質上是要“改變”我們對斯德哥尔摩代表會議看法的理由，簡直到了荒唐可笑的地步。

加米涅夫說：“我們明白了，從現在(?)起斯德哥尔摩代表會議不再(?)是帝國主義國家手中的盲目工具了。”

這是謊話。沒有一點事實根據，加米涅夫也舉不出什麼重要的事實。英法社會帝國主義者不參加斯德哥尔摩代表會議，而德國社會帝國主義者參加了，難道這是根本的變化嗎？從國際主義者的观点看來，難道這算是一個變化嗎？莫非加米涅夫已經“忘記了”我們黨的代表會議(4月29日)對丹麥社會帝國主義者的邀請這件完全相同的事情所作的決定？

據報紙報道，加米涅夫還說：“在斯德哥尔摩的上空開始飄揚起革命的大旗，在革命的大旗下聚集着全世界無產階級的力量。”

^① 見“列寧全集”1957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4卷第357頁。——譯者注

這是充滿了切爾諾夫和策烈鐵里精神的最空洞的豪言壯語。這是彌天大謊。不是革命的旗幟，而是勾結、妥協的旗幟，是赦免社會帝國主義者、讓銀行家談判瓜分割地的旗幟，——事實上正是這樣的旗幟在斯德哥爾摩上空開始飄揚。

對全世界負有革命的国际主義義務的国际主義者政黨，決不能去討好俄國的和德國的社會帝國主義者，去討好帝國主義資產階級政府中的部長們——切爾諾夫、斯柯別列夫之流，決不允許同他們勾結而敗壞自己的名譽。

我們決定建立第三國際。我們應該不顧一切困難來實現它。決不向社會帝國主義者和社會主義叛徒的勾結行為作任何讓步！

載于1917年8月29日(16日)

“無產者報”第3號

署名：尼·列寧

按“無產者報”原文刊印

关于陰謀的謠言

8月17日“新生活报”第103号上登載了一篇标题是“关于陰謀的謠言”的簡訊。这篇东西值得予以極严重的注意，应当一次又一次地談到它，虽然它中間一些貌似严肃的东西实际上是一点也不严肃的。

这篇簡訊的内容是：8月14日在莫斯科流传一种謠言，說有几支哥薩克部队正从前綫开到莫斯科来，同时“某些軍事集团在莫斯科的一些社会团体的贊許下”正在組織“决定性的反革命發动”。其次，說軍事当局已經把这种情况通知莫斯科兵工代表苏維埃，并“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代表的参加下”（即在孟什維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参加下）采取措施使士兵認識保衛城市的必要性等等。簡訊在結束时說：“并且也吸收了在许多部队中享有威信的莫斯科布尔什維克的代表参加准备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就給布尔什維克接近軍隊开辟了道路。”

最后这句话是故意写得含糊不清的，既然布尔什維克在许多部队中享有威信（这一点是不容爭辯的，也是尽人皆知的），那末用什么方式、有什么人能够給布尔什維克接近这些部队“开辟道路”呢？这分明是無稽之談。如果“在这种情况下”真正給布尔什維克接近任何一个部队“开辟了道路”（是誰开辟的呢？显然是孟什維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这就是說，布尔什維克和护国派之間，在“防



止反革命發動”上是有某种同盟、联盟或协定的。

这种情况就使这篇不严肃的簡訊有了严重的意义，要求所有觉悟的工人都以最审慎的态度来对待上述事实。

护国派即孟什維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所散布的謠言显然是荒誕無稽的，散布这些謠言的卑鄙齷齪的政治目的也十分明显。护国派想保衛的那个临时政府恰恰是真正反革命的。真正把哥薩克军队从前綫調到首都来的(如7月3日調来彼得格勒)正是临时政府和“社会主义者”部长們，这一点哥薩克將軍卡列金在莫斯科反革命帝国主义者會議上也已正式承認。这是事实。

这个事实揭穿了孟什維克和社会革命党人，証明他們已經背叛革命，已經同反革命分子結成联盟，同卡列金分子結成联盟。孟什維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想借助于“謠言”来抹杀、掩盖这个事实，迫使人們忘記这个事实，要人們相信克倫斯基、策烈鉄里、斯柯別列夫和阿夫克森齐也夫并不知道把哥薩克調到莫斯科来的事情，相信孟什維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正在捍衛革命”等等。孟什維克和护国派叛徒們的政治目的是最明显不过的：他們想欺騙工人，冒充革命者，探听布尔什維克的一些情况(当然是为了报告反間諜机关)，挽回自己的声誉。他們用心之卑鄙真是太明显了！他們說，我們只要付出低廉的代价，只要制造一些愚蠢的“謠言”，就会得到“接近”布尔什維克军队的机会，就会普遍地增强对临时政府的信任，就会使天真幼稚的人相信，似乎这个政府想打倒哥薩克，似乎它并没有同哥薩克联盟，似乎它“正在捍衛革命”等等。

用心是明显的。謠言是荒唐的，捏造的。但是，他們說：我們真正能使人民信任临时政府，而且又能把布尔什維克拉来同我們結成“联盟”！

很难相信在布尔什维克中間能找到現在願意同护国派結成联盟的傻瓜和坏蛋。这首先因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的決議⁷¹中已經說得很清楚（見“無产者报”⁷²第4号），“孟什维克已經完全投到無产階級敌人的营垒中去了”。决不能同完全投到敌人营垒中去的人协商，决不能同他們結成联盟。又說：“革命社会民主党的首要任务是使他們（孟什维克护国派）在一切稍有革命意識的工人中也完全孤立起来。”显然，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用来对付我們的办法是散布荒誕無稽的謠言。显然，不論在莫斯科或在彼得堡，工人愈来愈清楚地看到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反革命的叛变政策，愈来愈避开他們，护国派为了“改善状况”也就只好“乱来”了。

既然代表大会有这样的決議，同护国派結成联盟去“开辟道路”或对临时政府間接表示信任（似乎是保护临时政府免遭哥薩克的袭击）的布尔什维克，就应当立刻开除党籍。

根据其他理由也很难相信在莫斯科或其他任何地方，能够找到願意同护国派結成联盟、願意成立某种共同的即使是临时的机关、願意达成某种协定等等的布尔什维克。尽管如此，我們姑且为这种一点不像布尔什维克的布尔什维克做一个最好的假定：假定他們由于天真幼稚真正相信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告訴他們的謠言，甚至假定他們相信了一些捏造的“事实”。很明显，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正直的或还没有完全丧失理智的布尔什维克也不会去同护国派建立任何联盟，也不会去为“开辟道路”达成任何协定等等。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布尔什维克也会說：如果反革命軍隊現在开始向临时政府进攻，那末我們的工人、我們的士兵就一定要同他們作战，这不是为了保护这个在7月3日召回卡列金之流

的政府，而是为了独立地保衛革命，追求自己的目的，即追求工人的胜利、穷人的胜利、和平事業的胜利，而不是追求帝国主义者克倫斯基、阿夫克森齐也夫、策烈铁里、斯柯別列夫之流的胜利。即使在我们所假定的这种絕無仅有的情况下，布尔什維克也会对孟什維克說：当然我們要作战，但我们决不同你們建立任何政治联盟，我們决不对你們表示一点点信任，完全像 1917 年 2 月一样，那时社会民主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一起同沙皇政府作战，但社会民主党人不同立宪民主党人建立任何联盟，一秒鐘也不相信立宪民主党人。現在对孟什維克表示一点点信任就是背叛革命，正像 1905—1917 年对立宪民主党人表示信任就是背叛革命一样。

布尔什維克会对工人和士兵說：讓我們作战吧，但一点也不要相信孟什維克，如果你們不願意断送胜利果实的話。

散布謠言和推測对孟什維克是極有利的，可以使人觉得似乎他們所拥护的政府是在拯救革命，但事实上这个政府已經同卡列金分子建立了联盟，已經成了反革命政府，已經采取了許多步驟而且每天在采取新的步驟来履行同卡列金分子建立联盟的各项条件。

相信这些謠言，直接或間接地支持这些謠言，对布尔什維克來說就是背叛革命事業。現在革命胜利的主要保証是：群众明确地認識到孟什維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背叛行为，同他們完全断絕关系，一切革命無产者要像在 1905 年取得經驗以后無条件地抵制立宪民主党人那样抵制他們。

（請把这篇文章多打几份寄給几种党的报纸和杂志發表，同时以我的名义把一份提交給中央委员会，并附上下面的話：

我請求中央委員會把這篇文章看成是我的一篇報告，同時我還建議：為了查明事實，中央可以決定在莫斯科布尔什維克（不是中央委員）的參加下正式進行調查，查明布尔什維克和護國派是否在這個基礎上成立過共同的機關，是否曾有過聯盟或協定等等。必須正式調查事實及其詳細情形，弄清一切細節。如果真有過聯盟，那就必須解除中央委員或莫斯科委員會委員的職務，必須在代表大會召開以前把正式解除他們職務的問題提交中央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因為現在，在莫斯科會議閉幕以後，在罷工以後，在7月3—5日的事變以後，莫斯科就有或可能有中心的意義。在這個比彼得格勒大得多的無產階級的巨大中心，完全有可能產生像7月3—5日那樣的運動。那時在彼得堡的任務是使運動具有和平的有組織的性質。那時這個口號是正確的。現在在莫斯科卻擺着一個完全不同的任務；舊口號已經極不正確了。現在的任務是自己奪取政權，宣布自己為政府，以便獲得和平，把土地轉交農民，按照同各地農民達成的協議按期召開立憲會議等等。由於失業、飢荒、鐵路員工罷工和經濟破壞等等，極有可能在莫斯科爆發類似的運動。特別重要的是莫斯科的“掌舵”人不能右傾，不能同意跟孟什維克聯盟，在運動展開時要能了解新任務，了解奪取政權的新口號以及新方法和新手段。因此，“審理”聯盟事件，斥責進行聯盟活動的布尔什維克（如果有這樣的人的話），解除他們的職務，這都是必要的，這不僅是為了嚴肅紀律，不僅是為了糾正已經干出的蠢事，也是為了維護未來運動最根本的利益。8月12日莫斯科的罷工證明，儘管社會革命黨人在杜馬選舉中獲得了多數，積極的無產階級還是跟着布尔什維克走的。這很像1917年7月3—5日以前彼得堡的情況。不過還是有很大的區別：當時彼得堡從物

質力量来看也还不能夺取政权；即使靠物質力量夺得了政权，在政治上也是不能支持的，因为当时策烈铁里之流还没有堕落到支持屠杀政策的地步。正因为如此，那时候，即1917年7月3—5日，在彼得堡提出夺取政权的口号是不正确的。那时候連布尔什維克也没有而且不可能明确地坚决地把策烈铁里之流說成是反革命分子。那时候不論是士兵或是工人都不可能有在7月里所积累的那种經驗。

现在就完全不同了。現在莫斯科如果爆發自發的运动，口号就应当是夺取政权。因此在莫斯科由完全理解这个口号并对这个口号周密思考过的适当的人来领导运动是極其重要、百倍重要的。这就是必須一次又一次地坚持审查和解除犯錯誤者的职务的原因。)

写于1917年8月18—19日

(8月31日—9月1日)

1928年第一次載于

“列寧文集”第7卷

按手稿刊印

只見樹木不見森林

馬尔托夫在8月4日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上說：“策烈鐵里的批評太溫和”，“政府沒有對軍人的反革命活動進行還擊”，“我們的目的不是要推翻現政府，破壞它的威信”……接着又說：“根據力量對比的實際情況，現在還不能提出把政權轉交蘇維埃。這一點只有在國內戰爭過程中才能實現，現在不允許這樣做。”最後他說：“我們並不打算推翻政府，但是，我們應該向它指出，國內除了立憲民主黨和軍人以外，還有另外的力量。那就是革命民主派的力量，臨時政府應該依靠這個力量。”（摘自“新生活報”報道）

馬尔托夫的這一段話很精彩，值得特別注意。這一段話所以精彩，是因為它特別明顯地重復了小資產階級群眾那些最流行、最有害、最危險的政治錯誤和小資產階級群眾的典型偏見。馬尔托夫無疑是所有小資產階級群眾的代表人物中最“左”、最革命、最覺悟和最老練的政論家，正因為如此，研究他的這一段話恰巧要比研究賣弄空話的切爾諾夫或笨伯策烈鐵里之流的廢話有益些。我們研究馬尔托夫的話，也就是研究現在小資產階級思想中最有意義的東西。

最突出的首先是馬尔托夫在把政權轉交蘇維埃的問題上所表現的動搖。在7月4日以前，馬尔托夫反對這個口號，7月4日以後又擁護這個口號，8月初他又反對。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看，

他的論据是多么不合邏輯，多么滑稽可笑！他反对这个口号是因为“根据力量对比的实际情况，現在还不能提出把政权轉交苏維埃。这一点只有在國內战争过程中才能实现，現在不允許这样做”。

糊塗就糊塗在这里。7月4日以前可以不經過國內战争把政权轉交苏維埃（这是千真万确的！），但正在这个时候，馬尔托夫反对轉交……其次，在7月4日以后，馬尔托夫又贊成把政权轉交苏維埃，似乎这可以不經過國內战争而实现了。这显然是一种不能容忍的錯誤，因为7月4日夜里拿破侖主义者在立宪民主党人的支持下和切尔諾夫、策烈铁里之流的屈从下，把反革命軍隊調到了彼得堡。在这种情况下，用和平方式夺取政权是絕對不可能的。

最后，馬尔托夫認為，馬克思主义者，甚至普通的革命民主派，有权放弃这个正确反映人民利益和革命利益的口号，因为它“只有在國內战争过程中”才能实现……但是这显然是胡說八道，显然是放弃一切階級斗争，放弃一切革命。因为誰都知道，世界上一切革命史都向我們表明，階級斗争变为國內战争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誰都知道，正好在7月4日以后，俄国的反革命資產階級掀起了國內战争，解除軍隊武装，槍杀前綫士兵，杀害布尔什維克。請看，正当事变的發展必然导致反革命資產階級挑起國內战争的时候，革命民主派却說“不允許”进行國內战争。

馬尔托夫的糊塗是最难以想像、最滑稽可笑、最不可救藥的。

要澄清他所引起的糊塗观念，應該做以下的說明：

正是在7月4日以前，把全部政权轉交当时的苏維埃的口号是唯一正确的口号。当时是可以不經過國內战争和平地办到这一点的，因为当时还没有像7月4日以后那样对人民群众实行有步驟的迫害。当时可以保證整个革命和平發展，也可以保證用和平

方式在苏維埃内部消除階級斗争和党派斗争。

7月4日以后,不经过国内战争就不可能把政权轉交苏維埃,因为7月4日夜里,政权已經落到了立宪民主党人和黑帮分子所支持的拿破侖主义軍事集团手里,因此,一切馬克思主义者,一切拥护革命無产階級的人,一切正直的革命民主派,現在都應該向工人和农民說明局势的根本改变,这种改变决定了另一条把政权轉交無产者和半無产者的道路。

馬尔托夫沒有提出理由来替“現在”不允許进行国内战争的“思想”辯护,来替他的目的“不是要推翻現政府”的声明辯护。特别是他在护国会議上發表的毫無道理的意見,必然与下述护国主义的論調不謀而合:外敌当前,决不允許进行国内战争。

我們不知道馬尔托夫敢不敢公开提出这种論調。这是在小資产階級群众中最流行的一种論調。这种論調当然是最庸俗的。無論1870年9月法国的資产階級,或者1917年2月俄国的資产階級,都不怕在外敌当前的时候进行革命和国内战争。資产階級并不怕在外敌当前的时候用国内战争的代价来夺取政权。所以革命無产階級也不用去考虑資产階級的騙子和奴僕的这些“論調”。

* *
*

馬尔托夫犯下的一个最令人不能容忍的錯誤,也是整个小資产階級政治思想界最典型的理論錯誤,就是把沙皇和一般帝制的反革命派同資产階級反革命派混为一談。这正是小資产階級民主派特有的狹隘和愚蠢,他們在經濟上、政治上和思想上不能摆脱对資产階級的依賴,他們把长子的权利奉送給資产階級,把資产階級看成是一种“理想”,相信資产階級叫喊的“右边的反革命”的威胁。

馬尔托夫反映了这种思想，更正确些說，反映了小資產階級的輕率态度，他在發言中說：“我們應該用反压力来对抗右边对它（对政府）的压力。”

这正是庸俗地輕信和忘記階級斗争的典型例子。政府似乎是超階級和超党派的东西，右边对它“施加”的压力过大时，就应该从左边对它施加更大的压力。啊！这真是路易·勃朗、切尔諾夫、策烈鉄里和这帮狐群狗党的聪明办法。可是这种庸俗的聪明多么有利于拿破侖主义者，拿破侖主义者多么想对“愚蠢的农夫”把事情說成这样：现在的这个政府只要采取非常手段向左右两边斗争，就能建立真正的国家体制，实现真正的民主。实际上，这个拿破侖主义的政府却正是反革命資產階級的政府。

欺騙人民，把事情描繪成資產階級所說的那樣，似乎“反革命对一般革命的威胁来自右边即来自沙皇”，这对資產階級是有利的（对資產階級的永世統治也是必要的）。整个“革命民主派”的这种由小資產階級生活条件培养起来的思想，只有靠唐恩和策烈鉄里之流無限的愚蠢以及切尔諾夫和阿夫克森齐也夫之流無限的自我欣賞才能站得住脚。

但是，無論哪一个人，只要他学过一点历史或者馬克思主义学說，他就應該承認，进行政治分析首先應該提出階級問題：是哪个階級的革命？哪个階級是反革命？

法国的历史向我們表明，拿破侖主义反革命派是 18 世紀末（第二次是 1848—1852 年）在反革命資產階級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并且为正統王朝的复辟鋪平了道路。拿破侖主义是一种統治形式，是由于資產階級在民主改革和民主革命的环境里轉向反革命而产生的。

要故意閉上眼睛，才看不見拿破侖主義正在俄國這種極其相似的情況下滋長起來。沙皇反革命勢力現在已經極其微弱，已經沒有任何政治意義，也不起任何政治作用。騙子們故意宣揚和夸大沙皇反革命勢力的威脅，來吓唬傻瓜，用政治奇聞款待庸人，轉移人民對真正嚴重的反革命勢力的注意。任何人看了那個叫做札魯德尼的人的議論都不免要發笑，他的全部精力集中在考慮無足輕重的同盟者“神聖俄羅斯”的反革命作用，而“不注意”叫做立憲民主黨的全俄資產階級聯盟的反革命作用。

立憲民主黨是俄國資產階級反革命的主要政治力量。這個力量在選舉中，更重要的是在軍政管理機構中以及在大肆誣蔑、中傷、攻擊布爾什維克即革命的無產階級政党和蘇維埃的報刊宣傳中，把一切黑幫分子牢固地團結在自己周圍。

現在的政府逐步地然而堅決地執行的政策，正是立憲民主黨1917年3月以來有步驟地鼓吹和策劃的政策：恢復和拖延帝國主義戰爭，中止和平的“空談”，授權各個部長封閉報館，禁止舉行代表大會，實行逮捕和流放，恢復死刑，槍殺前綫士兵，解除工人和革命軍隊的武裝，讓反革命軍隊在首都橫行無忌，開始逮捕和迫害自己起來“奪取”土地的農民，關閉工廠和同盟歇業等等。這裡還遠沒有把所有的都列舉出來。這些措施愈來愈清楚地表明了拿破侖主義的資產階級反革命派的面貌。

立憲會議延期召開，莫斯科“縉紳會議”對拿破侖主義的政策舉行“加冕禮”，——這不是把立憲會議拖到戰爭結束後召開的步驟嗎？這難道不是拿破侖主義的政策的法寶嗎？馬爾托夫沒有看到資產階級反革命派的司令部在哪裡…… 真是只見樹木不見森林。

* * *

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維克占統治地位的苏維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延期召开立宪會議的事情上，扮演了一个多么卑鄙的奴僕角色呵！立宪民主党人首先發出这种論調，主张延期召开立宪會議，在报刊上大肆宣传，讓哥薩克代表大会提出延期召开立宪會議的要求。（哥薩克代表大会！这正是向李伯尔、阿夫克森齐也夫、切尔諾夫、策烈鉄里之流討好！）孟什維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尾随着立宪民主党人，正像狗在主人皮鞭的威胁下应着主人的口哨走过来一样。

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局不仅不向人民提供簡要的实际材料，指明3月以来立宪民主党人怎样明显怎样無耻地拖延和阻挠立宪會議的召开，揭露立宪會議不可能按期召开的騙人遁詞和断言，却很快地撤开了甚至是唐恩（甚至是唐恩！）提出的“怀疑”，从奴僕式的常务局中派出两名奴僕勃拉姆桑和勃朗佐夫到临时政府去做“关于立宪會議的选举必須延期到10月28—29日”的报告……这就是莫斯科縉紳會議給拿破侖主义者举行加冕礼的隆重序幕。不論是誰，只要他还没有墮落到極端卑鄙的地步，就應該團結在革命的無产階級政党周围。沒有無产階級的胜利，人民就得不到和平，农民就得不到土地，工人和全体劳动者就得不到面包。

載于1917年9月1日（8月19日）

“無产者报”第6号

署名：尼·卡尔波夫

按“無产者报”原文刊印

政治訛詐

揭發某些事實或某些捏造的“事件”，使被揭露者感到頭痛，或者製造某些其他的麻煩，以此威脅、勒索，這叫做訛詐。

以揭露相威脅，或者揭發真的、但往往是假的“事件”，使敵人在政治上受到損失，蒙上不自之冤，不能進行或很難進行政治活動，這就是政治訛詐。

我們的共和派的（請原諒我這樣講）甚至民主派的資產者和小資產者，就是進行政治訛詐的英雄，他們掀起誣蔑誹謗、造謠中傷的“運動”，打擊他們不喜歡的政黨和政治家。過去沙皇政府進行粗暴、野蠻、殘酷的迫害。現在共和派資產階級進行卑鄙醜惡的迫害，拚命用誹謗誣蔑、造謠中傷、流言蜚語等等來污辱他們所仇視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和國際主義者。

布爾什維克能夠受到共和派帝國主義者這種手法的迫害，特別感到榮幸。布爾什維克完全可以拿一位詩人的名言來比自己：

他聽到的贊許聲音
不是在娓娓動聽的贊詞里，
而是在粗暴瘋狂的叫囂中。⁷³

俄國革命一開始，所有資產階級的報刊和幾乎所有小資產階級的報刊都向布爾什維克粗暴地瘋狂地叫囂起來。布爾什維克、國際主義者、無產階級革命的擁護者理應在這種粗暴瘋狂的叫囂

中“听到”贊許的声音，因为資產階級的疯狂的仇恨，往往是被誹謗、被陷害、被迫害的人正确而忠誠地为無產階級服务的最好証明。

資產階級誹謗手法的詭詐性質，我們可以用一个与我党無关的例子，即社会革命党人切尔諾夫的例子来特別清楚地加以說明。人所共知的誹謗者立宪民主党人，以米留可夫和盖森为首，想要恐吓或赶走切尔諾夫，于是就攻击切尔諾夫在国外写了所謂“失敗主义的”文章，同所謂接受德帝国主义代理人津貼的人接近等等。攻击激烈起来了。所有的資產階級报刊都随声附和。

但是立宪民主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在內閣名額問題上“达成了協議”。啊，真是怪事！切尔諾夫“案件”烟消云散了！！不过几天，沒有經過审判，沒有經過审問，沒有公布文件，沒有傳訊証人，沒有鑑定人的鑑定書，“案件”就烟消云散了。只要立宪民主党人不滿意切尔諾夫，誹謗性的“案件”就会發生。一旦立宪民主党人同切尔諾夫在政治上暫時和解，“案件”就会烟消云散。

这种政治詭詐是一目了然的。在报上攻击別人、造謠中伤，正是資產階級、米留可夫、盖森、扎斯拉夫斯基、唐恩这些無賴进行政治斗争和政治报复的工具。政治目的一旦达到，攻击某某的“案件”頓時“烟消云散”，但这也就証明“案件”制造者是如何卑鄙齷齪、下流無耻和詭詐成性了。

很清楚，如果不是詭詐者，那末，無論政治上有什么变化，他都不会停止揭露，并且动机也是純正的；如果不是詭詐者，那末，就無論如何要揭露到底，直到法庭宣判，公众完全弄清真相，所有的文件都已經收集并且公布为止，或者公开坦率地承認自己的錯誤或誤解。

这个非布尔什維克切尔諾夫的例子，清楚地向我們表明了資產階級報刊和小資產階級報刊对布尔什維克进行訛詐性攻击的真正本質。一旦这些資本的騎士和走狗觉得政治目的已經达到，布尔什維克已被逮捕，報紙已被查封，那他們就会一声不响了！米留可夫、盖森、扎斯拉夫斯基、唐恩之流向布尔什維克进攻的好汉們，拥有一切可以用来揭露真相的东西：報刊、金錢、外国資產階級的幫助、俄国整个資產階級“輿論”的協助、世界大国之一的国家政权的友善支持等等，但是，他們一声不响。

对于自覺的工人來說，整个生活使他們很快就能識破資產階級的手法，他們一眼就能看穿米留可夫、盖森、扎斯拉夫斯基、唐恩之流不过是一些政治訛詐者。这一点对于任何一个正直的人都愈來愈清楚了。这一点應該肯定下来，不断向群众說明，天天在報上登載，把这方面的材料收集起来編成小冊子，抵制訛詐者等等等。这才是無產階級应当用来对付誹謗和訛詐的方法！

我們的加米涅夫同志也是最近受到訛詐之害的一个。他在案件审理以前就“丢开了社会活动”。依我們看来，这样做是錯誤的。訛詐者正需要我們这样做。审理案件他們是不願意的。加米涅夫可以不理这些無賴，相信自己的党就行了，讓“言論報”、“交易所報”、“日報”、“工人報”等等下流報紙的惡狗們去狂吠吧！

要是我們党一听到資產階級誹謗我們党的領袖就同意自己的領袖丢开社会活动，那就要吃大亏，就会使無產階級受到損失，使無產階級的敌人拍手称快。因为資產階級的報紙很多，資產階級屢来进行訛詐的文人（像扎斯拉夫斯基之流）更多，資產階級要使我们党的工作人員“丢开”社会活动那太容易了！审理案件，弄清真相，他們連想都沒有想过。

不，同志們！我們決不向資產階級報刊的叫囂屈服！我們決不讓米留可夫、蓋森、扎斯拉夫斯基之流進行詭詐的無賴們拍手稱快。我們相信無產者的審判，相信 24 萬國際主義者組成的我們黨的覺悟工人的審判。我們不會忘記，在全世界，資產階級正同護國派勾結起來，用造謠、誹謗、詭詐的手法迫害國際主義者。

我們要痛斥詭詐者。我們要堅定不移地讓覺悟的工人、自己的黨來審判，來決斷每一件還有些微懷疑的事情。我們相信黨，我們把黨看做我們時代的智慧、榮譽和良心。我們把革命國際主義者的國際聯盟看做工人階級解放運動的唯一保證。

對於那些同立憲民主黨人呆在一個內閣里的人，對於那些同米留可夫、唐恩、扎斯拉夫斯基之流握手言歡的人，我們決不受他們“輿論”的任何影響！

打倒政治詭詐者！蔑視他們，抵制他們！不斷向工人群眾揭露他們的丑惡面貌！我們要堅定地走自己的路，保衛自己黨的工作能力，保衛黨的領袖，而且使他們不要因為那些壞人和壞人們的無恥誹謗而浪費時間。

載于 1917 年 9 月 6 日（8 月 24 日）

“無產者報”第 10 號

按“無產者報”原文刊印

紙上的決議

策烈鐵里先生是一個最饒舌的“社會主義者”部長和庸人領袖。他那些數不清的演講，那些言之無物、不負責任、毫無重大意義、真正是所謂“部長式的”演講，簡直空洞庸俗到了令人難以卒讀的地步。他那種登峰造極的妄自尊大使這些娓娓動聽的“發言”（正因為這些發言空洞，策烈鐵里才成了資產階級的寵兒）特別令人不能容忍，因此，很難斷定被這些圓滑動聽的甜言蜜語掩蓋起來的究竟是超乎尋常的愚蠢呢，還是可耻地缺乏政治原則性。

策烈鐵里的演講愈空洞，就愈應該特別強調指出他8月18日在彼得格勒蘇維埃全體會議上所做的那件簡直不可思議的不平常的事情。雖然令人難以置信，但這是事實，策烈鐵里竟吐露了一句真誠的、清楚的、老實的、公正的話。這句話真實地反映了一個深刻而重要的政治真理，這個真理不是只有偶然的意義，而是表明了當前整個政局中重大的、根本的特征和基本因素。

根據“言論報”的報道，策烈鐵里說（讀者當然記得，策烈鐵里是反對廢除死刑的決議的）：

……“你們的任何決議都是無濟于事的。這裡需要的不是紙上的決議，而是實際的措施”……

真理總是真理。聰明的話聽起來也很舒服……

當然，策烈鐵里的這個真理首先打擊的，而且打擊得最厲害

的，还是他自己。因为正是他，这位苏維埃最著名的領袖促使这个机关名誉扫地，使它淪为一种自由派會議的可怜角色，給世界留下了一堆典型的軟弱無力的善良願望的記錄。策烈鉄里通过被孟什維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閹割了的苏維埃，作过几百个“紙上的決議”，現在，通过了一項打他自己嘴巴的決議的时候，正是他，是最沒有权利叫喊“紙上的決議”的。策烈鉄里使自己陷入了一个特別可笑的議會議員的境地，这个議員最热衷于“議会的”決議，最愛把決議的作用吹得天花乱墜，最愛为了決議劳碌奔走，而一碰到反对自己的決議时，就拚命大喊大叫：“葡萄是酸的”，老实說，決議不过是紙上的。

真理畢竟是真理，哪怕它是出自伪君子之口，哪怕它是用虛伪的声調講出来的。

決議之所以成为紙上的，并不是因为前任部长策烈鉄里說了这样的話，而且他認為，为了保衛革命（不要笑！），必須采用死刑。決議之所以成为紙上的，是因为決議又在重复从1917年3月起就背得烂熟的、毫無意义地再三重复的死板公式：“苏維埃要求临时政府”。人們已習慣于“要求”，照例不断地重复，但是沒有看到情况已經变了，力量已經消失了，沒有实力作后盾，“要求”是可笑的。

而且死板地重复“要求”，会給群众造成一种錯觉，以为情况并沒有改变，苏維埃还有实力，只要它說一声“要求”，事情就能办到，就可以躺下来大做其尽了自己职责的“革命”（請原諒……）“民主主义者”的美梦。

也許有的讀者要問：难道主张要有清醒的政治头脑、要估計实力、反对說空話的布尔什維克，就不应当贊成決議嗎？

不，应当贊成，因为決議里有一节（第三节）包含着一个很好很

正确的思想（基本的、主要的、有决定意义的思想）；死刑是对付群众的工具（如果是对付地主和资本家的工具，那就又当别论了）。虽然社会革命党这班庸人糟蹋了马尔托夫的原作，不用“违背人民利益的帝国主义”目的这句话，而添上“保卫祖国和革命”这种纯粹是虚伪的、欺骗人民的、掩饰掠夺性战争的词句，但是我们还是应当赞成。

应当赞成，但要说明我们有个别地方不同意，并且声明：工人们！你们别以为今天的苏维埃还能够向临时政府要求什么东西。不要抱幻想。要知道苏维埃已经沒有力量要求了，今天的政府完全成了反革命资产阶级的俘虏。好好地想一想这个辛酸的真理吧！只要用任何一种方式作了这样的声明，誰也不能阻止苏维埃的委员們 赞成 这个决議。

只有这样，决議才不会是“紙上的”。

只有这样，我們才可以避开策烈铁里提出的挑拨性的問題：他問苏维埃的委员們是不是想“推翻”临时政府，这跟亚历山大三世的时候，卡特柯夫問自由派是不是想“推翻”专制制度一模一样，一字不差。我們倒想回答前任部长說：亲爱的先生，你們刚刚頒布了苦役法来对付那些“圖謀”或者仅仅是想要“推翻”政府（地主、资本家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叛徒們协商組成的政府）的人。我們完全懂得，如果你們再“拉”几个布尔什維克来受这种令人滿意的（对你們來說）法律的制裁，所有的资产者会更加夸奖你們。可是，如果我們不来帮助你們找到运用这个“令人滿意的”法律的机会，那也請你們不要見怪。

* * *

*

就像太陽在一滴水珠里反映出来一样，8月18日的事件反映出俄国的整个政治制度。拿破侖式的政府，死刑，苦役法，以及用路易·拿破侖到处宣揚的平等、博愛、自由、祖國的光榮和尊嚴、大革命的傳統、鎮壓無政府主義等等詞句來給這些“令人滿意的”（對挑撥者來說）東西塗上一層糖衣。

甜蜜蜜的、甜得膩人的小資產階級部長和前任部長們，拍着胸膛說他們有良心，說他們如果用死刑對付群眾就是昧了良心，說着甚至哭了起來。這正是19世紀60年代一位“教師”的更好的翻版。這位教師遵照皮羅哥夫的遺訓，鞭打普通人家的子弟，但他不像過去那樣隨隨便便地、平平常常地打完了事，而是在“合法地”“公正地”鞭撻的時候，揮着仁慈的眼淚。

農民們受了自己的小資產階級領袖的欺騙，還相信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的聯盟同資產階級聯姻後，就會產生……無償地廢除土地私有制。

工人呢……工人想的是什麼，在“人道的”策烈鐵里還沒有廢除新的苦役法以前，我們暫且沉默一下吧！

載于1917年9月8日（8月26日）

“工人報”第2號

按“工人報”原文刊印

論斯德哥尔摩代表會議

現在有許多人又對斯德哥尔摩代表會議發生興趣了。報紙上熱烈地討論了會議的意義問題。這個問題是同對整個現代社會主義原則本身的估價，特別是同社會主義對帝國主義戰爭的態度不可分割地聯繫着的。因此，我們必須更詳細地來談一談斯德哥尔摩代表會議。

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即布尔什維克，一开始就聲明反對參加這次代表會議。在這一點上他們是從原則出發的。誰都知道，世界各國的社會主義者，不管他們是交戰國的或中立國的，在對戰爭的態度問題上已經基本上分裂成兩大部分。一部分人站在本國政府、本國資產階級方面。我們把他們叫做社會沙文主義者，也就是說，口頭上是社會主義者，事實上是沙文主義者。凡是用“保衛祖國”來掩蓋保衛“自己”統治階級掠奪的利益的人，我們都把他們叫做沙文主義者。在這次戰爭中，交戰雙方的資產階級都在追求掠奪的目的：德國資產階級為了奪取比利時、塞爾維亞等等而戰；英國和法國的資產階級為了奪取德國的殖民地等等而戰；俄國資產階級為了奪取奧地利（里沃夫）、土耳其（阿爾明尼亞、君士坦丁堡）而戰。

因此，凡是在這次戰爭中站在本國資產階級立場上的社會主義者，就已經不是社會主義者了；他們已經背叛工人階級，實際上

已經轉到資產階級營壘里去了。他們成了無產階級的階級敵人。歐美社會主義的歷史，特別是第二國際時代即 1889—1914 年的歷史向我們表明，一部分社會主義者特別是大多數領袖和議會主義者轉到資產階級方面去並不是偶然的。在一切國家中，正是社會主義者中間的機會主義分子成了社會沙文主義者的骨幹。如果我們對社會沙文主義進行科學的考察，即不是抽出個別的人來看，而是從整個國際思潮的發展及其社會聯系的總和來看，那末社會沙文主義就必然是徹頭徹尾的機會主義。

各地的無產階級群眾都相當清楚相當敏銳地意識到社會沙文主義者背叛了社會主義，都痛恨和輕視最著名的社會沙文主義者，如俄國的普列漢諾夫，德國的謝德曼，法國的蓋得和列諾得爾之流，英國的海德門等等。

在戰爭期間，儘管資產階級進行瘋狂的迫害，堵住人們的口，可是各國革命的國際主義派還是形成了。這一派始終忠於社會主義。他們並沒有向沙文主義屈服，他們不容許用保衛祖國的謊言來掩蓋沙文主義，他們揭穿了這些話的全部虛偽性，揭穿了目前資產階級兩大聯盟進行掠奪戰爭的全部罪行。屬於這一派的有：英國的馬克林，他因反對掠奪成性的英國資產階級而被判處服一年半苦役；德國的卡爾·李卜克內西，他因為有在德國號召革命、揭露德國進行掠奪戰爭的“罪狀”而被德國帝國主義強盜判處服苦役。屬於這一派的還有俄國的布爾什維克，他們因為有和馬克林、卡爾·李卜克內西同樣的“罪狀”而受到帝國主義的代理人俄國民主共和派的迫害。

這一派是唯一忠於社會主義的派別。只有這一派沒有背叛表達自己信念的莊嚴宣言，沒有背棄 1912 年 11 月全世界社會主義

者一致签字的巴塞尔宣言上的庄严的诺言。这个宣言所說的不是一般的战争(有各种各样的战争),恰恰是1912年准备好而在1914年爆发的战争,也就是德国与英国及其盟国之间因争夺世界霸权而爆发的战争。面对这种战争,巴塞尔宣言一个字也没有提到社会主义者有“保卫祖国”(也就是为自己参加战争辩护)的义务和权利,它极其肯定地说,这样的战争一定会导致“无产阶级革命”。各国社会沙文主义者背叛社会主义可以从下面的事实特别明显地看出来:现在他们所有的人都胆怯地躲开巴塞尔宣言中談到的这次战争同无产阶级革命的联系,就像小偷躲开他偷过东西的地方一样。

显然,一种是忠于巴塞尔宣言并以鼓吹和准备无产阶级革命来“回答”战争的社会主义者,一种是以支持“本国”民族资产阶级来回答战争的社会沙文主义者,他们之间存在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显然,想“调和”或“统一”这两派的挣扎是多么软弱无力,多么幼稚和虚伪。

世界社会主义的第三个流派即所谓“中派”或“考茨基派”(以“中派”最著名的代表考茨基得名)正是这样非常可怜地在挣扎。各国的这一流派在整整三年战争期间的表现,是完全没有思想性,完全没有办法。例如在德国,事变的进程曾迫使考茨基派同德国的普列汉诺夫派分裂而建立特殊的所谓“独立社会民主党”⁷⁴,但是这个党还是不敢做出必要的结论,还是鼓吹在国际范围内同社会沙文主义者“统一”,继续欺騙工人群众,要他们把希望寄托在恢复德国的这种统一上面,并且阻挠同“本国”政府进行革命斗争(这种斗争在战争时期可以而且应当改变形式,但决不能延缓、推迟)的唯一正确的无产阶级策略的实行。

这就是国际社会主义的情况。对于这种情况沒有明确的估計，对于国际社会主义的一切派別沒有原則性的看法，那就不能討論像斯德哥尔摩代表會議这样的实际問題。只有布尔什維克党，在1917年4月24—29日的代表會議通过的、8月經第六次代表大会批准的詳尽決議中，对国际社会主义的一切派別作了原則性的評价。忘記这种原則性的評价，忽視这种評价而談斯德哥尔摩代表會議，那就是站在毫無原則的立場上。

这种無原則性盛行于一切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即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維克中間，8月10日“新生活报”上的一篇文章可算是这种無原則性的典范。这篇文章之所以值得注意，是因为它集中了小資產階級民主派極左翼的報紙上关于斯德哥尔摩代表會議的最流行的錯誤、偏見和無思想性。

“新生活报”的社論写道：“人們可以根据某些理由对斯德哥尔摩代表會議抱否定态度，也可以在原則上非难‘大多数护国派’的調停嘗試。但是为什么要否定一目了然的事情呢？要知道，在英国工人通过了引起本国政治危机并造成本国‘民族統一’的第一次深刻裂痕的著名決議以后，會議就具有了前所未有的意义。”

这种議論是無原則性的典范。事实上，怎么能从斯德哥尔摩代表會議問題造成英国“民族統一”的深刻裂痕这一無可爭辯的事实中得出結論說，我們應該弥补而不應該加深这个裂痕呢？原則性的問題是这样的，而且只能是这样的：同护国派（社会沙文主义者）决裂还是同他們妥协。斯德哥尔摩代表會議是实行妥协的多次嘗試中的一次。會議沒有开成。它之所以沒有开成，是因为英法帝国主义者现在还不同意議和，而德帝国主义者則同意議和。英国工人更清楚地感覺到本国帝国主义資產階級是在欺騙

他們。

試問，应当怎样来利用这一点呢？我們是革命的国际主义者，我們說：应当利用这一点来加深無产階級群众同本国社会沙文主义者的分裂，以便达到彻底的分裂，排除群众在反对本国政府、本国資產階級的革命斗争發展中的一切障碍。正是我們而且也只有我們才能这样做，才能加深裂痕并使这种裂痕达到分裂的地步。

到斯德哥尔摩去的人，或者确切些說，向群众鼓吹有必要到那里去的人，現在，当实际生活“排斥了”这个計謀的时候，实际上是在做什么呢？只不过是弥补裂痕，因为有意召集和支持斯德哥尔摩代表會議的是拥护本国政府的人們，是內閣派切尔諾夫和策烈鉄里之流，斯陶宁格、布兰亭和特魯尔斯特拉之流，更不必說謝德曼分子了。

这就是“一目了然”的事情，这就是“新生活报”的机会主义者对社会沙文主义这种思潮不作总的評價而只是完全無原則地議論的时候忘記了的和加以掩盖的事情。斯德哥尔摩代表會議是帝国主义者政府的部长們的座談会。这一事实不管“新生活报”怎样竭力迴避，还是迴避不了的。号召工人参加斯德哥尔摩代表會議，号召他們等待斯德哥尔摩代表會議，号召他們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斯德哥尔摩代表會議上，这就等于向群众說：你們能够而且应当从小資產階級政党和帝国主义者政府內拥护帝国主义者政府的部长們的妥协中期待美好的东西。

“新生活报”正是不自覺地进行着这种極端無原則的極端有害的宣传。

“新生活报”因为看到英法两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和他們的政府之間的冲突，就忘記了切尔諾夫、斯柯別列夫、策烈鉄里、阿夫克

森齐也夫、布兰亭、斯陶宁格以及謝德曼之流都同样是拥护本国政府的社会沙文主义者。这难道不是無原則嗎？

“新生活报”不是向工人說：你們看，英法帝国主义者甚至不允許自己的社会沙文主义者去同德国的社会沙文主义者談判，——这就是說，从英国和法国方面看来这次战争也是掠夺性的战争，这就是說，除了同一切政府、一切社会沙文主义者徹底决裂以外沒有别的出路——“新生活报”不是向工人这样說，而是用幻想来安慰工人。

該报写道：“人們准备在斯德哥尔摩議和并一起制定共同的斗争計劃：拒絕預算投票，抛弃‘民族統一’，召回政府中的部长等等。”

为了証明这段完全騙人的話是真的，就在“斗争”两个字下面加上着重号。不用說，这是一个多么好的証明！

經過三年战争以后，还是用最空洞的諾言来哄騙工人：“准备在斯德哥尔摩”抛弃民族統一……

誰准备这样做呢？是謝德曼、切尔諾夫、斯柯別列夫、阿夫克森齐也夫、策烈鉄里、斯陶宁格、布兰亭之流，恰恰就是几年或几个月以来执行民族統一政策的那些人（和政党）。不管“新生活报”怎样真誠地相信这种奇迹，不管它怎样誠心誠意地相信这种事情是可能的，我們还是必須說，“新生活报”是在大大地欺騙工人。

“新生活报”是在欺騙工人，要工人信任社会沙文主义者。照它說来，虽然社会沙文主义者一向参加內閣并执行民族統一政策，但是他們不久就要在斯德哥尔摩进行商討，取得諒解，达成協議并停止这种行动。他們将开始为和平奋斗，他們将拒絕預算投票，等等等等……

这一切都是徹头徹尾的欺騙。这一切都是反动的对工人的安

懣和麻醉，都是想使工人信任社会沙文主义者。但是那些不是在口头上“为和平奋斗”的社会主义者，那些不是为了自欺欺人而是真正“为和平奋斗”的社会主义者，却并没有等待任何国际会议，他们早就开始了这种斗争，早就抛弃民族统一而开始了这种斗争，像英国的馬克林，德国的李卜克内西，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都是这样的。

“新生活报”写道：“我们完全理解布尔什维克对于列诺得尔分子和謝德曼分子的合理的和健康的怀疑，但是‘工人和士兵报’的政論家們却教条主义地只願見树木而不願見森林：他們沒有注意到列诺得尔和謝德曼所依靠的群众情緒在轉变。”先生們，問題不在于怀疑，——掩盖事实、表現無原則的知識分子的怀疑却是在你們身上占主导地位的情緒。我們并不怀疑列诺得尔分子和謝德曼分子，我們是他們的敌人。这是“二者之間很大的区别”。我們已經同他們决裂，并且号召群众同他們决裂。正是我們而且只有我們“注意到”群众情緒的轉变，“注意到”比情緒及其轉变更重要得多、深刻得多的东西，即群众的基本利益，以及这种利益同列诺得尔和謝德曼之流社会沙文主义者的政策之間的不可調和性。“新生活报”的先生們和俄国帝国主义政府的部长們一道在斯德哥尔摩恰恰会碰到謝德曼分子和列诺得尔分子（因为斯陶宁格和特魯尔斯特拉同列诺得尔并没有什么重大的区别，至于阿夫克森齐也夫和斯柯別列夫，那更不必說了）。我們不去看這場由社会沙文主义者排演、由社会沙文主义者自己观看的斯德哥尔摩滑稽剧，正是为了使群众睁开眼睛，为了表达他們的利益，为了号召他們革命，为了利用他們情緒上的轉变去同社会沙文主义者完全决裂并且进行原則性的斗争，而不是無原則地迁就这种情緒。

“新生活报”写道：“……布尔什维克喜欢挖苦那些到斯德哥尔摩去的国际主义者，說他們同謝德曼分子和韓德遜分子妥協，他們‘不知道’他們自己对代表會議的态度——当然由于根本不同的原因——却是同普列汉諾夫分子、盖得分子和海德門分子一致的。”

說我們对代表會議的态度是同普列汉諾夫分子一致的，这不正确！这显然是無稽之談。我們不願意参加由一部分社会沙文主义者召开的不彻底的代表會議，这一点我們同普列汉諾夫分子是一致的。但是我們对代表會議的态度無論在原則上或在实践上都和普列汉諾夫分子完全不同。而你們这些自命为国际主义者的人，才真是同謝德曼、斯陶宁格和布兰亭分子一道去参加代表會議，才真是去同他們妥協的。这是事实。你們把团结社会沙文主义者这一渺小的、可怜的、帶有極大陰謀性的、依靠两大联盟之一的帝国主义者的事業叫做“团结国际無产阶级的伟大事業”。这是事实。

你們这些假国际主义者要是不說一大堆謊話，散播一些幻想，把社会沙文主义者打扮一番，使群众产生一种希望，似乎斯陶宁格、布兰亭、斯柯別列夫、阿夫克森齐也夫之流真能够抛弃“民族統一”，那你們就無法向群众鼓吹参加斯德哥尔摩代表會議，——很有可能，除了鼓吹以外，别的什么也做不出来；但是，代表會議虽开不成，鼓吹还是具有思想上的意义的。

我們布尔什维克所进行的反对斯德哥尔摩代表會議的宣传却向群众說明全部真相，繼續揭穿社会沙文主义者，揭穿同社会沙文主义者妥協的政策，并引导群众同他們完全决裂。事情是这样，德帝国主义認为目前参加斯德哥尔摩代表會議对自己有利，因而派它的代理人謝德曼分子到那里去，而英帝国主义認为目前对自己

不利，甚至不願意現在談和平；我們就揭露英帝國主義，利用英帝國主義和英國無產階級群眾之間的衝突來提高英國無產階級群眾的階級覺悟，加強國際主義的宣傳，向他們說明必須同社會沙文主義完全決裂。

“新生活報”的假國際主義者的所作所為正像知識分子氣十足的印象主義者，即毫無骨氣地隨波逐流、忘記國際主義基本原則的人。新生活派是這樣來推論的：既然英帝國主義反對斯德哥爾摩代表會議，那就是說我們必須贊成這次會議。也就是說，代表會議已經具有了前所未有的意義。

這樣來推論，實際上就是陷入無原則的泥坑，因為德帝國主義者現在贊成斯德哥爾摩代表會議是為了帝國主義的貪得無厭的掠奪利益。既然這些“國際主義者”不敢公開承認這一無可爭辯的顯而易見的事實，既然他們不得不迴避這一事實，那末他們的“國際主義”究竟有什麼價值呢？先生們，假如你們和謝德曼、斯陶寧格之流一道去參加斯德哥爾摩代表會議，那末你們究竟有什麼保證能使自己在實際上不變成德帝國主義秘密外交家手中的傀儡和工具呢？你們不可能有這種保證。這種保證根本就不存在。如果斯德哥爾摩代表會議終於開成了（這是很少可能的），這次會議就會是德帝國主義者刺探交換割地有哪些可能的一個嘗試。這就會是謝德曼和斯柯別列夫之流的娓娓動聽的演說的真正現實意義。如果這次會議開不成，那末你們要群眾相信社會沙文主義者、相信他們不久大概可能“改正”的欺人之談，就具有現實的意義。

在這兩種情況下，你們都想做一個國際主義者，但實際上卻成了某一聯盟或兩個聯盟的社會沙文主義者的幫兇。

而我們卻估計到一切細微的政治變化，我們始終是徹底的國

际主义者,我們鼓吹工人的兄弟般的联合,鼓吹同社会沙文主义者决裂,鼓吹为無产階級革命而工作。

載于1917年9月8日(8月26日)

“工人报”第2号

署名:尼·克一夫

按“工人报”原文刊印

政論家札記

(农民和工人)

8月19日“全俄农民代表苏維埃消息报”⁷⁵第88号上登載了一篇非常值得注意的文章，这篇文章应该成为每个同农民有接触的党的宣传員和鼓动員以及每个派往农村工作或者同农村有联系的觉悟工人的基本讀物之一。

这篇文章就是“根据1917年出席彼得格勒第一次全俄农民代表大会各地代表带来的242个委托書編写的示范委托書”。

万分希望农民代表苏維埃把有关这些委托書的尽可能詳細的材料公布出来(如果根本不可能把这些委托書全部刊印的話；如果可能全部刊印，当然最好)。例如，特別需要把提出委托書的省、县、鎮全部开列出来，注明每个地方提出了多少委托書，委托書是在什么时候起草或提出的，至少应对各項基本要求作一分析，以便看出各地区在各个問題上的差別大不大。譬如說，农戶占有土地的地区和村社占有土地的地区、大俄罗斯人地区和其他民族地区、中央地区和边远地区、沒有农奴制的地区等等，在取消农民土地所有权、定期重分土地、禁止雇佣劳动、沒收地主的农具和牲畜等等問題的提法上，有什么差別。如果沒有这些詳細的資料，就不可能对农民委托書中非常宝贵的材料进行科学研究。事实是我們政策的基础，我們馬克思主义者是应该竭尽全力对种种事实进行科

学研究的。

在綜合委托書（我們將这样称呼“示范委托書”）中，現在還沒有發現什么事实上的錯誤。由于沒有更好的材料，它就是这方面的唯一材料。我們再說一遍：这应当是我們党的每个党员必备的材料。

綜合委托書的第一部分是講一般的政治原理，政治民主的要求；第二部分是講土地問題。（我們希望全俄农民代表苏維埃或其他的人編写一份农民对于战争問題的綜合委托書和決議。）对于第一部分，我們現在不作詳細論述，只指出两点。第6条要求全体公职人員由选举产生；第11条要求战争结束后废除常备軍。这两点使农民的政治綱領同布尔什維克党的綱領十分接近。根据这两点，我們應該在自己的全部宣传鼓动中指出并証明，孟什維克和社会革命党的首領不仅是社会主义的叛徒，而且是民主主义的叛徒，因为他們违背民意，违背民主的原則，为了討好資本家而坚持委員人选必須經政府批准而不是完全由选举决定，例如在喀琅施塔得就是这样。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維克的首領在彼得堡的区杜馬和其他地方自治机关里，违背民主原則，反对布尔什維克提出的立即实行工人民警制、然后过渡到全民民警制的要求。

根据綜合委托書，农民的土地要求首先在于無償地廢除一切形式的土地私有制，直到农民的土地私有制；把經營水平高的农庄交給国家或村社；把已經沒收的土地上的一切耕畜和农具也沒收（土地少的农民除外），交給国家或村社；禁止雇佣劳动；劳动群众平分土地，并定期重分等等。在立宪會議召开以前，农民要求立即頒布禁止土地买卖的法律，取消关于退出村社、关于单独田庄等的法律，頒布关于保护林木、漁場和其他副業，以及关于取消长

期租約和修改短期租約等等的法律，作为过渡时期的办法。

只要稍微考虑一下这些要求就可以看到，如果不同資本家完全决裂，不同資本家階級作最坚决最無情的斗争，不推翻他們的統治，而同他們建立联盟，那末这些要求是完全不能实现的。

社会革命党人欺騙自己、欺騙农民，就在于他們贊許并且宣传这样一种看法，以为不推翻資本家的統治，不把全部国家政权轉归無产階級，以为貧农不支持無产階級的国家政权用最坚决最革命的措施去反对資本家，也可以实现这种改革，也可以实现类似的改革。“社会革命党”的分化，左派的产生，証明这个党的内部已經逐漸意識到了这种欺騙。

事实上，沒收全部私有土地意味着沒收亿万の銀行資本，因为大部分土地是抵押給銀行的。如果革命階級不用革命办法去打垮資本家的反抗，这种措施难道是可以設想的嗎？同时这里所談的是最集中的銀行資本，它同我国这样一个大国的資本主义經濟的一切最重要中心有千絲万縷的联系，只有同样集中的城市無产階級的力量，才能战胜这种資本。

其次，把經營水平高的农庄轉交国家。显然，只有革命的無产階級国家才是能够夺取这些农庄并且真正为劳动群众的利益、而不为官僚和資本家的利益去进行經營的“国家”。

沒收养馬場等等，进而沒收一切耕畜和农具，这不仅是对生产資料私有制的巨大打击，而且是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驟，因为农具“交給国家或公社专门使用”就必须建立社会主义的大农业，或者至少要对联合的小經濟实行社会主义的监督，对它們的經營实行社会主义的調节。

“禁止”雇佣劳动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一句空話，是受压制的

小業主軟弱無力的、不自覺的幼稚願望，這些小業主沒有看到，如果沒有農村的僱傭勞動後備軍，整個資本主義工業就會停頓，如果在城市里允許僱傭勞動，在農村里也就不可能“禁止”僱傭勞動；而且他們沒有看到，“禁止”僱傭勞動也正是走向社會主義的一個步驟。

正是在這裡，我們接觸到了工人對農民的态度這一根本問題。

群眾性的社會民主主義的工人運動在俄國已經有二十多年的歷史了（如果從 1896 年的大罷工算起）。在這個很長的時期內，貫穿在兩次偉大的革命中並且像一根紅綫一樣貫穿在俄國的全部政治史中的一個問題就是：工人階級領導農民前進走向社會主義呢，還是自由資產者拖着農民後退，容忍資本主義？

社會民主黨的機會主義派總是按照下面這個聰明絕頂的公式來論斷的：因為社會革命黨人是小資產者，所以“我們”應該拋棄他們的小市民空想的社會主義觀點，為的是要像資產階級那樣否定社會主義。這樣，馬克思主義就被巧妙地換成了司徒盧威主義，孟什維克就墮落為立憲民主黨的走狗，叫農民“容忍”資產階級的統治。策烈鐵里、斯柯別列夫同切爾諾夫和阿夫克森齊也夫一起，忙於以“革命民主派”的名義簽署立憲民主黨的反動地主的法令。這就是這些走狗最近最明顯的表現。

革命的社會民主黨從來沒有放棄對社會革命黨的小資產階級幻想進行批評，除去為了反對立憲民主黨以外，從來沒有同他們訂立聯盟；革命的社會民主黨總是爭取農民脫離立憲民主黨的影響，不是以容忍資本主義的自由主義態度，而是以革命的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道路來對抗小市民空想的社會主義觀點。

現在，戰爭異常迅速地加快了事變的發展，令人難以置信地加

深了資本主义的危机，各族人民在这个时候需要立即作一选择：死亡呢，还是馬上坚决地采取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驟？現在，半自由主义的孟什維主义和革命無产階級的布尔什維主义之間的深刻分歧，已經非常清楚而具体地由数千万农民的行动表明了。

容忍資本的統治吧，因为“我們”还没有成熟到实行社会主义，——这就是孟什維克对农民說的話，这样他們就用一般“社会主义”的抽象問題代替了下面这个具体問題：如果不坚决地采取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驟，能不能医治战争的創伤呢？

容忍資本主义吧，因为社会革命党人是小資产階級的空想家，——这就是孟什維克对农民說的話，他們就同社会革命党人一起去支持立宪民主党的政府了……

社会革命党人則拍着自己的胸膛要农民相信，他們反对向資本家作任何妥协，他們从来不認为俄国的革命是資产階級革命，——因此他們就去同机会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人建立联盟，就去支持資产階級政府……社会革命党人可以签署任何極其革命的农民綱領，但他們总是把它束之高閣不去实行，总是用最空洞的諾言来欺騙农民，实际上几个月来都是在联合內閣中同立宪民主党人謀“妥协”。

社会革命党人这样明目张胆地、实际地、直接地、明显地出卖农民的利益，使形势大为改变。應該估計到这种改变。不能仅仅用旧的方法，仅仅像我們在1902—1903年和1905—1907年那样来进行反社会革命党人的鼓动了。不能只限于在理論上揭穿“土地社会化”、“平均使用土地”、“禁止僱佣劳动”等等小資产階級的幻想了。

那时正是資产階級革命的前夜或資产階級革命尚未完成的时

候，所以全部任务首先在于把革命推进到推翻君主制度。

現在君主制度已經推翻了。資產階級革命已經完成了，俄国已經成了民主共和国，有了一个由立宪民主党、孟什維克和社会革命党組成的政府。三年来的战争把我們向前推进了三十年，它在欧洲造成了普遍义务劳动制和企業的强制辛迪加化，它使最先进的国家瀕于飢荒和空前破坏的境地，使它們不得不采取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驟。

只有無产階級和农民才能推翻君主制度，——这就是我們的階級政策在当时的基本定义。这个定义是对的。1917年2月和3月再次証实了这一点。

只有領導着貧苦农民(即我們党綱所說的半無产者)的無产階級才能以民主的和平結束战争，医好战争創伤，开始实行絕對必要的刻不容緩的走向社会主义的步驟，——这就是我們的階級政策在現时的定义。

由此可以得出結論：反对社会革命党的宣传鼓动的重心應該移到說明社会革命党人背叛农民这一点上。他們代表的不是貧苦的农民群众，而是少数富裕的業主。他們不是引导农民同工人結成联盟，而是引导农民同資本家結成联盟，服从資本家。他們为了取得部长的肥缺，为了同孟什維克和立宪民主党人結成联盟而出卖了被剝削劳动群众的利益。

因战争而加速發展的历史，已經大大向前推进，以新的内容充实了旧的公式。“禁止雇佣劳动”这句话在以前不过是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一句空話，但在現时的实际生活中却有了另一种意义：千百万貧苦农民在242个委托書中表示，他們要废除雇佣劳动，但是他們不知道应当怎样做。而我們却知道应当怎样做。我

們知道，要做到這一點只有同工人結成聯盟，在工人的領導下反對資本家，而不是同資本家“妥協”。

我們反對社會革命黨的宣傳鼓動的基本路線即我們向農民說話的基本路線，現在應該這樣改變。

農民同志們，社會革命黨背叛了你們。它出賣了茅舍而投身到宮殿里去了，即使不是皇帝的宮殿，也是革命的死敵、特別是農民革命的死敵立憲民主黨人同切爾諾夫、彼舍霍諾夫、阿夫克森齊也夫之流組成的政府在那里開會的宮殿。

只有革命的無產階級，只有把它統一起來的先鋒隊布爾什維克黨，才能够真正實行 242 個委託書中提出的貧苦農民的綱領。因為革命的無產階級不是用不許雇用工人的辦法即“禁止”雇用工人的辦法，而是用唯一正確的推翻資本統治的辦法來真正廢除雇傭勞動的。革命的無產階級真正要沒收土地、農具和擁有技術設備的農業企業，實現農民需要的而社會革命黨人不能給予的東西。

工人向農民說話的基本路線現在就應該這樣改變。你們貧苦農民所需要的、正在尋找的、但常常不知道在什麼地方尋找和怎樣才能找到的東西，我們工人能够而且一定要給你們。我們工人反對資本家，維護自己的利益，同時也維護絕大多數農民的利益，但是社會革命黨人却同資本家建立聯盟，出賣這種利益。

* *
* *

提醒讀者注意一下恩格斯在逝世前不久關於農民問題所說的話。恩格斯強調指出，社會主義者從來沒有想要剝奪小農，認為只有用示范的力量向他們表明使用機器的社會主義農業的優越性。⁷⁶

現在，戰爭已實際地向俄國提出了這樣的問題。農具很少。要沒收農具，但“不要分割”經營水平高的農莊。

農民開始懂得這一點了。貧困迫使他們懂得了。戰爭也迫使他們懂得了，因為沒有地方可以得到農具。必須愛護農具。大經濟也正是意味着節省用于農具方面以及用于其他許多方面的勞動。

農民希望保留自己的小經濟，希望平均分配，按期重分……讓他們這樣希望吧。沒有一個明智的社會主義者會因此而同貧苦農民分手。既然沒收土地意味着摧毀銀行的統治，沒收農具意味着摧毀資本的統治，那末，只要無產階級取得了中央的統治，政權轉到了無產階級手里，其他一切自然而然就會得到解決，就會因“示范的力量”而產生，就會由實踐本身提示出來。

政權轉歸無產階級——這就是問題的實質。到那個時候，242個委託書的綱領中所包含的一切重大的、主要的、根本的東西就會實現。實際生活也會表明，這些東西在實現時將有哪些形式上的變更。但這是小事。我們不是教條主義者。我們的學說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

我們並不苛求馬克思或馬克思主義者知道走向社會主義道路上的一切具體情況。這是痴想。我們只知道這條道路的方向，我們只知道在這條道路上前進的有哪些階級的力量；至于具體情況，實際情況，那只有千百萬人的實踐經驗才能表明。

農民同志們，相信工人吧！拋棄同資本家的聯盟吧！只有同工人緊密地結成聯盟，你們才能真正開始實現242個委託書的綱領。如果同資本家結成聯盟，受社會革命黨人的領導，你們將永遠看不到一個具有這個綱領的精神的堅定不移的步驟。

只有同城市工人結成聯盟，只有同資本作無情的鬥爭，你們才

能开始实现 242 个委托书的纲领，那时全世界将帮助你们和我们，那时这个纲领（不是现在这样写的纲领，而是它的实质）才有实现的保证。那时资本统治和雇佣奴隶制的末日就到来了。社会主义的天下，和平的天下，劳动者的天下就出现了。

载于 1917 年 9 月 11 日（8 月 29 日）

“工人日报”第 6 号

署名：尼·列宁

按“工人日报”原文刊印

論 誹 謗 者

在8月20日的“言論報”和“俄羅斯意志報”上，又一次刊載了誹謗我的消息。大家都知道，“俄羅斯意志報”是用黑錢辦的，它還向選民宣傳過：如果你們有“社會主義的情緒”，那就應該投“統一派”和“人民社會主義者”的票。

據這兩家報紙報道，這些消息是從“陸軍部”得來的，“言論報”甚至斷言，“根據證明材料和某些人的多次談話”來看，這些消息是可靠的。

禁止報刊進行誹謗的法律在俄國實際上已經不起作用了。進行誹謗的先生們特別在資產階級報刊上享有充分的自由，他們可以任意在報刊上匿名發表議論，造謠誹謗，透露官方消息而不用任何一個官方人士的署名等等，——不管怎樣做，都可以逍遙法外！以米留可夫先生之流為首的卑鄙的誹謗者是享有人身不可侵犯的特權的。

誹謗者斷言，我同“烏克蘭解放協會”有某些關係。米留可夫的報紙寫道：“德國政府曾委託列寧鼓吹和平”，“在柏林召開的兩個社會主義者會議，列寧和約爾土霍夫斯基都參加了”。“俄羅斯意志報”還在這句話後面補充了一句：“列寧曾在約爾土霍夫斯基那里住過。”

如果讓米留可夫先生以及像他一樣進行無恥誹謗的無賴們和

騎士們逍遙法外，那我只有再說一遍：這是誹謗；只有再一次舉出群眾知道的証人，來駁斥訛詐騎士們引用証人的話。

“烏克蘭解放協會”有一個成員叫巴索克，我是在1906年認識他的，當時他是一個孟什維克，同我一起參加過斯德哥爾摩代表大會。1914年秋，也許是1915年初，我住在伯爾尼的時候，一個高加索著名的孟什維克特里阿從君士坦丁堡到我那兒去找我。他把巴索克參加“烏克蘭解放協會”和這個協會同德國政府的聯繫都告訴了我，同時他把巴索克的一封信轉交給我。在信里，巴索克對我表示同情，希望我們的觀點能夠接近。我當時非常氣憤，趁特里阿在的時候，馬上寫了一封回信，托他轉交巴索克，因為特里阿打算回到君士坦丁堡去。

我在給巴索克的信中表示，既然他同一個帝國主義分子發生了關係，那我們就完全是背道而馳的，談不上有任何共同之點。

我同“烏克蘭解放協會”的關係不過如此而已。

載於1917年9月12日（8月30日）

“工人報”第8號

署名：尼·列寧

按“工人報”原文刊印

給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信

事变迅速地發展着，有时簡直是瞬息万变，所以这封信可能已經过时了。这封信是在星期三（8月30日）写的，中央收到时不会早于星期五（9月2日）。虽然如此，我还来冒一下险，因为我認为我有义务写这封信。

科尔尼洛夫暴动是事变的完全出人意外的（在这个时候、这种形式下是出人意外的）、真正意想不到的急剧轉变。

像任何一次急剧的轉变一样，这次轉变也要求修改和变更策略。而且像任何时候一样，这次修改也必須極其慎重地进行，以免陷入無原則的泥坑。

我深信，滾到护国主义立場上去的人（像沃洛达尔斯基）或墮落到同社会革命党人联盟、支持临时政府的人（像另外几个布尔什維克），都陷入了無原則的泥坑。这是非常錯誤的，这是毫無原則的。只有政权轉归無产階級掌握以后，只有和平建議提出以后，只有撕毀秘密条約和割断同銀行的联系以后，——只有这样以后，我們才能成为护国派。無論是占領里加，或是占領彼得堡，都不能使我們成为护国派。（極盼将这封信交沃洛达尔斯基一閱。）到現在为止，我們仍然主张無产階級革命，我們反对战争，我們并不是护国派。

就是現在我們也不應該支持克倫斯基政府。支持这个政府是無原則的。有人問：难道不打科尔尼洛夫了嗎？当然要打！但这并不是一回事；这里有一个界限；有些布尔什維克越出了这个界

限，因而陷入了“妥協主义”的泥坑，被事变的急流冲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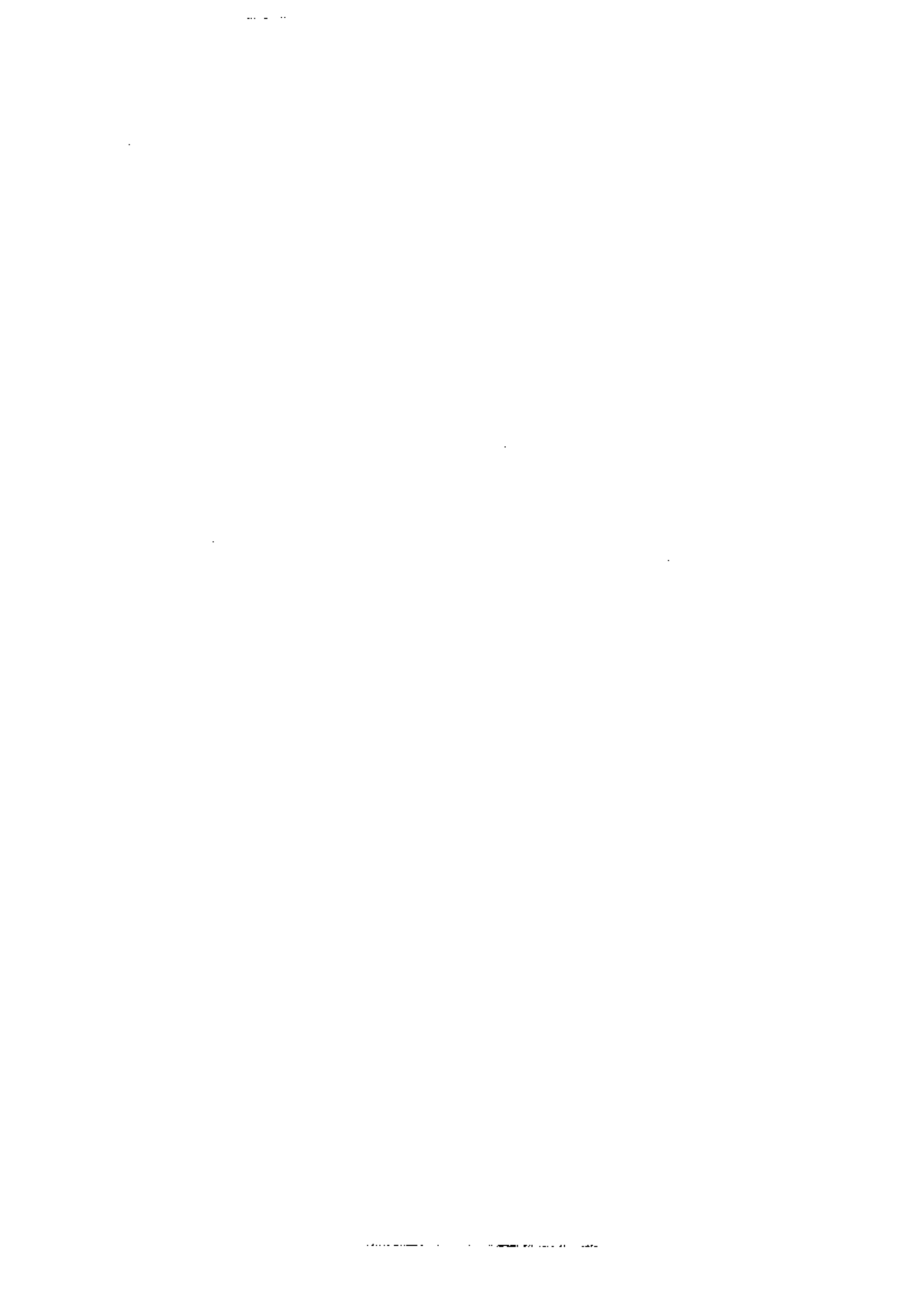
我們跟克倫斯基的軍隊一样，要同而且正在同科尔尼洛夫作战，但是我們不支持克倫斯基，而要揭露他的弱点。这是差別。这个差別虽然很小，但是非常重要，因而决不能把它忘記。

科尔尼洛夫暴动以后我們策略上的改变究竟表現在哪里呢？

表現在我們改变了同克倫斯基斗争的方式。我們絲毫沒有改变对克倫斯基的敌視，我們决不收回我們說过的任何一句反对他的話，我們决不放弃推翻克倫斯基的任务，但我們說：應該考虑时机，現在我們不打算推翻克倫斯基，現在要用別的方法来同他斗争，这个方法就是向人民（同科尔尼洛夫斗争的人民）說明克倫斯基的軟弱和动摇。我們过去也是这样做的，不过現在这一点已是主要的了，改变就在这里。

其次，改变还表現在：現在的主要任务是加紧向克倫斯基提出“局部要求”的鼓动，要求逮捕米留可夫，武装彼得堡工人，調喀琅施塔得、維波尔格、赫尔辛福斯等地的軍隊到彼得堡来，解散国家杜馬，逮捕罗将柯，制定地主土地轉交农民的法律，实行工人对粮食和工厂的監督等等。这些要求我們不只是應該向克倫斯基提出，与其說應該向克倫斯基提出，还不如說應該向投入反科尔尼洛夫斗争的工兵农提出来。我們要帶領工兵农向前进，鼓励他們去痛打那些拥护科尔尼洛夫的將軍和軍官，使他們立刻提出土地轉交农民的要求，讓他們感到必須逮捕罗将柯和米留可夫，解散国家杜馬，封閉“言論报”和其他資產階級報紙，并对这些報紙进行审訊。特別應該推动“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向这方面走。

如果認為我們这样就离开無产階級夺取政权的任务更远了，那是不对的。不，我們是大大接近这个任务了，不过不是正面接近，



而是側面接近。此刻与其說應該直接鼓动反对克倫斯基，不如說應該間接鼓动反对他，所謂間接就是要求積極而又積極地、真正革命地同科尔尼洛夫作战。只有这个战争的發展能使我們掌握政权，但鼓动时應該少說这些話(牢牢記住，明天的事变能使我們掌握政权，到那时候我們就决不放手了)。我認為應該在給鼓动員的信中(不是在报刊上)向全体鼓动員、宣传員以及一般黨員說明这一点。應該無情地反对所謂保衛国家、組成革命民主派的統一战綫、支持临时政府等等空話。現在是干的时候了，——这种話早就被你們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維克先生們說烂了。現在正是干的时候了，應該用革命的方法进行反科尔尼洛夫的战争，應該帶領群众，推动群众，激發群众(克倫斯基却害怕群众，害怕人民)。在对德国人的战争中現在所需要的正是行动：立刻無条件地建議在一定的条件下停火。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就可以迅速地获得和平，或把战争变为革命战争，不然，所有的孟什維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仍将是帝国主义的奴僕。

附言：写完这封信之后，看了六号“工人日报”，我必須說我們的意見完全是不謀而合。我以最大的誠意欢迎出色的社論⁷⁷、报刊評論以及弗·米柳亭和沃洛达尔斯基的文章。关于沃洛达尔斯基的演說我已看到他給編輯部的信，这封信也“消除了”我对他的責难。再一次衷心地致敬和問好！

列 宁

写于1917年8月30日(9月12日)

第一次載于1920年11月7日

“真理报”第250号

按手稿刊印

政論家札記

1. 禍 根

提起“新生活報”的作家尼·蘇漢諾夫，可能大家都会同意說，他不是是一个很坏的而是一个很优秀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的代表人物。他真誠地傾心于国际主义，这在最艰苦的时刻，在沙皇反动势力和沙文主义猖狂的年代已得到过証实。他很有學問，很想独立地研究一些重大的問題，他从社会革命党的思想轉向革命的馬克思主义的长期过程，就証明了这一点。

但是更值得注意的是，在革命最紧要的关头，在一些根本的革命問題上，甚至这样的人也会用下面这种十分膚淺的見解来款待讀者：

……“不管最近几个星期我們失掉了多少革命成果，但有一个成果，也許是最重要的成果，却保留下来了，那就是政府及其政策只有靠苏維埃大多数的意志才能支持下去。革命民主派的一切权力是自願讓出去的；民主机关要收回它的一切权力还是十分容易的；只要对当前形势的要求有应有的了解，就不难使临时政府的政策納入正軌。”（8月20日“新生活報”第106号）

这些話里包藏着一个对最重要的革命問題的弥天大謊，正是这种謊言在各国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当中最流行，对革命也最有害。

如果你思索一下上面那段話里的那一套小資產階級的幻想，那就一定會想到：“新生活報”的先生們同部長們，同內閣派的社会主義者，同策烈鐵里、斯柯別列夫之流，同政府委員克倫斯基、科尔尼洛夫之流坐在一起開“統一”代表大會⁷⁸，這決不是偶然的。他們的确有一個共同的思想基礎，那就是不加批判地從庸人那里學來的對善良願望採取無聊的小市民式的輕信態度。原來蘇漢諾夫的一切議論和那些憑良心辦事的孟什維克護國派的全部活動，都充滿了這種輕信。而這種小資產階級的輕信正是我國革命的禍根。

馬克思主義要求我們在確定任何重大政策的時候，必須以經得起精確的客觀檢驗的 事實 作為政策的基礎和依據。看來，蘇漢諾夫一定會舉起雙手來贊成這個要求。現在我們就根據這個要求來談談蘇漢諾夫上面的那個論斷。

這個論斷是以什麼事實作基礎的呢？蘇漢諾夫憑什麼說政府“只有靠”蘇維埃的“意志才能支持下去”，蘇維埃“十分容易地”“收回它的一切權力”，不“難”改變臨時政府的政策呢？

第一、蘇漢諾夫所根據的可能是自己的總的印象，是蘇維埃的“十分明顯”的力量，克倫斯基的出席蘇維埃，這個或那個部長的親切發言等等。這當然是不足為憑的，更正確些說，就是完全沒有憑據，完全缺乏客觀事實。

第二、蘇漢諾夫所根據的可能是工人、士兵和農民的絕大多數決議都堅決擁護和支持蘇維埃這樣一個客觀事實。他說，這些決議表明了大多數人民的意志。

這種論調也像前一種一樣，在庸人當中常常可以聽到，但是毫無根據。

在過去的一切革命當中，大多數工人和農民的意志，無疑也就

是大多数人民的意志，是拥护民主的。但是絕大多数的革命都是以民主的失敗告終的。

馬克思估計到了大多数革命特別是 1848 年革命(同我国現在的革命最相似)的这个經驗，他無情地嘲笑了那些想用決議、想靠大多数人民的意志來取得勝利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

我們的亲身經驗更加清楚地証實了這一點。無疑地，1906 年春天工人和農民的大多数決議都是拥护第一屆杜馬的。無疑地，大多数人民是拥护它的，但是，沙皇把它解散了，因為革命階級的热情(1906 年春天工人的罷工和農民的騷動)對於掀起一次新的革命來說还是很不够的。

好好考慮一下當前革命的經驗吧！1917 年 3、4 月間和 7、8 月間，大多数決議都是拥护蘇維埃的，大多数人民都是拥护蘇維埃的。但是，大家都看到、知道並且感覺到，革命在 3、4 月間前進了，而在 7、8 月間却后退了。這就是說，靠大多数人民的意志是解決不了任何具體的革命問題的。

光拿這一點來做證明，正是小資產階級幻想的典型，正是不願意承認在革命中應該戰勝敵對階級，應該推翻維護它們的國家政權，要做到這一點，光靠“大多数人民的意志”是不够的，還必須使願意戰鬥並能夠戰鬥的革命階級具有力量，而且這種力量能夠在決定性的關頭和決定性的地方摧毀敵人的力量。

居于統治地位的地主階級和資產階級人數雖少，但是組織和裝備都很好，而且很集中，他們能夠把組織和裝備都很差而且很分散的“大多数人民”的力量一一擊破，這種事情在革命中真不知有過多少次！

當革命使階級鬥爭變得特別尖銳的時候，不研究階級鬥爭的

具体問題，只“泛泛的”談論“人民的意志”，這只有最愚蠢的小資產者才做得出來。

第三、蘇漢諾夫在上面那段話里還提出了一個“論據”，這個論據在庸人當中也是常常可以聽到的。他說，“革命民主派的一切權力是自願讓出去的”。似乎由此可以做出結論說，“自願”讓出的東西就容易收回來……

這種論調一文不值。首先，收回自願讓出去的東西的前提是接受讓步的人“自願同意”。因此要有人自願同意才行。可是誰接受了“讓步”呢？誰得到了“革命民主派”讓出的“權力”呢？

最值得注意的，是這個對於任何一個還有頭腦的政治家說來都是基本的問題，却被蘇漢諾夫完全撇開了……“革命的”（請原諒我這樣講）“民主派”“自願讓出去”的東西實際上落到了誰的手里呢？這才是關鍵的所在，這才是問題的實質。

蘇漢諾夫和所有的孟什維克、社會革命黨人以及所有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撇開的正是問題的這個實質。

其次，在兒童室裏，“自願讓出去的東西”也許很容易收回。例如，卡嘉自願地把小皮球讓給了瑪莎，瑪莎“十分容易地”就會把皮球“還給”卡嘉。但是把這些概念搬到政治和階級鬥爭上來，除了俄國的知識分子外，沒有幾個人敢於這樣做。

在政治上，自願讓出“權力”，這說明讓出者非常軟弱無力，非常沒有氣節，非常無能。因此，一般說來，只能“得出”一個結論：誰自願讓出權力，誰就不僅“應該”失去權力，而且“應該”失去生存的權利。換句話說，自願讓出權力這件事本身就只能“證明”，接受這種自願讓出的權力的人甚至必然會奪走讓出者的權利。

如果“革命民主派”自願把權力讓出去，那它就不是革命的民

主派，而是庸俗的、卑鄙的、胆怯的、沒有摆脱奴才气的民主派；正是在做了这种讓步之后，敌人就会把它赶跑，或者使它不起作用，叫它“自願”死亡，就像它“自願”讓出权力一样。

把政党的活动看成一时的冲动，就是根本拒絕研究政治。根据选举的各种消息、报道和客观材料，这两大政党得到大多数人民的拥护，它們会“自願地讓出权力”一定是有原因的。这样的事情不可能是偶然的，不能不同人民中某个大阶级的一定的經濟地位有关。这样的事情不能不同这些政党的發展历史有关。

在成千上万种类似的庸俗論調中，苏汉諾夫的論調之所以是十分典型的，就是因为他的論調实际上是以善良意志（“自願”）的概念为根据，而忽略了我們所提到的政党的历史。苏汉諾夫完全忽視了政党的历史，忘記了自願讓出权力本来是从2月28日开始的，当时苏維埃表示信任克倫斯基，同意同临时政府成立“协定”。而5月6日的事件簡直是大規模地讓出权力了。总起来看，我們面前出現了一幅十分清楚的圖画：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維克党一下子就走到了斜坡上，愈来愈快地滾下去了。7月3—5日以后，他們完全滾到坑里去了。

現在說什么讓步是自願的，“十分容易地”使大的政党来一个180度的大轉变，“不难”促使它們采取同他們多年以来（革命多月以来）的方向相反的方向，“十分容易地”从坑里爬出来，沿着斜坡爬上去，——这些說法难道不是膚淺到了極点嗎？

最后，第四、苏汉諾夫为了替自己的意見辯护，可能会說，对苏維埃表示信任的工人和士兵有武装，所以“十分容易”收回自己的一切权力。但是正是由于这个几乎是最重要的一点，“新生活报”作者的庸俗論調才显得特別糟糕。

为了尽可能使問題具体化，現在把4月20—21日的事件同7月3—5日的事件比較一下。

4月20日，政府激起了群众的憤怒。武装部队出动到彼得格勒街上去，要逮捕临时政府人員。逮捕虽然沒有进行，但政府清楚地看到它已經沒有人可以依靠了。沒有军队拥护它了。推翻这样的政府的确是“十分容易”的，因此政府向苏維埃提出最后通牒：或者是我走，或者是你們支持我。

所有的政党都想抑制住7月4日群众的憤怒，但是这种憤怒仍然冲破了种种抑制爆發出来。同样是一次反政府的武装示威，但是有很大的差別：头脑混乱的、脱离人民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維克的首領們在7月3日就已經同意資產階級調卡列金的军队到彼得堡来。这就是关键！

卡列金在莫斯科會議上以軍人的坦率直言不諱地說：不是你們这些社会主义者部长自己叫“我們”在7月3日来援助的嗎！……沒有一个人敢在莫斯科會議上反駁卡列金，因为他說的是实話。卡列金奚落了孟什維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他們只好默不作声。哥薩克將軍吐了他們一脸的口水，他們擦了擦說：“这是聖水！”

資產階級的報紙都登出了卡列金的這些話，然而孟什維克的“工人报”和社会革命党的“人民事業报”却把莫斯科會議上的这个最重要的政治声明隱瞞起来，不讓讀者知道。

事情就是如此：政府第一次專門拥有了卡列金的军队，而坚决的真正革命的军队和工人却被解除了武装。这个根本的事实虽然被苏汉諾夫“十分容易地”迴避和忘却了，但事实終归是事实。对于現阶段革命，对于第一次革命來說，这是一件有决定意义的事实。

在前綫有決定意义的地方和軍隊里，权力先后落到了卡列金分子的手里。这是事实。在同他們敌对的軍隊中，最積極的人被解除了武装。卡列金分子虽然沒有馬上利用大权来建立完全的专政，但这决不能駁倒大权操在他們手里这件事实。难道 1905 年 12 月以后沙皇沒有操縱大权嗎？难道当时的情况不是迫使他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利用这个权力，在沒有攫取全部大权即沒有实行政变⁷⁹以前召开了两届杜馬嗎？

判定权力屬於誰，要根据事实，而不能根据空話。政府 7 月 5 日的行动，就証明大权是操在卡列金分子手里的，他們慢慢地然而不停地向前推进，每天都接受“大大小小的讓步”：今天讓搗毀“真理报”、杀害真理报社的人員并且任意逮捕人的士官生逍遙法外，明天下令封閉报社，解散會議和代表大会，不加审判就把人驅逐出境，侮辱“亲善使节”的就送进監獄，危害政府的就做苦役，在前綫采用死刑，等等等等。

卡列金分子并不是傻瓜。他們既然每天都能得到一些他們所需要的东西，那又何必一定去硬碰硬闖挺而走險呢？斯柯別列夫和策烈鉄里、切尔諾夫、阿夫克森齐也夫、唐恩和李伯尔之流才是傻瓜，他們每次看到卡列金分子前进一步，就叫喊：“民主的凱旋！胜利！”他們認為，卡列金、科尔尼洛夫和克倫斯基之流沒有馬上吞掉他們，这就是“胜利”！！

祸根就在于，小資產階級群众由于自己的經濟地位而显出一种惊人的輕信和無知，他們还在半睡半醒中發着梦囈：收回自願讓出的东西是“十分容易的”！那末就請去試一試吧，要卡列金和科尔尼洛夫自願地把他們得到的东西拿回来吧！

祸根就在于“民主的”政論界支持这种庸俗的、愚蠢的、卑鄙的

梦想，而不去同它作斗争。

如果我们用一般政治历史家特别是马克思主义者应有的观点来看问题，即联系地考察事件，那就会非常清楚地了解，决定性的转变现在不仅不是“容易的”，而且没有新的革命是绝对不可能的。

我在这里所谈的问题决不是这样的革命需要不需要，我所分析的也决不是这样的革命能不能和平地合法地进行（一般地讲，历史上有过和平地和合法地进行的革命）。我仅仅是想说，没有新的革命，决定性的转变从历史上来看是不可能的，因为政权已经落到别人手里了，已经不在“革命民主派”手里了，政权已经被夺走了，已经巩固了。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党的所作所为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小资产阶级经济地位的产物，是2月28日到5月6日、5月6日到6月9日、6月9日到6月18日和19日（进攻）等等发生的一连串政治事件的结果。在这里，政权的整个情况、政权的整个成分、大党的活动条件以及扶植这些大党的阶级的“意图”，都需要有一个转变。从历史上来看，这些转变没有新的革命是不可思议的。

苏汉诺夫和许多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不是向人民解释新的革命的一切主要历史条件，它的经济政治前提，它的政治任务，以及有关阶级的对比关系等等，而是搞些“无聊的玩意儿”，说一些自我安慰的话，什么我们“可以毫无困难地收回一切”，“十分容易地”收回一切，什么“最重要的”革命成果“仍然保留”在我们这里，以及诸如此类轻率的、无知的、简直等于犯罪的胡说，用这些来麻痹人民。

现在，深刻的社会变革的征兆已经出现。这些征兆清楚地指出了工作的方向。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在无产阶级中的威信

已經顯著地降低，而布尔什維克的威信已經顯著地提高。尽管“卡列金的軍隊調到彼得堡”來了，可是就在彼得堡，8月20日的選舉同6月的區杜馬選舉相比，布尔什維克的票數仍然增加了80。

在不能不動搖于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中間，革命的国际主義派——馬爾托夫和其他一些孟什維克、斯皮里多諾娃、卡姆柯夫和其他一些社會革命黨人的加強、壯大和發展，是轉變的客觀標志。不用說，日益逼近的飢荒、經濟破壞、軍事失敗，一定能大大加速這個轉變的到來，使政權轉到最貧苦的農民所支持的無產階級手里來。

2. 徭役制和社會主義

社會主義的特別凶惡的敵人所以表現的那種愚蠢的“揭露”狂，有時候却幫了社會主義的忙。他們所攻擊的正是值得大家同情和仿效的東西。他們攻擊的性質本身就使人民睜開了眼睛，認清了資產階級的卑鄙無恥。

在一家最下流的資產階級報紙“俄羅斯意志報”上就發生了這種事情，它在8月20日登載了一篇標題為“徭役制”的叶加特林堡通訊。下面就是這篇通訊所報道的：

……“工兵代表蘇維埃在我市實行一種勞役制，規定凡有馬匹的公民每天必須輪流把馬帶來供蘇維埃委員們使用。

同時還制定了專門的值班表；每個‘有馬的公民’應該在什麼時候、在幾點鐘以前把馬帶到什麼地方來值班，都有明確的書面通知。

為了更加明白起見，在‘命令’里還加了一句：‘如果不執行這個要求，蘇維埃雇用馬車的費用（不超過25個盧布）要由您負擔’……

資本家的辯護人当然要生气了。廣大人民終生受苦受難，不僅要服“徭役”，而且還要被雇到工廠、礦山或其他地方去做苦工，經常失業挨餓，資本家對於這些却安之若素。

但是，當工人和士兵要資本家哪怕是盡一点点社會義務時，這些剝削者先生便大叫其“徭役制”了！！

請問一問任何一個工人和農民，如果工兵代表蘇維埃成了唯一的國家政權機關，在各地規定富人必須盡社會義務，例如必須帶着馬、汽車、自行車來值班，必須每天做點書寫工作，來統計產品數量和需要的人數，等等等等，這有什麼不好呢？

大概除了富農之外，任何一個工人和農民都會說這太好了。

這也是正確的。這還不是社會主義，只是走向社會主義的第一步，但這正是貧苦人民迫切需要的。沒有這樣的措施，就不能使人民免于飢餓和死亡。

為什麼像葉加特林堡蘇維埃這樣的做法是十分少見的呢？為什麼這類措施沒有早些在全國實行，沒有形成一套完整的制度呢？

在實行了富人帶馬匹來盡社會義務的制度之後，為什麼沒有規定要他們把收支總賬、特別是國家訂貨總賬交出來，受蘇維埃的監督呢？為什麼也沒有規定在什麼時候到什麼地點交出來，在什麼時候到什麼地點納多少稅，並且發出“明確的書面通知”呢？

因為絕大多數的蘇維埃都是由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的首領們領導的，他們實際上跑到資產階級那邊去了，加入了資產階級政府，答應支持它，他們不僅背叛了社會主義，而且背叛了民主。資產階級不僅不許在彼得堡規定富人盡社會義務，而且連一些很小的改革也阻撓了好幾個月，而這些首領還對資產階級“妥協”。

這些首領說“俄國實行社會主義還沒有成熟”，以此來欺騙自

己的良心，欺騙人民。

為什麼說這是欺騙呢？

因為這樣一來就把事情捏造成這個樣子，似乎打破千百万人民的習慣的改革是空前複雜和困難的。事情被捏造成這個樣子，似乎有人想用一紙命令在俄國“實行”社會主義，既不管技術水平怎樣，也不管有沒有大量的小企業，更不管大多數居民的習慣和意志如何。

這完全是謊話。誰也沒有這樣想過。任何一個黨、任何一個人都沒有打算用命令來“實行社會主義”。這裡所談的只不過是在叶加特林堡實行富人要盡社會義務這樣一些十分受貧苦大眾即人民的大多數歡迎的措施。從技術方面和文化方面來看，現在已經完全可以採取這些措施，這樣就能立刻減輕貧苦人民的生活負擔，減輕戰爭的重担，使大家比較平均地來分擔這個重負。

革命以來，差不多有半年之久了，而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的首領們仍在阻撓所有這些措施的實現，出賣人民的利益，以達到同資產階級“妥協”的目的。

如果工人和農民還不懂得這些首領是叛徒，應該把他們趕走，撤銷他們的一切職務，那末勞動者必然會繼續受資產階級的奴役。

載于1917年9月14日(1日)

“工人報”第10號

署名：尼·列寧

按“工人報”原文刊印

党綱問題

布哈林同志在“斯巴达克”⁸¹上發表的关于召开“小型”代表大会来通过党綱的消息，表明这个問題已經成熟。

問題确实是刻不容緩的。

我們党走在其他国际主义的政党的前面，这是当前的事实。

因此，我們应当首先行动起来，应当提出能够回答帝国主义时代各种問題的綱領。

如果我們做不到这一点，那就是耻辱。

建議中央委员会决定：

每个党組織立即成立一个或几个綱領起草委员会，責成它們以及一切理論家、著作家等等摆脱一切来着手进行这项工作，在三天到七天之內提出自己的草案，或者对別人的草案提出修改的意見。

只要坚持不懈地努力，这项工作是完全可以做好的。

要在两星期之內把这些草案加以綜合并刊印出来，或打字后分送各主要組織。

然后，馬上宣布在一个月以后召开小型代表大会（每4 000个或5 000个党员中产生1个代表）来通过綱領。

我們党应当提出綱領，只有这样，才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上推动第三国际前进。

其他的都是空話、約許、無限期的拖延。我們首先行动起来，就能从各方面加快工作的进行，也只有这样才能草拟出第三国际的綱領。

写于1917年9月上半月

1928年第一次載于

“列寧文集”第7卷

按手稿刊印

齐美尔瓦尔得問題

現在看来十分清楚，我們沒有退出齐美尔瓦尔得国际是錯誤的。

大家都受了騙，对斯德哥尔摩代表會議抱有希望。可是斯德哥尔摩代表會議在一月一月地“延期”。

齐美尔瓦尔得却在“等待”斯德哥尔摩代表會議！考茨基分子加上意大利人，即齐美尔瓦尔得的多数派在“等待”斯德哥尔摩代表會議。

我們也参加了这幕滑稽剧，在工人面前要对这幕滑稽剧負責。这是耻辱。

應該立即退出齐美尔瓦尔得。

要是我們留在那里只是为了了解情况，我們就不会失掉什么，而且可以不对这幕“等待”斯德哥尔摩代表會議的滑稽剧負責。

我們退出腐朽的齐美尔瓦尔得以后，應該馬上在1917年9月3日的全会上决定：召开左派代表會議，把这项工作委托給参加斯德哥尔摩代表會議的代表去做。

我們党沒有退出齐美尔瓦尔得已經是做了蠢事，如果再不退出，那我們这样一个拥有17种报纸等等的世界上唯一的国际主义者政党，就会同德国和意大利的馬尔托夫分子和策烈鉄里分子玩弄妥协的把戏，正像馬尔托夫同策烈鉄里、策烈鉄里同社会革命党

人、社会革命党人同资产阶级……实行妥协一样。

而这也算是“拥护”第三国际!!!

写于1917年9月上半月

1928年第一次载于

“列宁文集”第7卷

按手稿刊印

关于在群众组织中 违反民主的现象

应该通过一项决议，谴责士兵代表苏维埃的做法（士兵每500人中产生1个代表，工人每1000人中产生1个代表）⁸²和总工会的做法（小的工会每a个会员产生1个代表，大的工会每a—b个会员产生1个代表）是伪造民主的行为[⊖]，正像尼古拉二世的那种行为一样。

如果我们默默地容忍这种伪造，那末我们还算什么民主主义者呢？

那末，同样不平等地“赋予”农民和地主代表权的尼古拉二世还有什么不好呢？

我们容忍这种事情，就是污辱民主。

应该通过一项决议，要求平等的选举权（在苏维埃里和在工会代表大会上），谴责任何一点违反平等原则的做法都是伪造民主的行为，正像尼古拉二世的做法一样。应该把中央全会的这个决议写得通俗易懂，印在传单上散发给工人群众。

既然称为“民主主义者”，就决不能容忍伪造民主的行为。要

⊖ “任何地方选举的代表，都应当是在同等人数中产生”的。这是最起码的民主，否则就是伪造民主。

是容忍这种事情，我們就不是民主主义者，而是一些沒有原則的人！！

写于 1917 年 9 月上半月

1928 年第一次載于

•列宁文集”第 7 卷

按手稿刊印

論 妥 協

为了同别的政党达成协议而在某些要求上讓步或放弃自己要求的一部分，这在政治上叫做妥协。

庸人对布尔什維克一般有这样的看法（这种看法得到专事誹謗布尔什維克的报刊的支持），認為布尔什維克是任何时候都不願意对任何人作任何妥协的。

这种看法对我们革命無产阶级的政党是一种頌揚，因为它証明，連敌人也不得不承認我們忠于社会主义和革命的根本原則。但实际上應該說，这种看法是不符合真实情况的。恩格斯对布朗基派共产主义者的宣言（1873年）批評得很对，他說他們声明“决不妥协！”是可笑的⁸³。他說这是空話，情况的变化經常不可避免地迫使政党在斗争中采取妥协手段，絕對拒絕“分期收債款”⁸⁴是荒謬的。真正革命的政党的职责不是宣布根本做不到的“絕對不妥协”，而是要通过各种妥协（在它們不可避免的时候）忠于自己的原則、自己的阶级、自己的革命任务，忠于准备革命和教育人民群众走向革命胜利的事業。

举一个例子來說。参加第三届和第四届杜馬是妥协，是暂时放弃革命要求。但这样做完全是迫不得已，因为当时力量的对比决定我們在一定时期內不可能發動群众性的革命斗争；为了作长期准备，还必须善于在这种“畜圈”内部工作。布尔什維克党这样

提問題是完全正确的，这一点已由历史証明了。

現在摆在日程上的不是迫不得已的妥協問題，而是自願的妥協問題。

我們黨和其他任何政黨一樣，力圖為自己爭得政治上的統治。我們的目的是革命無產階級專政。半年的革命非常鮮明地、有力地、動人地証明了，針對當前革命的利益提出這種要求是正确的、必要的，不這樣人民就不能得到民主的和平，就不能把土地轉交農民，就不能得到完全的自由（完全民主的共和國）。我國革命半年來的事變進程，階級間和政黨間的鬥爭，4月20—21日、6月9—10日、6月18—19日、7月3—5日、8月27—31日幾次危機的發展，都表明並且証實了這一點。

現在俄國革命發生了一個十分急劇、十分奇特的轉變，使我們能夠以政黨的資格建議實行自願的妥協，誠然，不是向資產階級，向我們直接的主要的階級敵人建議，而是向我們最接近的政敵，向“居領導地位的”小資產階級民主派政黨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建議。

只是作為一種例外，只是由於情況特殊（顯然，這種情況只能持續極短的時間），我們才能向這些政黨建議妥協，而且我認為這是我們所應該做的。

從我們方面來說，妥協就是回到七月前的要求：全部政權歸蘇維埃，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的政府對蘇維埃負責。

現在，只是在現在，也許總共在幾天或一兩個星期的時間內，這種政府會完全和平地成立並得到鞏固。它會保證（帶有極大的可能性）整個俄國革命和平地向前推進，保證全世界爭取和平和爭取社會主義勝利的運動有最好的機會大踏步前進。

我認为，只是为了革命的这种和平發展(这种可能性在历史上是非常小的，是非常可貴的，簡直是小到了極点的)，只是为了这种可能性，主张世界革命，主张采取革命方法的布尔什維克才可以而且应当謀这种妥协。

布尔什維克可以妥协的就是不要求参加政府(不真正实现無产階級和貧农专政的条件，国际主义者要参加政府是不可能的)，不立刻要求政权轉归無产階級和貧农，不采取革命方法来实现这个要求。条件是不言而喻的，对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維克來說也并不新奇，那就是要有鼓动的完全自由，不再推迟召开立宪會議的日期或在更短的时期內召开會議。

执政的孟什維克和社会革命党集团要同意(假定妥协实现)在地方上的全部政权轉归苏維埃的基础上成立完全对苏維埃負責而且仅仅对苏維埃負責的政府。这是“新的”条件。我想布尔什維克不会再提出其他任何条件，因为他们相信，只要真正有鼓动的完全自由，只要立即以新的民主精神改組苏維埃(改选苏維埃)、行使苏維埃职权，革命自然就会和平地向前推进，苏維埃內部政党間的斗争自然就会和平地消除。

也許这已經不可能实现了吧？也許。但是假如还有百分之一的机会，那还是值得来試一試把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的。

“協議”双方，即布尔什維克同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維克的联盟，从这个“妥协”中能得到什么好处呢？假如双方都得不到什么好处，那就应当承認妥协是不可能的，那也就不必談它了。不管現在(在7、8两月以后；这两个月等于寂靜的“和平”时代的二十年)实行这个妥协怎样困难，但我認为还是有实行的小小机会，因为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維克已决定不同立宪民主党人一起参加政府了。

布尔什維克从这个妥协中会得到的好处，就是他們能够充分自由地宣传自己的見解，能够在真正充分民主的条件下扩大自己在苏維埃中的影响。現在“大家”口头上都承認布尔什維克有这种自由。事实上，在資产階級政府或有資产階級参加的政府的統治下，即在非苏維埃的政府的統治下，这种自由是不可能得到的。在苏維埃政府的統治下，这种自由才有可能得到（不是說絕對有保証，但畢竟有可能）。由于有这种可能，在这样困难的时候就應該同現時苏維埃中的大多数妥协。在真正民主的条件下，我們不怕什么，因为实际生活對我們有利，甚至敌視我們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維克黨內部派別發展的进程，也証实我們是正确的。

孟什維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会得到的好处，就是他們能够依靠絕大多数的人民，能够保証“和平地”利用自己在苏維埃中的大多数，因而立刻有充分的可能来实现他們的联盟的綱領。

这个联盟不是清一色的，一方面正因为它是联盟，另一方面因为小資产階級民主派总是比資产階級或無产階級复杂，很可能从这个联盟中会發出两种声音。

一种声音会說：“我們决不同布尔什維克、同革命的無产階級一起走。革命無产階級总要提出过分的要求，总要誘惑貧农。他們会要求和平，会同盟国决裂。这是不可能的。對我們來說，还是資产階級更可亲近、更可靠，要知道，我們並沒有同資产階級絕交，只是在短时期內仅仅为了科尔尼洛夫事件同他們吵过嘴。吵过嘴还可以言归于好。而且布尔什維克根本没有什么好對我們‘讓步’的，他們搞暴动的做法反正会像 1871 年的巴黎公社一样遭到失敗。”

另外一种声音会說：“引証巴黎公社是非常膚淺的，甚至是愚

蠢的。因为第一、布尔什維克从 1871 年多多少少学到了一些东西，他們一定会把銀行掌握在自己手中，他們一定不会放弃向凡尔賽进攻；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巴黎公社也能够取得胜利。此外，布尔什維克一旦掌握政权，立刻就会提出巴黎公社所沒有提出的要求：把土地轉交农民，立刻建議停火，真正監督生产，同乌克兰人和芬兰人建立真挚的和平关系等等。用俗話說，就是布尔什維克手中的‘王牌’要比巴黎公社多十倍。第二、不管怎样，公社意味着苦难的内战，意味着战后文化和平發展的长期停滞，意味着給一切麦克馬洪分子和科尔尼洛夫分子采取軍事行动和进行各种勾当打开方便之門，而这种行动是威胁我們整个資产階級社会的。因此，讓公社建立起来是否明智呢？

如果我們不夺取政权，如果情况还像 5 月 6 日—8 月 31 日这段时期那样严重，那末公社在俄国是不可避免的。每一个革命的工人和士兵都必然会思念公社，信仰公社，企圖建立公社。他們这样議論：人民在死亡，战争、飢荒和經濟破坏愈来愈严重，只有公社能够挽救我們。虽然我們大家会毀灭、死亡，但是，我們还是要建立公社。工人必然会有这样的思想，而且現在要战胜公社已不像在 1871 年那么容易了。現在俄国公社在全世界的同盟者要比 1871 年强大百倍…… 我們讓公社建立起来是否明智呢？我也不能同意这种說法，認為布尔什維克的妥协實質上並沒有給我們什么东西。一切文明国家的文明部长們在战争期間就非常重視同無产階級达成任何協議，即使是小小的協議。他們是非常非常重視的。要知道，他們是很实际的人，是真正的部长。不管怎样鎮压，不管布尔什維克的报刊怎样軟弱，布尔什維克还是很快地强大起来了…… 我們讓公社建立起来是否明智呢？

我們擁有有保證的大多數，窮農覺醒的時期還相當遠，足夠我們過一輩子。我不相信在農民的国家里大多數會跟極端派走。在真正民主的共和国里，反對絕大多數而實行暴動是不可能的。”第二種聲音就是這樣說的。

也許還可以從馬爾托夫、斯皮里多諾娃的某些信徒中間找到第三種聲音，這種聲音說道：“‘同志們’，你們兩個在議論公社及其可能性的時候堅決地站在反對方面，這一點使我很氣憤。你們兩個，一個採取一種形式，另一個採取另一種形式，但都是站在鎮壓公社的一方面。我不想為公社鼓動，我不能像所有布爾什維克那樣預先答應參加公社的隊伍作戰，但我還是應當說：如果不管我怎樣努力，公社暴動還是爆發的話，那我寧願幫助公社的擁護者，而不願幫助公社的反對者……”

“聯盟”內部的意見分歧是很大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因為在小資產階級民主派中有許多流派，從十足內閣派的十足資產者起，到還沒有完全轉到無產者立場上來的半窮人止。誰也不知道這種意見分歧在當前每一時刻中會產生什麼樣的結果。

* *
* *

本文是在星期五（9月1日）寫的。由於偶然的原因（歷史說明，在克倫斯基執政時不是所有布爾什維克都能享受遷徙自由的），本文沒有在當天送到編輯部去。看了星期六和今天星期日的報紙以後，我對自己說：也許建議妥協已經晚了。也許革命還有和平發展的可能的幾天也已經過去了。真的，據各方面看來，那種日子已經過去了⁸⁵。不管怎樣，克倫斯基一定會脫離社會革命黨，一定會因社會革命黨人毫無作為而離開他們，拋棄他們，去投

靠資產者而巩固起来…… 真的,据各方面看来,和平發展的道路偶然成为可能的那几天已經过去了。只好把这篇短文加上“过时的思想”的标题送到編輯部去……有时候知道知道过时的思想也許不是沒有意思的吧。

写于1917年9月1—3日
(14—16日)

載于1917年9月19日(6日)
“工人之路报”第3号

署名:尼·列宁

按报纸原文刊印

关于目前政治形势的決議草案⁸⁶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維克）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政治形势的決議，結合目前形势，特在中央全会上作出如下决定：

1. 由于革命的空前迅速的發展，在7月3日到9月3日两个月內，階級斗争的进程和政治事件的發展把全国大大地向前推进了，这是在沒有革命和沒有战争的和平时期几年內也做不到的。

2. 7月3—5日的事件是整个革命的轉折点，这一点愈来愈明显了。不正确地估計这些事件，就不可能正确地估計無产阶级的任务，也不可能正确地估計不以我們意志为轉移的革命事件發展的速度。

3. 资产阶级在资本主义报纸和出版業中大量投資，狂热地对布尔什維克进行誹謗，在人民群众中極其广泛地散布这些誹謗，現在，这些誹謗已日益迅速、日益广泛地被揭穿了。首先是首都和大城市的工人群众，其次是农民，愈来愈清楚地看到，地主和资本家对布尔什維克的誹謗，是他們同捍衛工人和貧苦农民利益的布尔什維克斗争的主要武器之一。

4. 资产阶级企圖用誹謗布尔什維克的老办法来公然掩飾科尔尼洛夫的暴动，即掩飾以立宪民主党（“人民自由”党）为首的地主资本家所支持的將軍和軍官的暴动，而这个暴动却使極其广大的人民群众看透了资产阶级誹謗布尔什維克工党这个真正保护穷人

的党的真正用意。

5. 如果我们党不支持7月3—4日这次不顾我们的阻止而自发地掀起来的群众运动，那就是直接地完全地背叛无产阶级，因为群众已经行动起来，他们反对为了资本家的利益而拖延帝国主义掠夺战争，不满意政府和苏维埃对加剧经济破坏和饥饿的资产阶级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他们的愤慨是合理的，是正当的。

6. 尽管资产阶级和政府用尽一切办法，逮捕几百个布尔什维克，没收他们的各种文件，搜查编辑部等等，他们还是没有证明而且永远也不能证明这样的诽谤，即我们党除了举行“和平的有组织的”示威游行并提出全部国家政权归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的口号以外，对7月3—4日的运动还抱有其他的目的。

7. 如果布尔什维克在7月3—4日把夺取政权作为自己的任务，那就错了，因为不仅大多数人民，而且大多数工人当时还没有真正体会到军队里的将军、农村里的地主和城市里的资本家所实行的反革命政策，这种政策是由于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同资产阶级妥协而产生的，7月5日以后群众才把它认清了。无论我们党的中央机关或地方机关都不仅没有用书面或口头提出过在7月3—4日夺取政权的口号，而且也没有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讨论过。

8. 现在的事件表明，我们党在7月3—4日这两天所犯的真正错误，就在于党对全体人民的革命情绪估计不足，党认为政治改革还可以通过改变苏维埃的政策而和平发展，但事实上，当时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已经吓昏了，已经向资产阶级妥协了，而资产阶级已经是反革命了，根本就谈不上什么和平发展。这种错误观点的产生是由于希望事件不要发展得太快，党只有参加7月3—4日的人民运动，提出“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提出使运

动具有和平的和有組織的性質的任务，才能消除这种錯誤观点。

9. 科尔尼洛夫暴动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异常有力地使人民群众看清楚了过去和現在一直被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維克用妥協詞句掩盖起来的真相：以立宪民主党为首的地主資本家以及同他們站在一起的將軍和軍官已經組織起来了，他們准备进行并且已經在进行罪惡滔天的活动，把里加（然后把彼得格勒）出賣給德国人，給他們开放战綫，讓布尔什維克軍隊遭到杀伤，掀起騷乱，把以“野蛮师”为首的軍隊調到首都等等。这一切都是为了讓資產階級掌握全部政权，为了使地主在农村的統治得到巩固，为了讓工农的鮮血洒遍全国。

科尔尼洛夫的暴动向俄国証明了整个历史向全世界証明了的事实：資產階級为了維護自己对人民的統治和自己的利益，不惜出賣祖国和干出一切罪惡的勾当。

10. 俄国的工人和农民只有进行最坚决的斗争，战胜地主和資產階級，战胜立宪民主党，战胜同情立宪民主党的將軍和軍官，此外絕對沒有别的出路。城市工人階級只要掌握了全部国家政权并得到貧苦农民的支持，就能够領導人民即全体劳动者进行这一斗争，并且取得胜利。

11. 特別是在5月6日以后，俄国革命事件以暴風驟雨之势非常迅速地發展起来了，在7月3日以后，發展得更迅速，因此，党的任务决不是加速事件的發展，相反地，應該尽一切努力赶上事件的發展，尽可能地向工人和劳动者說明形勢的变化和階級斗争进程的变化。目前党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向群众說明：形勢非常危急，任何發動都可能变成武装冲突，因此，过早的起义会带来極大的損失。然而事件的轉变是不以工人階級的意志为轉移的，这种危急

的形势不可避免地(可能是極其迅速地)会迫使工人階級不得不同反革命資產階級作坚决的斗争并且夺取政权。

12. 科尔尼洛夫的暴动完全暴露了軍隊都很憎恨总司令部这个事实。甚至連几个月来竭力証明自己憎恨布尔什維克、拥护工农同地主和資產階級妥协的政策^的孟什維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也必須承認这一点。軍隊对总司令部的憎恨有增無減, 因为克倫斯基政府只是用阿列克謝也夫代替了科尔尼洛夫, 而把克列姆博夫斯基和其余的科尔尼洛夫將軍們仍旧留下来, 对于軍隊的民主化, 对于革除反革命首要分子的职务, 根本沒有采取任何有效的措施。苏維埃容忍和支持克倫斯基的这种軟弱無力、动搖不定、毫無原則的政策, 在消灭科尔尼洛夫的暴动时, 又放过了一次和平地夺取全部政权的时机, 苏維埃的錯誤不仅在于它們妥协, 而且在于它們的妥协是一种罪行。

軍隊憎恨总司令部, 他們看到了战争的侵略性而不願意进行战争, 这样的軍隊注定是会遭到新的失败的。

13. 只有工人階級才能在夺取政权以后, 在实际上而不是口头上执行和平政策; 它决不会像孟什維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那样, 口头上执行和平政策而实际上支持資產階級及其所締結的秘密条約。無論在任何軍事情况下, 甚至在科尔尼洛夫將軍們出卖了里加然后又要出卖彼得格勒的情况下, 工人階級还是要毫不迟疑地向各·国·人·民提出公开的、明确的、公·正·的和平条件。工人階級能够代表全体人民做到这一点, 因为俄国絕大多数工人和农民反对目前的侵略战争, 主张在不割地(不侵占)不賠款的公平合理的条件下实现和平。

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維克几个月以来也在談論这种和平, 事

實上，他們是在欺騙自己，欺騙人民。工人階級一旦奪取了政權，就會立即向各國人民提出這種和平。

各國資本家在竭力制止到處高漲的反對戰爭的工人革命。如果俄國革命從無力地可憐地乞求和平轉到直接提出和平，公布并撕毀秘密條約等等，和平就會很快地到來，有百分之九十九的把握，資本家也再不能阻撓和平了。

如果發生一種很少有可能發生的情況：資本家違背本國人民的意志，拒絕俄國工人政府提出的和平條件，那末歐洲的革命就會以百倍的速度迫近，我們的工农軍隊就會選擇他們所尊敬的而不是他們所憎恨的長官和司令官，就會相信，只有在和平已經提出，秘密條約已經撕毀，地主和資產階級的同盟已經中止，全部土地已經轉交農民以後，戰爭才是正義的。只有到了那個時候，從俄國方面來講，戰爭才是正義的戰爭，工人和農民才不是在棍棒的逼迫下作戰，而是自願地作戰，只有這樣的戰爭才會使先進國家的必然到來的工人革命更加迫近。

14. 只有工人階級才能在奪取政權以後，保證迅速地把地主的全部土地無償地交給農民。這件事是決不能拖延的。立憲會議將把全部土地無償地交給農民這件事法定下來，但是，農民對於拖延立憲會議是沒有責任的。農民日益相信，同地主資本家妥協是不能得到土地的。貧苦農民只有同工人結成真誠無私的兄弟般的聯盟，才能得到土地。

幾個月來，切爾諾夫企圖對地主立憲民主黨人實行大大小小的讓步來捍衛農民的利益，但是都遭到了破產，於是切爾諾夫退出了政府，這就特別明顯地暴露了妥協政策是靠不住的。各地農民都已經看到、知道、理會到和覺察到，7月5日以後，地主在农村中更加卑鄙無恥了，必須鎮壓他們，不許他們為非作歹。

15. 只有工人階級才能在夺取政权以后，結束經濟破坏現象和消灭日益严重的飢荒。政府从5月6日起就一再答应实行监督，但是它沒有这样做，也不可能这样做，因为資本家和地主破坏了全部工作。失業現象日益严重，飢餓日漸逼近，貨幣不断贬值，彼舍霍諾夫在固定价格增加了一倍之后退出政府，这就进一步加深了危机，并且再一次証明了政府的軟弱無力。只有工人对生产和分配实行监督，才能摆脱这种状况。只有工人政府才能鎮压資本家，才能得到全体劳动者对政权的大力支持，才能建立秩序，才能規定粮食和产品的正确交換。

16. 由于資產階級的誹謗，由于对妥协政策抱着幻想，貧苦农民对工人階級的信任曾一度受到影响，但是后来，特别是在7月5日以后，在农村中捕人，对劳动者进行种种迫害，再加上科尔尼洛夫的暴动，人民的眼睛擦亮了，这种信任又重新恢复了。在实行并貫徹这种妥协政策的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維克这两个主要的政党内，特别是在7月5日以后，对这种政策表示不滿和反对的人愈来愈多了，在社会革命党最近一次“总委员会”會議和孟什維克党代表大会上，反对妥协政策的人几乎占了五分之二(40%)，这是人民不再相信同資本家妥协的政策标志之一。

17. 事变的整个进程、一切經濟政治条件和軍队里的一切事件，都愈来愈快地使工人階級接近于胜利地夺取政权，那时，工人階級就会贏得和平、面包和自由，就会加速其他各国無产階級革命的胜利。

写于1917年9月3日(16日)以前

1925年第一次載于“列寧文集”第4卷

接手稿刊印

大难临头，出路何在？

飢荒逼近

不可避免的灾难威胁着俄国。铁路运输已经混乱不堪，正在日益解体，不久就会全部停顿。工厂需要的原料和煤的供应将要停止。粮食的运送也要中断。资本家故意不断地对生产怠工（损坏东西、停闭、破坏和阻挠），指望空前的灾难会使共和政体和民主制度破产，使苏维埃和一般工农团体瓦解，这样就便于恢复帝制和恢复资产阶级地主的专政。

规模空前的灾难和飢荒是不可避免的。所有的报纸都无数次地谈到这一点。各政党、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通过的无数决议也都承认灾难必将到来，都说灾难已经迫在眉睫，必须同它作殊死的斗争，为了防止毁灭，人民必须“英勇努力”等等。

大家都在谈论这一点，都承认这是事实，都决定这样去做。

可是什么事也没有做。

革命已经半年了，灾难更加逼近，大批工人失业。只要想一想：国内有足够的粮食和原料，各种货物却都卖空了，国家因产品不足、劳动力缺乏而面临灭亡的深渊，就在这样的国家里，在这样的危急关头，却又有大批工人失业！革命（有人称之为伟大的革命，可是，暂时称为腐朽的革命也许要公正些）半年来，既有民主共和

Вопросы надвигающейся

Вопросы надвигающейся революции. Идея революции...
...идея революции...
...идея революции...

Вопросы надвигающейся революции. Идея революции...
...идея революции...
...идея революции...

Идея революции...
...идея революции...

Вопросы надвигающейся революции. Идея революции...
...идея революции...
...идея революции...

Вопросы надвигающейся революции. Идея революции...
...идея революции...
...идея революции...

Вопросы надвигающейся революции. Идея революции...
...идея революции...
...идея революции...

1917年9月10—14日(23—27日)
列宁的“大难临头,出路何在?”手稿第1页
(按原稿缩小)



政体，又有许许多多傲然自命为“革命民主”的团体、组织和机关，但是实际上根本沒有采取任何重大的措施来消除灾难和战胜飢荒，这难道还需要証明嗎？我們正愈来愈快地接近崩潰，因为战争是無情的，它对人民生活各方面造成的混乱正在不断加剧。

其实，只要稍微注意一下和思索一下，就可以看到，消除灾难和战胜飢荒的办法是有的，并且十分简单明了，完全可以实现，用人民的力量完全能够办到；沒有采取这些办法，只是因为，仅仅是因为，实行这些办法就会触犯一小撮地主、資本家的空前利潤。

的确，可以肯定地说，任何一个演說，任何党派的报纸的任何一篇文章，任何会议或机关的任何一个決議，都十分清楚地肯定地承認了消除灾难和战胜飢荒的基本的主要的办法。这个办法就是由国家实行监督、监察、統計和調节，正确調配生产和分配中的劳动力，爱惜人民的力量，消除人力的任何浪費，节省人力。监督，监察，統計，——这就是消除灾难和战胜飢荒的首要办法。这是無可爭辯的，是大家公認的。然而这也正是人們所不做的，他們唯恐触犯地主和資本家的专政，唯恐触犯地主和資本家抬高物价和供給軍需品（現在几乎所有的人都在直接或間接地为战争“工作”）而得来的空前的惊人的巨額利潤，这种利潤誰都知道，誰都看到，誰都为之惊嘆不已。

可是国家方面絲毫沒有实行稍微認真的监督、統計和监察。

政府不起任何作用

全国各地对国家的任何监督、监察、統計以及实施监督的任何嘗試，都始終是实行怠工的。只有幼稚到了極点的人才不懂得，只

有虛偽透頂的人才假裝不知道：这种怠工是从哪里来的，是用什么手段进行的。这种銀行家和資本家的怠工，这种对任何監督、監察、統計的破坏，都是同民主共和政体相适应的，同“革命民主”机关的存在相适应的。資本家老爷們很好地領会了一个真理，这个真理本来是一切贊成科学社会主义的人都在口头上承認的，但是孟什維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他們的朋友一攀上部长、次长等等高位之后，就立刻把它忘掉了。这个真理就是：用民主共和政体代替君主政体，絲毫也不会触犯資本主义剝削制度的經濟本質，相反地，只要把保护神聖不可侵犯的資本主义利潤的斗争方式加以改变，就可以同样順利地在民主共和政体下保持这种利潤，正如在君主专制政体下一样。

在民主共和政体下对任何監督、統計、監察实行的現代最新式的怠工手段，就是資本家在口头上“热烈”拥护監督“原則”，承認它的必要性（所有孟什維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当然也是一样），不过主张“逐漸地”有計劃地“由国家来安排”这种監督。其实，这种好听的詞句不过是用来掩盖他們对監督的破坏，把監督化为烏有，化为有名無实的東西，以及掩盖他們对監督的玩弄，把任何切实認真的步驟都擱置起来，而建立各种非常复杂庞大、毫無生气的官僚監督机关，这些机关完全听从資本家的意志，什么事也不做，什么事也不能做。

为了不致空口無憑，我們可以从孟什維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中找出一些証人。他們在革命头半年內在苏維埃中占多数，参加过“联合政府”，因此他們要在政治上对俄国的工人和农民負縱容資本家的責任，負資本家破坏任何監督的責任。

在“革命”民主派的所謂“全权”（不要笑！）机关中的最高机关

的正式机关报“中央执行委员会(即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1917年9月7日第164号上,登載了一个管理监督问题的专门机关的決議,这个专门机关也是孟什維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建立的,并且是由他們把持的。这个专门机关就是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經濟部”。在它的決議中正式承認,“政府所設調节經濟生活的各中央机关不起任何作用”完全是事实。

难道証明孟什維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政策破产的証据,有比他們亲手签字的这个文件更有力的嗎?

还在沙皇制度时代就認為有調节經濟生活的必要,并且也建立了一些专职机关。可是在沙皇制度下,經濟破坏不断加剧,达到了駭人听聞的地步。革命共和政府的任务,本来是要立刻采取重大的坚决的措施来消除这种破坏現象。有孟什維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参加的“联合”政府刚一成立,就在5月6日的告全国人民的郑重宣言中,答应負責实行国家监督和調节。那时策烈铁里和切尔諾夫之流以及所有的孟什維克和社会革命党的領袖們都發誓說,他們不只对政府的行动負責,而且他們所掌握的“革命民主派的全权机关”也在实际監視和检查政府的工作。

从5月6日到現在已經四个月了,在这长长的四个月中,俄国因实行帝国主义的荒謬“进攻”而葬送了几十万士兵,在这期間經濟破坏和灾难飞速逼来,夏季在水运方面、农業方面和矿山勘探等方面本来有極大的可能做出許多成績,但是四个月之后,孟什維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竟不得不正式承認政府所設的监督机关“不起任何作用”了!!

而現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正好是9月12日民主會議⁸⁷召开的前夕),这班孟什維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儼然以国家要人的姿态

高談什麼只要同工商界的基特·基特奇之流，即同列布申斯基、布勃利科夫、捷列申柯之流成立聯合政府來代替同立憲民主黨人成立的聯合政府，便可挽救時局！

試問怎樣來解釋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這種驚人的盲目無知呢？是否應該認為他們在國家工作上是一些極端蠢笨幼稚，不知道自己正在干些什麼，而自甘迷誤的孩子呢？或者說他們由於占據部長、次長、總督、專員等等高位過多，就必然產生一種特殊的“政治”盲目病呢？

監督是眾所周知和輕而易舉的辦法

可能發生一個問題：也許監督的辦法和步驟是一種極端複雜困難的、沒有試驗過的、甚至人們都不知道的事情吧？也許監督之所以遲遲未行，是因為立憲民主黨、工商業階級、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中的國家要人雖然已經累得滿頭大汗，用了半年的時間來探求、研究、發現監督的辦法和步驟，但這個任務過於困難而仍然沒有得到解決吧？

唉！的確有人想“蒙蔽”那些不識字的閉塞無知的農民以及那些不動腦筋而輕信別人的庸人，就把事情說成這樣。其實甚至沙皇政府，甚至“舊制度”，在建立軍事工業委員會時就已經知道實行監督的基本步驟、主要辦法和途徑：使居民按各種職業、工作目的、勞動部門等等聯合起來。可是沙皇政府害怕居民聯合起來，所以它極力限制和故意排斥這種眾所周知、輕而易舉、完全可以實行的監督辦法和途徑。

一切交戰國在遭到極端嚴重的戰爭災難和不同程度的經濟破

坏和飢荒时,早已拟出、决定、采用并試行过一系列的监督办法。这些办法归結起来,总不外是把居民联合起来,建立和鼓励各种各样的团体,这些团体由国家派代表参加,受国家的监督。所有这些监督办法都是众所周知的,并且講过許多,写过許多。各个参战的先进国家所頒布的有关监督的法令已經譯成俄文,或者在俄国报刊上詳細地論述过了。

假使我們的国家真正想切实認真地实行监督,假使它的机关不是因献媚于資本家而陷于“不起任何作用”的地步,那末国家随手就可以从大量的监督办法中找到大家已經知道的、已經被人采用过的办法。这里的唯一障碍,即立宪民主党人、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維克对人民隱瞞的障碍始終是:实行监督就会暴露資本家的駭人听聞的利潤,就会損害这些利潤。

为了把这个非常重要的問題(實質上就是任何一个願意挽救俄国、使它摆脱战争和飢荒的真正革命政府的政綱問題)解释得更加明白,我們把这些最主要的监督办法列举出来,逐一加以考察。

我們可以看到,如果政府叫做革命民主政府不是开玩笑,那它只要在成立政府的开头一星期中,頒布实施最主要的监督办法的法令,規定認真的而不是兒戏的惩罚办法,来处分那些用欺騙手段逃避监督的資本家,并号召人民自己来監視資本家,監視他們是否誠实执行有关监督的各项法令,只要这样,监督早就在俄国实现了。

以下便是最主要的监督办法:

(1)把所有銀行合并为一,由国家监督它的业务,或实行銀行国有化;

(2)把各个辛迪加即資本家的最大垄断組織(糖業、石油業、

煤業、冶金業等等辛迪加)收归国有;

(3)取消商業秘密;

(4)强迫工業家、商人以及一般企業主辛迪加化(即强迫他們合并为各种联合組織);

(5)强迫人民联合在各种消費合作社中,或奖励这种联合并且对它們实行監督。

現在我們把这些办法逐一地加以考察,看看它們在用革命民主手段来实行的条件下究竟具有什么意义。

銀行国有化

大家都知道,銀行是現代經濟生活的中心,是全部資本主义国民經濟体系的神經中枢。談“調节經濟生活”而避开銀行国有化問題,就等于暴露自己的極端無知,或者是用华丽的詞句和漂亮的諾言来欺騙“老百姓”,根本不想实现这些諾言。

監督并調节糧食的輸送,或者監督并調节一般产品的生产和分配,而不監督和調节銀行的業務,这是荒謬可笑的。这好像是猎取偶然到手的“几个戈比”,而閉眼不理睬那千百万卢布的橫財。現代的銀行同商業(糧食及其他一切商業)、工業緊密地生长在一起,不“插手”到銀行中,絕對不能做出絲毫重大的、絲毫“革命民主的”事情来。

也許,国家“插手”到銀行中是一种非常困难复杂的过程吧?人們通常拿这种情景来恐吓那班庸人,而竭力这样做的当然是資本家及其辯护人,因为这样对他們有利。

其实,銀行国有化决不剝夺任何一个“私有者”一个戈比,絕對

沒有任何技術上和文化上的困難，而只是一小撮富人的唯利是圖的卑鄙欲望在起阻礙作用。常常有人把銀行國有化同沒收私有財產混為一談，這應當歸咎於散布這種混亂概念的資產階級報刊，因為它們的利益就是欺騙民眾。

銀行所支配並集中於銀行的那種資本的所有權，是有印刷的和書面的字據做證明的，這些字據就叫做股票、債券、期票、收條等等。在實行銀行國有化時，就是說，在把所有銀行合併為一個國家銀行時，這些字據一個也不會作廢，一個也不會改變。誰的存摺上有 15 個盧布，在銀行國有化以後，他仍舊是 15 盧布的所有者，誰有 1 500 萬盧布，在銀行國有化以後，他仍然握有由股票、債券、期票、貨物証等等所表現的 1 500 萬盧布。

那末銀行國有化的意義究竟何在呢？

由於對各單個銀行及其業務不可能實行任何真正的監督（即使取消了商業秘密等等），就無法查出它們在編制資產負債表，虛設企業和成立分行，以及使用頂名人等等的時候採取的一切極複雜、極紛繁、極狡猾的手段，只有把一切銀行合併為一（這種合併的本身絲毫也不改變私有財產關係，再說一遍，不剝奪任何一個私有者的一個戈比），才有可能實行真正的監督，當然，同時還要採取上述其他各種措施。只有實行銀行國有化，才能使國家知道幾百萬以至幾十億盧布往來流動的去向，以及這種流動是怎樣發生和在什麼時候發生的。只有監督銀行，監督這個資本主義周轉過程的中樞、軸心和基本機構，才能真正地而不是在口頭上做好對全部經濟生活的監督，做好對重要產品的生產和分配的監督，才能做到“調節經濟生活”，否則這種事情仍免不了是欺騙老百姓的一句部長式的空話。只有把各個銀行合併為一個國家銀行，對它的業務

进行监督,再采取一系列简单易行的措施,才能真正做好征收所得税的工作,才不致发生隐瞒财产和收入的事情,而现在的所得税绝大部分是落空的。

銀行国有化只要下一道命令就行了,銀行經理和職員自己会动手的。不需要国家設立任何特別机构和采取任何特别的准备步骤,这个办法只要下一道命令,“一举手”就可以实现。既然资本主义發展到了通用期票、股票、債券等等的程度,那它也就恰好在經濟上造成了实行这种办法的可能性。这里剩下的事情只是合并賬务而已。如果革命民主国家作出决定:立刻用电报通知在每个城市中召开銀行經理職員會議,在每省和全国范围内召开銀行經理職員代表大会,以便立刻把各銀行合并为一个国家銀行,那末这一改革在几星期內就可以完成。当然,那些經理和高级職員会設法抗拒,欺騙国家,故意拖延等等,因为这班老爷怕失去他們收入特別多的职位,不能施展他們获利特別大的欺詐手段,全部实质就在于此。可是,合并銀行并不会有絲毫技术上的困难,如果国家政权不只在口头上是革命的(即不怕打破一切因循守旧的恶習),不只在口头上是民主的(即維護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而不是維護一小撮富人的利益),那末,只要發布一道命令,用沒收财产和監禁的办法来惩治那些敢于稍微拖延和企圖隐瞒文据賬目的銀行經理、董事和大股东,只要把貧穷職員等单独組織起来,并給揭發富人的欺騙和拖延行为的人發奖金,銀行国有化就可以極順利極迅速地实行。

銀行国有化对于全体人民,特别是对于农民和小手工業者大众,而不是对于工人(因为工人很少同銀行有来往),好处是非常大的。劳动力方面的节省将是不可計量的,假定国家保存銀行原

有職員的数量，那末，在普遍利用銀行、增加分行數目、銀行業務大眾化等等方面會大大地前進一步。正是對小業主和農民來說，信貸將變得非常大眾化和簡單易行。國家也就第一次有可能首先對一切主要的現金業務加以考察，不讓有隱瞞，接着監督這種業務，從而調節經濟生活，最後就獲得幾百萬以至幾十億的巨款來進行重大的國家設施，不必因所謂“中介”而付給資本家老爺們巨大的“酬勞”金。正因為這樣，而且只因為這樣，一切資本家、一切資產階級教授、整個資產階級以及所有為它服務的普列漢諾夫和波特列索夫之流，都口沫飛濺地叫囂反對銀行國有化，臆造出幾千個借口來反對這個極簡單而又極必要的辦法，這個辦法即使從國家的“防禦”觀點，即從軍事觀點來看，也有極大的好處，它可以大大地提高國家的“軍事實力”。

這裡也許會有人反駁說：那末，像德國和美國這樣在“調節經濟生活”方面做得非常好的先進國家，為什麼卻沒有想要實行銀行國有化呢？

我們回答說：這些國家雖然一個是君主政體，一個是共和政體，可是二者都不僅是資本主義國家，而且是帝國主義國家。它們既然是這樣的國家，在實行它們所必需的改革時就要採用反動官僚的手段，而我們在這裡說的則是革命民主的手段。

這個“小小的差別”有極重大的意義。關於這個差別常常是“照例”不想的。“革命民主”這個名詞在我們（特別在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那里）幾乎成了一句口頭禪，就像“謝謝上帝”這句話一樣，即使是並非無知的、不信上帝的人也常常會說的，也像“可敬的先生”這個稱呼，有時甚至用來稱呼那些“日報”或“統一報”的撰稿人，雖然幾乎人人都看得出來，這些報紙是資本家為了自身利益

創办的并且用錢来維持的，因而参加这些报纸的所謂社会主义者本人是很少有“可敬”之处的。

若是不把“革命民主”当做裝飾門面的詞句，当做口头禪来用，而考虑一下它的意义，那末要做一个民主主义者，就要真正重視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而不是只顧少数人的利益，要做一个革命者，就要最坚决最無情地打破一切有害的过时的东西。

据說，無論在美国或德国，無論是政府或統治階級，都不追求“革命民主”这个称号，而我国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維克，却以这个称号自封(其实是污辱这个称号)。

在德国一共只有四个全国性的私人大銀行，在美国只有两个。对于这些銀行的金融巨头來說，用私下的、秘密的、反动的手段而不是革命手段，用官僚手段而不是民主手段来实行联合，要容易得多，方便得多，有利得多；他們收买国家的官吏(这無論在美国或德国都成了通例)，保持銀行的私有性質，这正是为了保持業務秘密，从国家那里賺取千千万万的“超額利潤”，正是为了保证他們在金融上玩弄种种欺詐的把戏。

無論美国或德国，“調节經濟生活”的結果是給工人(和一部分农民)造成單專苦役营，給銀行家和資本家建立起天堂。这些国家的調节办法就是把工人“勒紧”，紧到挨餓的地步，另一方面保証(用秘密手段、反动官僚手段)資本家获得比战前更高的利潤。

这样的方式，在共和制帝国主义的俄国也是完全可能的；这一方式不仅由米留可夫和盛加略夫之流在实现，而且也由克倫斯基同捷列申柯、涅克拉索夫、別尔納茨基、普罗柯波維奇等等在实现，他們也是用反动官僚手段来掩护銀行的“不可侵犯性”及其获取駭人听聞的利潤的神聖权利。最好还是說真話吧：有人想在共和制

的俄国用反动官僚的方式来调节经济生活，可是，由于“苏维埃”的存在，“常常”难以实行，第一个科尔尼洛夫曾想驱散“苏维埃”，没有成功，第二个科尔尼洛夫又会竭力设法来驱散它的……

这就是真话。这句简单的真话虽然很辛辣，但对人民的启发却比说什么“我们的”、“伟大的”、“革命的”民主制度等等动听的话要有益得多……

* * *

银行国有化对同时进行的保险事业国有化会有极大的帮助，保险事业国有化就是把一切保险公司合并为一，集中它们的活动，由国家来监督。在这里，也可以毫不困难地通过保险公司的职员代表大会来立刻实现这种合并，只要革命民主国家下令实施，并责令各保险公司的经理和大股东各自认真负责地毫不延迟地实行这种合并就行了。保险事业方面的几亿资金是资本家投入的，全部工作是由职员进行的。把这一事业统一起来，就可以减低保险费，使所有保险者能够获得许多便利，并减轻他们的负担，在原有人力和资金的条件下可以增多保险者的数目。除了一小撮收入丰裕者的因循守旧和自私自利以外，没有任何其他东西阻碍这种改革，加之这种改革也能提高国家的“防御能力”，节省人民的劳动，提供许多极其重大的可能性来真正“调节经济生活”，而不是口头上说说而已。

辛迪加国有化

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前的旧的国民经济体系不同，它的各部

門形成了一種密切聯繫和相互依賴的關係。順便說一句，要是沒有這一點，任何走向社會主義的步驟在技術上都是不能實現的。由銀行統治生產的這種現代資本主義，使國民經濟各部門間的這種相互依賴關係發展到了最高峰。銀行和各大工商業部門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一方面就是說，不採取步驟對工商業辛迪加（糖業、煤業、鐵業、石油業等等辛迪加）實行國家壟斷，不把這些辛迪加收歸國有，而只把銀行收歸國有是行不通的。另一方面就是說，要認真實行調節經濟生活，就必須把銀行和辛迪加同時收歸國有。

且拿糖業辛迪加為例吧。這個辛迪加在沙皇時代就已經建立起來，那時已把許多設備良好的工廠合并為一個極大的資本主義組合，自然，這種合并充滿了最反動最官僚的氣息，它保證資本家獲得駭人所聞的高額利潤，使職員和工人處於絕對無權的、卑賤的、受壓制的、奴隸的地位。國家在那時就已經對生產實行監督和調節，但這是有利於財閥和富豪的監督和調節。

這裡要做的事情，只是發布一些簡單的命令，規定召開職員、工程師、經理、股東的代表大會，實行統一的會計制度，由工會實行監督等等，來把反動官僚的調節變為革命民主的調節。這是最簡單不過的事情，然而正是這件事情至今還沒有做！！事實上在民主共和制度下，在制糖業方面仍舊用反動官僚方式進行調節，一切都是老樣子，浪費人民的勞動，因循守舊，停滯不前，讓鮑勃凌斯基和捷列申柯之流大發其財。要向民主派號召表現獨立主動精神，而不是向官僚號召；要向工人和職員號召表現獨立主動精神，而不是向“糖業大王”號召；只要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不用同這些糖業大王實行“聯合”的計劃來模糊人民的意識，那末這件事就應該而且應當在幾天之內一舉而成。然而正因為同富人實行聯合，結

果政府在調节經濟生活方面“不起任何作用”也就完全不可避免了[⊖]。

再拿石油業來說吧。資本主义的前期發展就已經把石油業大規模地“社会化”了。两三个石油大王操縱着几百万以至几亿資金,专靠剪息票为生,同时从那个在事实上、技术上、社会意义上都已经在全国范围内組織起来并且已经由数百数千个職員、工程师等經營着的“事業”中获取惊人的利潤。石油工業国有化是可以一举而成的,而且是革命民主国家必須做的事情,特別在国家遭到極大的危机,必須节省人民的劳动和增加燃料产量的时候。当然,官僚式的监督在这里不会有絲毫結果,絲毫不会改变情况,因为“石油大王”無論对付捷列申柯之流、克倫斯基之流、阿夫克森齐也夫之流或斯柯別列夫之流,都像对付沙皇的大臣一样容易,对付的方法就是拖延、推托、許諾,以至直接和間接地收买資產階級报刊(这就是所謂“輿論”,而这种“輿論”是为克倫斯基和阿夫克森齐也夫之流所“重視的”),收买官吏(即由克倫斯基和阿夫克森齐也夫之流留在不可侵犯的旧国家机关中旧职位上的官吏)。

要想做些認真的事情,就必須把官僚制度轉变为民主制度,而且要用真正革命的手段来实行这种轉变,就是說,要向石油大王和股東宣战,用命令規定,如果他們拖延石油業国有化,隱瞞收入和賬目,对生产怠工,不采取措施提高产量,就要沒收他們的財產并处以徒刑。应当喚起工人和職員的主动性,立刻召集他們开会或举行代表大会,只要建立起完备的监督制并扩大了生产,就分出一

⊖ 当我写到这里时,我在報紙上看到克倫斯基政府宣布实行糖業垄断,实行的方式自然是反动官僚的方式,不召开職員和工人的代表大会,不明文公布,也不制裁資本家!|

部分利潤給他們。如果能立刻在1917年4月就實行這種革命民主的步驟，那末作為世界上液體燃料蘊藏最豐富國家之一的俄國，就能够在夏季利用水運供給人民必需數量的燃料，在這方面做出許許多多的事情。

無論是資產階級的政府，或者是社會革命黨人、孟什維克和立憲民主黨人的聯合政府，都什麼事也沒有做，只是玩弄了一套官僚主義的改良把戲，連一個革命民主的步驟也不敢採取。仍然是那些石油大王，仍然是那樣因循停滯，仍然是工人和職員對剝削者的憎恨，仍然是在這一基礎上產生的瓦解現象，仍然是不斷浪費人民的勞動，——一切都像在沙皇時代一樣，改變了的只是“共和國”各辦公廳收發文件上的稱呼而已。

煤炭工業在技術上和文化上所具備的實現國有化的“現成”條件並不差；那班掠奪人民的強盜煤業大王，在管理上的無恥程度也並不輕，在這裡我們看到工業家公然怠工、公然破壞設備和中斷生產等許多極明顯的事實。甚至孟什維克的內閣派報紙“工人報”也承認了這些事實。結果怎樣呢？同樣地什麼也沒有做，只是舉行了幾次工人和煤業辛迪加強盜的代表各占“半數”的舊的反動官僚式的會議而已！！任何革命民主的步驟也沒有採取，絲毫也沒有想到要建立唯一切實的監督制，即從下面由職員工會和工人用恐怖手段來對付那些危害國家、停止生產的煤炭工業家！怎麼可以這樣做啊，我們“大家”不是都主張同立憲民主黨人或者同工商界建立“聯合政府”嗎！可是聯合的意思就是把政權留在資本家手裡，讓他們橫行無忌，讓他們阻礙事業，把一切都歸罪於工人，使經濟破壞加劇，從而準備新的科爾尼洛夫叛亂！

取消商業秘密

如果不取消商業秘密，对生产和分配的監督就仍旧是空洞的諾言，立宪民主党人用它来愚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維克，而后者又用来愚弄劳动階級；或者这种監督就是只有用反动官僚的办法和措施才能实现的監督。不管这一点对所有沒有成見的人來說是怎样明显，不管“真理报”[⊙]主张取消商業秘密是怎样的坚决（为資本效劳的克倫斯基政府封閉“真理报”，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这件事），但無論是我們的共和政府或是“革命民主派的全权机关”，都还没有想实行这一真正監督的首要步驟。

正好在这一点上是实行任何監督的關鍵。正好在这一点上是那些掠夺人民并对生产实行怠工的資本家的致命之处。正因为这样，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維克也就害怕触及这一点。

資本家通常提出的、小資產階級也不加思索地重复的理由，就是資本主义的經濟絕對不容許普遍取消商業秘密，因为生产資料的私有制，各企業对市場的依賴，使商業簿記和商業周轉（当然銀行周轉也在內）必須保持“神聖的不可侵犯性”。

凡是这样或那样地重复这种理由或类似的理由的人，都是自己甘願受騙，并且还以此欺騙人民，他們閉眼不看現代經濟生活中两个众所周知的極其重大的基本事实。第一个事实就是大資本主义即銀行、辛迪加、大工厂等等經濟的特点。第二个事实就是战争。

現代的大資本主义到处都已成为壟斷資本主义，根本消除了

⊙ 見“列宁全集”1957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4卷第481—482頁及本卷第127—131頁。——編者注

商業秘密的任何合理性，使商業秘密成為虛偽的東西，成為只是掩蓋金融欺詐行為和使大資本獲得驚人利潤的工具。大資本主義經濟，按它本身的技术來說，是社會化的經濟，就是說，它為千百萬人工作，它用自己的各種業務來直接或間接地聯合成百、成千以至成萬個家庭。它並不是小手工業經濟或中農經濟，這兩種經濟完全無所謂商業簿記，所以取消商業秘密也同它們無關！

在大經濟中，它的業務反正有幾百人以至更多的人知道。保持商業秘密的法律在這裡並不是為了生產或交換上的需要，而是為了掩蓋投機買賣和極不正當的謀利手段，掩蓋直接的欺詐行為，大家知道，在股份企業中這種欺詐行為是特別流行的，它特別巧妙地用偽造的賬目和資產負債表來掩蓋自己，欺騙大眾。

在那些生產本身還沒有社會化、還是分散零星的小商品經濟中，即在小農和小手工業者中，保持商業秘密是必不可免的，但是在資本主義經濟中保持這種秘密，便是保持極小一撮人的特權和利潤而損害全體人民。既然規定股份公司必須公布賬目，那就是說，法律也承認了上述這個事實，不過這種監督（這在一切先進國家以及俄國都已實現）是反動官僚式的監督，這種監督不讓人民看清真相，不讓人民知道股份公司業務的全部真實情況。

如果按革命民主方式來做，就應該立刻頒布另一種法律：取消商業秘密，命令大企業和富人公開全部賬目，讓任何一部分公民（在民主的意義上說已達到相當人數者，譬如 1 千或 1 萬選民）有權審查任何一個大企業的一切文據。這樣的辦法只要一道命令就可以很容易地完全實現；只有這個辦法才能通過職員工會，通過工人工會，通過一切政黨來發動人民對監督的主動性；只有這個辦法才能使監督成為認真的和民主的監督。

此外还要加上战争这一点。现在绝大多数工商企业不是为“自由市场”服务，而是为国库、为战争服务。所以我已经在“真理报”上说过，那些借口不能实行社会主义而来反对我们的人是撒谎，是双倍的撒谎，因为这里所说的，不是要现在立刻直接实行社会主义，而是要揭发盗窃国库的行为[⊙]。

为“战争”服务的资本主义经济（即直接或间接地同供应军需品有关的经济）是有系统的、取得法律保障的盗窃国库的行为，立宪民主党的老爷们连同反对取消商业秘密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都只是盗窃国库的帮手和庇护者。

战争使俄国现在每天耗费5 000万卢布。每天5 000万，这个数目大部分是付给军需品供应者的。每天在这5 000万中至少有500万，也许有1 000万以至更多的数目成了资本家和同他们有某种勾结的官吏们的“正当收入”。特别是那些贷款给军需品供应事业的大公司和大银行，在这里赚取了闻所未闻的利润，它们是一些靠盗窃国库发财的强盗，因为这种乘战争灾难的“机会”，乘几十万、几百万人死亡的“机会”来欺詐人民、掠夺人民的行为，决不能叫做别的。

关于这种从军需品供应中获得的惊人利润，关于银行隐匿的各种“保证信件”，关于靠物价飞涨发财的是些什么人，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社会上”也用嘲笑态度谈论着这些事，甚至那些照例隐瞒“不愉快”事实、迴避“棘手”问题的资产阶级报刊，对这点也有不少各种各样的确切陈述。大家都知道，可是大家都不说，都忍受，都容忍那个专说“监督”、“调节”等等漂亮话的政府！！

⊙ 見本卷第52—54頁。——編者注

革命民主主义者，如果他們真是革命者和民主主义者，那他們就應該立刻頒布法令，取消商業秘密，責成軍需品供应者和商人把賬目公开，不經過政府允許，不能丢弃他們所經營的業務，用沒收财产和槍斃[⊖]来惩治那些隱瞞和欺騙人民的人，組織自下的、民主的检查和監督，即由人民自己，由職員工会、工人工会以及消費者团体等等实行检查和監督。

我們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維克完全可以說是吓慌了的民主主义者，因为在这个問題上他們重复所有吓慌了的市儈的話，說什麼采用“过严的”办法，資本家就会“逃走一空”，說沒有資本家“我們”就不行，說也許英法百万富翁会因此“見怪”，而他們本来是“支持”我們的，諸如此类等等。使人覺得，布尔什維克所提出的是人类历史上未曾有过的东西，是从來沒有試行过的“烏托邦”。其实早在 125 年以前，在法国就有真正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他們真正相信他們所进行的战争是正义的防御战争，真正依靠同样有这种真誠信念的人民群众，当时他們已經建立起对富人的革命監督，并且获得了举世欽佩的結果。而在这 125 年中，資本主义發展了，建立起銀行、辛迪加、铁路等等，这就使工农对剝削者，对地主和資本家实行真正民主的監督要容易和簡單百倍。

實質上，監督的全部問題归根到底在于誰監督誰，就是說哪一個階級是監督階級，哪一個階級是被監督階級。直到現在，在我們共和制的俄国，在所謂革命民主派的“全权机关”参与下，仍旧承認

⊖ 我有一次在布尔什維克刊物上指出过，只有在死刑被剝削者用来对付劳动群众、借以維持剝削制度的时候，才能認為反对死刑的理由是正当的（見本卷第 252—255 頁。——編者注）。不用死刑来对付剝削者（即地主和資本家），恐怕是任何革命政府都行不通的。

地主和資本家是監督者，仍舊讓他們當監督者。結果，資本家的掠奪行為必然激起人民的公憤，資本家故意支持的經濟破壞現象就必不可免。應當不怕打破舊的，大膽建設新的，堅決徹底地實行工農對地主資本家的監督。而這正是我們的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非常害怕的事情。

強迫合併成聯合組織

強迫實行辛迪加化，例如強迫工業家成立聯合組織，在德國已經這樣做了。這裡絲毫沒有什麼新的東西。這裡也由於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的過錯，共和制的俄國完全陷於停滯狀態，而這些很不光彩的政黨竟和立憲民主黨人，或者和布勃利科夫之流，或者和捷列申柯及克倫斯基跳起雙人舞來“款待”俄國。

強迫實行辛迪加化，一方面是國家推動資本主義發展的办法，結果使階級鬥爭普遍地成為有組織的鬥爭，使聯合組織的數目增加，式樣增多，意義增大。另一方面，強迫“聯合化”是任何一種稍為認真的監督办法和任何一種節省人民勞動的办法所必需的先決條件。

例如德國的法律責成同一地方或全國的制革工廠主組成一個聯合組織，由國家派代表參加這個聯合組織的董事會，進行監督。這項法令絲毫沒有直接（指法令本身）觸動私有制關係，沒有剝奪任何私有者的一個戈比，並且也沒有預先決定，究竟這種監督用反動官僚的方式、方針和精神來實現，還是用革命民主的方式、方針和精神來實現。

這種法律可以而且應當在我國立即頒布，用不着花費一個星

期的寶貴時間，只要讓社會環境本身更具体地去規定實現法令的方式、速度以及監督的辦法等等。為了頒布這樣的法令，國家並不需要設立特別的機關進行特別的調查以及任何事先的研究，只要有決心同那些“不習慣”這種干預、不願意喪失超額利潤（保障這種超額利潤的除了無人監督以外，還有舊的經營方式）的資本家的某些私人利益斷絕關係就行。

為了頒布這樣的法令，並不需要任何機關，任何“統計”（切爾諾夫想以此代替農民的革命首創精神），因為實行這種法令的責任應當在於工廠主或工業家本身，在於現有的社會力量，要依靠現有社會（即不是政府的，不是官僚的）力量的監督，不過這種社會力量一定要來自所謂“下層等級”，即來自被壓迫、被剝削階級，因為這些階級的英勇精神、自我犧牲和集體紀律，在歷史上總是表現得比剝削者高過無數倍的。

假定說我國有真正革命民主的政府，並且規定每個生產部門中凡是雇用兩個工人以上的工廠主和工業家都必須立刻組成縣和省的聯合組織，那末切實執行法令的責任，首先落在工廠主、經理、董事、大股東身上（因為這些人都是現代工業的真正首領、真正主人）。如果他們規避立刻執行法令的工作，就把他們當做逃避軍役而以軍法治罪，並實行連環保，各人用自己的全部財產擔保，一人有罪，大家負責。其次，所有職員也有責任執行這個法令，讓他們也成立一個團體，所有工人和工會也要擔負這個責任。“聯合化”的目的就是要建立最完備、最嚴格和最詳細的會計制度，而主要是在購買原料、推銷產品方面實行聯營，節省人民財力和人力。在分散的企業聯合為一個辛迪加時，就能大大節省，這是經濟學告訴我們的，也是一切辛迪加、卡特尔、托拉斯的例子說明了的。我再

重复一遍，成立一个辛迪加联合组织丝毫不会改变私有制关系，也不会剥夺任何私有者一个戈比。这一情况必须再三强调，因为资产阶级报纸经常“恐吓”中小业主，说什么一般社会主义者，特别是布尔什维克想“剥夺”他们的财产；这种说法显然是捏造出来的，因为社会主义者就是在完全的社会主义变革时也不想剥夺、不能剥夺并且不会剥夺小农的。我们常常说的只不过是那些立刻就要实行的最迫切的办法，这些办法在西欧已经实现了，凡是比较彻底的民主派都应当立刻在我国采取这些办法，以便同当前不可避免的灾难进行斗争。

如果要最小的业主和小业主成立各种联合组织，那无论在技术上或者文化上都会遇到严重的困难，因为他们的企业非常分散，技术简陋，业主本人又不识字或无知识。然而正是这些企业可以不包括在这项法令之内（像我们上面假设的例证中指出的那样），即使不把它们合并，更不用说晚一些合并，也不会造成什么严重的障碍，因为为数众多的小企业在生产总量中的比重和对整个国民经济的意义都是微不足道的，况且这些企业通常都是这样或那样地依赖大企业的。

有决定意义的只是大企业，在这里，从技术和文化水平来看，已经具备了实行“联合化”所必需的人力与物力，所缺少的只是革命政权为了发动这些人力和物力而必须严厉无情地对待剥削者所需要的坚决果断的主动精神。

国家愈缺乏有技术的人材和一般知识干部，就愈迫切需要尽可能迅速、尽可能坚决地下令实行强迫合并，而且要从最大的和大的企业开始，因为正是合并才能节省知识干部，才能充分使用和更合理地调配这些干部。1905年以后，在沙皇政府的统治下，俄

国农民甚至在穷乡僻壤也能够战胜政府所造成的無数障碍，在成立各种联合的事業上大大跨进一步，現在大工商業和中等工商業的合并就完全可能在几个月內实现，或者还要快些，只要真正革命民主的政府强制执行，并且能依靠“下層”，依靠民主势力，即依靠職員和工人的支持、参加、同情和关心，号召他們起来实行监督就行了。

調 节 消 費

战争迫使所有交战国和許多中立国都实行了調节消費的办法。面包証出世了，成了很普通的現象，接着又出现了其他各种配給証。俄国也不例外，也实行了面包配給制。

然而，正好在这个例子上我們也許可以作一个最明显的比較：用反动官僚办法来战胜灾难，那就只是限于最微小的改造；用革命民主的办法，只要不褻瀆自己的称号，那末它的直接任务就是用强力同一切陈旧的东西决裂，尽快地把运动推向前去。

面包配給制是现代资本主义国家調节消費的一个典型范例，它的任务只有一个（至多也只能实现这一点）：分配現有粮食，使大家够吃。規定最高消費定額的远不是一切东西，而只是几种主要的“大众”食品。只不过如此而已。别的再也不管了。官僚式地統計現有存粮，按人口分配，規定定額，加以实行，这样就算完事。奢侈品是毫不涉及的，因为这些东西“反正”很少，“反正”这样昂貴，“人民大众”是买不起的。所以毫無例外地在所有交战国中，甚至在德国，在这个無可爭辯地可以說是最准确、最精密、最严格調节消費的典型国家里，我們都看見富人經常是不受任何消費“定額”

的限制的。这也是“大家”都知道的，“大家”都耻笑的事实，并且德国社会主义的报刊，有时甚至资产阶级的报刊，不管德国军纪森严的检查机关如何横暴，还是经常登载关于富人的“菜单”，关于富人在某某疗养地（凡是有钱的……都可以假装有病到那里去疗养）可以无限制地得到白面包，关于富人享用山珍海味来代替大众化的食品等等的短评和消息。

反动的资本主义国家害怕损坏资本主义的基石、雇佣奴隶制的基石、富人经济统治的基石，害怕工人以及一般劳动群众发挥自动性，害怕“煽起”他们的正当要求；这样的国家除了面包配给制以外是什么也不需要。这样的国家随时随地都不会放松自己的反动目的：巩固资本主义，不使它受到损害，在“调节经济生活”方面，尤其在调节消费方面，仅仅采取一些使人民不致挨饿所绝对必需的办法，而并不打算真正调节消费，就是说，并不想监督富人，不想把更多的战时重担加到那些在和平时期养尊处优、享有特权、饱食终日的富人身上。

解决战争带给人民的困难的反动官僚办法，只限于实行面包配给制，平均分配那些生活绝对必需的“大众”食品，一点也不放弃官僚主义和反动政策，就是说，一点也不放弃自己的目的：不发动穷人、无产阶级、人民大众（“平民”）的自动性，不容许他们监督富人，更多地为富人留下享受奢侈品的漏洞。在所有国家中，重复一句，甚至在德国，更不用说俄国了，这样的漏洞是留得极多的，“老百姓”在忍饥挨饿，而富人却到疗养地去，用各种“附加物”来补充国家规定的很小的消费额，并且，不让自己受到监督。

在刚刚经过了反对沙皇制度、争取自由平等的革命的俄国，按它的实际政治制度来说，一下子就成了民主共和的俄国，大家看

到富人可以随便不受“面包配給制”限制的現象，是特別刺目，特別不滿、恼怒、痛恨和憤慨的。这种現象十分严重。他們“暗地里”用特別高的价格，尤其是依靠“交情”（这只有富人才有），就能得到一切东西，而且是大量的。人民却在忍飢挨餓。用来調节消費的仅仅是范围非常狹窄的官僚反动办法。政府方面絲毫沒有想到，絲毫沒有关心，要在真正革命民主的原則上实行这种調节。

“大家”都受到排队买东西的痛苦，可是……可是富人却派僕人去排队，甚至雇佣專門的僕人来做这件事！这也叫做“民主主义”！

当国家空前貧困的时候，为了战胜当前的灾难，革命民主政策应不限于实行面包配給制，还要加上以下的办法：第一、强迫全体居民組成消費合作社，因为不这样就無法实行完备的消費監督；第二、要富人担負劳动义务，要他們無報酬地在这些消費合作社中从事文書等类的劳动；第三、把一切消費品真正平均分配給居民，使战时的灾难真正平均分担；第四、实行由居民中的貧苦階級来監督富人消費的監督制。

在这方面建立真正的民主制度，在組織人民中最貧苦階級实行監督方面表現真正的革命性，就能大大推动現有的每个知識分子，就能真正發揮全体人民的革命力量。然而現在，共和制的革命民主主义俄国的部长們，像他們在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中的同僚一样，專門說些漂亮話，什么“全体为人民利益而劳动”、“振奋一切力量”等等，可是人民到底还是看到了和觉察到了这些話完全是虛伪的。

結果是踏步不前，制止不了經濟破坏的加深，灾难日益逼近。按照科尔尼洛夫方式，按照兴登堡方式，按照一般帝国主义方式来

对工人施行軍事苦役制吧，我国政府不能这样做，因为革命的传统、记忆、痕迹、习惯和组织还是活生生地存在于人民之中；真正認真地向革命民主的道路上前进几步吧，我国政府又不願意，因为它依賴資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組織“联合”政府，一点不敢触犯資產階級的实际特权，这样就把它渾身上下都束縛住了。

政府破坏民主組織的工作

我們探討了战胜灾难和飢荒的各种方法和办法。我們到处都可以看到，民主派方面以及政府和支持政府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維克的联盟方面，二者之間有不可調和的矛盾。为了証明这些矛盾不只是我們談到，而且在实际上存在，为了証明这些矛盾的不可調和性已为具有全民意义的实际冲突所証实，只要提到我国革命半年来的經歷中两个特別典型的“总结”和教訓就够了。

帕尔欽斯基“統治”的經過是一个教訓。彼舍霍諾夫“統治”和垮台的經過又是一个教訓。

上述各种战胜灾难和飢荒的办法，實質上就是要从各方面鼓励（直到强迫）居民，首先是鼓励民主派即大多数居民“組織化”，也就是說首先鼓励被压迫階級，鼓励工人和农民，特別是貧苦的农民进行“組織化”。为了克服战争所带来的空前的困难、痛苦和灾难，居民自己已經自發地走上了这条道路。

沙皇政府曾千方百計地阻撓居民自动地和自由地“組織化”。但在沙皇专制政体崩潰后，民主組織便在俄国各地产生并迅速發展起来。自动成立的各种民主組織、各种供給委员会、粮食委员会、燃料會議以及諸如此类的組織，都进行了克服灾难的工作。

在我国革命半年来的全部历史中，在这个問題上最值得注意的，就是自称为共和的革命的政府，即孟什維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以“革命民主派全权机关”的名义支持的政府，竟进行了反对民主組織的斗争，并且打败了这些組織！！

帕尔欽斯基由于进行这个斗争，臭名传遍了俄国。他藏在政府的后台进行活动，而不是公开地出现在人民面前（这同一般立宪民主党人喜欢用的活动方式完全一样，他們推出策烈铁里来“对付人民”，自己却暗中包办一切重要事情）。帕尔欽斯基阻挠和破坏了自發民主組織的一切重大措施，因为任何一項重大措施都不能不“損害”基特·基特奇之流的無限利潤和专横气焰。而帕尔欽斯基正是基特·基特奇之流的忠实衛士和奴僕。事情弄到这种地步，——这是报上公布过的事实——帕尔欽斯基竟公然下令取消自發民主組織發出的指示！！

帕尔欽斯基“統治”的全部历史（他“統治了”好几个月，而且正是在策烈铁里、斯柯別列夫、切尔諾夫当“部长”的时候），完全是一部討好資本家、維護資本家的卑鄙私利而破坏民意、破坏民主派決議的丑史。自然，報紙上能够發表的只是帕尔欽斯基“功績”的極小一部分，要把他阻挠克服飢荒的罪行徹底查清，只有無产階級取得政权，成立真正的民主政府才能做到，那时無产階級就会把帕尔欽斯基及其同类人物的案件毫不隱匿地提交人民审判。

也許有人会反駁說，帕尔欽斯基只是一种例外而已，你看，不是已經把他赶走了嗎……可是問題正在于帕尔欽斯基不是例外，而是通例，赶走了帕尔欽斯基，情况絲毫也沒有改善，代替他的只是一些名字不同的帕尔欽斯基罢了；資本家的全部“影响”，为討好資本家而破坏克服飢荒的全部政策，絲毫沒有触动。因为克

倫斯基之流不过是維護資本家利益的屏障而已。

对这一点的最明显的証明，就是粮食部长彼舍霍諾夫退出內閣。大家知道，彼舍霍諾夫是个極温和的民粹主义分子。可是他在組織粮食工作方面很想同民主組織發生联系，依靠它們来老实实在地做些事情。彼舍霍諾夫的工作經驗和他退出內閣之所以更值得注意，是因为这个極温和的民粹主义分子，这个“人民社会”党黨員，虽然决心尽量同資產階級妥協，还是不得不退出內閣！原因是克倫斯基政府为了討好資本家、地主和富农而提高了粮食的固定价格！！

請看斯密特在9月2日“自由生活报”⁸⁸第1号上对这个“步驟”及其意义的描写吧：

“在政府决定提高固定价格的前几天，全国粮食委员会里曾出現了这样一个場面：右派代表罗洛維奇这个頑强維護私商利益、無情反对粮食壟断、反对国家干涉經濟生活的人，洋洋得意地当众宣布，据他所知，粮食的固定价格很快就要提高了。

工兵代表苏維埃的代表回答說，他絲毫也不知道有这样的事，俄国革命还在进行，决不会有这种举动，不同民主派的全权机关經濟委员会和全国粮食委员会商量，政府無論如何是不会做出这种事情的。农民代表苏維埃的代表也同意这个声明。

可惜！事实給了这个反声明一个非常残酷的修正：說对了的原来不是民主派的代表，而是富豪分子的代表。原来关于准备侵犯民主权利这件事，他消息很灵通，尽管民主派的代表愤慨地否認發生这种事情的一切可能性。”

总之，無論工人代表或农民代表，都以絕大多数人民的名义明确地申述了自己的意見，而克倫斯基政府却为資本家的利益干着与此相反的勾当！

資本家的代表罗洛維奇对于民主派不知道的那些事情，消息是非常灵通的，这正像我們常常看到而且現在还能看到的情形—

样：資產階級報紙“言論報”和“交易所報”對於克倫斯基政府中所發生的事情，消息是非常靈通的。

消息這樣靈通，這說明什麼呢？顯然說明了資本家有自己的“門路”，並且在實際上掌握着政權。克倫斯基是一個受他們指使的傀儡，他們要怎樣使用他，就怎樣使用他，要什麼時候使用他，就什麼時候使用他。千百萬工人和農民的利益在一小撮富人的利潤下犧牲了。

我們的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怎樣回答這種令人憤慨的欺侮人民的舉動呢？也許他們已經向工人和農民發表了宣言，說既然這樣只好把克倫斯基及其同僚送進監獄吧？

根本沒有這回事！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僅僅以他們所把持的“經濟部”的名義通過了一個我們已經提到的吓人的決議而已！在這個決議中，他們聲明，克倫斯基政府提高糧食價格是一種“有害的辦法，使糧食工作以及全國經濟生活遭受莫大的打擊”，並且指出，實施這些有害的辦法是公然“違”法的！！

這就是妥協政策的結果，這就是向克倫斯基討好並想對他“寬恕”的政策的结果！

政府違法，它為了討好富人、地主和資本家，採取這種危害全部監督工作、糧食工作和危害整頓極端不穩定的財政工作的辦法，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却還在談論什麼同工商界妥協，繼續同捷列申柯開會商議，寬恕克倫斯基，並且只通過一紙決議表示抗議，但是就是這個決議也被政府若無其事地置之高閣了！！

在這裡可以特別明顯地看到一個真理，就是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背叛了人民和革命，而布爾什維克才是群眾（甚至包括擁護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的群眾）的真正領袖。

这是因为，只有布尔什维克党所领导的无产阶级夺得政权，才能肃清克伦斯基之流所造成的混乱现象，才能恢复被克伦斯基及其政府所破坏的粮食、供给等等的民主组织的工作。

从上述事例中可以极其明显地看出，布尔什维克代表了全体人民的利益，坚决主张做好粮食和供给工作、满足工人和农民最迫切的需要，反对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那种动摇的、不坚决的、真正叛卖性的政策，这种政策已经把国家弄到竟然提高粮食价格这样可耻的地步！

财政破产和挽救的办法

提高粮食的固定价格问题还有另一方面的影响。价格的提高意味着更多地滥发纸币，物价更加高涨，财政更加紊乱，财政破产更加逼近。大家都认为，滥发纸币是一种最坏的强迫性公债，它使工人和贫民的生活状况急剧恶化，它是财政混乱的祸根。

而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所拥护的克伦斯基政府正好采用了这种办法！

要认真克服财政紊乱和不可避免的财政破产，除了用革命手段同资本的利益决裂，组织真正的民主监督，即工人和贫农“从下面”对资本家进行监督之外，也就是除了前面所说的办法之外，别的道路是没有的。

滥发纸币就是鼓励投机，让资本家靠投机而大发横财，并且给急需扩大的生产造成莫大困难，因为原料、机器等等的价格日益昂贵，不停地飞涨。应当采取什么办法来对付富人隐瞒投机得来的财富的行为呢？

可以征收所得税，对巨额收入和最大收入规定很高的累进税率。繼其他帝国主义政府之后，我国政府也实行了这个办法。但是这个办法多半是空洞的和死的条文，因为第一、貨幣贬值愈来愈快，第二、投机获利的机会愈多，商業秘密保守得愈严，隱瞞收入的現象也就愈厉害。

要使税收实际可靠，不致成为空中楼阁，就必须实行实际的而不是紙上的监督。如果监督仍然是官僚式的，那就不可能对資本家实行监督，因为官僚同资产階級有千絲万縷的联系。所以在西歐各帝国主义国家里，不管是君主国也好，共和国也好，整頓財政总是靠实行“劳动义务制”达到的，而实行这种制度就是使工人服軍事苦役或成为軍事奴隶。

反动官僚式的监督是帝国主义国家（民主共和制的法国和美国也不例外）把战争重担推到無产階級和劳动群众身上的唯一手段。

我国政府政策的基本矛盾就在于不得不实行反动官僚式的监督，以免同资产階級鬧翻和破坏同它組成的“联合政府”，同时为了不断欺騙人民，又把这种监督叫做“革命民主的”监督，这样就激起了刚把沙皇制度推翻的群众的憤怒。

其实，只有采取革命民主的办法，把工农被压迫階級，把群众联合在各种团体中，才能对富人实行真正的监督，才能最有效地揭露隱瞞收入的現象。

現在正在大力鼓励用支票流通的办法来防止濫發紙幣。这种办法对于貧民是無所謂的，反正貧民朝不保夕，一星期总要完成一次“經濟周轉”，把賺来的很少几个錢归还給資本家。对于富人，支票流通則有巨大的意义，特別在实行銀行国有化和取消商業秘密

之后,支票流通就能够使国家真正监督资本家的收入,真正抽他们的税,真正把财政体系“民主化”(同时加以整顿)。

但是这里的障碍正是那种害怕侵犯资产阶级特权,害怕破坏同它成立的“联合政府”的畏惧心理。因为不采取真正的革命办法,不使用极严厉的强迫手段,资本家就不会服从任何监督,不会把自己的账目公开,不会把储藏的钞票向民主国家“报账”。

联合在各种团体中的工人和农民,只要把银行收归国有,实行一切富人都必须依法执行的支票流通制,取消商业秘密,规定用没收财产的办法来惩治隐瞒收入的人等等,他们就能很容易地使监督成为真正的和普遍的监督,成为对富人的监督,迫使一切拥有国家纸币的人、一切隐藏国家纸币的人把这些纸币交还国库。

为此就必须有革命无产阶级所领导的民主派的革命专政,就是说,为此民主派就必须成为真正革命的民主派。这就是问题的全部关键。这正是我们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不愿意做的事,他们打着“革命民主”的旗帜来欺骗人民,实际上拥护资产阶级的反动官僚政策,而资产阶级总是以下列原则为指针的:《après nous le déluge》——只要我们安全,哪怕洪水滔天!

我们平常甚至没有感觉到,所谓资产阶级私有制“神圣不可侵犯”这种反民主的习惯和成见是如何深刻地侵蚀了我们的的心灵。当某个工程师或银行家公布工人的收支情况,公布关于工人工资及其劳动生产率的材料时,一般人都认为这是极合理而公道的事情。谁也不认为这是对工人“私人生活”的侵犯,是工程师的“侦探或告密”行为。资产阶级社会把雇佣工人的劳动和工钱看做自己的公开账簿,任何一个资产者都有权随时查看,随时揭露工人如何“奢侈”、如何“懒惰”等等。

可是，如果实行反过来的监督呢？如果职员、办事员、僕役等等的团体应民主国家的邀请来检查资本家的收支情况，公布这些材料，协助政府来揭露隐瞒收入的现象，那又会怎样呢？

那资产阶级就会大嚷大叫地反对“偵探”，反对“告密”了！当“老爷”监督僕役，资本家监督工人时，一般人都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认为劳动者和被剥削者的私人生活并不是不可侵犯的，资产阶级有权要求每个“雇佣奴隶”报账，有权随时公布他的收支情况。但是当被压迫者要监督压迫者，要把他的收支情况弄清楚，要把他的奢侈生活揭露出来时，——哪怕这种奢侈生活在战争期间已经直接引起了前线军队的饥饿和死亡，——呵，那可不行，资产阶级是不容许“偵探”和“告密”的！

问题还是归结于这一点：资产阶级的统治和真正革命的真正民主制度是不可调和的。在20世纪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如果害怕走社会主义道路，那就决不可能成为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

害怕走社会主义道路能不能前进呢？

以上所说的，很容易引起那些受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流行的机会主义思想侵蚀的读者的反驳，说这里论述的办法实质上大多数都不是民主主义的，而已经是社会主义的了！

这种在资产阶级、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报刊上常见的（用这样或那样的形式）流行的反驳，是对落后的资本主义的一种反动的司徒卢威式的辩护。他们说什么我国还没有成熟到实行社会主义的地步，现在“实行”社会主义还太早，我国革命是资产阶级的，所以应该做资产阶级的奴僕（虽然法国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家

在125年以前就对一切压迫者、地主和资本家采取了恐怖手段，而使革命成了伟大的革命！）。

那些替资产阶级效劳的冒牌马克思主义者（社会革命党人也转到那边去了）所以这样议论，是由于不懂得（从他们这种意见的理论基础来看）什么是帝国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垄断，什么是国家，什么是革命民主制。懂得这些东西的人决不会不承认，不走社会主义道路就不能前进。

大家都在谈论帝国主义。但是帝国主义无非是垄断资本主义而已。

俄国的资本主义也成了垄断资本主义，这一点可以由“煤炭公司”、“五金公司”、糖业辛迪加等等充分证明。而糖业辛迪加又明显地表明了垄断资本主义是怎样变成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

什么是国家呢？国家就是统治阶级的组织，例如在德国便是容克和资本家的组织。所以德国的普列汉诺夫分子（谢德曼、连奇等人）称之为“军事社会主义”的东西，实际上就是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说得简明些，就是使工人服军事苦役，使资本家的利润得到军事保护。

如果用革命民主国家，即用采取革命手段破坏一切特权、不怕以革命手段实现最完备的民主制度的国家来代替容克资本家的国家，代替地主资本家的国家，那又会怎样呢？那你就会看到，真正革命民主国家下面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必然会实现社会主义的一个或一些步骤！

资本主义大企业如果成了垄断组织，那就是说，它是在供应全体人民的需要。如果它成了国家垄断组织，那就是说，由国家（在革命民主制的条件下，国家就是人民的首先是工人和农民的武装

組織)來指導全部企業。但是為誰的利益服務呢？

——或者是為地主和資本家的利益服務，那就不是革命民主國家，而是反動官僚國家，是帝國主義共和國；

——或者是為革命民主派的利益服務，那就是實現社會主義的步驟。

因為社會主義無非是從國家資本主義壟斷向前邁進的第一步。換句話說，社會主義無非是變得有利於全體人民的國家資本主義壟斷而已，因而也就不再是資本主義壟斷了。

在這裡，中間道路是沒有的。客觀的發展進程是這樣：不走社會主義道路，就不能從壟斷組織（戰爭使壟斷組織的數目、作用和意義增大了10倍）向前進。

要想做一個真正的革命民主主義者，那就不能害怕走向社會主義的步驟。

要是害怕走向社會主義的步驟，像普列漢諾夫、唐恩、切爾諾夫那樣，借口我國革命是資產階級革命，不能“實行”社會主義等等來非難這些步驟，那就必然會滾到克倫斯基、米留可夫和科爾尼洛夫那邊去，即用反動官僚式的手段來壓制工农群眾的“革命民主”傾向。

中間道路是沒有的。

我國革命的基本矛盾也就在這裡。

在歷史上，特別在戰爭期間，站在原地不動是不可能的。不是前進，就是後退。在20世紀的俄國，在用革命手段取得了共和制和民主制的俄國，不走社會主義道路，不採取實現社會主義的步驟（這些步驟為技術和文化的水平所制約和決定；在農業中“實行”大機器經濟固然不行，在糖業生產中要取消大機器經濟也是不行

的)，要想前进是不可能的。

害怕前进就是后退，而克倫斯基之流先生們在米留可夫和普列汉諾夫之流的欣然贊賞下，在策烈鐵里和切尔諾夫之流的愚蠢帮助下，正是这样做的。

战争异常地加速了垄断資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資本主义轉变的过程，从而使人类异常迅速地接近了社会主义，——这就是历史的辯証法。

帝国主义战争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这不仅因为战争带来的灾难促成了無产阶级的起义（如果社会主义在經濟上尚未成熟，任何起义也創造不出社会主义来），而且因为国家垄断資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的最完备的物質准备，是社会主义的入口，是历史阶梯上的一級，从这一級就上升到叫做社会主义的那一級，沒有任何中間級。

* *
* *

对于社会主义問題，我們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維克是抱着教条主义的态度，即根据他們背得烂熟但不很了解的教条来看待的。他們把社会主义想像成远不可即的模糊的将来。

其实，社会主义現在已經在現代資本主义的一切窗口中出現，在这个最新資本主义的基础上每前进进一步的每一重大措施中，社会主义都直接而实际地显现出来了。

什么是普遍劳动义务制呢？

这就是在最新垄断資本主义基础上的一个前进的步驟，是按照一定的总計劃来調节整个經濟生活的步驟，是节省人民劳动、防止資本主义滥用人民劳动的步驟。

在德國，實行普遍勞動義務制的是容克（地主）和資本家，所以它必然使工人服軍事苦役。

可是這一制度如果由革命民主國家來實行，那末試想想看，會有怎樣的意義呢？由工兵農代表蘇維埃實行、調整、指導的普遍勞動義務制，雖然還不是社會主義，但是已經不是資本主義了。這是走向社會主義的一個巨大步驟，在完全民主制存在的條件下，除非對群眾施加空前未有的暴力手段，決不可能從這樣的步驟退到資本主義去。

消除經濟破壞和戰爭問題

既然談到戰勝已經臨頭的災難的辦法問題，我們就得說明一下另外一個極重要的問題，就是對內政策和對外政策的聯繫問題，換句話說，就是帝國主義的侵略戰爭和無產階級的革命戰爭之間、罪惡的掠奪戰爭和正義的民主戰爭之間的相互關係問題。

上面已經指出，我們所闡述的一切戰勝災難的辦法，會大大加強國防能力，換句話說，會加強國家的軍事實力，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如果不把侵略戰爭變為正義戰爭，不把資本家為了本身利益而進行的戰爭變為無產階級為了一切被剝削勞動者的利益而進行的戰爭，那末這些辦法就不能實現。

事實上，把銀行和辛迪加收歸國有，同時取消商業秘密和實行工人對資本家的監督，不僅可以大大節省人民的勞動，可以節省人力和物力，而且會使勞動群眾即大多數人民的生活狀況得到改善。大家知道，在現代戰爭中，經濟組織是有決定意義的。在俄國，糧食、煤、石油、鐵都很充足，在這方面，我國的狀況比歐洲任何

一个交战国都要好些。如果用上述办法消除经济破坏，鼓励群众自动参加这个斗争，改善群众的生活状况，实行银行国有和辛迪加国有，俄国就能利用自己的革命和自己的民主制度把整个国家在经济组织方面提到高得无比的程度。

假如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不同那些阻挠一切监督办法、对生产怠工的资产阶级成立“联合政府”，而在4月间就使政权转归苏维埃，并且不把自己的力量用在玩弄“倒阁组阁”的把戏上，用在争取同立宪民主党人一起盘踞在部长次长等等官位上，而是把力量用来领导工农实行他们对资本家的监督，领导工农进行反对资本家的战争，那末俄国现在就会成为一个在经济上经过了彻底改造的国家，土地已归农民，银行已归国有，也就是说，在这些方面（而这是现代生活极其重要的经济基础）会比所有其他的资本主义国家都高出一头。

实现了银行国有化的国家的防御能力即军事实力，一定比银行留在私人手里的国家要强。土地已归农民委员会所有的农民国家的军事实力，一定比土地仍归地主所有的国家要强。

人们常常援引法国人在1792—1793年所表现的英勇爱国精神和军事义勇奇迹。但是，他们常常忘记了当时唯一可能造成这种奇迹的物质条件和历史、经济条件。用真正革命的手段摧毁过时的封建制度，使全国过渡到更高的生产方式，过渡到自由的农民土地占有制，并且以真正革命民主主义的速度、果断手段、毅力和忘我的精神来实现这种过渡，——这就是那些用“神奇的”速度挽救了法国，把它的经济基础加以改造、加以革新的物质经济条件。

法国的例子告诉我们的唯一的一点就是：要使俄国成为具有

防禦能力的國家，要使俄國也出現群眾性的英勇“奇蹟”，就必須用“雅各賓式的”無情手段來掃除一切舊的東西，在經濟上革新俄國。

庸俗水平)。决定战争的性质的的是战争所继续的是 什么政策(“战争是政策的继续”),战争是由 哪一个阶级 进行的,是为了什么目的进行的。

引导群众去参加履行秘密条约的掠夺战争,还指望群众表现热情,这是不可能的。革命俄国的先进阶级即无产阶级日益清楚地觉悟到战争的罪恶性质,资产阶级不仅不能打破群众的这种信念,群众对战争罪恶性质的认识反而日益提高了。俄国两个首都的无产阶级已经完全成为国际主义的无产阶级了!

这里怎么谈得上群众拥护战争的热情呢!

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是彼此紧密联系着的。没有人民在进行伟大的经济改造中所表现的大无畏精神,就不能使国家成为具有防御能力的国家。而不同帝国主义断绝关系,不向各国人民建议缔结民主的和约,不这样来把侵略的、掠夺的、罪恶的战争变为正义的、自卫的、革命的战争,就不能唤起群众的英勇精神。

只有在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上都始终不渝地同资本家断绝关系,才能挽救我们的革命,挽救我们这个被帝国主义的铁钳钳制着的国家。

革命民主派和革命无产阶级

现代俄国的民主派要想成为真正的革命民主派,就应当同无产阶级结成最密切的联盟,支持这个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所进行的斗争。

分析了同规模空前的不可避免的灾难作斗争的方法问题之后,所得出的结论就是这样。

战争造成了如此重大的危机，使人民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达到如此紧张的地步，使全部现代社会组织受到如此严重的打击，因此人类必须抉择：或是灭亡，或是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最革命的阶级，以便最迅速最急进地过渡到更高的生产方式。

由于许多历史原因（俄国比其他国家落后得多，战争带给它的困难特别大，沙皇制度腐朽透顶，人们还继承着 1905 年的传统），使得俄国的革命比其他国家先爆发。革命所已经做到的，是俄国按其政治制度来说，在几个月以内就赶上先进国家了。

但是这还不够。战争是铁面无情的，它斩钉截铁地提出问题：或是灭亡，或是在经济方面也赶上并且超过先进国家。

这是可能的，因为在我們面前摆着许多先进国家的现成经验以及它们在技术和文化方面的现成成就。同时，欧洲的反战浪潮日益高涨，全世界的工人革命日益发展，也给了我们精神上的支持。在帝国主义战争时期很少见到的革命民主自由激励着我们，鞭策着我们。

或是灭亡，或是开足马力奋勇前进。历史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

在这样的时刻，无产阶级对农民的态度证明（在形式上有相应的改变）布尔什维克所采取的这个老原则是正确的，即必须使农民摆脱资产阶级的影响。只有这样才能挽救革命。

农民在整个小资产阶级群众中间是人数最多的。

我们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起了反动的作用，他们任凭农民受资产阶级的影响，引导农民去同资产阶级联合，而不是去同无产阶级联合。

革命的經驗迅速地教育了群众。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的

反动政策正在破产；他們已在两个首都的苏維埃中遭到失敗⁸⁹。在这两个小資產階級民主党的内部都有“左”的反对派在成长。1917年9月10日在彼得格勒举行的社会革命党市代表會議上，趋向于同無产階級联合而拒絕同資產階級联合（建立联合政府）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占三分之二的多数。

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維克在重复資產階級所喜爱的把資產階級与民主派对立起来的論調。这是毫無意义的，实际上正好像把尺与斗拿来对比一样。

有民主派的資產階級，也有資產階級的民主派，只有絲毫不懂历史和政治經濟学的十足蠢才才会否認这一点。

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維克之所以要如此荒謬地把它們对立起来，是为了掩盖一个無可爭辯的事实，那就是在資產階級和無产階級之間还有一个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由于它的階級的經濟地位，必然会在資產階級和無产階級之間搖擺不定。

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維克把小資產階級拉去同資產階級結成联盟。他們整个“联盟”的实質、整个联合內閣以及典型的半立宪民主党人克倫斯基的全部政策的实質就在这里。在这半年的革命中，这个政策已遭到了徹底的破产。

立宪民主党人幸灾乐祸地說：革命遭到了破产，革命既沒有消除战争，也沒有消除經濟破坏。

这是撒謊。遭到破产的是立宪民主党人与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維克，因为这个联盟統治了俄国半年，在这半年中，經濟破坏加深了，战争局面弄得更加混乱、更加困难了。

資產階級同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維克的联盟破产愈徹底，人民也就学会得愈迅速。人民也就会更容易地找到正确的出路，

那就是：貧苦农民即大多数农民同無产階級結成联盟。

1917年9月10—14日

1917年10月底由“波濤”出版社
出版单行本

按手稿刊印

革命的一个根本問題

毫無疑問，任何一个革命的最主要的問題都是国家政权問題。政权在哪一个階級手里，这一点决定一切。俄国主要执政党的報紙“人民事業報”最近(第 147 号)埋怨大家爭論政权問題而忘了立宪會議和糧食問題，我們要回答社会革命党人說：你們还是埋怨自己吧。要知道，“更換閣員的把戏”耍个不休，召开立宪會議的日期無限期地拖延下去，資本家对通过的和拟定的关于糧食垄断和保證国家糧食供应的措施加以破坏，这一切主要应当怪 你們 党的动摇和犹豫。

政权問題是不能迴避、不能撇开不管的，因为这是一个根本問題，它决定着革命的發展和革命对内对外政策中的一切問題。我国的革命在政权結構問題上搖擺不定，“白費了”半年的时间，这是無可爭辯的事实，这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維克的动摇政策所造成的。而这两个党派的政策，归根到底又是由于小資產階級的階級地位和小資產階級在資本同劳动的斗争中經濟地位不穩定所决定的。

現在全部問題就在于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在这内容异常丰富的伟大的半年里，是不是学到了一点东西。如果没有，那革命就会失败，只有無产階級举行胜利的起义，才能挽救革命。如果学到了一点东西，就应当立即开始建立稳固的不动摇的政权。在大多数工

农群众已經覺醒的人民革命时代，只有毫不猶豫地依靠 大多数 人民，才能成为穩固的政权。直到今天，俄国的国家政权 实际上还是在 資产階級 手里，資产階級只不过是迫不得已才作了个别的讓步（第二天就想收回），才到处許下諾言（只說不做），才千方百計地掩飾自己的統治（用表面上的“真誠地建立联合政府”来欺騙人民）等等。口头上是人民的、民主的、革命的政府，而实际上是反人民、反民主、反革命的資产階級政府，这就是至今还存在的矛盾，这就是政权之所以極不穩固和搖擺不定的根源，这就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維克先生們之所以怀着那么可悲的（对人民來說）热心来干整套“更換閣員的把戏”的根源。

或者是解散苏維埃，讓它不光榮地灭亡；或者是全部政权归苏維埃。这是 1917 年 6 月初我在全俄苏維埃代表大会[⊖]上講的，7 月和 8 月的历史十分令人信服地証明了这些話是正确的。不管資产階級的奴才波特列索夫、普列汉諾夫等怎样造謠撒謊，把政权实际上落到人民中占極少数的資产階級剝削者手中說成政权“基础的扩大”，苏維埃政权还是唯一可能成为真正依靠大多数人民的穩固的政权。

只有苏維埃政权才能是穩固的政权，才是在最猛烈的革命風暴中也不会被推翻的政权，只有这个政权能保証革命不断地广泛地發展，保証苏維埃內部党派之間进行和平的斗争。不建立这个政权，就必然会产生猶豫、动蕩和搖擺，就会不断發生“政权危机”和更換閣員的滑稽剧，就会忽而从左面、忽而从右面發生冲突。

但是，人們对“政权归苏維埃”的口号的了解，經常甚至大部分

⊖ 見本卷第 1—3 頁。——編者注

是完全不正确的，他們認為这就是“由苏維埃的大多数政党組成內閣”。关于这个十分錯誤的意見，我們想詳細地談一談。

“由苏維埃的大多数政党組成內閣”，就是只更換部長的人选，而整个旧的政府权力机关，官僚气十足的、沒有一点民主气的、甚至連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維克的綱領中的那些重大改革也不能实行的机关，却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了。

“政权归苏維埃”，就是对整个旧的国家机关，对这种阻挠一切民主措施的官僚机关，来一个根本的改造，取消这种机关，代之以新的、人民的机关，即真正民主的苏維埃机关，即有組織的、武装起来的大多数人民、工人、士兵、农民的机关，使大多数人民不但在选举代表上，而且在管理国家、实现改革和改造上，能够發揮創造性和主动性。

为了更清楚更明白地了解这种差别，我們可以回忆一下执政党社会革命党的报纸“人民事業报”不久以前的一个宝贵的自供。这个报纸写道：即使在交給社会主义部长管理的那些部里（这是在孟什維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当了部长，同立宪民主党人成立了臭名远揚的联合政府以后写的），整个管理机构也还是旧的，它阻挠着整个工作的进行。

这是很自然的。资产階級議會制的国家的全部历史表明，资产階級立宪国家的历史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表明，更換部长的意义是非常小的，因为实际的管理工作掌握在一支庞大的官吏队伍手中。这支官吏队伍浸透了反民主的意識，同地主和资产階級有千絲万縷的联系，在各方面都依賴他們。这支队伍的周围完全是资产階級的气氛，他們呼吸着这种空气，他們停滯了，硬化了，僵化了，摆脱不了这种空气，他們的思想、感情、行为不能不是老样子的。

对上司畢恭畢敬的習气和“国家”职务的某些特权把他們拴住了，通过股票和銀行，这支队伍的上層分子完全成了财政资本的奴才，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它的代理人，它的利益的代表者和影响的传播者。

企圖通过这种国家机构来实行無償地废除地主土地私有制或粮食垄断制等等改革，只能是最天真的幻想，最荒謬的自欺欺人之談。这种机构能够为共和派資產階級服务，建立起像法兰西第三共和国那样的“沒有君主的君主制”共和国，但是，要对資本的权利和“神聖的私有制”的权利实行一种并不是消灭而只是严重地削減或限制的改革，这种国家机构是絕對办不到的。因此，結果往往总是这样：無論在哪一种有“社会主义者”参加的“联合”內閣里，哪怕其中个别的人的确是十分真誠的，这些社会主义者实际上都是資產階級政府的裝飾品和屏風，是这个政府躲避人民憤怒的避雷針，是这个政府欺騙群众的工具。1848年的路易·勃朗是这样，后来英国法国的社会主义者几十次参加內閣也是这样，1917年切尔諾夫和策烈铁里之流参加內閣也是这样。只要資產階級制度存在，只要旧的、資產階級的、官僚的国家机构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过去是这样，将来还是这样。

工兵农代表苏維埃之所以特別可貴，就是因为它是一个無比高級的、無比民主的国家机构的新类型。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維克干尽了种种可能的和不可能的事情，总想把苏維埃（特别是彼得堡苏維埃和全俄苏維埃即中央执行委员会）变成一个清談館，在“監督”的名义下通过一些軟弱無力的決議和建議，而政府只是笑容可掬地把它們擱置起来。但是，只要吹来一陣科尔尼洛夫叛乱的“清風”，預告大風暴即将来临，苏維埃里的一切沉悶空气就会暫

时吹散，革命群众的創造性就会开始表现出来，成为一种伟大、雄壮而不可战胜的力量。

讓所有信念不坚定的人学习这个历史实例吧！讓那些說“我們沒有机构来代替这个必然傾向于维护资产阶级的旧机关”的人感到羞耻吧。因为这种机构有，这就是苏維埃。不要害怕群众的創造性和主动性，要相信群众的革命組織，那你們就一定會在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看到工人和农民联合起来奋勇打击科尔尼洛夫匪帮时所表現的那种力量和那种伟大而不可战胜的精神。

不相信群众，怕他們發揮創造性，怕他們發揮主动性，在他們的革命毅力面前發抖，而不能全心全意从各方面去支持他們，这就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維克的領袖們最严重的罪过，他們之所以动搖犹豫，無休止而又毫無成效地企圖在旧的国家官僚机构的旧皮袋里装新酒，其最深的根源之一，就在这里。

拿 1917 年俄国革命中軍隊的民主化、切尔諾夫当部长、帕尔欽斯基的“統治”、彼舍霍諾夫的去职等等事实来看，处处都最清楚不过地証實了上面的話。不完全信任士兵选举出来的組織，不絕對地实行士兵选举长官的原則，結果就是科尔尼洛夫分子、卡列金分子和反革命軍官指揮軍隊。这是事实。只要不是故意閉起眼睛，就不会看不見：在科尔尼洛夫叛乱以后，克倫斯基政府还是讓一切照旧，实际上是讓科尔尼洛夫匪帮恢复起来。任命阿列克謝也夫，同克列姆博夫斯基、加加林、巴格拉齐昂之流和其他科尔尼洛夫分子“和解”，对待科尔尼洛夫分子和卡列金分子的态度軟弱，这一切最清楚不过地表明克倫斯基实际上是要讓科尔尼洛夫匪帮恢复起来。

中間路綫是沒有的。經驗也証明中間路綫是不存在的。不是

全部政权归苏維埃，軍隊完全民主化，就是科尔尼洛夫的叛乱。

切尔諾夫当部长的情况怎样呢？难道不是証明每一个比較重大的真正滿足农民需要的措施，每一个足以証明相信农民，相信他們本身的群众組織和行動的措施，都激起了全体农民的滿腔热情？可是切尔諾夫却去同立宪民主党人、同官吏們“講价錢”，講來講去差不多有4个月，他們無限期地拖延，想尽各种办法进行陷害，逼得切尔諾夫最后只好下台，什么事也沒干成。地主和資本家“贏得了”这4个月的时间，在这4个月里他們保衛了地主的土地所有制，拖延了立宪會議的召开，甚至对土地委员会开始了一連串的鎮压。

中間路綫是沒有的，經驗也証明中間路綫是不存在的。或者是中央和地方的全部政权归苏維埃，全部土地在立宪會議作出决定之前立即交給农民；或者是地主資本家阻撓一切，恢复地主权力，使农民十分憤怒，起来举行一系列暴風雨般的起义。

对生产进行比較严格的监督被資本家破坏（在帕尔欽斯基的帮助下），粮食垄断被商人破坏，对粮食和产品的分配进行民主調整的原則被彼舍霍諾夫破坏，——这些情况也都証明了这一点。

俄国今天的问题，决不是發明什么“新的改革”，搞什么“包罗万象”的改造“計劃”。根本不是这样。只有那些高喊反对“实行社会主义”，反对“無产階級专政”的資本家、波特列索夫分子、普列汉諾夫分子，才会把問題說成这样，才会这样明目张胆地撒謊。实际上，俄国的情况是战争带来了空前的痛苦和灾难，带来了空前的極其严重的經濟破坏和飢荒，这一切情况本身就暗示了出路，指出了出路，而且已經提出了一些刻不容緩的改革和改造办法：实行粮食垄断，监督生产和分配，限制紙幣的發行，实行粮食和商品的正常

交换等等。

这一类措施，这方面的措施，大家都公認是一定要实行的，而且已經在許多地方、在各个方面开始实行了。已經开始实行，但是到处遇到地主和資本家的抵抗，并且通过克倫斯基政府（实际上它完全是資產階級的、拿破侖式的政府），通过旧国家的官僚机关，通过俄国的和“联合的”財政資本直接和間接的压力进行抵抗。

不久以前，伊·普里列扎也夫在“人民事業报”（第 147 号）上写了一篇文章，为彼舍霍諾夫的去职，为固定价格和粮食垄断的破产而痛哭：

“勇气和决心，这就是我們历届政府所缺乏的东西…… 革命民主派不应当等待，而应当表现出主动的精神，有计划地干預經濟混乱的現象…… 如果問哪里需要坚定的方針和坚决的政权，那就正是这里。”

真理总是真理。真是字字珠璣。只是作者沒有想一想，坚定的方針、勇气和决心不是个人的問題，而是能够表现勇气和决心的那个階級的問題，这样的階級只有一个，就是無产階級。政权的勇气和决心，政权的坚定方針，不是别的，而是無产階級和貧苦农民的专政。伊·普里列扎也夫自己看不到这一点，只是对这个专政唉声嘆气。

这种专政实际上是什么呢？不是别的，就是粉碎科尔尼洛夫分子的反抗，恢复和完成軍队的徹底民主化。这种专政建立两天以后就会得到百分之九十九的軍队的热烈拥护。这个专政会把土地交給农民，把全部权力交給当地的农民委员会。如果不是發疯，怎么会对农民支持这个专政發生怀疑呢？彼舍霍諾夫所只能許諾的东西（“資本家的反抗已經打垮了”——这完全是彼舍霍諾夫在苏維埃代表大会上所作的那篇著名演說中講的話），这个专政将付

諸實現，使之變成現實，對於已經開始建立的管理糧食和進行監督等等的民主機構，不但不取消，而且要加以支持，促進其發展，消除其工作中的一切障礙。

只有無產者和貧苦農民的專政才能打垮資本家的反抗，才能表現出一個政權的真正偉大的勇氣和決心，才能保證自己在軍隊和農民中得到群眾熱烈的、奮不顧身的和真正英勇的支持。

只有政權歸蘇維埃才能使革命逐步地、和平地、平穩地發展，才能使革命的發展同大多數人民群眾的認識、決心和他們的親身經驗完全適應。政權歸蘇維埃，就是把管理國家和監督國家經濟的事情完全交給工人和農民，誰也不敢反抗他們，他們很快就會從經驗中，從自己親身的實踐中，學會正確地分配土地、產品和糧食。

載於1917年9月27日（14日）

“工人之路報”第10號

署名：尼·列寧

按“工人之路報”原文刊印

怎样保証立宪會議的成功

(关于出版自由)

4月初，我在表明布尔什維克对要不要召开立宪會議这个问题的态度时写道：

“应当召开，而且要快些召开。但是保証它召开并且开得成功的条件只有一个：增加工兵农等代表苏維埃的数目，加强它們的力量；組織和武装工人群众。这就是唯一的保証。”（“俄国的政党和無产阶级的任务”，“生活和知識”出版社普及丛书第3册第9頁及第29頁）^①

从那时起已經过去5个月了，由于立宪民主党人的过錯，會議一再延期召开，这就証明了这些話是正确的。此外，科尔尼洛夫叛乱也有力地証明了这些話是正确的。

現在，由于民主會議就要在9月12日召开，我想談談問題的另一方面。

孟什維克的“工人报”和“人民事業报”对于在农民中进行的鼓动工作太少、在俄国人民的这批真正群众即俄国人民的真正大多数中进行的教育工作太少表示遺憾。大家都意識到而且都承認，立宪會議的成功与否取决于对农民的教育，但是这方面的工作做得

^① 見“列宁全集”1957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4卷第74—75頁。——譯者注

太少，簡直少得可笑。虛偽透頂的、反革命資產階級的和“黃色的”報刊每天在欺騙、愚弄和吓唬農民，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的報刊（更不用說布爾什維克的報刊）根本就無法同它們對抗。

為什麼會這樣的呢？

這正是因為執政的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黨軟弱無能，不果斷，無所作為；這正是因為他們不同意蘇維埃奪取全部政權，讓農民仍然處於愚昧無知的狀態下無人過問，聽任農民受資本家和他們的報刊、他們的鼓動的“擺布”。

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把我國革命吹噓得了不得，忽左忽右地大發其“革命民主主義”的豪言壯語，實際上却使俄國局限於最普通的最典型的小資產階級革命的範圍內，這種革命除了推翻沙皇之外，並不改變任何東西，也不對農民進行政治教育，一點不觸動農民的愚昧無知這個最後的（也是最強有力的）堡壘——人民的剝削者和壓迫者的堡壘。

現在正是應該提到這一點的時候。現在，在民主會議召開以前，在到“預定”召開（還可以再延期）立憲會議的日期還有兩個月的時候，正應該指出，如果……如果我們的帶引號的“革命民主派”成了真正革命的即能夠真正採取革命行動的民主派，成了重視大多數人民的意志和利益而不考慮繼續掌握政權（克倫斯基政府）的少數資本家的意志和利益的民主派，那末問題就很容易解決，在農民的政治教育方面就可以做許多工作，可是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總是想同這些資本家“妥協”，不是直接就是間接、不是通過舊方式就是通過新方式同他們“妥協”。

資本家（許多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因無知或守舊而追隨他們）把取消書報檢查和各黨派可以自由出版任何報紙叫做“出版

自由”。

实际上这并不是出版自由，而是资产阶级富翁欺騙被压迫被剝削人民群众的自由。

实际上就是这样。就拿彼得堡和莫斯科的报纸来说，你立刻可以看出，资产阶级的报纸，如“言论报”、“交易所报”、“新时报”、“俄罗斯语言报”⁹⁰ 等等等等（这类报纸很多），在发行额上占很大的优势。这种优势是建筑在什么基础上的呢？决不是建筑在大多数人的意志上的，因为选举表明两个首都的大多数人（而且是絕大多数人）是站在民主派即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这方面的。这三个党所获得的票数占全部票数的四分之三到五分之四，而他們出版的报纸的份数大概还没有所有资产阶级报刊（我們现在知道而且看到，这些报刊直接或間接为科尔尼洛夫叛乱辯护）的四分之一甚至五分之一。

为什么会这样呢？

大家都很清楚这是为什么。因为出版报纸是一种有利可圖的资本主义大企业，富人把几百万几百万卢布投入这种企业。资产阶级社会的“出版自由”就是富人每天发行数百万份报纸来有系統地不断地欺騙、腐蝕和愚弄穷人——被剝削被压迫的人民群众。

这就是大家都看到、都認識到的那个简单的、显而易見的、众所周知的事实，但也是“几乎所有的人”都“羞羞答答地”不談或胆怯地迴避的事实。

现在要問：可不可以同这种令人气愤的罪恶现象作斗争，怎样同它作斗争呢？

首先要有一个最简单、最有效、最合理的办法，这个办法我在“真理报”上早已指出过，现在，在9月12日就要到来的时候提到

这个办法是特別适宜的，而且工人應該經常記住这个办法，因為他們在夺取政权时不用这个办法恐怕是不行的。⊖

这个办法就是对报纸上的广告实行国家垄断。

只要你翻一翻“俄罗斯語言报”、“新时报”、“交易所报”、“言論报”等等，你就可以看到大量的广告，这些广告給出版这些报纸的資本家带来一笔巨大的甚至是主要的收入。世界上所有资产阶级报纸就是这样經營，这样發財，这样毒害人民的。

在欧洲，有些报纸的發行額达到本城居民人数的三分之一（例如，居民 40 000 人，發行額 12 000 份），这些报纸虽然免費送到每一家，但是它們的出版者还能得到一笔很可观的收入。这些报纸都是靠登广告的收入过活的，而报纸免費送到每一家則保證了这些广告得到广泛的传播。

試問，为什么自称为革命民主派的民主派不能实行报上广告由国家垄断的办法呢？为什么不能宣布只能在省苏維埃和市苏維埃出版的报纸以及彼得格勒中央苏維埃的全国范围的报纸上登广告，而不准在其他任何报上登广告呢？为什么“革命”民主派要容忍那些拥护科尔尼洛夫并且散布謠言誣蔑苏維埃的富人靠登广告来賺錢呢？

这种办法無疑是公平的。它对登广告的人有很大的益处，也对全体人民特別是最受压迫和最愚昧的农民有很大的益处，这样他們花不了几个錢或不用花錢就能拿到附有农民专刊的苏維埃报纸。

为什么不实行这种办法呢？只是因为資本家老爷們的私有制

⊖ 見本卷第 82—83 頁。——編者注

和继承权(登广告所得的收入私有制和继承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自称为 20 世纪的革命民主派的人难道在第二次俄国革命中可以承认这种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吗?!

有人会說:但是这就破坏了出版自由。

不对。这会恢复和扩大出版自由。因为出版自由就是全体公民可以自由发表一切意见。

可是现在怎样呢? 现在只有富人以及大党才有这种垄断权。其实如果能够出版可以登各种广告和声明的大型苏维埃报纸,就完全能够保证更多的公民发表自己的意见,譬如也可以征求一定数量的人签名共同发表意见。经过这样的改革以后,出版自由实际上就会变得更加民主,更加完备。

但是有人会說:到哪儿去找印刷所和纸张呢?

原来如此!!! 问题不在于“出版自由”,而在于剥削者占有印刷所和纸张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所有权!!!

为什么我们工人和农民要承认这种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呢? 这种公布不真实的消息的“权利”比占有农奴的“权利”好在什么地方呢?

为什么在战争期间可以到处征用房屋、住宅、马车、马匹、粮食、五金等等,而印刷所和纸张就不能征用呢?

不,把这种办法說成是不公正的或者是难以实现的只能暂时欺骗工人和农民,但真理是一定会战胜的。

苏维埃形式的国家政权要把所有的印刷所和所有的纸张拿来公平地分配;首先是给国家,这是为了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大多数穷人的利益,特别是世世代代受地主和资本家折磨、压抑和愚弄的大多数农民的利益。

第二是給在两个首都获得 10—20 万选票的大党。

第三是給比較小的党以及任何一个有一定数量的成員或有某些人签名的公民团体。

只有这样分配紙張和印刷所才是公平的；在苏維埃掌握政权的条件下实行这种分配是毫無困难的。

只有这样，我們才能在立宪會議召开前两个月真正帮助农民，保証把每个大党的为数几百万册的十来种小册子（或者是几号报纸，或者是特刊）送到每一个农村去。

这就是在立宪會議选举前要做的“革命民主主义的”准备，这就是先进工人和士兵对农村的帮助，这就是国家为了教育人民而不是愚弄和欺騙人民所給予的帮助，这就是赋予所有的人而不是赋予富人的真正的出版自由，这就是同迫使我们容忍富人霸占宣传和教育农民的伟大事業的可詛咒和受奴役的过去实行决裂。

載于1917年9月28日(15日)

“工人之路报”第11号

署名：尼·列宁

按“工人之路报”原文刊印

国家与革命

(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說与
無产階級在革命中的任务)⁹¹

初版序言

国家問題，現在無論在理論方面或在政治实践方面，都具有特別重大的意义。帝国主义战争大大加速和加剧了垄断資本主义变为国家垄断資本主义的过程。国家同拥有無限权力的資本家集团日益密切地溶合在一起，它对劳动群众的残酷压迫，愈来愈駭人听闻了。各先进国家(我們在这里是指这些国家的“后方”而言)已經变成了囚禁工人的軍事苦工監獄。

連綿不断的战争造成的空前慘剧和灾难，使群众生活困苦不堪，使他們更加义憤填膺。国际無产階級革命正在显著地發展，这个革命对国家所抱的态度，已經成为具有实际意义的问题了。

在几十年較為和平的發展中积聚起来的机会主义成分，使得社会沙文主义流派在世界各个正式社会主义政党内取得了統治地位。这个流派(在俄国有普列汉諾夫、波特列索夫、布列什柯夫斯卡婭、魯巴諾維奇以及不太露骨的策烈鉄里先生、切尔諾夫先生之流；在德国有謝德曼、列金、大衛等；在法国和比利时有列諾得尔、盖德、王德威尔得；在英国有海德門和費边社分子⁹²等等)口头上是社会主义，实际上是沙文主义。这些“社会主义的領袖”的特长是卑躬屈

膝地維護“本國”民族資產階級的利益，也就是維護“自己”國家的利益，因為大多數所謂大國早就在剝削和奴役很多弱小民族，帝國主義戰爭也正是為了瓜分和重分這些贓物而進行的戰爭。如果不在“國家”問題上反對機會主義偏見，就不能展開鬥爭，不能使勞動群眾擺脫資產階級的影響，特別是擺脫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影響。

首先，我們來考察一下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國家學說，特別詳細地談談這個學說被人遺忘或遭到機會主義者歪曲的各個方面。其次，我們要專門分析一下歪曲這個學說的主要代表人物，即在這次戰爭中可耻地遭到徹底破產的第二國際（1889—1914年）最著名的領袖考茨基。最後，我們要給俄國1905年革命，特別是1917年革命的經驗，做一個基本的總結。後面這次革命的第一個階段現在（1917年8月初）大概正在結束，但整個這次革命只能認為是帝國主義戰爭引起的社會主義無產階級革命的鏈條中的一個環節。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對國家的態度問題向群眾說明，為了使自己從資本的枷鎖下解放出來，他們在最近的將來應當做些什麼。因此這個問題不僅具有實際的政治意義，而且具有最迫切的意義。

作 者

1917年8月

再 版 序 言

本書再版時幾乎沒有變動，僅在第二章中增加了第三節。

· 作 者

1918年12月17日於莫斯科

第一章

階級社会和国家

1. 国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产物

馬克思的學說在今天的遭遇，正如历史上各被压迫階級解放斗争中的革命思想家和領袖的學說的遭遇一样。当伟大的革命家在世时，压迫階級总是不断迫害他們，以最恶毒的敌意、最疯狂的仇恨、最放肆的誹謗对待他們的學說。在他們逝世以后，便企圖把他們变为無害的神像，即所謂把他們偶像化，赋予他們的名字某种荣誉，以便“安慰”和愚弄被压迫階級，同时却閹割革命學說的内容，磨灭它的革命鋒芒，把它庸俗化。現在資產階級和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者对馬克思主义作的这种“修改”是一致的。他們遺忘、抹杀和歪曲这个學說的革命方面和革命精神，把資產階級可以接受或者似乎可以接受的东西放在第一位来加以頌揚。現在，一切社会沙文主义者都成了“馬克思主义者”（請不要笑！）。那些德国的資產階級学者，昨天还是摧殘馬克思主义的专家，現在却愈来愈頻繁地談論起“德意志民族的”馬克思来了，仿佛馬克思培育極有組織的工人协会是为了进行掠夺战争！

在这种情况下，在歪曲馬克思主义的風气空前流行的时候，我們的任务首先就是要恢复馬克思关于国家的真正學說。为此，必須引証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的許多話。当然，很多的引証会使文章冗长，不通俗，但是沒有这样的引証是絕對不行的。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所有論到国家問題的地方，至少一切有决定意义的

地方，我們要尽可能完整地加以引証，一方面使讀者对科学社会主义創始人的整个观点以及这些观点的發展有一个独立的概念，同时也可以确鑿地証实并指明現在占統治地位的“考茨基主义”对这些观点的歪曲。

我們現在先从传播最广的恩格斯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書講起，这本书于1894年在斯圖加特印行了第六版。我們必須根据德文原著譯出一段引文，該書俄文譯本虽然很多，但多半譯得不完全，或者譯得很糟。

恩格斯在总结他所做的历史分析时說：“国家决不是从外面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国家也不像黑格尔所断言的是‘道德观念的現实’或‘理性的形象和現实’。国家是社会發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国家是社会陷入自身不可解决的矛盾的表现，是社会分裂为不可調和的对立面而又無力摆脱这种对立状况的表现。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經濟利益彼此冲突的階級不致在無謂的斗争中互相消灭，使社会同归于尽，于是，一种似乎駕于社会之上的力量，似乎可以緩和冲突、使它不致破坏‘秩序’的力量，就成为必要了。这个从社会中产生、駕于社会之上并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德文第六版第177—178頁）⁹³

这一段話已經十分清楚地表明了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历史作用及其意义的基本思想。国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产物和表现。在階級矛盾客觀上达到不能調和的地方、时候和程度，便产生国家。反过來說，国家的存在表明階級矛盾的不可調和。

正是在这个最重要的根本問題上，人們从两个主要方面来歪曲馬克思主义。

一方面，资产阶级的思想家，特别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迫于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而不得不承认，只有在有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地方才有国家，但他们又来“改正”马克思，说国家是阶级调和的机关。在马克思看来，如果阶级调和是可能的话，国家就不会产生，也不会保持下去。在市僧的庸俗的教授和政论家们（他们往往善意地引用马克思的言论！）看来，国家正是用来调和阶级的。在马克思看来，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是建立一种“秩序”，来使这种压迫合法化、固定化，使阶级冲突得到缓和。在小资产阶级政治家看来，秩序正是阶级调和，而不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缓和冲突就是调和，而不是剥夺被压迫阶级用来推翻压迫者的一定的斗争工具和手段。

例如，在1917年革命的时候，对国家的意义和作用的想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需要在实践中立刻行动，而且是大规模行动的问题，全体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在这个问题上一下子就完全滚到“国家”“调和”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理论方面去了。这两个政党的无数决议和他们的政治家的许多论文，都浸透了这种市僧的庸俗的“调和”论。国家是一定阶级的统治机关，这个阶级决不能与同它对立的一方（同它对抗的阶级）调和，这一点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始终不能了解的。在对待国家的态度问题上，再明显不过地表明我国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根本不是社会主义者（我们布尔什维克向来就这样说），而是唱准社会主义高调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

另一方面，“考茨基主义”歪曲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就巧妙得多了。“在理论上”，它不否认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也不否认阶级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但是，它忽视或抹杀了以下一点：既然国家是

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既然它是駕于社會之上并“日益同社會脫離”的力量，那末很明显，被壓迫階級的解放，不僅非進行暴力革命不可，而且非消滅統治階級建立的、體現這種“脫離”的國家政權機關不可。這個結論在理論上是不言而喻的，下面我們會看到，這是馬克思對革命的任務做了具體的歷史分析後得出的絕對肯定的結論。正是這個結論（我們在下面還要詳細說明）竟被考茨基……“遺忘”和歪曲了。

2. 特別的武裝隊伍，監獄等等

恩格斯又說，……“國家同舊的氏族（或宗族）組織不同的第一個特征，就是它按地域來劃分它統治下的國民”……

我們現在看來，這種劃分是“很自然的”，但這是同宗族或氏族的舊組織進行長期鬥爭才獲得的。

……“第二個特征，就是社會權力的建立，這個權力已經不是自己組織成武裝力量的居民了。這個特別的社會權力之所以需要，是因為自從社會分裂成階級以後，已經不可能有居民自動組成的武裝了…… 這個社會權力在每一個國家里都存在。構成這個權力的不僅有武裝隊伍，還有監獄、各種強制機關等物質附屬機構，這些東西都是以前氏族社會制度所沒有的”……

恩格斯在這裡闡明了由社會中產生而駕于社會之上并日益同社會脫離的國家這個力量的概念。這個力量主要是指什麼呢？主要是指擁有監獄等等的特別武裝隊伍。

應該說這是特別的武裝隊伍，因為任何國家所具有的社會權力已經不是武裝的居民，不是居民“自動組成的武裝”了。

同一切伟大的革命思想家一样，恩格斯竭力促使觉悟工人注意的，正是盛行的庸俗观念认为最不值得注意、最习以为常，而被根深蒂固的、可说是顽固不化的偏见奉为神型的那些东西。常备军和警察是国家权力的主要工具，但是——难道可能不是这样吗？

19世纪末叶，绝大多数欧洲人认为，这是不能不这样的。恩格斯的话正是对这些人说的。他们没有经历过，也没有亲眼看到过一次伟大的革命，他们完全不了解，什么是“居民自动组成的武装”。对于为什么要有驾于社会之上并使自己同社会脱离的特别武装队伍（警察、常备军），西欧和俄国的庸人总是喜欢借用斯宾塞和米海洛夫斯基的几句话来答复，说这是因为社会生活复杂化、职能分化等等。

这种说法似乎是“科学的”，而且最能迷惑庸人，掩盖社会分裂为不可调和的敌对阶级这个主要的、基本的事实。

如果没有这种分裂，“居民自动组成的武装”同使用棍棒的猿猴群、原始人类，或宗族社会的原始组织比较起来，只是程度上复杂些，技术上高明些，但这样的武装组织是可能的。

这样的组织之所以不可能有，就因为文明社会已分裂为敌对的而且是不可调和地敌对的阶级，如果这些阶级都有“自动组成的”武装，那在它们之间就一定会展开武装斗争。于是国家形成了，特别的力量、特别的武装队伍建立起来了。每当革命破坏国家机关的时候，我们都清楚地看到，统治阶级是如何力图恢复替它服务的特别武装队伍，被压迫阶级又是如何力图建立一种不替剥削者服务，而替被剥削者服务的新型组织。

上面恩格斯从理论上提出的问题，即每次大革命在实践中明显地而且是以大规模的行动提到我们面前的问题，正是“特别”武

裝隊伍同“居民自動組成的武裝”之間的相互關係問題。我們會看到，歐洲和俄國歷次革命的經驗是怎樣具體地說明這個問題的。

現在我們再來看恩格斯的論述。

他指出，有的時候，如在北美某些地方，這種社會權力是薄弱的（這裡指的只是資本主義社會中少數的例外，以及在帝國主義時期以前北美那些自由移民占多数的地方），但一般說來，它是在加強：

……“社會權力是隨着國家內部階級矛盾尖銳化及鄰國的擴大和人口增多而加強起來的。拿現在的歐洲來說，階級鬥爭和侵略競爭已把社會權力提高到可以吞食整個社會，甚至吞食整個國家的地步”……

這段話至遲是在19世紀90年代初期寫的。恩格斯最後的序言寫於1891年6月16日。當時向帝國主義的轉變，無論就托拉斯的完全統治、大銀行的無限權力或大規模的殖民政策等等來說，在法國還是剛剛開始，在北美和德國更要差一些。此後，“侵略競爭”前進了一大步，尤其因為到了20世紀20年代初，世界已被這些“互相競爭的侵略者”，即巨大的強盜國家瓜分完了。從此海陸軍備無限增長，1914年至1917年英德兩國為了爭奪世界霸權、為了瓜分贓物而進行的強盜戰爭，使社會上一切力量幾乎都被強盜國家政權“吞沒”，使情況發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恩格斯在1891年就已指出，“侵略競爭”是各大強國對外政策最重要的特征之一，但是社會沙文主義的惡棍們在1914年至1917年，正當這個競爭加劇了許多倍並引起了帝國主義戰爭的時候，却用“保衛祖國”、“保衛共和國和革命”等等詞句來掩蓋他們維護“本國”資產階級強盜利益的行为！

3. 国家是剥削被压迫阶级的工具

为了维持居于社会之上的特别社会权力,就需要捐税和国债。

恩格斯说:“官吏既然掌握着社会权力和征税权,他们就成为社会机关而居于社会之上。从前人们对氏族(或宗族)社会机关的那种自愿的敬意,即使他们能够获得,也不能使他们满足了。”……于是制定了官吏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特别法律。“一个微不足道的警察”却有大于氏族代表的“权威”,然而,即使是文明国家掌握军权的首脑,也会对“不是用强迫手段获得社会尊敬”的氏族首领表示羡慕。

这里提出了作为国家政权机关的官吏的特权地位问题。指出了这样一个基本问题:究竟什么东西使他们居于社会之上?我们在下面就会看到,1871年巴黎公社如何实际地解决了这个理论问题,而在1912年又如何被考茨基反动地抹杀了。

……“因为国家是为了控制阶级对抗而产生的,同时又是在这种阶级冲突中产生的,所以,它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压制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不仅古代的国家 and 封建国家是剥削奴隶和农奴的机关,“现代的代表制的国家也是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工具。但是也常有一些例外,如相互斗争的阶级达到势均力敌的地步,国家政权暂时获得某种独立性,似乎成了这两个阶级之间的中介人”……17世纪和18世纪的君主专制,法国第一帝国和第二帝国的拿破仑主义,德国俾斯麦时代,都是如此。

我們还可以补充說，在共和制俄国的克倫斯基政府开始压迫革命無产階級以后，由于小資产階級民主派的領導，苏維埃已經軟弱無力，而資产階級 逐 沒有足够的力量来直接解散苏維埃的时候，也是如此。

恩格斯又說，在民主共和国内，“財富是間接地發揮它的权力的，因此是更可靠的”，它所采用的第一个方法是“直接收买官吏”（美国），第二个方法是“政府同交易所結合”（法国和美国）。

目前，任何最民主的共和国中的帝国主义和銀行統治，都把这两种維护和实现財富的無限权力的方法“發展”到了非常巧妙的地步。例如，在俄国实行民主共和的头几个月里，在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維克这两种“社会主义者”同資产階級联姻的“蜜月”期間，帕尔欽斯基先生在联合政府中实行怠工，不願意实施制裁資本家、制止他們进行掠夺和借軍事訂貨盜窃国庫的种种措施，在帕尔欽斯基先生退出內閣以后（接替他的自然是同他一模一样的人），資本家“奖賞”給他年薪 12 万卢布的肥缺，試問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是直接的收买，还是間接的收买？是政府同辛迪加勾結，还是“仅仅”是一种友誼关系？切尔諾夫、策烈鉄里、阿夫克森齐也夫、斯柯別列夫之流究竟起着什么作用？他們是盜窃国庫的百万富翁的“直接”同盟者，还是仅仅是間接的同盟者？

“財富”的無限权力在民主共和制度下之所以更可靠，是因为它不依賴資本主义的不好的政治外壳。民主共和制度是資本主义所能采用的最好的政治外壳，所以資本一掌握（通过帕尔欽斯基、切尔諾夫、策烈鉄里之流）这个最好的外壳，就能十分可靠十分巩固地确立自己的权力，在資产階級民主共和国中，無論人員、机关

或政党的任何更換，都不会使这个权力动摇。

还应该指出，恩格斯十分肯定地认为，普选制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他显然是估计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长期经验，他说普选制是

“工人阶级成熟的指标。在现代国家中，普选制不能而且永远不会提供更多的东西”。

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如我国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及其同胞兄弟西欧一切社会沙文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都希望从普选制中得到“更多的东西”。他们自己相信而且要人民也相信这种荒谬想法，似乎普选制“在现代国家中”真正能够体现大多数劳动者的意志，并保证实现这种意志。

我们在这里只是指出这个错误的想法，只是指出，恩格斯这个十分明确而具体的说明，经常在“正式的”（即机会主义的）社会主义政党的宣传鼓动中遭到歪曲。至于恩格斯怎样揭露这种想法的全部虚伪性，我们以后在谈到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现代”国家的看法时，还会详细地加以阐明。

恩格斯在他那部最通俗的著作中，把自己的看法总结如下：

“由此可见，国家不是自古就有的。曾经有过不需要国家、而且根本不知国家和国家政权为何物的社会。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必然使社会分裂为几个阶级时，国家就成为必要了。现在我们正以迅速的步伐走上这样的生产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上，这些阶级的存在不仅已经没有必要，而且成了生产的直接障碍。阶级必然会消失，正如它们从前必然会产生一样。随着阶级的消失，国家也必然会消失。以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为基础的、按新方式来组织生产的社会，

將把全部國家機器放到它應該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陳列館去，同紡車和青銅斧陳列在一起。”

這一段引文在現代社會民主派的宣傳鼓動書刊中很少看到，即使引用也多半是為了崇拜偶像，也就是說，為了正式表示對恩格斯的尊敬。他們根本不去考慮，先要經過怎樣廣泛而深刻的革命，才能“把全部國家機器放到古物陳列館去”。甚至他們往往不懂恩格斯說的國家機器究竟是什麼。

4. 國家“消亡”和暴力革命

恩格斯關於國家“消亡”的話是非常著名的，經常有人引証，它清楚地表明了目前流行的把馬克思主義偷偷地改為機會主義的把戲的本質，因此我們必須詳細地加以說明。現在我們把這句話的出處的那一整段論述轉錄如下：

“無產階級取得了國家政權，首先把生產資料變為國家財產。但這樣一來，無產階級就消滅了自己之為無產階級，就消滅了一切階級差別和階級對立，同時也就消滅了國家之為國家。過去和現在在階級對立中向前發展的社会，需要國家，即需要一個剝削階級的組織，以便維持其生產的外部條件，特別是用強力把被剝削階級控制在當時生產方式所決定的那些壓迫條件（奴隸制、農奴制、僱傭勞動制）以內。國家曾是整個社会的正式代表，是社会的集中組織形態，但是國家所以成為這樣，只是因為它是當時唯一代表整個社会的階級的國家。在古代，它是奴隸主即國家公民的國家；在中世紀，它是封建貴族的國家；在我們的時代，它是資產階級的國家。當國家最後真正成為全社会的代表時，它就自然而然地成為多餘的東西

了。那时候，必須加以镇压的社会阶级已不存在，一个阶级统治另一个阶级的现象以及目前生产无政府状态引起的生存斗争已不存在，这个斗争中的冲突和过火行动（极端化）也随着消失，再没有什么东西须要镇压了，于是，实行镇压的特别力量——国家也就不需要了。国家作为全社会的真正代表而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即以社会名义占有生产资料，也就是它以国家资格所采取的最后一个独立行动。那时，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涉，便会逐步成为多余的东西而自行停止。对人的管理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指导所代替。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应该根据这一点来评价‘自由的人民国家’这句话，这句话用来鼓动暂时还可以，但毕竟是没有科学根据的。同时也应当根据这一点来评价所谓无政府主义者要在一天之内废除国家的要求。”（“反杜林论”德文第三版第301—303页）⁹⁴

我们可以大胆地说：在恩格斯这一段思想极其丰富的论述中，只有与无政府主义“废除”国家的学说不同的国家“消亡”（马克思语）这一点，被现代社会主义政党当作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想接受下来了。这样来割裂马克思主义，无异是把马克思主义变成机会主义，这样来“解释”，就只会留下一个模糊的观念，似乎只有缓慢的、平静的、逐渐的变化，而没有突变、风暴和革命。对国家“消亡”最普遍、最流行、最大众化的（如果能这样说的话）理解，无疑是抹杀革命，甚至是否认革命。

但是，这样的“解释”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最粗暴的歪曲，仅仅有利于资产阶级。从理论上说，产生这种歪曲的根源就是忘记了我們上面全部摘引的恩格斯的“总结性”论述中也指出的极重要的情

况和观点。

第一、恩格斯在这段论述中一开始就说，无产阶级取得了国家政权，“也就消灭了国家之为国家”。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人们“照例”是不加思索的，他们不是完全忽略这一点，就是认为这是恩格斯的“黑格尔主义的毛病”。其实这几句话扼要地表明了最伟大的一次无产阶级革命的經驗，即1871年巴黎公社的經驗，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下面还要詳細地加以论述。实际上恩格斯在这里所講的是以无产阶级革命来“消灭”资产阶级的国家，他講的消亡是指社会主义革命以后的无产阶级国家制度的残余。恩格斯认为资产阶级国家是不会“自行消亡”的，而要用无产阶级革命来“消灭”它。在这个革命以后，自行消亡的是无产阶级的国家或半国家。

第二、国家是“实行镇压的特別力量”，恩格斯下的这个絕妙而極其深刻的定义是十分明确的。从这个定义可以得出这样的結論：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即一小撮富豪对千百万劳动者“实行镇压的特別力量”，应该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镇压的特別力量”（无产阶级专政）来代替。这就是“消灭国家之为国家”。这就是以社会名义占有生产资料的“行动”。显然，以无产阶级的“特別力量”来代替资产阶级的“特別力量”，这样一种更換是决不能靠“自行消亡”来实现的。

第三、恩格斯在談到“自行消亡”和更鮮明更光輝的“自行停止”一語时，他十分明确而肯定地说，这是指在“国家以社会名义占有生产资料”以后，即在社会主义革命以后的事情。我們大家都知道，这时“国家”的政治形式是最徹底的民主制。但是那些無耻地歪曲馬克思主义的机会主义者，却没有一个人想到恩格斯在这

里所說的就是民主制的“自行停止”和“自行消亡”。乍看起来，这似乎是很奇怪的。但是，只有那些沒有想到民主制也是国家、在国家消逝时民主制也会消逝的人，才会觉得这是“不可理解”的。资产阶级的国家只有革命才能“消灭”。最彻底的民主国家只能“自行消亡”。

第四、恩格斯在提出“国家自行消亡”这个著名的原理以后，立刻就具体地說明这一点是既反对机会主义者又反对無政府主义者的。但恩格斯放在首位的，是从这个原理中得出的反对机会主义者的結論。

可以担保，在1万个讀过或听过“国家自行消亡”的論述的人中，有9990人完全不知道或不記得恩格斯从这个原理中得出的結論不仅是反对無政府主义者的。其余的10个人中可能有9个人不懂得什么是“自由的人民国家”，不懂得为什么反对这个口号就是反对机会主义者。历史就是这样記載的！伟大的革命学說就是这样被人偷偷地改成了流行的庸人主义！人們千百次地重复反对無政府主义者的結論，把它庸俗化并简单地装到头脑中去，形成了固执的偏見。至于反对机会主义者的結論，却被抹杀和“忘記”了！

“自由的人民国家”是70年代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提出的綱領性要求和流行口号。这个口号只是市僧式地夸大了民主制的概念，沒有絲毫政治內容。既然人們当时可以合法地利用这个口号来暗示民主共和国，恩格斯也就从鼓动的观点同意“暂时”替这个口号“辯护”。但这是一个机会主义的口号，它不仅起了粉飾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的作用，而且表现出不懂得社会主义对一般国家的批評。我們拥护民主共和国，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是对無

产阶级最有利的国家形式，但是，我們决不能忘記，即使在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里，人民仍然摆脱不了当雇佣奴隶的命运。任何国家都是对被压迫阶级“实行镇压的特别力量”。因此任何国家都不是自由的，都不是人民的。在70年代，馬克思和恩格斯一再向他們党內的同志解释这一点。

第五、在恩格斯这本著作中，除了大家記得的关于国家消亡的論述以外，还談到了暴力革命的意义。恩格斯对于革命的作用的历史評价成了对暴力革命的真正頌揚。但是，“誰都不記得”这一点，这个思想的意义在現代社会主义政党内是照例不談、照例不想的，在群众中进行的日常鼓动宣传中也不占任何地位。其实，这个思想同国家“自行消亡”的理論是密切联系的，是一个严密的整体。

請看恩格斯的論述：

……“暴力在历史上还起着另一种作用”（除作恶以外）“即革命的作用，暴力是替任何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舊社会接生的产婆（馬克思語），暴力是社会运动借以开辟道路并破坏僵死硬化的政治形式的工具和手段，——关于这一切，杜林先生一个字也沒有提到。他仅仅带着嘆息和呻吟的口吻承認，为了推翻剝削者的經營制度，暴力也許是必要的（你們看，真可惜！），而任何暴力的采用，据說都会使采用暴力的人道德墮落。尽管在每次革命胜利以后，道德和思想都有显著的提高，他还是說出了这种話！而且这是在德国說的，当时德国人民可能被迫进行暴力冲突，發生这种事件的好处至少是可以排除三十年战争的耻辱在民族意識中造成的奴才气。难道可以把这种灰色的、萎靡不振、軟弱無力的僧侶思想，推荐给历史上最革命的政党嗎？”（“反杜林論”德文第三版第193頁；第二

編第四章末)①

怎样才能把恩格斯从 1878 年起至 1894 年他逝世时为止，一再向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提出的頌揚暴力革命的論点，同国家“消亡”的理論結合起来呢？

人們往往用折衷主义，用無原則地或詭辯式地任意（或者为了討好当权者）抽出前者或后者的办法把它們結合起来，而且在 100 次中有 99 次（如果不是更多的話）正是把国家“消亡”論摆在首位。用折衷主义代替辯証法，这就是目前在正式的社会民主党書刊中对馬克思主义采取的最常見最普遍的手法。这种做法，自然并不新奇，甚至在希腊古典哲学史上也是常見的。把馬克思主义偷偷地改为机会主义的时候，用折衷主义冒充辯証法是最容易欺騙群众的。这样能使人感到一种似是而非的滿足，似乎考虑到了过程的一切方面，發展的一切趋势，各方面的矛盾的影响等等，但实际上並沒有对社会發展过程做出任何完整的革命分析。

我們在前面已經說过，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暴力革命不可避免的学說是針對资产阶級国家說的，在下面我們还要更詳尽地說明这一点。资产阶級国家由無产阶級国家（無产阶級专政）代替是不能經過“自行消亡”来实现的，根据一般規律，只能靠暴力革命来实现。恩格斯对暴力革命的頌揚同馬克思的屢次声明完全符合（我們可以回忆一下，馬克思在“哲学的貧困”⁹⁵和“共产党宣言”⁹⁶这两部著作的結尾部分，曾自豪地公开声明暴力革命的必然性；我們还可以回忆一下，約在 30 年以后，馬克思在 1875 年写的“哥达綱領批判”⁹⁷中，曾無情地抨击了这个綱領表現的机会主义），这种

① “反杜林論” 1956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190 頁。——譯者注

頌揚決不是“迷戀”，決不是誇張，也決不是論戰伎倆。必須不斷教育群眾，使他們這樣來認識暴力革命，而且只能這樣來認識暴力革命，這正是馬克思和恩格斯全部學說的基础。現在占統治地位的社会沙文主义和考茨基主义流派对馬克思和恩格斯學說的背叛，最突出地表現在這兩個流派都把這方面的宣传和鼓動忘記了。

無產階級國家代替資產階級國家，必須通過暴力革命。無產階級國家的消滅，即任何國家的消滅，只能通過“自行消亡”。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研究每一個革命形勢，分析每一個革命的經驗教訓時，總是詳細而具體地發揮了他們的這些見解。我們現在就來談談他們學說中這個最重要的部分。

第 二 章

國家與革命 1848—1851 年的經驗

1. 革命的前夜

成熟的馬克思主義的最初著作“哲學的貧困”和“共產黨宣言”，恰巧是在 1848 年革命前夜寫成的。由於這種情況，這兩本書除了敘述馬克思主義的一般原理外，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具體的革命形勢。因此，我們來研究這兩部著作的作者在做 1848—1851 年革命經驗的總結以前關於國家問題的言論，也許更為恰當。

馬克思在“哲學的貧困”中寫道，……“工人階級在發展過程中將創造一個沒有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聯合體來代替舊的資

产阶级社会；从此再不会有任何原来意义的政权了，因为政权正是资产阶级社会内阶级对抗的正式表现。”（1885年德文版第182页）⁹⁸

拿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几个月以后（1847年11月）写的“共产党宣言”中的论述来同这一段关于国家会随着阶级消灭而消逝的思想的论述比较一下，是颇有教益的。

……“当我们叙述无产阶级发展中最一般的阶段时，我们探讨了现存社会里多少带有隐蔽性的国内战争，一直到这个国内战争变成公开的革命，那时无产阶级就用暴力推翻资产阶级而建立起自己的统治”……

……“我们在前面已经看见，工人革命的第一步是无产阶级变为（直译是提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

“无产阶级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一步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到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中，并尽量迅速地增殖生产力总量。”（1906年德文第七版第31页和37页）⁹⁹

在这里我们看到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问题的一个最卓越最重要的思想，即“无产阶级专政”（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巴黎公社以后所说的那样）的思想，其次我们还看到给国家下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定义，这个定义也属于马克思主义中“被人遗忘的言论”：“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

国家的这个定义，在各正式社会民主党最流行的宣传鼓动书中从来没有解释过。它恰巧被遗忘了，因为它同改良主义是根本不相容的，它直接打击了“民主制和平发展”的一般机会主义偏见和市僧幻想。

無产階級需要国家，——一切机会主义者，社会沙文主义者和考茨基主义者都这样重复，硬說馬克思的学說就是如此，但是“忘了”补充：馬克思認為，第一、無产階級所需要的只是逐漸消亡的国家，即需要建立一个立刻开始消亡而且不能不消亡的国家；第二、劳动者所需要的“国家”，就是“組織成为統治階級的無产階級”。

国家是特殊的权力組織，是用来鎮压某一个階級的強力組織。無产階級要鎮压的究竟是哪一個階級呢？当然只是剝削階級，即資產階級。劳动者需要国家只是为了鎮压剝削者的反抗，而能够領導和实行这种鎮压的只有無产階級，因为無产階級是唯一徹底革命的階級，是唯一能够團結一切被剝削劳动群众去反对資產階級并把它完全鏟除的階級。

剝削階級需要政治統治是为了維持剝削，也就是为了極少數人的私利去反对絕大多數人民。被剝削階級需要政治統治，是为了徹底消灭一切剝削，也就是为了絕大多數人民的利益去反对極少數的現代奴隶主——地主和資本家。

小資產階級民主派，这些以幻想階級妥协来代替階級斗争的假社会主义者，对于社会主义改造也抱着幻想，他們不是把改造設想为推翻剝削階級的統治，而是設想为少数馴順地服从那意識到了本身任务的多数。这种小資產階級空想同認為国家是超階級的观点有密切的联系，这种空想在实际上必然导致出卖劳动階級的利益，法国 1848 年革命和 1871 年革命的历史已經表明了这一点，19 世紀末和 20 世紀初英、法、意等国的“社会主义者”参加資產階級內閣的經驗也表明了这一点。

馬克思一生都在反对这种小資產階級社会主义，即目前在俄

国由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維克复活起来的这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馬克思一贯坚持阶级斗争的理论，并把它貫徹到政权学說、国家学說之中。

只有无产阶级这一特殊阶级才能推翻资产阶级的統治，因为无产阶级生存的經濟条件使它做好了推翻资产阶级統治的准备，使它有可能、有力量达到这个目的。资产阶级一方面分离和拆散农民及一切小资产阶级阶層，另一方面也使无产阶级联合、团结和组织起来。只有无产阶级，由于它在大生产中的經濟作用，才能成为一切被剝削劳动群众的領袖，这些被剝削劳动群众受资产阶级的剝削、压迫和蹂躪往往比无产阶级更厉害，可是他們不能为自己的解放进行独立的斗争。

馬克思在国家和社会社会主义革命問題上运用的阶级斗争学說，必然会承認无产阶级的政治統治，承認无产阶级专政，即承認不与任何人分掌而直接依靠群众武装力量的政权。只有使无产阶级变为統治阶级，变为能够镇压资产阶级必然要进行的拚命反抗、能够組織一切被剝削劳动群众来建立新的經濟制度的統治阶级，才能推翻资产阶级。

无产阶级需要国家政权，集中的权力組織，强力組織，为的是镇压剝削者的反抗和领导广大民众即农民、小资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来“組織”社会主义經濟。

馬克思主义教育工人的党，教育无产阶级的先鋒队，使它能够夺取政权并引导全体人民走向社会主义，领导建立新制度，成为所有被剝削劳动者在沒有资产阶级参加并反对资产阶级而建設自己社会生活的事業中的导师、领导者和領袖。反之，現在占統治地位的机会主义却把工人的党教育成一群脱离群众而代表工資优

厚的工人的人物，只圖在資本主义制度下“苟且偷安”，为了一碗稀飯而出卖长子的权利，即放弃权利不当领导人民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領袖。

“国家即組織成为統治阶级的無产阶级”，——馬克思的这个理論同他关于無产阶级在历史上的革命作用的全部学說，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这种作用的最高表現是無产阶级专政，無阶级的政治統治。

既然無阶级需要国家这样一个反对资产阶级的特殊强力組織，那末自然就会得出一个結論：不預先消灭和破坏资产阶级为自己建立的国家机器，就不可能建立这样一个組織。在“共产党宣言”中已接近于得出这个結論，馬克思在总结 1848—1851 年革命的經驗时也就談到了这个結論。

2. 革命的总结

关于这个使我們感到兴趣的国家問題，馬克思在“拿破侖第三政变記”中总结 1848—1851 年的革命时写道：

……“然而革命是徹底的。它还在前进中不断鍛炼自己。它在有条不紊地执行自己的任务。在 1851 年 12 月 2 日”（拿破侖第三政变的日子）“以前，它完成了准备工作的前一半，現在正在完成后一半。它首先使議会权力臻于完备，以便有可能推翻这个权力。現在，它已經做到了这一点，它就使行政权力臻于完备，使行政权力达到最純粹的表現形式，孤立起来，成为自己面前唯一的靶子，以便集中一切破坏力量来反对这个行政权力”（着重号是我們加的）。“当革命完成后一半准备工作时，欧洲就会跳起来欢呼說：老田鼠挖得好呀！”

这个行政权力拥有庞大的官僚组织和军事组织，拥有极复杂的人为的国家机器，拥有50万官吏队伍和50万军队——这个像密网一样缠住法国社会的躯体并堵塞其一切毛孔的可怕的寄生机体，是在君主专制时代即封建制度崩溃的时候产生的，这个寄生机体又加速了封建制度的崩溃。”第一次法国革命发展了集中制，“但同时又扩大了政府的职权范围，增加了行政人员。拿破仑完成了这个国家机器”。正统王朝和七月王朝“除了实行更大的分工以外，没有增加任何新东西”……

……“最后，议会制共和国在其反对革命的斗争中，除采用高压手段以外，不得不加强政府权力的工具，不得不使国家权力更加集中。迄今一切政变都是使这个机器更加完备，而不是把它摧毁”（着重号是我们加的），“那些争夺统治权的相互更替的政党，把夺取这个庞大的国家建筑看成是自己胜利时的主要战利品。”（“拿破仑第三政变记”1907年汉堡德文第四版第98—99页）¹⁰⁰

马克思主义在这一段出色的论述里比在“共产党宣言”中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在该书中，国家问题还提得非常抽象，还只有最一般的概念和表述。在这里，问题已经提得具体了，还做出了非常确切、肯定、实际而具体的结论：过去一切革命使国家机器更加完备，但是这个机器是必须打碎，必须摧毁的。

这个结论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主要的基本的东西。正是这个基本的东西，不仅被现在占统治地位的正式社会民主党完全遗忘，并且被第二国际最著名的理论家考茨基公然歪曲了（这点我们在下面还要讲到）。

在“共产党宣言”中做了一般的历史总结，使人们认识到国家

是階級統治的機關，還使人們得出這樣一個必然的結論：無產階級如果不先奪取政權，不取得政治統治，不把國家變為“組織或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就不能推翻資產階級；這個無產階級國家在取得勝利以後就會立刻開始消亡，因為在沒有階級矛盾的社會里，國家是不需要的，是不可能存在的。在這裡還沒有提出究竟應當（從歷史發展的观点來看）怎樣以無產階級國家來代替資產階級國家的問題。

馬克思在1852年提出來加以解決的正是這個問題。馬克思是忠於自己的辯證唯物主義哲學的，他拿1848—1851年革命偉大年代的历史經驗作為基礎。馬克思的學說在這裡也像其他任何時候一樣，是由深刻的哲學世界觀和豐富的历史知識闡明的經驗總結。

國家問題現在提得很具體：資產階級的國家，資產階級統治所需要的國家機器在历史上是怎样產生的？在历次資產階級革命進程中，面臨着各被壓迫階級獨立行動的時候，國家機關如何改變，如何演進？無產階級對這個國家機器的任務怎樣？

資本主義社會所特有的集中的國家政權，產生於專制制度崩潰的時代。最能表現這個國家機器特征的有兩種機關，即官吏和常備軍。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屢次談到的這兩個機器，恰巧同資產階級有千絲萬縷的聯繫。每個工人的經驗都非常清楚非常有力地說明了這種聯繫。工人階級由於親身的體驗，現在已經領會到這種聯繫意味着什麼，正因為這樣，工人階級很容易懂得、很深刻地領會到這種聯繫不可避免的道理，小資產階級民主派則不是愚蠢地、輕率地否認這一點，便是更輕率地加以“一般地”承認，但是忘了做出相應的實際結論。

官吏和常備軍是資產階級社會軀體上的“寄生蟲”，是腐蝕着這個社會的內部矛盾所滋生的寄生蟲，而且正是“堵塞”生命的毛孔的寄生蟲。目前在正式社會民主黨內占統治地位的考茨基機會主義，認為把國家看作一種寄生機體的观点是無政府主義獨特的特性。這樣來歪曲馬克思主義，對於那些空前地玷污社會主義、把“保衛祖國”的概念應用於帝國主義戰爭來替這個戰爭辯護粉飾的市僧，當然是有很大好處的，然而這畢竟是一種絕對的歪曲。

經過從封建制度崩潰以來歐洲所發生的多次資產階級革命，這個官吏機關和軍事機關就逐漸發展、完備和鞏固起來。必須指出，小資產階級被吸引到大資產階級方面去並受它支配多半是通過這個機關的，因為這個機關給農民、小手工業者、商人等等的上層分子以比較舒適、安靜和顯要的職位，使他們駕於人民之上。我們看一看俄國在1917年2月27日以後這半年中發生的一些事情吧：以前黑幫分子把持的官吏位置，現在成為立憲民主黨人、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的贓物了。實際上他們不想進行任何認真的改革，力圖把這些改革拖延到“立憲會議召開的時候”，而召開立憲會議的日期，他們又慢吞吞地想拖延到戰爭結束以後！至於瓜分贓物，攫取部長、次長、總督等肥缺，卻沒有延期，沒有等待任何立憲會議！分配政府要職的把戲，其實不過是全國上下一切中央和地方管理機關中瓜分和重分“贓物”的一種表現。現在各種改革都延期了，官吏職位已經分配完了，分配方面的“錯誤”也由幾次重新分配糾正了，——這無疑是1917年2月27日到8月27日這半年的總結，客觀的總結。

但是在各資產階級政党和小資產階級政党和之間（拿俄國來講，就是在立憲民主黨、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之間）“重分”官吏機關

的事实愈多，各被压迫阶级，首先是领导它们的无产阶级，就会愈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同整个资产阶级社会不可调和的敌对性。因此，一切资产阶级政党，甚至最民主的和“革命民主的”政党，也必须加强高压手段来反对革命的无产阶级，巩固高压机关，也就是巩固国家机器。这样的事变进程迫使革命“集中一切破坏力量”去反对国家政权，迫使革命提出破坏和消灭国家机器的任务，而不是去改善国家机器。

这个任务的提出，不是由于逻辑的推论，而是由于实际的事变发展，由于1848—1851年的生动经验。马克思在1852年还没有具体提出用什么东西去代替这个必须消灭的国家机器的问题，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是怎样严格地依据实际的历史经验的。那时在这个问题上，经验还没有提供材料，后来在1871年，历史才把这个问题提到日程上来。1852年，根据对自然历史过程的精确的观察，只能断定无产阶级革命已接近于提出“集中一切破坏力量”来反对国家政权的任务，即“摧毁”国家机器的任务。

这里可能会发生这样的问题：把马克思的经验、观察和结论加以推广，用到比1848—1851这三年法国历史更为广泛的范围上去是否正确呢？为了分析这个问题，我们先回忆一下恩格斯的一段话，然后再来研究实际材料。

恩格斯在“拿破仑第三政变记”第三版序言里写道：……“法国是这样一个国家，它历史上每一次阶级斗争的结局，都比其他各国更加彻底。它的经常更换的政治形式最鲜明地表现出阶级斗争的进展及其结果。法国在中世纪时代是封建制度的中心，在文艺复兴以后是一个纯粹等级制的典型帝国，它在大革命时代摧毁了封建制度而建立了纯粹的资产阶级统

治，它所具有的这种典型的鮮明性，是欧洲其他国家所沒有的。抬起头来的無产階級反对統治的資產階級的斗争在这里所表現的尖銳形式，也是其他各国从来沒有的。”（1907年版第4頁）

最后一句話已經过时了，从1871年起，法国無产階級的革命斗争就停頓了，可是無論停頓多久，法国也还有可能在即将到来的無产階級革命中成为坚决把階級斗争进行到底的典型国家。

現在我們来概括地看一看19世紀末20世紀初各先进国家的历史。我們可以看到，这样的过程在更加广闊的場所更緩慢更多样地进行着：一方面，在共和制的国家（法国、美国、瑞士）和君主制的国家（英国、一定程度上的德国、意大利及斯堪的那維亞半島各国）里正在形成“議會权力”，另一方面，瓜分和重分官吏职位“贓物”的各資產階級政党和小資產階級政党，在不改变資產階級制度的基础上为爭夺政权进行着斗争，最后，“行政权力”及其官吏机关和軍事机关日益完备和巩固起来。

毫無疑問，这是現代資本主义国家整个进化过程中的共同特征。在1848—1851这三年內，法国迅速地、尖銳地、集中地表明了整个資本主义世界所固有的那种發展过程。

特别是帝国主义时代，銀行資本时代，大資本主义垄断时代，垄断資本主义轉变为国家垄断資本主义的时代表明，無論在君主制的国家或最自由的共和制国家，由于要对無产階級加强镇压，“国家机器”就大大加强起来，它的官吏机关和軍事机关也就空前地扩大了。

現在，整个世界历史無疑将在比1852年更加广泛的范围內把無产階級革命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去“摧毀”国家机器。

至于無产階級将用什么来代替这个国家机器，巴黎公社对这一点提供了極有用的材料。

3. 1852 年馬克思对問題的提法[⊖]

1907 年梅林把 1852 年 3 月 5 日馬克思致魏德迈的信摘要登載在“新时代”杂志¹⁰¹（第 25 卷第 2 期第 164 頁）上。在这封信里有这样一段出色的論述：

“至于講到我，無論是發現现代社会中有階級存在或發現各階級間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資产階級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階級斗争的历史發展，資产階級的經濟学家也已对各个階級做过經濟上的分析。我的新貢獻就是証明了下列几点：（1）階級的存在仅仅同生产發展的一定历史阶段（historische Entwicklungsphasen der Produktion）相联系；（2）階級斗争必然要导致無产階級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階級和进入無階級社会的过渡”……¹⁰²

在这一段話里，馬克思非常清楚地指出了两点：第一、他的学說同資产階級最渊博的先进思想家的学說之間的主要的和根本的区别；第二、他的国家学說的实質。

馬克思学說中的主要内容是階級斗争。人們时常这样說，这样写。但这是不正确的。根据这个不正确的观点，往往会对馬克思主义进行机会主义的歪曲，把馬克思主义偷偷地改为資产階級可以接受的东西。因为階級斗争学說不是由馬克思，而是由資产階級在馬克思以前創立的，而且一般說来，是資产階級可以接受

⊖ 第 2 版增加的一节。

的。誰要是仅仅承認階級鬥爭，那他還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他可能還沒有走出資產階級思想和資產階級政策的圈子。用階級鬥爭學說來限制馬克思主義，就是割裂和歪曲馬克思主義，把馬克思主義變為資產階級可以接受的东西。只有承認階級鬥爭、同時也承認無產階級專政的人，才是馬克思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同庸俗小資產者（以及大資產者）之間的最大區別就在這裡。必須用這塊試金石來測驗是否真正了解和承認馬克思主義。無怪乎當歐洲的歷史在實際上向工人階級提出這個問題時，不僅一切機會主義者和改良主義者，而且所有“考茨基主義者”（動搖於馬克思主義和改良主義之間的人），都成了否認無產階級專政的可憐的庸人和小資產階級民主派。考茨基寫的“無產階級專政”一書，是在1918年8月，即在本書第一版刊行以後很久才出版的，這本書是用市儈的觀點歪曲馬克思主義、口頭上假意承認馬克思主義而實際上卑鄙地背叛馬克思主義的典型（見我的“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1918年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版）。

以過去的馬克思主義者考茨基為主要代表的現代機會主義，完全陷入了馬克思所評述的資產階級立場，因為這個機會主義把承認階級鬥爭的範圍局限於資產階級關係的領域以內。（在這個領域、這個範圍內，任何一個有知識的自由主義者都不會拒絕在“原則上”承認階級鬥爭！）機會主義恰巧在最主要的問題上不承認有階級鬥爭，即不承認在資本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時期、在推翻資產階級並徹底消滅資產階級的時期有階級鬥爭。實際上，這個時期必然是階級鬥爭空前殘酷、階級鬥爭形式空前尖銳的時期，因而這個時期的國家就必須是新型的民主國家（對無產者和一般窮人是民主的）和新型的專政國家（對資產階級是專政的）。

其次，一个階級專政，不仅一般階級社会需要，不仅推翻资产階級的無产階級需要，而且，从資本主义过渡到“無階級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都需要，只有了解这一点的人，才算領会了馬克思国家学說的实質。资产階級国家虽然形式非常复杂，但本質是一个，不管怎样，所有这些国家总是资产階級專政。从資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当然不能不产生多种多样的政治形式，但本質必然是一个，就是無产階級專政。

第 三 章

国家与革命 1871年巴黎公社的經驗 馬克思的分析

1. 公社社員这次嘗試的英雄主义何在？

大家知道，在巴黎公社前几个月，即1870年秋，馬克思曾經警告巴黎工人說，推翻政府的嘗試是一种絕望的愚蠢举动。但是，1871年3月，当工人被迫进行决战，起义已經成为事实的时候，尽管当时有种种恶兆，馬克思还是以欢欣鼓舞的心情来迎接無产階級革命。馬克思并没有用学究式的言論来非难“不合时宜的”运动，像臭名昭彰的俄国馬克思主义叛徒普列汉諾夫那样。普列汉諾夫在1905年11月写了一些鼓舞工人农民进行斗争的文章，而在1905年12月以后，却以自由主义的論調大叫其“本来是不需要拿起武器的”。

然而，馬克思不仅是因为公社社員表现了如他所說的“翻天覆地”的英雄主义而感到愉快。虽然这次群众性的革命运动沒有达

到目的,但是他在这次运动中看到了有極重大意义的历史經驗,看到了全世界無产階級革命的一定进步,看到了比几百种綱領和議論更为重要的实际步驟。分析这个經驗,从这个經驗中得到策略教訓,根据这个經驗来重新审查自己的理論,这就是馬克思提出的任务。

馬克思認為对“共产党宣言”必須做的唯一“修改”,就是他根据巴黎公社社員的革命經驗而做出的。

在“共产党宣言”德文新版上由两位作者签名的最后一篇序言,是1872年6月24日写成的。在这篇序言中,作者馬克思和恩格斯說,“共产党宣言”的綱領“現在有一些地方已經过时了”。

他們又說……“特別是巴黎公社已經証明:‘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掌握現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103

这段引文中单引号內的話,是两位作者从馬克思的“法兰西內战”一書中借用来的。

总之,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巴黎公社这个基本的主要的教訓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共产党宣言”再版时,他們就把这一点加进去作为重要的修改。

非常值得注意的正是这个重要的修改被机会主义者歪曲了。“共产党宣言”的讀者,大概有十分之九,甚至有百分之九十九是不了解这个修改的意义的。我們在下面专論歪曲的那一章里,还要对这种歪曲加以詳細說明。現在只須指出,对于我們前面引証的馬克思的那句名言,流行着一种庸俗的“了解”,認為馬克思在这里是強調緩慢發展的思想,不主张夺取政权等等。

实际上恰巧相反。馬克思的意思是說工人階級应当打碎和

摧毀“現成的国家机器”，而不只是简单地夺取这个机器。

1871年4月12日，正是建立起巴黎公社的时候，馬克思在給庫格曼的信中写道：

……“如果你讀一下我的‘拿破侖第三政变記’的最后一章，你就会看到，我認为法国革命下一次的尝试不应该像以前那样，把官僚軍事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轉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应该把它摧毀”（着重号是馬克思加的；原文是zerbrechen），“这正是大陆上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我們英勇的巴黎同志們的尝试正是这样”（見“新时代”杂志第20卷1901—1902年第1期第709頁）¹⁰⁴。（馬克思的“給庫格曼的信”至少有两种俄文版本，其中有一种是由我校訂和作序的。⊖）

“摧毀官僚軍事国家机器”这几个字，已經把馬克思主义关于無产階級在革命中对国家的任务問題的主要教訓，简单地表明了。現在占統治地位的考茨基主义在“解釋”馬克思主义的时候不仅把这个教訓忘記了，而且还公然歪曲它！

馬克思从“拿破侖第三政变記”中摘录的話，我們在前面已經全部引用了。

在以上引証的馬克思的那段論述中，有两个地方是值得特別指出的。第一、他把他的結論只限于大陆。这在1871年是可以理解的，那时英国还是純粹資本主义国家的典型，还没有軍閥制度，大体上也沒有官僚制度。所以馬克思把英国除外，当时英国革命，甚至人民革命，很有可能不必以破坏“現成的国家机器为先决条件”。

⊖ 見“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第12卷第83—91頁。——編者注

現在到了 1917 年，在第一次帝国主义大战时期，馬克思的这种有限制的說法已經不适用了。英国和美国这两个全世界最大的和最后的盎格魯撒克遜“自由制”（从沒有軍閥制度和官僚制度这个意义來說）的代表，已經完全滾到一般欧洲式的、支配一切、压制一切的官僚軍事机关的污浊血腥的泥潭中去了。現在，無論在英国或美国，打碎、摧毁“現成的”（1914—1917 年間，这两个国家就达到了“欧洲式的”一般帝国主义的完备程度）“国家机器”，是“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

第二、馬克思說破坏官僚軍事国家机器是“任何一次真正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这个非常深刻的見解是值得特別注意的。“人民”革命这一概念出自馬克思的口中似乎是很奇怪的，俄国的普列汉諾夫分子和孟什維克，这些自命为馬克思主义者的司徒卢威的信徒，也許会說馬克思說这句话是“失言”。他們把馬克思主义曲解为非常貧乏的自由主义，在他們看来，除了資产階級革命和無产階級革命的对立以外，再沒有任何东西，而且他們对这种对立的了解也是非常死板的。

如果以 20 世紀的革命为例，那末無論葡萄牙革命或土耳其革命，当然都應該算是資产階級革命。但是無論前者或后者，都不是“人民”革命，因为人民群众，大多数人民，在这两次革命中显然都沒有積極地、独立地为自己的經濟要求和政治要求进行斗争。恰恰相反，1905—1907 年的俄国資产階級革命，虽然沒有取得像葡萄牙革命和土耳其革命某些时候得到的那些“輝煌”成績，但这無疑是一次“真正人民的”革命，因为人民群众，大多数人民，遭受压迫和剝削的社会最“底層”，都站起来了，提出自己的要求，要按照自己的方式建設新社会来代替正在破坏的旧社会，他們影响了整

个革命的进程。

1871年，欧洲大陆上任何一个国家的無产阶级都沒有占人民的多数。当时只有把無产阶级和农民都吸引到运动中的革命，才真正是人民多数的“人民”革命。当时的“人民”就是由这两个阶级构成的。这两个阶级因为都受“官僚軍事国家机器”的压迫、摧残和剝削而联合起来。打碎这个机器，摧毁这个机器，——这就是“人民”，人民的多数，即工人和大多数农民的真正利益，这就是貧苦农民同無产者自由联盟的“先决条件”，沒有这个联盟，民主制就不能稳固，社会主义改造就不能完成。

大家知道，巴黎公社曾为自己开辟过实现这个联盟的道路，但是，由于許多内部和外部的原因，沒有达到目的。

所以馬克思在談到“真正人民的革命”时，絲毫也沒有忘記小资产阶级的特点（关于这些特点，他說得很多而且常常說），他極严格地估計了1871年欧洲大陆上多数国家中实际的阶级对比关系。另一方面，他又指出，“打碎”国家机器是工人和农民双方的利益所要求的，这个要求使他們联合起来，在他們面前提出了消灭“寄生虫”、用一种新东西来代替它的共同任务。

究竟用什么东西来代替呢？

2. 用什么东西来代替被打碎的国家机器呢？

1847年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还十分抽象，更正确些說，只是指出这个任务，而沒有指出解决的方法。“無产阶级組織成为統治阶级”，“爭得民主”，这就是“共产党宣言”的回答。

無产阶级組織成为統治阶级究竟会采取怎样的具体形式，怎

样才能組織得同最完备最彻底的“民主”相适应，关于这个问题，馬克思并没有陷于空想，而是期待群众运动的經驗来解答。

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一書中曾对公社的經驗（尽管經驗很少）作过極仔細的分析。現在我們把該書中最重要的几段摘录下来：

中世紀产生的“集中的国家政权及其遍布各地的机关——常备軍、警察、官僚、僧侶、法官等級”，在19世紀已經發展起来了。随着劳資間階級对抗的發展，“国家政权就愈来愈变成压迫劳动的社会权力，变成階級統治的机器。在每次标志着階級斗争的一定进步的革命以后，国家政权的純粹压迫性質，也就日益公开地显露出来”。在1848—1849年革命以后，国家政权就成为“全国資本对劳动作战的武器”。第二帝国使这种情况巩固起来。

“公社是同帝国絕對相反的东西”。“它是共和国的一种形式，这种共和国不仅應該消灭階級統治的君主制形式，而且應該消灭階級統治本身”……

無产階級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这种”形式是怎样的呢？公社开始建立的国家是怎样的呢？

……“公社的第一个法令就是废除常备軍而用武装的人民来代替它”……

現在一切自命为社会主义的政党的綱領中都有这个要求。但是它們的綱領究竟有什么价值，这从我国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維克的行径中看得最清楚，实际上他們恰巧在2月27日革命以后就已經拒絕实现这个要求！

……“公社是由巴黎各区普选选出的城市代表組成的。这

些代表对选民負責，随时可以撤換。其中大多数自然都是工人，或者是公認的工人階級的代表”……

……“一向作为国家政府的工具的警察，立刻失去了一切政治职能，并变为公社中随时可以撤換的負責机关…… 其他各管理部門的官吏也是一样…… 从公社委員起，自上而下一切公职人員，都只应領取相当于工人工资的薪金。国家高級官吏所享有的一切特权及支付給他們的办公費，都随着这些官吏的消失而消失…… 公社在废除了常备軍和警察等旧政府物質权力的武器以后，立刻着手摧毀精神压迫的工具僧侶…… 法官已失去其表面的独立性……他們今后应该公开选出，对选民負責，并且随时可以撤換”……105

由此可見，公社用来代替被打碎的国家机器的，似乎“仅仅”是更完备的民主制；取消常备軍，对公职人員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和撤換制。但是这个“仅仅”，事实上意味着完全用一些原則上不同的机关来代替另一些机关。在这里恰巧看到了一个由“量变到質变”的实际例子：民主制达到了一般想像的最充分最徹底的程度以后，就会由資產階級的民主制变为無产階級的民主制，就会由国家（=鎮压一定階級的特別力量）变为一种已經不是原来的国家的東西。

鎮压資產階級及其反抗，仍然是必要的。这对公社尤其必要，公社失敗的原因之一就是在这方面做得不够坚决。但在这里实行鎮压的机关是居民中的大多数，而不是居民中的少数，同过去奴隶制、农奴制、雇佣奴隶制时代的情形完全相反。既然人民大多数亲自鎮压压迫自己的人，实行鎮压的“特別力量”也就不需要了！国家就在这个意义上开始消亡。人民大多数可以代替那些享有特权的少数人（享有特权的官吏、常备軍軍官）的特殊机关来直接进行

这些工作，而行使国家政权的职能愈是全民化，这个国家政权就愈不需要了。

在这方面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着重指出的公社所采取的措施：取消支付给官吏的一切办公费和一切金钱特权，把国家所有公职人员的薪金减到“工人工资”的水平。这里恰巧最明显地表现出一种转变：从资产阶级的民主制转变为无产阶级的民主制，从压迫者的民主制转变为被压迫阶级的民主制，从国家这个镇压一定阶级的“特别力量”转变为由人民大多数——工人和农民用共同的力量来镇压压迫者。正是在这特别明显的一点上，也许是国家问题的最重要的一点上，人们把马克思的教训忘得干干净净！通俗的解释（这种解释多不胜数）是不提这一点的。把这一点看作已经过时的“幼稚行为”，“照例”不讲它，正如基督教徒在基督教成为国教以后，便“忘记了”原始基督教带有革命民主精神的“幼稚行为”一样。

降低国家高级官吏的薪金，看来“不过”是幼稚的原始的民主主义的要求。最新的机会主义的“创始人”之一，以前的社会民主党人伯恩斯坦曾不止一次地玩弄过资产阶级嘲笑“原始的”民主主义的庸俗把戏。他同一切机会主义者及现在的考茨基主义者一样，完全不懂得：第一、如果不在某种程度上“回复”到“原始的”民主主义，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不这样做，怎么能够过渡到由大多数人民和全体人民行使国家职能呢？）；第二、以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文化为基础的“原始民主主义”同原始时代或资本主义以前的原始民主主义是不一样的。资本主义文化创立了大生产、工厂、铁路、邮政、电话等等，在这个基础上，旧的“国家政权”的绝大多数职能就变得很简单，只要简单地办理一些登记、填表、检

查等手續就行了，因此，每一個識字的人都完全能夠行使這些職能，行使這些職能只須付給普通“工人的工資”，並且可以（也應當）把這些職能中任何享受特權的“長官制”的殘余鏟除干淨。

對一切公職人員毫無例外地實行全面選舉制並可以隨時撤換，把他們的薪金減低到普通“工人工資”的水平，所有這些簡單的和“不言而喻”的民主措施必然會把工人和大多數農民的利益結合起來，同時也必然會成為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橋梁。這些措施關係到國家的純政治的社會改造，但是這些措施只有同正在實行或正在準備實行的“剝奪剝奪者”的措施聯繫起來，也就是同變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有制為社會公有制的措施聯繫起來，才會顯示出全部意義。

馬克思寫道：“公社實現了所有資產階級革命都提出的‘廉價政府’的口號，因為它取消了兩項最大的開支，即軍隊和官吏。”

農民同小資產階級其他階層一樣，他們當中只有極少數人能夠“上升”，能夠“出頭”（從資產階級的意義來說），即變成富人，變成資產者，變成生活上有保障和享有特權的官吏。在任何一个有農民的資本主義國家（這樣的資本主義國家占大多數），絕大多數農民是受政府壓迫的，是渴望推翻這個政府和渴望“廉價”政府的。能夠實現這一要求的只有無產階級，而無產階級實現了這一要求，也就是向國家的社會主義改造邁進了一步。

3. 議會制的消滅

馬克思寫道：“公社不應當是議會式的，而應當是同時兼管立法和行政的工作機關”……

……“普选制不是为了每三年或六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統治階級中的什么人在議會里代表和压迫（ver-und zertreten）人民，普选制应当为組織在公社里的人民服务，使他們能为自己的企業找到工人、监工和會計，正如个人选择的权利为了同一目的服务于任何一个工厂主一样。”

由于社会沙文主义和机会主义占了統治地位，这个在1871年对議會制提出的卓越批評，現在也成为馬克思主义中“被人遺忘的言論”了。以部长和議員为職業的人們，現今的無产階級叛徒和“实际的”社会主义者，把批評議會制的事情完全讓給無政府主义者去做，而根据这一理由又振振有詞地宣布，对議會制的任何批評都是“無政府主义”！！难怪“先进的”議會制国家的無产階級一看到謝德曼、大衛、列金、桑巴、列諾得尔、韓德遜、王德威尔得、斯陶宁格、布兰亭、比索拉蒂之流的“社会主义者”，就产生一种恶感，而日益同情無政府工团主义，尽管無政府工团主义是机会主义的亲兄弟。

但是，馬克思从来沒有像普列汉諾夫和考茨基等人那样，把革命的辯証法看做是一种时髦的空談或劲听的詞藻。馬克思善于無情地摺弃無政府主义，因为它不会利用資产階級議會制的“畜圈”，特别是在显然不具备革命形勢的时候，但同时馬克思又善于給議會制一种真正的革命無产階級的批評。

每隔几年决定一次究竟由統治階級中的什么人在議會里压迫、鎮压人民，——这就是資产階級議會制的真正本質，不仅在議會制的君主立宪国内是这样，而且在最民主的共和国内也是这样。

但是，如果提出国家問題，如果把議會看成是一个国家机关，那末就無产階級在这方面的任务來說，摆脱議會制的出路何在呢？

怎样才能避免議會制呢？

我們不得不一再指出，馬克思從研究公社中得出的教訓竟被現代的“社會民主黨人”（請讀作現代的社會主義叛徒）忘掉了，他們只知道對議會制的無政府主義批評或反動批評，簡直不懂得任何其他批評。

擺脫議會制的出路，當然不在於取消代表機關和廢除選舉制，而在於把代表機關由清談館變為“工作”機關。“公社不應當是議會式的，而應當是同時兼管立法和行政的工作機關”。

“不應當是議會式的，而應當是工作”機關，這正好打中了現代社會民主黨議會議員和議會“哈巴狗”們的要害！請看一看任何一個議會制的國家，從美國到瑞士，從法國到英國和挪威等等，那里真正的“國家”工作是在后台決定而由各部、官廳和司令部來執行的。議會為了愚弄“老百姓”，專門從事空談。這是千真萬確的事實，甚至在俄國這樣的共和國，在這個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還沒有來得及建立真正的議會以前，議會制的所有這些弊病就已經顯露出來了。腐朽的市儈英雄們，如斯柯別列夫和策烈鐵里之流，切爾諾夫和阿夫克森齊也夫之流，竟按最卑鄙的資產階級議會主義方式來玷污蘇維埃，把它變成了清談館。在蘇維埃里，“社會主義的”部長先生們用空談和決議來愚弄輕信的農民。在政府里，則不斷更換角色，一方面為的是依次讓更多的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尝尝高官厚祿的“甜頭”，另一方面為的是“轉移”人民的“視線”。而“國家”工作却在官廳和司令部里“作”！

執政的“社會革命黨”的機關報“人民事業報”不久以前在一篇社論中，用“大家”都以政治賣淫為業的“好社會”中的人物的坦率口吻自供說，甚至在“社會主義者”（請原諒我用這個名詞！）管的各

部中，全體官吏實際上原封未動，他們像從前一樣行使着職權，十分“自由地”對革命的創舉實行怠工！即使沒有這個自供，社會革命黨人和孟什維克參加政府的事實不也證明了這一點嗎？這裡值得注意的是，同立憲民主黨人一起呆在政府官場里的切爾諾夫、魯薩諾夫、晉集諾夫之流以及“人民事業報”的其他編輯先生，竟毫不害羞地、滿不在乎地當眾宣布說，在“他們的”各部中一切照舊！！革命民主的詞句是用來愚弄鄉下人的，官僚主義官廳的拖拉作風則是為了博得資本家的“歡心”，這就是“真誠的”聯合政府的實質。

在公社用來代替資產階級社會貪污腐敗的議會制的機關中，發表意見和討論的自由不會流為騙局，因為議員必須親自工作，親自執行自己通過的法律，親自檢查在實際生活中執行的結果，親自對選民負責。代表機關仍然存在，然而作為一種特殊的機構，作為立法和行政的分工以及議員們享有特權的議會制，在這裡是不存在的。如果沒有代表機關，那我們就很難想像有什麼民主制，也很難想像有無產階級的民主制；但是，如果我們對資產階級社會的批評不是空談，如果推翻資產階級統治的願望是我們真正的和真誠的願望，而不是像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謝德曼、列金、桑巴、王德威爾得之流的那種騙取工人選票的“競選”詞句，那我們可以而且應當不要議會制。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馬克思在談到既為公社需要、又為無產階級民主制需要的那種官吏機構的職能時，他拿“任何一個工廠主”雇用的人員來加以比較，即拿雇用“工人、監工和會計”的普通資本主義企業來加以比較。

馬克思絲毫沒有陷入空想主義，他沒有虛構和幻想“新”社會。相反，他把從舊社會誕生新社會、從前者進到後者的過渡形式，

作为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来研究。他吸取無产階級群众运动的实际經驗，竭力从这个經驗中取得实际教訓。他向公社“学习”，正像一切伟大的革命思想家不怕向被压迫階級的伟大运动的經驗学习一样，他对这个运动从来没有講过一句学究式的“訓言”（像普列汉諾夫所說的“本来是不需要拿起武器的”，或策烈铁里所說的“階級应当自己約束自己”）。

立刻徹底消灭各地的官吏机构是談不到的。这是空想。但是立刻打碎旧的官吏机器，开始建立一个新的机器，逐步消灭一切官吏机构，这并不是空想，这是公社的經驗，这是革命無产階級当前的直接任务。

資本主义使“国家”管理机关的职能簡化了，使我們有可能抛弃“长官制”，把全部事情交給以全社会名义雇用“工人、监工和會計”的無产者（統治階級）組織。

我們不是空想主义者，我們决不“梦想”立刻取消任何管理制度和任何从屬关系；这种由于不了解無产階級专政的任务而产生的無政府主义梦想，是与馬克思主义根本不相容的。实际上这种梦想只会把社会主义革命拖延下去，直到人們变成另一种人的时候。我們不是这样，我們希望由現在的人們来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現在的人們沒有从屬关系、沒有监督、沒有“监工和會計”是不行的。

但是应当服从的是一切被剝削劳动者的武装先鋒队——無产階級。国家官吏的特殊“长官制”可以并且應該在一天之內用“监工和會計”的簡單职能来代替，这些职能現在只要有一般市民水平的人就能胜任，只要發給“工人的工資”就完全能够执行了。

我們工人将以資本主义創造的成果为基础，依靠自己的經驗

来亲自組織大生产,建立依靠武装工人的国家政权来维护的最严格的铁的紀律,使国家官吏成为不过是执行我們的委托的工作人员,使他們成为对选民負責的、随时可以撤換的而且是領取普通薪金的“监工和會計”(当然还要用各式各样的和具有各种水平的技术人员),这就是我們無产阶级的任务,無产阶级革命实现以后,就可以而且应该从这里开始做起。在大生产的基础上,这个开始自然会使一切官吏机构逐渐“消亡”,使这个不带引号的、与雇佣奴隶制不同的秩序逐渐建立起来,在这个秩序下,日益簡化的监督和报告的职能将由大家輪流行使,等到大家逐渐習慣了遵守秩序,这些职能也就不成其为特殊阶层的特殊职能了。

19世紀70年代,有一位聪明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認為邮政是社会主义經濟的范例。这是非常正确的。目前邮政是按国家资本主义垄断組織形式組織的一种經濟。帝国主义逐渐把所有托拉斯都变为这种类型的組織。現在压在那些工作繁重、忍飢挨餓的“粗笨的”劳动者头上的也正是这个资产阶级的官僚机构。但是社会管理机构在这里已經准备好了。只要推翻资本家,用武装工人的铁拳粉碎这些剝削者的反抗,摧毁現代国家的官僚机器,我們就会有一个排除了“寄生虫”而拥有高度技术设备的机构,这个机构完全可以由已經团结起来的工人亲自使用,雇用一些技术人员、监工和會計,付給所有这些人的工資,也像付給所有“国家”官員的工資一样,将相当于工人的工資。这就是对一切托拉斯的具体、实际而且立即可行的任务,这样做会使劳动者免除剝削,并估計到了公社在实践中創造的經驗(特别是在国家建設方面的經驗)。

把整个国民經濟組織得像邮政一样,使技术人员、监工、會計以及所有公职人員所領的薪金不超过“工人的工資”,使他們受武

裝無产階級的監督和領導，這就是我們最近的目标。我們所需要的正是建立在這樣的經濟基礎上的國家。這樣才能消滅議會制而保留代表機關，這樣勞動階級才能使這些機關不受資產階級的糟蹋。

4. 民族統一的建立

……“公社在它沒有來得及進一步加以發揮的全國組織綱要上十分肯定地說，公社甚至應該……成爲一個最小村落的政治形式”……巴黎“國民代表機關”也應當由各公社選舉出來。

……“那時仍由中央政府行使的一些爲數不多而又非常重要的職能不應該廢除（斷言應該廢除是有意的捏造），而應該交給公社的官吏，即交給那些真正負責的官吏”……

……“民族的統一不應該消滅，相反地應該借助於公社的機構建立起來。要實現民族的統一，必須消滅以民族統一的體現者自居同時却脫離民族、駕於民族之上的國家政權。實際上這個國家政權只是民族軀體上的寄生贅疣”……“任務就在於鏟除舊政權的純粹壓迫機關，把這個妄圖駕於社會之上的政權的合理職能奪過來，交給社會上負責的公僕”。

叛徒伯恩施坦所著的遺臭萬年的“社會主義的先決條件和社會民主黨的任務”一書，再清楚不過地表明現代社會民主黨內的機會主義者是多麼不了解，或者更正確些說，是多麼不願意了解馬克思的這些論述。伯恩施坦在談到馬克思上述的一段話時寫道，這個綱領“就其政治內容來說，在一切要點上都十分類似蒲魯東主張的聯邦制…… 不管馬克思和‘小資產者’蒲魯東（伯恩施坦把“小

資者”这几个字放在引号内大概是表示諷刺)之間有种种分歧,可是在这些要点上,他們的思維过程是再接近不过的”。伯恩施坦接着又說:自然,市政局的作用更加重要了,但是,“我怀疑民主制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废除(Auflösung——直譯是解散、融解)现代国家和完全改变(Umwandlung——变革)其組織,像馬克思和蒲魯东所想像的那样:由各省或各州的會議选出代表組織全国會議,而各省或各州的會議則由各公社选出代表組成,这样,全国代表机关的旧形式就会完全消失”(伯恩施坦:“先决条件”1899年德文版第134頁和136頁)。

把馬克思关于“消灭寄生虫式的国家政权”的观点同蒲魯东的联邦制混为一談,这簡直是駭人听闻的事!但这不是偶然的,因为机会主义者从来沒有想到,馬克思在这里談的根本不是要建立同集中制对立的联邦制,而是要打碎一切資产階級国家里旧的資产階級国家机器。

机会主义者所想到的,只是在自己周围、在庸俗的市僧人物中和停滞的“改良主义”环境中看到的東西,只是看到了“市政局”!至于無产階級革命,机会主义者連想都沒有想过。

这是很可笑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点上竟沒有人同伯恩施坦进行过爭論。許多人都曾駁斥过伯恩施坦,特别是俄国著作界的普列汉諾夫和西欧著作界的考茨基,但是,無論前者或后者都沒有談到伯恩施坦对馬克思的这一歪曲。

机会主义者不会用革命的头脑来思考革命,他們竟把“联邦制”强加在馬克思头上,把他同無政府主义的始祖蒲魯东混为一談。而想成为正統派馬克思主义者、想捍衛革命的馬克思主义學說的考茨基和普列汉諾夫却对此默不作声!这就是考茨基主义者

和机会主义者如此庸俗地認識馬克思主义同無政府主义的区別的根源之一，关于这种庸俗的观点，我們以后还要講到。

在上述的馬克思关于公社經驗的論述中根本沒有談到联邦制。馬克思和蒲魯东相同的地方，恰巧是机会主义者伯恩施坦看不到的；而馬克思和蒲魯东不同的地方，恰巧是伯恩施坦認為相同的。

馬克思和蒲魯东相同的地方，就在于他們两人都主张“打碎”現代国家机器。馬克思主义同無政府主义（不管是蒲魯东或巴枯宁）这一相同的地方，無論机会主义者或考茨基派都不願意看見，因为他們在这一点上离开了馬克思主义。

馬克思同蒲魯东和巴枯宁不同的地方，恰巧就在联邦制問題上（更不用說無产階級专政的問題了）。联邦制在原則上是从無政府主义的小資产階級观点产生的。馬克思是主张集中制的。在他上述的那段論述中，絲毫也沒有离开集中制。只有对国家充滿市儈“迷信”的人們，才会把消灭資产階級国家机器看成是消灭集中制！

無产階級和貧苦农民把国家政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十分自由地組織在公社內，采取一致行动打击資本，粉碎資本家的反抗，把铁路、工厂、土地以及其他私有财产交給整个民族、整个社会，难道这不是集中制嗎？难道这不是最徹底的民主集中制、而且是無产階級的集中制嗎？

伯恩施坦根本沒有想到可能有自願的集中制，可能使各公社自願結合为統一的民族，可能使無产階級的公社在破坏資产階級統治和資产階級国家机器的事業中自願溶合在一起。伯恩施坦同其他所有的庸人一样，以为集中制是只能从上面、只能由官吏和軍

閥强迫实行和维持的东西。

馬克思似乎預料到会有人歪曲他的这些观点，所以故意着重指出，如果非难公社取消民族的統一、废除中央政权，那就是有意的捏造。他故意用“建立民族統一”这句话，以便把自觉的、民主的、無产阶级的集中制同资产阶级的、軍閥的、官吏的集中制对立起来。

但是……不願意听的人比聋子还要聋。現代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者正是不願意听消灭国家政权、鏟除寄生虫这样的话的人。

5. 消灭寄生虫式的国家

我們已經引用了馬克思有关这个问题的言論，現在再引几段。

馬克思写道：……“人們往往把新的历史創举当作是抄袭旧的、甚至已經过时的社会生活形式，只要新的机关稍微与这些形式有点相似。这就是新的历史創举的通常命运。于是摧毁（bricht——打碎）現代国家政权的新公社，也就被看作中世紀公社的复活……看作許多小国家的联盟（孟德斯鳩，吉倫特派）……看作从前反对过分集中的斗争的扩大形式”……

……“公社制度将把迄今靠社会供养而又阻碍社会自由發展的寄生贅疣——‘国家’所吞食的一切力量归还給社会机体。仅仅这一点就会把法国的复兴向前推进了”……

……“公社制度会使农村生产者在精神上受各省主要城市的领导，保証他們能够得到城市工人做自身利益的天然代表者。公社的存在自然而然会带来地方自治，但这种地方自治已經不是用来对抗現在已經成为废物的国家政权的東西

了”……

消灭“国家政权”这个“寄生赘疣”，“铲除”它，“破坏”它；“国家政权现在已经成为废物”，——马克思在评价和分析公社的经验时，关于国家就是这样谈的。

所有这些都是在大約半世紀以前写的，現在必須把这些話發掘出来，使广大群众能够認識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馬克思觀察了他經歷的最后一次大革命之后做出的結論，恰巧在新的無产階級大革命时代到来的时候被人遺忘了。

……“人們对公社的各种估計以及公社所代表的利益証明，公社是一个高度灵活的政治形式，而一切旧有的政权形式在本質上都是压迫者的政权。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實質上是工人階級的政府，是生产者階級同占有者階級斗争的結果，是終于發現的、可以使劳动者在經濟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

“如果没有最后这个条件，公社制度就沒有实现的可能，而是一个騙局”……

空想主义者从事于“發現”可以使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各种政治形式。無政府主义者避而不談一般政治形式的問題。現代社会民主党內的机会主义者則認為，資產階級議會制民主国家的政治形式是不可逾越的極限，他們对着这个“典范”磕头磕得头破血流，他們宣布摧毁这种政治形式的任何意圖都是無政府主义。

馬克思从社会主义和政治斗争的全部历史中得出結論：国家一定会消逝；国家消逝的过渡形式（从国家到非国家的过渡），将是“組織成为統治階級的無产階級”。但是，馬克思並沒有去發現这个未来的政治形式。他只是确切地考察和分析了法国历史，正确

地得出了 1851 年事变的結論：問題在于 破坏 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

当无产阶级群众革命运动爆發的时候，尽管这个运动遭到挫折，尽管这个运动为期很短而且有显著的弱点，馬克思还是来研究这个运动究竟 发现了 怎样的政治形式。

公社是由无产阶级革命“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者在經濟上获得解放的形式。

公社是无产阶级革命 打碎 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第一次尝试，是“终于发现的”政治形式，这个政治形式可以而且应该用来 代替 已被打碎的国家机器。

我們往下就会看到，俄国 1905 年革命和 1917 年革命在另一个环境和另一种条件下繼續着公社的事業，証实着馬克思这种天才的历史分析。

第 四 章

續前 恩格斯的补充說明

馬克思对公社經驗的意义問題指出了基本的要点。恩格斯不止一次地談到这个問題，說明馬克思的分析和結論，并且非常有力非常突出地闡明这个問題的其他 方面，因此我們必須特別来談談这些說明。

1. “住宅問題”

恩格斯在他論住宅問題的著作（1872 年出版）中，已經估計到

了公社的經驗，并且屢次談到革命對於國家的任務。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談到這個具體問題時，一方面明顯地說明了無產階級國家同現代國家相似的特征，根據這些特征我們可以把前者 and 後者都稱為國家；另一方面他又說明了二者之間不同的特征，即無產階級國家是要逐漸消亡的。

“怎樣解決住宅問題呢？在現在的社会里，解決這個問題同解決其他一切社會問題完全一樣，即靠供求關係在經濟上的逐漸均衡來解決，但是這樣解決之後這個問題還會不斷產生，也就是說，等於沒有解決。社會革命將怎樣解決這個問題呢？這不僅要以時間地點為轉移，而且也同一些帶根本性的問題有關，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消滅城鄉對立的問題。既然我們不預備憑空設想未來社會結構的制度，也就用不着在這上面浪費時間。但有一點是肯定的，現在各大城市中有足夠的住宅，只要合理使用，就能夠使真正需要住宅的人立刻得到幫助。當然，要實現這一點，就必須剝奪現在的房東，讓沒有房子住或住得很擠的工人搬到這些住宅里去。只要無產階級取得了政權，這種有關社會福利的措施就會像現代國家剝奪其他東西的措施和占據住宅那樣容易實現。”（1887年德文版第22頁）¹⁰⁶

這裡沒有談國家政權形式的改變，只是談到了國家政權活動的內容。根據現代國家的命令也是要剝奪住宅和占據住宅的。無產階級的國家，從形式上來講，也會“下令”占據和剝奪住宅。但是很明顯，舊的執行機關，即與資產階級勾結的官吏機構，是完全不能執行無產階級國家的命令的。

……“必須指出，由勞動人民實際占有一切勞動工具和全

部工業，是同蒲魯东主义的‘贖买’政策完全相反的。如果采用后一种措施，則每个工人将成为某一所住宅、某一塊土地、某些劳动工具的所有者；如果采用前一种措施，則‘劳动人民’将成为全部住宅、工厂和劳动工具的集体所有者。这些住宅、工厂等等，至少在过渡时期还未必会毫無代价地分配給个人或共耕社使用。同样，消灭土地私有制不是消灭地租，而是用另一种形式把地租轉交給社会。所以由劳动人民实际占有一切劳动工具，無論如何都不排斥承租和出租。”(第 68 頁)①

我們在下一章将要考察在这段論述中提到的問題，即关于国家消亡的經濟基础的問題。恩格斯非常謹慎，他說無产階級国家“至少在过渡时期”“未必”会毫無代价地分配住宅。把屬於全民的住宅租給个别家庭就要征收租金，要实行一定的监督并規定分配住宅的某种标准。这一切都要求有一定的国家形式，但決不需要特别的軍事官僚机关及其享有特权的长官。至于过渡到免費分配住宅，那是与国家的完全“消亡”联系着的。

恩格斯談到布朗基主义者在公社以后因受到公社經驗的影响而轉到馬克思主义的原則立場上的时候，曾順便把这个立場表述如下：

……“無产階級必須采取政治行动、实行专政，是为了过渡到废除階級并废除国家”……(第 55 頁)②

那些喜欢咬文嚼字的批評家或者“糟蹋馬克思主义”的資產階級分子大概以为，在这里承認“废除国家”，在上述“反杜林論”的

① “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 1954 年莫斯科中文版第 1 卷第 605 頁。——譯者注

② 同上第 589 頁。——譯者注

一段論述中又把這個公式當作無政府主義的公式加以否定，這是矛盾的。如果機會主義者把恩格斯算作“無政府主義者”，那並沒有什麼奇怪，因為社會沙文主義者斥責國際主義者是無政府主義者的做法現在已經成為一種風氣了。

國家會隨着階級的廢除而廢除，這是馬克思經常教導我們的。“反杜林論”的那段人所共知的關於“國家消亡”的論述，並不是單純斥責無政府主義者主張廢除國家，而是斥責他們宣傳可以“在一天之內”廢除國家。

現在占統治地位的“社會民主主義”學說把馬克思主義在消滅國家問題上對無政府主義的態度完全歪曲了，因此我們來回憶一下馬克思和恩格斯同無政府主義者的一次論戰，是特別有益的。

2. 同無政府主義者的論戰

這次論戰發生在1873年。馬克思和恩格斯曾經把駁斥蒲魯東主義者、“自治派”或“反權威主義者”的論文寄到意大利，收在一本社會主義文集里，這些論文在1913年才譯成德文發表在“新時代”雜誌上¹⁰⁷。

馬克思譏笑無政府主義者否認政治時寫道，……“如果工人階級的政治鬥爭採取革命的形式，如果工人建立起自己的革命專政來代替資產階級專政，那他們就犯了侮辱原則的莫大罪行，因為工人為了滿足自己低微的起碼的日常需要，為了打破資產階級的反抗，竟不放下武器，不廢除國家，而賦予國家以革命的暫时的形式”……（“新時代”雜誌1913—1914年第32卷第1期第40頁）

馬克思在駁斥無政府主義者時，只是反對這樣的“廢除”國家！

馬克思完全不是反對國家將隨階級的消逝而消逝，或國家將隨階級的廢除而廢除，而是反對要工人拒絕運用武器，拒絕運用有組織的暴力，即拒絕以“打破資產階級反抗”為目的的國家。

馬克思故意着重指出無產階級所需要的國家具有“革命的暫時的¹形式”，以免人們歪曲他同無政府主義者鬥爭的真實意義。無產階級需要國家只是暫時的。我們和無政府主義者都認為廢除國家是目的，在這個問題上完全沒有分歧。但我們肯定地說，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就必須暫時運用國家政權的武器、工具、手段去反對剝削者，正如為了消滅階級，就必須實行被壓迫階級的暫時專政一樣。馬克思在駁斥無政府主義者時，把問題提得非常尖銳，非常明確：工人在推翻了資本家的壓迫以後，應當“放下武器”呢，還是應當利用它來反對資本家，粉碎他們的反抗？一個階級有步驟地運用武器反對另一個階級，如果不採用國家那種“暫時的¹形式”，又採用什麼呢？

每一個社會民主黨人都應該問問自己：他在同無政府主義者論戰時是這樣提出國家問題的嗎？第二國際絕大多數正式社會主義政黨是這樣提出國家問題的嗎？

恩格斯更加詳盡更加通俗地闡明了這個思想。他首先譏笑蒲魯東主義者的糊塗觀念，他們自命為“反權威主義者”，否認任何權威、任何服從、任何權力。恩格斯說，試拿工廠、鐵路、航海的輪船來說，這是一些使用機器的、很多人有計劃地共同工作的複雜技術企業，如果沒有某種從屬關係，沒有某種權威或權力，那就沒有一樣能夠開動起來，這難道還不明顯嗎？

恩格斯寫道：……“如果我拿這種論據來反對最頑固的反權威主義者，那他們只能這樣回答：‘是啊！這是對的，但這裡

說的並不是我們賦予我們的代表的那種權威，而是說的某種委託。’ 這些人以為只要改變某一事物的名稱，就可以改變這一事物本身”……

恩格斯由此指明了權威和自治都是相對的概念，運用它們的範圍隨着社會發展的不同階段而改變，把它們看作絕對的東西是荒謬的，並且補充說，使用機器和大規模生產的範圍在日益擴大，然後恩格斯從權威問題的一般論述談到國家問題。

恩格斯寫道：……“如果自治派僅僅是想說將來的社會組織只會在生產條件所必然要求的限度內允許權威存在，那也許還可以同他們說得通。但是，他們閉眼不看一切使權威成為必要的事實，只是拚命反對名詞。

為什麼反權威主義者不只是限于高喊反對政治權威和反對國家呢？所有的社會主義者都一致認為，國家以及政治權威將由於未來的社會革命而消逝，也就是說，社會職能將失去其政治性質，而變成關心社會利益的簡單管理職能。但是，反權威主義者卻要求在那些產生政治國家的社會關係廢除以前，一舉把政治國家廢除。他們要求社會革命的第一個行動就是廢除權威。

這些先生見過一次革命沒有？革命無疑是天下最有權威的東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槍炮、刺刀，即用非常權威的手段迫使另一部分人服從自己的意志。而獲得勝利的政黨往往不得不用自己的武器使反動派感到畏懼，來維持自己的統治。要是巴黎公社沒有依靠武裝人民的權威來反對資產階級，它能支持一天以上嗎？反過來說，難道我們沒有理由責備公社把這個權威用得太多嗎？總之，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反權

威主義者自己不知所云，如果是這樣，那他們只是在散布糊塗觀念；或者是他們知道這一點，如果是這樣，那他們就是背叛無產階級的事業。在這兩種情況下，他們都只是為反動派效勞。”（第39頁）^①

在這段論述中涉及了在考察國家消亡時期政治與經濟的相互關係（下一章要專門論述這個問題）時應該考察的問題。那就是關於社會功能由政治功能變為簡單管理功能的問題和關於“政治國家”的問題。後面這個名詞特別容易引起誤會，它是指處在消亡過程中的國家，因為正在消亡的國家在它消亡的一定階段，才可以叫做非政治國家。

恩格斯這段論述中最精彩的地方，又是他用來反駁無政府主義者的問題提法。願意做恩格斯的學生的社會民主黨人，從1873年以來同無政府主義者爭論過幾百萬次，但他們在爭論時所採取的態度，恰巧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可以而且應該採取的。無政府主義者對廢除國家的觀念是糊塗的，而且是不革命的，恩格斯就是這樣提出問題的。無政府主義者不願看見的，正是革命的產生和發展，以及革命對暴力、權威、政權、國家的特殊任務。

現在社會民主黨人通常對無政府主義者的批評，可以歸結為純粹市僧式的極其庸俗的一句話：“我們承認國家，而無政府主義者不承認！”這樣庸俗的論調自然不能不使那些稍有思想的革命工人感到厭惡。恩格斯就不是這樣談問題的。他着重指出，所有的社會主義者都承認國家的消逝是社會主義革命的結果。然後他具體提出了關於革命的問題，這個問題機會主義的社會民主黨人通

^① “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1954年莫斯科中文版第1卷第613—614頁。

——譯者注

常是避而不談的，他們把它留給無政府主義者來專門“研究”。恩格斯一提出這個問題就抓住了問題的關鍵：公社難道不應該更多地運用國家的革命政權，即運用武裝起來並組織成爲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的革命政權嗎？

現在占統治地位的正式社會民主派，對於無產階級在革命中的具體任務問題，通常是簡單地用庸俗的譏笑口吻來敷衍，至多也不過是用詭辯來搪塞，說什麼“將來再看吧”。因此無政府主義者有權攻擊社會民主派，責備他們背棄了對工人進行革命教育的任務。恩格斯運用最近這次無產階級革命的經驗，正是爲了十分具體地研究一下無產階級對銀行和國家究竟應該怎麼辦。

3. 給倍倍爾的信

恩格斯在1875年3月18—28日給倍倍爾的信中有下面這樣一段話，這段話在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國家問題的著作中，如果不算是最精彩的論述，也得算是最精彩的論述之一。附帶說一下，據我們所知，倍倍爾第一次發表這封信是在他1911年出版的回憶錄（“我的一生”）第2卷里，也就是說在恩格斯發出這封信的三十六年之後。

恩格斯在給倍倍爾的信里批判了馬克思在給白拉克的有名的信里批判過的哥達綱領草案，並且特別談到了國家問題，他寫道：

……“自由的人民國家變成了自由國家。從字面上看，自由國家就是可以自由對待本國公民的國家，即具有專制政府的國家。應當拋棄這一切關於國家的廢話，特別是在巴黎公社以後，公社已經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國家了。無政府主義者用‘人民國家’這一個名詞把我們挖苦得很夠了，雖然馬克思

駁斥蒲魯东的著作以及后来的‘共产党宣言’都已經直接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建立以后，国家就会自行消散(sich auflös:)和消失。既然国家只是在斗争中、在革命中用暴力镇压敌人的一种暂时机关，那末所谓自由的人民国家就纯粹是無稽之談。無产階級还需要国家的时候，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到了有可能来談自由的时候，国家就不成其为国家了。因此，我們建議把‘国家’一詞全部改成‘公团’(Gemeinwesen)，这是一个極好的德文古詞，相当于法文中的‘公社’。”(德文原本第321—322頁)¹⁰⁸

应当指出，在这封信里談到了党綱，几星期以后，馬克思在一封信(馬克思的信写于1875年5月5日)里批判的党綱就是这个党綱；当时恩格斯和馬克思一起住在倫敦，因此，恩格斯在最后一句話里用“我們”二字，無疑是以他自己和馬克思的名义向德国工人党的領袖建議，把“国家”一詞从党綱中去掉，用“公团”来代替。

如果向現在这些为迁就机会主义者而伪造的“馬克思主义”的首領們建議这样来修改党綱，那他們該会怎样大叫大罵“無政府主义”呵！

讓他們叫罵吧。資产階級会因此称贊他們的。

我們还是要做我們自己的事情。在审查我們的党綱时，絕對必須考虑恩格斯和馬克思的意見，以便更接近真理，以便恢复馬克思主义，清除歪曲馬克思主义的一切言論，更正确地指导工人階級爭取自身解放的斗争。在布尔什維克当中大概不会有人反对恩格斯和馬克思的意見。困难也許只是在名詞上。德文中有两个詞都作“公团”解释，恩格斯用的那个詞不是指单独的公团，而是指公团的总和即公团体系。俄文中沒有这样一个詞，也許只好采用法

文中的“公社”一詞，虽然这个詞也有它的不便之处。

“公社已經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这是恩格斯在理論上最重要的論断。看了上文以后，这个論断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公社已經不成其为国家了，因为公社所要鎮压的不是大多数居民，而是少数居民（剝削者）；它已經打碎了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居民已經自己上台来代替实行鎮压的特別力量。所有这一切都已經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了。如果公社得到巩固，那末公社的国家痕迹就会自行“消亡”，它就用不着“废除”国家机关，因为国家机关将無事可做而逐渐失去其作用。

“無政府主义者用‘人民国家’这一个名詞挖苦我們”，——恩格斯的这句话首先是指巴枯宁和他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攻击說的。恩格斯認為他攻击得对，因为“人民国家”和“自由的人民国家”这两种說法都是荒謬的，都是离开社会主义的。恩格斯力圖糾正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在反对無政府主义者的斗争中的偏差，使这个斗争在原則上正确，清除它在“国家”問題上的种种机会主义偏見。真可惜！恩格斯的这封信竟被擱置了三十六年。我們在下面可以看到，就在这封信發表以后，考茨基实际上还是頑固地重犯恩格斯警告过的那些錯誤。

倍倍尔在1875年9月21日写回信給恩格斯，信中順便談到他“完全同意”恩格斯对綱領草案的意見，并說他責备了李卜克內西的讓步态度（見倍倍尔的回忆录德文版第2卷第334頁）。但是把倍倍尔的“我們的目的”（《Unsere Ziele》）这本小册子拿来，我們就可以看到一些关于国家的完全不正确的議論：

“必須把基于阶级統治的国家变成人民国家。”（“我們的目的”1886年德文版第14頁）

这就是倍倍尔那本小册子第九版(第九版!)中的話。难怪德国社会民主党还是如此頑固地重复着关于国家問題的机会主义議論，特别是在恩格斯所作的革命解释被人埋藏起来而整个生活环境又长期使人“忘記”革命的时候。

4. 爱尔福特綱領草案批判

在分析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說时，不能不提到恩格斯在1891年6月29日寄給考茨基而过了十年以后才在“新时代”杂志上發表的爱尔福特綱領草案¹⁰⁹批判，因为这篇文章主要是批判社会民主党在国家結構問題上的机会主义观点的。

順便指出，恩格斯还对經濟問題作了一个非常宝贵的指示，这說明恩格斯是如何細心、如何深刻地考察了現代資本主义的种种变化，从而說明了他是如何善于在一定程度上預先想到当前帝国主义时代的任务。这个指示是恩格斯在談到該綱領草案用“無計划”(Planlosigkeit)这几个字來說明資本主义的特征时作的，他写道：

……“当股份公司演进到統治并垄断許多工業部門的托拉斯的时候，不仅私人生产停止了，而且無計划的現象也沒有了。”(見“新时代”杂志第20卷1901—1902年第1册第8頁)

这里指出了对現代資本主义即帝国主义的理論評价中最主要的东西，即資本主义变成了垄断資本主义。后面这四个字必須加上着重号，因为目前最普遍的一种錯誤就是根据資產階級改良主义的观点来断定，垄断資本主义或国家垄断資本主义已經不是資本主义，已經可以称为“国家社会主义”等等。完备的計划性当然是托拉斯所从来沒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尽管托拉斯有一点計划

性，尽管資本大王們預先考慮到了一国範圍內甚至国际範圍內的生產規模，尽管他們有計劃地調節生產，但是現在還是处在資本主義下，雖然是在它的新階段，但無疑還是資本主義。在無產階級的真正代表看來，這種資本主義之“接近”社會主義，只是證明社會主義革命已經接近，已經不難實現，已經可以實現，已經不容延緩，而決不是證明可以容忍一切改良主義者否認社會主義革命和粉飾資本主義的言論。

現在我們回過來講國家問題。恩格斯在這裡作了三類特別寶貴的指示：第一類是关于共和國問題；第二類是关于民族問題和國家結構的聯繫；第三類是关于地方自治。

关于共和國，恩格斯把它作為批判愛爾福特綱領草案的重點。如果我們還記得當時愛爾福特綱領在整个國際社會民主運動中具有怎樣的意義，它怎樣成了整个第二國際的模範綱領，那末可以毫不夸大地說，恩格斯在這裡是批判了整个第二國際的機會主義。

恩格斯寫道：“草案提出的政治要求有一個很大的缺點。

草案中沒有說（着重號是恩格斯加的）本來應當說的東西。”

其次，恩格斯解釋道，德國的憲法實質上是 1850 年最反動的憲法的抄本；正如威廉·李卜克內西所說的，德國議會只是“專制制度的遮羞布”；想在規定各小國存在、日耳曼各小國結成聯盟的憲法的基础上把“一切勞動工具變為公共財產”，那“顯然是荒謬的”。

“談論這個問題是危險的”，——恩格斯補充說，因為他深知在德國不能在綱領中公開提出建立共和國的要求。但是，恩格斯並不因為這個理由很明顯，“大家”都滿意，就這樣算了。他接着說：“但是，無論如何，事情總是要被人推進的。現在大部分社會民主黨的刊物都在散布（einreissende）機會主

义，这就说明提出这个要求是多么必要。现在人们因害怕反社会党人法令重新宣布有效，或回想起在这个法令的统治下发表的几篇过早的声明，就想要党承认德国的现行法制能够和平地实现党的一切要求”……

恩格斯把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行动是出于害怕非常法令重新宣布有效这个主要事实提到首位，毫不犹豫地称之为机会主义，而且说明，正是因为德国没有共和制和自由，所以走“和平”道路的想法是十分荒谬的。但恩格斯非常谨慎，他没有把问题说死了。他承认，在有共和制或有充分自由的国家里，和平地向社会主义发展是“可以想像”的（仅仅是“想像”！），但是在德国，他重复说：

……“在德国，政府几乎有無上的权力，议会和其他一切代表机关都没有实权，因此，在德国宣布某种类似的做法，在没有任何必要时宣布这种做法，就是揭去专制制度的遮羞布，自己去替它遮羞”……

德国社会民主党把这些指示“束之高阁”，党的绝大多数正式领袖果然就成了专制制度的掩护者。

……“这种政策归根到底只能把党引入迷途。他们把一般的抽象的政治问题提到首要地位，从而把那些在巨大事变和政治危机一旦发生就会自然而然地提到日程上来的迫切的具体问题掩盖起来。其结果只会使党在紧要关头突然陷于束手无策的地步，使党对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看法模糊、缺乏一致的见解，因为这些问题从来没有经过讨论……

为了眼前暂时的利益而忘记根本大计，只图一时的成就而不顾后果，为了目前而牺牲未来的运动，这种做法也许是出于‘真诚的’动机。但这是机会主义，始终是机会主义，而且

‘真誠的’机会主义也許比其他一切机会主义更危險……

毫無疑義的是，我們黨和工人階級只有在民主共和國這種政治形式下才能實行統治。這種民主共和國甚至是適用於無產階級專政的一種特殊形式，這一點已經被法國大革命證明了”……

恩格斯在這里特別明確地重述了像紅綫一樣貫穿在馬克思的一切著作中的基本思想，這就是：民主共和國是走向無產階級專政的捷徑。這樣的共和國雖然絲毫沒有消除資本的統治，因而也絲毫沒有消除對群眾的壓迫和階級鬥爭，但是，它必然會使這個鬥爭擴大、展開和尖銳化，以致一有可能滿足被壓迫群眾的根本利益時，這種可能就必然而且只有在無產階級專政即在無產階級領導這些群眾的條件下得到實現。對於整個第二國際來說，這也是馬克思主義中“被人遺忘的言論”，孟什維克黨在俄國 1917 年革命的開頭半年的歷史，非常清楚地表明他們也把这些話忘記了。

恩格斯在談到同居民的民族成分有關的聯邦共和國問題時寫道：

“應當用什麼東西來代替現在的德國呢？”（它擁有反動的君主憲法和同樣反動的小國分立制，這種分立制把“普魯士主義”的種種特點固定下來，而不是把它們溶化在德國的整體中）“在我看來，無產階級只能採用統一而不可分的共和國的形式。聯邦共和國一般說來現在還是美國廣大地區所必需的，雖然在它的東部這已經成了障礙。如果在英國建立聯邦共和國，那就是前進一步，因為在英國兩個海島上居住着四個民族，雖然議會是統一的，但是有三種立法體系同時并存。聯邦共和國在小小的瑞士早已成了障礙，那里所以還能容忍聯

邦共和制，那只是因为瑞士甘愿充当欧洲国家体系中纯粹消極的一員。如果德国实行瑞士式的联邦制，那就是倒退一大步。联盟制国家和完全統一的国家有两点区别，首先一点是每个加盟国都有它特別的民事法規和刑事法規，都有它特別的法院組織；其次，每个加盟国都有与国民議院同时并存的由各加盟国代表組成的議院，在这个議院中，每一个邦不論大小都以一个邦的資格参加表决。”在德国，联盟制国家是轉到完全統一的国家的过渡，所以不是要使 1866 年和 1870 年的“自上而下的革命”倒退，而是要用“自下而上的运动”来加以补充。

恩格斯对国家的形式問題不但不抱冷淡态度，相反，却非常細致地去分析那些过渡形式，以便根据各个不同場合的具体历史特点来估計某一个过渡形式是从什么到什么 的过渡。

恩格斯同馬克思一样，从無产階級和無产階級革命的观点出發坚持民主集中制，坚持統一而不可分割的共和国。他認為联邦共和国是一种例外，是發展的障碍，是由君主国向集中制共和国的过渡，也是在一定的特殊条件下的“进步”。在这些特殊条件下，民族問題就提出来了。

恩格斯同馬克思一样，虽然無情地批判了小国的反动性和在一定的具体情况下用民族問題来掩盖这种反动性的現象，但是他在任何地方都絲毫沒有忽視民族問題的傾向，而荷兰和波兰两国的馬克思主义者在反对“自己的”小国的狭隘市僧民族主义的極正当的斗争中，却常常表现出有这种傾向。

無論从地理条件、从共同的語言或从数百年的历史来看，英国似乎已經把各个小地区的民族問題都“解决了”。可是，甚至在这

个国家里，恩格斯也注意到一个明显的事实，即民族問題还存在，因此他承認建立联邦共和国是一个“进步”。自然，这里他絲毫沒有放弃批評联邦共和国的缺点，絲毫沒有放弃为实现統一的民主集中制的共和国而最坚决地进行宣传和斗争。

恩格斯絕對不像資產階級思想家和包括無政府主义者在内的小資產階級思想家那样，从官僚主义的意义上去了解民主集中制。在恩格斯看来，集中制絲毫不排斥广泛的地方自治，只要“公社”和省自願坚持国家的統一，这种地方自治就一定可以消除任何官僚主义和任何“命令主义”。

恩格斯在發揮馬克思主义对于国家問題的綱領性观点时写道，……“总之，需要統一的共和国，但并不是像現在法兰西共和国那样的共和国，因为現在的法兰西共和国同1798年建立的沒有皇帝的帝国并沒有有什么不同。从1792年到1798年，法国的每个省，每个公社(Gemeinde)都有美国式的充分的自治权，而这正是我們所應該有的。至于应当怎样組織地方自治和怎样才可以不要官僚制，这已經由美国和第一个法兰西共和国向我們表明，而現在又有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其他英屬殖民地向我們証明了。这种省的和公社的自治制比瑞士的联邦制要自由得多，在瑞士，每个邦对整个联邦国家固然具有很大的独立性，但它对县和公社也具有独立性。由邦政府任命县长(Staathalter)和其他地方长官，这在講英語的国家里是絕對沒有的，我們将来在自己国内也必須坚决消除这种現象，取消普魯士式的 Landrat 和 Regierungsrat” (专員、县长、省长以及所有由上面任命的官吏)。根据这一点，恩格斯建議把党綱关于自治問題的条文表述如下：“各省”(省或区域)“各县

和各公社通过普选选出的官吏实行完全的自治；取消由国家任命的一切地方的和省的政权机关。”

在被克倫斯基和其他“社会主义”部长的政府封閉的“真理报”（1917年5月28日第68号）^①上，我已經指出过，在这一点上（自然远不止这一点），我国假革命、假民主、假社会主义的代表們是如何惊人地离开了民主主义。自然，这些同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組成“联合政府”而把自己束縛起来的人对这些指示是充耳不聞的。

必須特別指出的是，恩格斯根据确鑿的事实和最确切的例子駁斥了一种非常流行的，特别是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中間非常流行的偏見，即認為联邦制共和国一定要比集中制共和国自由。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恩格斯所举的1792—1798年法兰西集中制共和国和瑞士联邦制共和国的事实推翻了这种偏見。民主集中制共和国赋予的自由实际上比联邦制共和国要多。換句話說，在历史上，地方、省等等能够享有最多自由的是集中制共和国，而不是联邦制共和国。

对于这个事实，以及所有一般关于联邦制共和国与集中制共和国和地方自治的問題，無論过去和現在，在我們党的宣传和鼓动工作中都沒有充分注意。

5. 1891年为馬克思的“法兰西內战”所写的序言

恩格斯在为“法兰西內战”第3版写的序言中（写于1891年3月18日，最初刊载在“新时代”杂志上），除了順便就有关对国家的态度的問題提出了許多值得注意的意見以外，还对巴黎公社的教

^① 見“列宁全集”1957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4卷第498—501頁。——譯者注

訓作了一个精辟的总结¹¹⁰。这个总结把公社以来二十年的全部經驗也包括进去了，并且是专门用来反对流行于德国的“国家迷信”观念的，因而可称为马克思主义在国家問題上的最高成就。

恩格斯指出，法国每次革命以后工人总是武装起来了；“因此，掌握国家大权的资产者的第一信条就是解除工人的武装。于是，在每次工人进行革命以后就产生新的斗争，其结果总是工人失败”……

对各次资产阶级革命的經驗作出的这个总结，真是又简短，又明了。这里正好抓住了問題的实质，也是国家問題的实质（被压迫阶级有没有武装？）。这一点正是那些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教授以及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常常避而不谈的。在1917年俄国革命的时候，这个“孟什维克”“也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策烈铁里很荣幸（卡維涅克式的荣幸）有机会来泄露资产阶级革命的这个秘密。他在6月11日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演說中，脱口說出了资产阶级要解除彼得堡工人武装的决定，当然，他把这个决定說成是他自己的决定，并且說这一般是“国家”所需要的。

策烈铁里在6月11日發表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演說，当然会成为每一个論述1917年革命的历史学家都要援引的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它証明策烈铁里先生所率領的社会革命党人同孟什维克的联盟如何轉到资产阶级方面来反对革命的无产阶级。

恩格斯順便提出的另外一个有关国家問題的意見是关于宗教的。大家知道，德国社会民主党因为腐化而愈益机会主义化，因而对“宣布宗教为私人的事情”这个有名的公式愈来愈加以庸俗的曲解，他們認为宗教問題对于革命无产阶级政党也是私人的事情！！这种完全背叛无产阶级革命綱領的立場正是恩格斯当时出来反对

的，但恩格斯在1891年还只看到自己党内机会主义的最小的萌芽，因此他說得很謹慎：

“参加公社的差不多都是工人或公認的工人代表，所以它的決議显然是純粹無产階級性質的。有些決議把共和派資產階級由于卑鄙的懦怯而拒絕的、而而是工人階級自由活动所必需的那些改革法定下来，例如实行宗教 对国家來說 仅仅是私人的事情的原則。有些決議則直接与工人階級的利益有关，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深深刺入了旧社会制度的內脏”……

恩格斯故意把“对国家來說”这几个字加上着重号，目的是要击中德国机会主义的要害，因为德国机会主义宣布宗教对党来说是私人的事情，这样也就把革命無产階級政党降低到最庸俗的“自由思想的”市僧的水平，市僧承認可以不信宗教，但是拒絕执行党对麻醉人民的宗教鴉片进行斗争的任务。

将来研究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史的历史学家在探討該党1914年遭到可耻的破产的根源时，会找到关于这个问题的許多有趣的材料：从該党思想領袖考茨基的論文中为机会主义打开大門的曖昧言論起，直到党对1913年的《Los-von-Kirche-Bewegung》（与教会分离的运动）的态度止。

現在我們来看一看恩格斯在公社以后二十年是怎样为斗争的無产階級总结公社教訓的。

下面就是恩格斯認為最重要的教訓：

……“正是軍隊、政治警察、官僚等旧的集权政府的压迫权力，这种由拿破侖在1798年建立、以后一直被每届新政府当作有用的工具接收并用来反对自己的敌人的权力，應該在全国各地覆沒，正如它在巴黎覆沒一样。

公社一开始就应当承認，获得統治权的工人階級不能繼續利用旧的国家机器来进行管理；工人階級为了不致失去刚刚爭得的統治权，它一方面应当鏟除全部旧的、一直被利用来反对它的压迫机器，另一方面应当保證自己有反对自己的代表和官吏的权利，宣布他們每个人都毫無例外地可以随时撤換”……

恩格斯一再着重指出，不仅在君主国，而且在民主共和国，国家依然是国家，也就是說仍然保留着它的基本特征：把公职人員，“社会公僕”，社会机关，变为社会的主人。

……“为了不让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僕变为社会的主人（这种現象在至今所有的国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公社采取了两个正确的办法：第一、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給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同时用法律規定选举者随时可以撤換被选举者。第二、不分职位高低，所有公职人員的工資同其他工人的工資相等。公社一般給的最高薪金为6 000 法郎[⊖]。这样就可靠地防止了人們去追求升官發財，何况公社还規定各代表机关的代表必須絕對服从选民的委托”……

恩格斯在这里談到了一个有趣的界綫，一达到这个界綫，彻底的民主制就变为社会主义，同时它也就要求实行社会主义。因为要消灭国家，就必须把国家服务机关的职能变为非常簡單的监督和統計手續，使絕大多数居民以至全体居民都能够办理，都能够

⊖ 名义上約等于2 400 卢布，但按現在的匯率計算，約等于6 000 卢布。有些布尔什維克提議例如在市杜馬內給9 000 卢布的薪金，而不提議全国以6 000 卢布（这个数目是足够的）为最高薪金，这种做法是完全不可饒恕的。

胜任。要完全消除升官發財的思想，就必須使国家服务机关中那些收入不多但是“光荣的”位置不能成为在銀行和股份公同內找到肥缺的桥梁，像在一切最自由的資本主义国家內所經常看到的那样。

但是，恩格斯沒有犯有些馬克思主义者在某些問題上，例如在民族自决权問題上所犯的那种錯誤：他們說民族自决权在資本主义下是不可能實現的，而在社会主义下則是多余的。这种似乎很明智但实际上并不正确的論調，对于任何一种民主設施，連給官吏發微薄的薪金的办法也包括在內，都可以这样說，因为在資本主义下徹底的民主制是不可能實現的，而在社会主义下則任何民主制都是会消亡的。

这是一种詭辯，正像古时候有句笑話：一个人掉了一根头髮，他是否就成了秃头呢？

徹底發展民主制，找出發展的形式，用实践来檢驗这些形式等等，都是为社会革命进行斗争的任务之一。任何单独存在的民主制都不会产生社会主义，但在实际生活中民主制永远不会是“单独存在”，而总是“相互依存”的，它影响經濟，推动經濟的改造，受經濟發展的影响等等。这是活生生的历史的辯証法。

恩格斯繼續写道：

……“这种炸毀(Sprengung)旧的国家政权并用新的真正民主的国家政权来代替的情形，已經在‘法兰西內战’第三章中作了詳細的描述。但是在这里还有必要再来简单地談一談这种代替的几个特点，因为正是在德国，对国家的迷信已經从哲学方面轉到資产階級甚至很多工人的一般意識中去了。按照哲学家的学說，国家是‘观念的实现’，或譯成哲学語言，就

是上帝在人間的統治，也就是永恒真理和正义所由实现或应当实现的場所。由此就产生了崇拜国家以及一切有关国家的事物的心理，这种心理之所以容易生根，是因为人們从小就一直認為全社会的公共事業和公共利益只能用旧的方法来处理和保护，即通过国家及其收入極多的官吏来处理和保护。人們以为，不再迷信世袭君主制而主张民主共和制，那就已經是非常勇敢地前进了一步。实际上，国家無非是一个階級鎮压另一个階級的机器，这在民主共和制下也絲毫不比在君主制下差。国家最多也不过是無产階級在爭取階級統治的斗争胜利以后所承受下来的一个祸害；胜利了的無产階級也将同巴黎公社一样，不得不立即除去这个祸害的坏的一面，直到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能够把国家制度的这一堆垃圾完全抛掉为止。”

恩格斯曾經警告过德国人，叫他們在共和制代替君主制的时候不要忘記一般国家問題的社会主义原則。他的警告現在看起来好像是直接对策烈鉄里和切尔諾夫之流先生們的教訓。因为他們在“联合政府”的实践中正好表现出对国家迷信和崇拜。

还应当指出两点：（1）恩格斯說，在民主共和制下，国家之为“一个階級压迫另一个階級的机器”，“絲毫不”比在君主制下“差”，但这决不等于說，压迫的形式对于無产階級是無所謂的，像某些無政府主义者所“教导”的那樣。更广泛、更自由、更公开的階級斗争形式和階級压迫形式，能够大大地促进無产階級为消灭一切階級而进行的斗争。

（2）为什么只有新一代才能够完全抛掉国家制度这一堆垃圾呢？这个問題是同民主制的消除問題联系着的，現在我們就来

談談這個問題。

6. 恩格斯論民主制的消除

恩格斯在談到“社会民主主义者”这个名称在科学上不正确的时候，曾連帶說到这一点。

恩格斯在70年代主要是論述“国际”問題的文集（《Internationales aus dem Volksstaat》[⊖]）的自序（写于1894年1月3日，即恩格斯逝世前一年半的时候）中写道，在所有的論文里，他都用“共产主义者”这个名詞，而不用“社会民主主义者”，因为当时法国的蒲魯东派和德国的拉薩尔派都自称为社会民主主义者。

恩格斯接着写道，……“因此在当时，馬克思和我两人都觉得，为了特別表明我們的观点，絕對不能用这样一个有伸縮性的名詞。現在情况不同了，这个名詞（“社会民主主义者”）也許还可以过得去（mag passieren），虽然它对我們这样的党來說仍然是不确切的（unpassend，不恰当的），因为我們党的經濟綱領不单单是社会主义的，而且还是共产主义的，党的最終政治目的是完全消除国家，因而也消除民主制。然而真正（着重号是恩格斯加的）政党的名称永远不会完全名副其实；党在發展，而名称却没有变。”¹¹¹

辯証法家恩格斯到臨終时仍然忠于辯証法。他說：馬克思和我有过一个很好的科学上很确切的党的名称，可是当时沒有一个真正的政党即群众性的無产階級政党。現在（19世紀末）真正的政党是有了，可是它的名称在科学上是不正确的。但这不要紧，“可

⊖ “‘人民国家’杂志上关于国际問題的論文”。——編者注

以过得去”，只要党在發展，只要它意識到它的名称在科学上是不确切的，不讓这个名称妨碍它朝着正确的方向發展！

也許某一位爱开玩笑的人会用恩格斯的話来安慰我們布尔什維克說，我們有真正的政党，它很好地在發展；就連“布尔什維克”这样一个毫無意义的奇怪的名称，除了表示我們在1903年布魯塞爾—倫敦代表大会上占多数这个完全偶然的事实外并沒有什么其他意思的名称，也还“可以过得去”……現在，由于共和党人和“革命”市僧民主派在7—8月間对我党实行迫害，“布尔什維克”这个名詞获得了全民的荣誉，这种迫害还表明我党在真正的發展过程中迈进了多么伟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步，在这个时候，也許連我自己也对我在4月間提出的改变我党名称的建議表示怀疑了。也許我要向同志們提出一个“妥协办法”：把我們党称为共产党，而把布尔什維克这个名詞放在括弧內……

但是党的名称問題远不及革命無产階級对国家的态度問題重要。

人們通常在談論国家問題的时候，老是犯恩格斯在这里所警告的而我們在上面也順便提到的那个錯誤。这就是：老是忘記国家的消灭也就是民主制的消灭，国家的消亡也就是民主制的消亡。

乍看起来，这样的論断似乎是極端古怪而难于理解的；甚至也許有人会耽心，是不是我們在期待一个不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則的社会制度，因为民主制也就是承認这个原則。

不是的。民主制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則不是一个东西。民主制就是承認少数服从多数的国家，即一个階級对另一个階級、一部分居民对另一部分居民有系統地使用強力的組織。

我們的最終目的是消灭国家，也就是消灭任何有組織有系統

的强力，消灭任何加在人們头上的强力。我們并不期待一个不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的社会制度。但是，我們向往社会主义，我們也深信社会主义将發展为共产主义，到那时候就沒有任何必要对人們使用强力，沒有任何必要使一个人服从另一个人，使一部分居民服从另一部分居民，因为人們将习惯于遵守公共生活的起码条件，而不需要強力和服从。

为了強調这个习惯的因素，恩格斯也說到了“在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能够把国家制度这一堆垃圾完全抛掉”的新的一代，这里所謂国家制度是指任何一种国家制度，其中也包括民主共和的国家制度。

为了說明这一点，就必须分析国家消亡的經濟基础問題。

第五章

国家消亡的經濟基础

馬克思的哥达綱領批判（即1875年5月5日給白拉克的信，这封信直到1891年才在“新时代”杂志第9卷第1册上发表，有俄文单行本）对这个問題作了最詳尽的說明。在这篇輝煌的著作中，批判拉薩尔主义的論战部分可以說是遮盖了正面論述的部分，即对共产主义發展和国家消亡之間的分析。

1. 馬克思对这个問題的提法

如果把馬克思在1875年5月5日給白拉克的信同上述恩格斯在1875年3月28日給倍倍尔的信比較一下，从表面上看也許会

覺得馬克思比恩格斯帶有更濃厚的“國家派”色彩，也許會覺得這兩位著作家對國家的看法有很大差別。

恩格斯勸倍倍爾根本拋棄關於國家的廢話，把“國家”一詞從黨綱中完全去掉而用“公團”來代替；恩格斯甚至宣布公社已經不是原來意義上的國家。而馬克思卻還談到“未來共產主義社會的國家制度”，這就是說，似乎他認為就是在共產主義下也還要有國家。

但這種看法是根本不對的。如果仔細研究一下，就可以知道馬克思和恩格斯對國家和國家消亡問題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上面所引的馬克思的話也就是指正在消亡的國家制度。

至於確定將來“消亡”的日期，這當然無從談起，但很明顯，它是一個長期的過程。馬克思和恩格斯之間所以有表面上的差別，是因為他們研究的問題和研究的目的不同。恩格斯的目的是要清楚地、尖銳地、扼要地向倍倍爾指明，當時流行的（也是拉薩爾頗為贊同的）關於國家問題的偏見是完全荒謬的。而馬克思只是在論述另一個問題即共產主義社會發展的時候，順便提到了這個問題。

馬克思的全部理論，就是運用最徹底、最完整、最周密、內容最豐富的發展論去考察現代資本主義。自然，他也運用這個理論去考察資本主義即將崩潰的問題，去考察未來的共產主義的未來發展問題。

究竟有什麼根據可以提出未來共產主義的未來發展問題呢？

這裡的根據就是共產主義是從資本主義中產生的，它在歷史上是從資本主義中發展起來的，它是資本主義產生的那種社會力量發生作用的結果。馬克思絲毫不想製造烏托邦，不想凭空猜測無法知道的事情。馬克思提出共產主義的問題，正像自然科學家

提出某一新的生物变种的发展问题一样，因为我们已经知道，这一变种是怎样产生以及朝着哪个方向演变的。

马克思首先扫除了哥达纲领对国家同社会的相互关系问题的糊涂观念。

他写道，……“现代社会，就是一切文明国家里的资本主义社会，都或多或少地摆脱了中世纪的杂质，仅仅因为每个国家历史发展的特点而在形态上多少有些不同，在发展程度上也多少有些不同。‘现代国家’却是各不相同的。普鲁士德意志帝国同瑞士完全不同，英国同美国也完全不同。所以，‘现代国家’只是一种虚构的概念。

但是，不管国家的形式如何纷繁，各个不同的文明国家却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建筑在资本主义多少已有发展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上。所以它们具有某些极重要的共同特征。在这个意义上，同现在国家的根基资产阶级社会已经消亡的未来相对来说，也可以说‘现代国家’。

其次，还有这样一个问题：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国家制度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换句话说，那时会有哪些同现代国家职能相类似的社会职能保留下来呢？这个问题只有用科学的方法才能解答；否则，即使你千百次把‘人民’和‘国家’这两个名词连在一起，也丝毫不会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有所帮助”……112

马克思这样讽刺了关于“人民国家”的一切空话，提出了问题，并且好像是警告说：要对这个问题作出科学的解答，只有依靠确切证明了的科学材料。

十分确切地由整个发展论和全部科学证明了的的首要的一点，也是从前被空想主义者所遗忘，现在又被害怕社会主义革命的机

会主义者所遗忘的那一点，就是在历史上必然会有一个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特别时期或特别阶段。

2. 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

馬克思繼續写道，……“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間有一个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轉变时期。与这个时期相适应的是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無产階級的革命专政”……

这就是馬克思根据他对無产階級在現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作用的分析，根据这个社会的发展情况以及無产階級与资产階級利益对立并且不可調和的实际材料所得出的結論。

从前，問題的提法是这样的：無产階級为了求得自身的解放，应当推翻资产階級，夺取政权，建立自己的革命专政。

現在，問題的提法已有些不同了：从向着共产主义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非經過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不可，而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無产階級的革命专政。

这个专政和民主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

我們知道，“共产党宣言”就是把“無产階級变为統治階級”和“爭得民主”这两个概念放在一起的。根据上述一切，可以更准确地断定，民主制在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是怎样变更的。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在它最順利的发展条件下，比較完备的民主制就是民主共和国。但是这种民主制始終只限于资本主义剝削的狭小范围，因此它實質上始終只是供少数人、供有产階級、供富人享受的民主制。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始終与古希腊共和国只供

奴隶主享受的自由大致相同。由于资本主义剥削的条件，现代的雇佣奴隶被贫困压得“无暇过问民主”，“无暇过问政治”，以致大多数居民在通常的和平局面下被排斥在社会政治生活之外。

德国可以说是证实这一论断的最明显的例子，因为在这个国家里，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几乎有半世纪之久（1871—1914年），宪法一直承认结社是合法的，在这个时期内，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利用合法机会”方面做的工作要比其他各国的社会民主党多得多，特别是使工人参加党的比例达到了举世未有的高度。

那末这种有政治觉悟的积极的雇佣奴隶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所占的最大的百分比究竟是多少呢？1500万雇佣工人中只有100万是社会民主党党员！1500万雇佣工人中只有300万是工会会员！

供极少数人享受的民主，供富人享受的民主，——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制。如果仔细地考察一下资本主义民主制的结构，那末无论在选举法的“细微的”（似乎是细微的）条文上（居住年限、妇女被排斥等等），或是在代议机关的办事手续上，在行使集会权的实际障碍上（公共的集会场所不准“穷人”使用！），在纯粹按资本主义原则办报等等事实上，到处都可以看到民主制的重重限制。对穷人的这种种限制、禁止、排斥、阻碍看起来似乎是很细微的，特别是在那些从来没有亲身体会过贫穷困苦、从来没有接近过被压迫阶级群众的生活的人（这种人在资产阶级的政论家和政治家中，如果不占百分之九十九，也得占十分之九）看来是很细微的，但是这些限制加在一起，却把穷人推出和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使他們不能积极参加民主生活。

馬克思出色地暴露了资本主义民主制的这一实质，他在分析公社的经验时说：这就是容许被压迫者数年一次来决定压迫阶级

中什么人应当在議會里代表和压迫他們！

但是这种必然是狹隘的、暗中排斥穷人的、因而也是完全虛伪和騙人的資本主义民主制，决不像一般自由主义的教授和小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者所想像的那样是简单地、直接地、平穩地朝着“日益徹底的民主制”發展的。不是的。向前發展，即向共产主义發展，必須經過無产階級专政，决不能走別的道路，因为再沒有其他人也沒有其他道路能够粉碎剝削者資本家的反抗。

而無产階級专政，即被压迫者先鋒队組織成为統治階級来镇压压迫者，不能仅仅限于扩大民主制。除了大規模地扩大这种第一次供貧民享受、供人民享受而不是供富人享受的民主制之外，無产階級专政还要对压迫者、剝削者、資本家采取一系列剝夺自由的措施。为了使人类从雇佣奴隶制下面解放出来，我們必須镇压这些人，必須用強力粉碎他們的反抗，——显然，凡是实行镇压和使用強力的地方，也就沒有自由，沒有民主。

讀者总还記得，恩格斯在給倍倍尔的信中已經很好地闡明了这一点，他說：“無产階級需要国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到了有可能来談自由的时候，国家就不存在了。”

絕大多数人享受民主，对那些剝削和压迫人民的分子实行強力镇压，即不允許他們参加民主生活，——这就是从資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的民主制。

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只有当資本家的反抗已經徹底粉碎，資本家已經消灭，階級已經不存在的时候，即社会各个成員在对社会生产資料的关系上已經沒有有什么差別的时候，——只有在那个时候，“国家才会消失，才談得上自由”。只有在那个时候，真正完備的、真正沒有任何例外的民主制才有可能实现。也只有在那个

时候，民主制才开始消亡；道理很简单，因为人们既然摆脱了资本主义奴役制，摆脱了资本主义剥削制所造成的无数残暴、野蛮、荒谬和卑鄙的现象，也就会逐渐习惯于遵守数百年来人们就知道的、数千年来在一切处世格言上反复谈到的、起码的公共生活规则，自动地遵守这些规则，而不需要强力，不需要强制和服从，不需要所谓国家的这种特别的强制机关。

“国家消亡”这句话说得非常恰当，它既表明了过程的渐进性，又表明了过程的自发性。只有习惯才能够而且一定会发生这样的作用，因为我们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到，如果没有剥削，如果没有某种会引起抗议、起义并使镇压成为必要的令人气愤的现象，那末人们是多么容易习惯于遵守他们所必需的公共生活规则。

总之，资本主义社会里的民主制是一种残缺不全的、贫乏的和虚伪的民主制，是只供富人、只供少数人享受的民主制。无产阶级专政，即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第一次提供了人民享受的、大多数人享受的民主制，同时对少数人即剥削者实行必要的镇压。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提供真正完备的民主制，而民主制愈完备，它也就愈迅速地成为不需要的东西，愈迅速地自行消亡。

换句话说，在资本主义下存在的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即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少数人镇压多数人的特别机器。很明显，为了达到剥削者少数始终压迫被剥削者多数的目的，就必然要采取极凶恶极残酷的镇压手段，就必然会造成无数流血惨案，而这样的流血事件是人类在奴隶制、农奴制和雇佣劳动制下都经历过的。

其次，在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候镇压还是必要的，但这已经是被剥削者多数对剥削者少数的镇压。特别的镇压机

关,特别的镇压机器即“国家”,还是必要的,但是已经是过渡性质的国家,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因为由昨天还是雇佣奴隶的多数人去镇压剥削者少数人是一件比较容易、比较简单和比较自然的事情,所流的血也会比从前在镇压奴隶、农奴和雇佣工人起义时流的少得多,人类为此而付出的代价也要小得多。而且这种镇压同绝大多数居民的广泛的民主是不违背的,因而对特别的镇压机器的需要就开始消失。自然,如果没有极复杂的镇压机器,剥削者就不能镇压人民,但是人民镇压剥削者,却只要有很简单的“机器”,甚至可以不要“机器”,不要特别的机关,而只要有武装群众的组织(如工兵代表苏维埃,——我们先在这里提一下)。

最后,只有共产主义才能够为完全不需要国家创造条件,因为那时已经没有人须要加以镇压,——这里所谓“没有人”是指阶级而言,是指对某一部分居民进行有系统的斗争而言。我们不是空想主义者,我们丝毫也不否认个别人捣乱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同样也不否认有镇压这种捣乱的必要性。但是,第一、做这件事情用不着什么特别的镇压机器,特别的镇压机关,武装的人民自己会来做这项工作,而且做起来非常简单容易,正像现代社会中任何一群文明人都很容易去劝解打架的人或制止虐待妇女一样。第二、我们知道,产生违反公共生活规则的捣乱行为的社会根源是群众受剥削和群众贫困。这个主要原因一消除,捣乱行为就必然开始“消亡”。虽然我们不知道消亡的速度和进度怎样,但是,我们知道这种行为一定会消亡。国家也会随着这种行为的消亡而消亡。

马克思并没有凭空幻想这个未来的远景,他只是更详细地确定现在所能确定的东西,即共产主义社会低级阶段和高级阶段之

間的差別。

3. 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

馬克思在“哥达綱領批判”中，詳細地駁斥了拉薩爾關於工人在社会主义下將領取“不折不扣的”或“全部劳动产品”的思想。馬克思指出，在整个社会的全部社会劳动中，必須拿出一部分作后备基金、作扩大生产的基金和补偿“磨損了的”机器的費用等等，然后在消費品中还要拿出一部分作为管理費以及学校、医院、养老院等等的基金。

馬克思不像拉薩爾那样說些含糊不清的籠統的話（“全部劳动产品归工人”），而是对社会主义社会必須怎样管理的問題作了冷靜的考察。馬克思在具体分析这种沒有資本主义存在的社会的生活条件时說道：

“我們这里所說的”（在分析工人党的党綱时）“不是在自身基础上發展起来的共产主义社会，而是从資本主义社会里刚刚产生出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經濟、道德和思想方面，都还帶有它脫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

这个刚刚从資本主义脫胎出来的在各方面还帶有旧社会痕迹的共产主义社会，馬克思称之为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或低級阶段。

生产資料已經不是个人的私有財產，它已归整个社会所有。社会的每个成員都担負某一部分社会所必需的工作，并从社会方面領得一张証書，証明他完成了多少工作量。根据这张証書，他从消費品的社会儲藏中領取相当数量的产品。这样，除去作为社会基金的一部分劳动之外，每个工人就从社会方面領取相当于他所

貢獻的一份報酬。

这样，似乎“平等”就實現了。

但是，拉薩尔把这样的社会制度（通常叫做社会主义，而馬克思称之为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說成是“公平的分配”，說成是“每人有获得同等劳动产品的平等权利”，这是錯誤的，馬克思就对他的錯誤进行了分析。

馬克思說：这里确实有“平等权利”，但这还是“资产阶级的法权”，它同任何权利一样，是以不平等为前提的。任何权利都是把同一标准应用在事实上各不相同、各不相等的人身上，因而“平等权利”就是不平等，就是不公平。的确，每个人付出同别人相等的一份社会劳动，就能領取一份相等的社会产品（除了上述扣除的以外）。然而每个人是不同的：有的强些，有的弱些；有的結了婚，有的沒有結婚；有的子女多些，有的子女少些，以及其他等等。

馬克思总结說，……“因此，在同样的劳动下，在平等地享受社会消費品的条件下，某一个人在实际上比另一个人領得多一些，这个人就会比另一个人富裕一些等等。为了避免这一切，权利就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

所以，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还不能做到公平和平等，富裕的程度还会不同，不同就是不公平。但是人剝削人已經不可能了，因为那时已經不能把工厂、机器、土地等生产資料攬为己有了。馬克思駁倒了拉薩尔关于一般“平等”和“公平”的含糊不清的小资产阶级說法，指出了共产主义社会的發展进程，說明这个社会最初只能消灭私人占有生产資料这一“不公平”現象，却不能立即消灭“按工作”（不是按需要）分配消費品这一仍然存在的不公平現象。

庸俗的經濟学家（包括資產階級的教授和“我們的”杜岡^①在內）經常譴責社会主义者，說他們忘記了人与人的不平等，“梦想”消灭这种不平等。我們看到，这种譴責只能証明資產階級思想家先生們的極端無知。

馬克思不仅極其准确地估計到人們不可避免的不平等，而且还估計到，仅仅把生产資料轉归全社会公有（通常所說的“社会主义”）还不能消除分配方面的缺点和仍然占着統治地位的“資產階級的法权”的不平等，因为产品是“按工作”分配的。

馬克思繼續說道，……“但是这些缺点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在經過长久的陣痛以后刚刚从資本主义社会脫胎出来的形态中，是不可避免的。权利永远不能超过社会的經濟結構以及由經濟結構决定的社会的文化發展”……

因此，在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通常称为社会主义），“資產階級的法权”沒有完全取消，而只是部分地取消，只是在已經發生的經濟变革範圍內，也就是在对生产資料的关系上取消。“資產階級的法权”承認生产資料是个人的私有财产。而社会主义則把生产資料变为公有财产。只有在这个範圍內，也只能在这个範圍內，“資產階級的法权”才不存在了。

但是它在另一方面却依然存在，依然是社会各个成員間分配产品和分配劳动的調节者（決定者）。“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社会主义原則已經實現了；“按等量劳动領取等量产品”这个社会主义原則也已經實現了。但是，这还不是共产主义，还没有消除不同的人按不等量的（事实上是不等量的）劳动領取等量产品的“资产

^① 指俄国資產階級經濟学家杜岡·巴拉諾夫斯基。——譯者注

階級的法權”。

馬克思說，這是一個“缺點”，但在共產主義第一階段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不願陷入空想主義，那就不能認為，在推翻資本主義之後，人們立即就會不需要任何法規而為社會勞動，況且資本主義的廢除不能立即為這種變更創造經濟前提。

可是，除了“資產階級的法權”以外，沒有其他法規。所以在這個範圍內，還需要有國家來保衛生產資料公有制，來保衛勞動的平等和分配的平等。

那時國家就會消亡，因為資本家已經沒有了，階級已經沒有了，因而也就沒有什麼階級可以鎮壓了。

但是，國家還沒有完全消亡，因為還要保衛容許在事實上存在不平等的“資產階級的法權”。要使國家完全消亡，就必須有完全的共產主義。

4. 共產主義社會的高級階段

馬克思接着又說：

……“在共產主義社會的高級階段，迫使人們奴隸般地服從社會分工的現象已經消失，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對立也隨之消失，勞動已不僅僅是謀生的手段，而且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生產力已隨着每個人的全面發展而增長，一切社會財富的資源都會充分地涌現出來，——只有在那時候，才能徹底打破資產階級法權的狹隘觀點，社會才能把‘各盡所能，按需分配’寫在自己的旗幟上。”

現在我們才認識到，恩格斯無情地譏笑那種把“自由”和“國家”這兩個名詞連在一起的荒謬見解，是多麼正確。還有國家的時

候就不会有自由，有了自由就不会有国家。

国家完全消亡的經濟基础就是共产主义的高度發展，那时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已經消失，因而現代社会不平等的最重要的根源之一也就消失，而这个根源光靠生产資料轉为公有財產，光靠剝夺資本家，是决不能立刻消除的。

这种剝夺会使生产力有蓬勃發展的可能。既然我們看到資本主义現在已經怎样难以想像地阻碍着这种發展，而在現有的技术基础上又可以大大推进生产力，我們就可以有十二分把握地說，剝夺資本家一定会使人类社会的生产力蓬勃發展。但是，生产力将怎样迅速地發展，将怎样迅速地打破分工、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把劳动变为“生活的第一需要”，这都是我們所不知道而且也不可能知道的。

因此，我們只能談国家消亡的必然性，同时着重指出这个过程是长期的，它的长短将取决于共产主义高級阶段的發展速度。至于消亡的日期或消亡的具体形式問題，只能作为悬案，因为現在还没有可供解决这些問題的材料。

当社会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則时，也就是說，在人們已經十分习惯于遵守公共生活的基本規則，他們的劳动生产率已經大大提高，因此他們能够自願地尽其所能来工作的时候，国家才会完全消亡。那时，“資產階級法权的狹隘观点”，这种使人像夏洛克^①那样冷酷地斤斤計較，不願比別人多做半小时工作，不願比別人少得一点报酬的狹隘观点就会打破。那时，社会就不必在分配产品的时候規定每人应当領取的产品数量；每人将“根据需

① 夏洛克是英国作家莎士比亚的剧本“威尼斯商人”中的一个典型的高利貸者。

——譯者注

要”自由地領取。

从資產階級的观点看来，很容易把这样的社会制度說成是“純粹的烏托邦”，并冷嘲热諷地說社会主义者許过諾言，要使每个人都有权利向社会領取任何数量的香菌、汽車、鋼琴等等，而对每个公民的劳动則可以不加任何监督。就是在今天，大多数資產階級“学者”也还是用这种諷刺的話来搪塞，但他們这样做只是暴露了他們的愚昧無知和为資本主义辯护的自私目的。

其所以說愚昧無知，是因为沒有一个社会主义者想到过要許下共产主义高級發展阶段一定到来的“諾言”，而伟大的社会主义者在預見这个阶段将会到来时所設想的前提，既不是現在的劳动生产率，也不是現在的庸人，因为这种庸人正如波米亚洛夫斯基小說中的教会学校学生一样，惯于“無故地”破坏社会財富的儲藏和提出不能实现的要求。

在共产主义的“高級”阶段到来以前，社会主义者要求社会和国家对劳动量和消费量实行極严格的监督，不过这种监督应当从剝夺資本家和由工人监督資本家开始，并且不是由官僚的国家而是由武装工人的国家来实行。

資產階級思想家（和他們的走卒，如策烈鉄里先生、切尔諾夫先生之流）为要达到替資本主义辯护的自私目的，就一味爭論和空談遙远的未来，而不談目前政治上的迫切問題：剝夺資本家，把全体公民变为一个大“辛迪加”即整个国家的工作人員和職員，并使整个辛迪加的全部工作完全服从真正民主的国家，即工兵代表苏維埃的国家。

其实，当博学的教授以及附和他的庸人們和策烈鉄里先生、切尔諾夫先生之流談到荒誕的烏托邦，談到布尔什維克的蠱惑人心

的諾言，談到不可能“實施”社會主義的時候，他們指的正是共產主義的高級階段，但是，不僅誰也沒有許過“實施”共產主義高級階段的諾言，而且連想也沒有想到“實施”，因為這根本不是可以“實施”的。

這裡我們也就要講到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在科學上的差別問題，這個問題在上面引用的恩格斯說“社會民主主義者”這個名稱不恰當的一段話里已經談到。共產主義第一階段或低級階段同共產主義高級階段之間的差別，在政治上說，將來也許很大，但現在在資本主義下着重來談它就很不可笑了，至於把這個差別提到首要地位的也許只有少數無政府主義者（這是說，如果在克魯泡特金之流，格拉弗、柯爾涅利遜以及其他無政府主義“大師”們“像普列漢諾夫那樣”變成了社會沙文主義者，或像一個沒有喪失廉恥和良心的無政府主義者格耶所說的那樣變成了無政府主義“衛國”戰士以後，無政府主義者當中還有人絲毫沒有學到什麼東西）。

但是社會主義同共產主義在科學上的差別是很明顯的。馬克思把通常所說的社會主義稱作共產主義社會的“第一”階段或低級階段。既然生產資料已成為公有財產，那末“共產主義”這個名詞在這裡也是可以用的，只要不忘記這還不是完全的共產主義。馬克思的這些解釋的偉大意義，就在於他這裡也始終應用了唯物主義辯證法，即發展學說，把共產主義看成是從資本主義中發展出來的。馬克思沒有經院式地臆造和“虛構”種種定義，也沒有從事毫無意義的字面上的爭論（什麼是社會主義，什麼是共產主義），而是分析了可以表現共產主義在經濟上成熟程度的兩個階段。

在第一階段，共產主義在經濟上還不可能是完全成熟的，還不能完全擺脫資本主義的傳統或痕跡。由此就產生一個有趣的現

象，這就是在共產主義第一階段還保留着“資產階級法權的狹隘觀點”。既然在消費品的分配方面存在着資產階級的法權，那當然一定要有資產階級的国家，因為如果沒有一個能夠迫使人們遵守法規的機關，權利也就等於零。

可見，在共產主義下，在一定的時期內，不僅會保留資產階級的法權，甚至還會保留沒有資產階級的資產階級国家！

這好像是奇談怪論，或只是一種聰明的辯證把戲，那些沒有花過一點功夫去研究馬克思主義的極其深刻的內容的人，就常常這樣來譴責馬克思主義。

其實，無論在自然界或在社會實際生活中，我們隨時隨地都可以看到新事物中有舊的殘余的情形。馬克思並不是隨便把“資產階級的”法權塞到共產主義中去，而是抓住了剛從資本主義腹內脫胎出來的社會里那種在經濟上和政治上不可避免的東西。

在工人階級反對資本家、爭取解放的鬥爭中，民主制具有巨大的意義。但是民主制決不是一種不可逾越的極限，它只是從封建主義到資本主義和從資本主義到共產主義的道路上的一個階段。

民主制意味着平等。很明顯，如果把平等正確地了解為消滅階級，那末無產階級爭取平等的鬥爭以及平等的口號就具有偉大的意義。但是，民主制僅僅是形式上的平等。一旦社會全體成員在占有生產資料方面的平等實現以後，也就是說，一旦勞動平等和工資平等實現以後，在人類面前就必然會產生一個問題：要更進一步，從形式上的平等轉到事實上的平等，即實現“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至於人類會經過哪些階段，通過哪些實際辦法達到這個最高目的，那我們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可是，必須認識到，資產階級總是非常虛偽地把社會主義看成是一種僵死的、凝固的、

一成不变的东西,实际上,只有从社会主义实现时起,社会生活和私人生活的各个方面才会开始真正地迅速地向前推进,形成一个有大多数居民甚至全体居民参加的真正群众性的运动。

民主制是一种国家形式,一种国家形态。因此,它同任何国家一样,也对人们使用有组织有系统的强力,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民主制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利。而这一点又和下面一点联系着的:民主制在其发展的某个阶段首先把反资本主义的革命阶级——无产阶级团结起来,使它们有可能去摧毁、粉碎、连根铲除资产阶级的(哪怕是共和派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即常备军、警察和官僚,而代之以更民主的、但仍然是国家的机器,即由武装工人群众(以后要过渡到全民民警制)构成的国家机器。

这就是“从量变到质变”:达到这样高度的民主,就会越出资产阶级社会的范围,开始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造。如果所有的人都真正参加国家的管理,那末资本主义就不能支持下去。而资本主义的发展本身却又为“所有的人”真正能够参加国家管理创造了前提。这种前提就是:在许多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已经达到了人人都识字,而且千百万工人已经在邮局、铁路、大工厂、大商业企业、银行等等社会化的巨大复杂的机关里“受了训练并养成了遵守纪律的习惯”。

在这种经济前提下,完全有可能在一天之内立刻推翻资本家和官僚,由武装工人、普遍武装的人民代替他们去监督生产和分配,统计劳动和产品。(不要把监督和统计的问题同具有科学知识的工程师和农艺师等等的問題混为一谈,这些先生今天在资本家的支配下工作,明天他们就会在武装工人的支配下更好地工作。)

統計和監督是把共产主义社会 第一阶段“安排好”并使它能正确地进行工作所必需的主要条件。在这里,全体公民都成了国家(武装工人)的雇員。全体公民都成了一个全民的、国家的“辛迪加”的職員和工人。全部問題在于要他們做同等的工作,正确完成工作量,領取同等的报酬。資本主义使这种統計和監督变得非常簡單,成为一种非常容易、任何一个識字的人都能胜任的監察和登記的手續,只是算算加減乘除和發發有关字据的手續[⊖]。

当大多数人民到处开始自己来进行这种統計,对資本家(这时已成为職員)和保留着資本主义恶習的知識分子先生們实行这种監督的时候,这种監督就成为真正包罗万象的、普遍的和全民的監督,那时他們就絕對無法逃避这种監督,就会“無处躲藏”了。

整个社会将成为一个管理处,成为一个劳动平等、报酬平等的工厂。

但是,無产階級在战胜資本家和推翻剝削者以后在全社会推行的这种“工厂”紀律,决不是我們的理想,也决不是我們的最終目的,而只是为了徹底肃清社会上資本主义剝削制造成的丑恶現象,并且为了繼續前进所必需的一个阶段。

当社会全体成員或至少絕大多数成員自己学会了管理国家,自己掌握了这个事業,并对一小撮資本家、想保留資本主义恶習的先生們和深深受到資本主义腐蝕的工人們“安排好”監督的时候,任何管理都开始不需要了。民主制愈完备,它成为多余的东西的时候就愈接近。“国家”,即由武装工人組成的、“已經不是原来意

⊖ 当国家的最主要职能簡化为由工人自己担当的这样一种統計和監督的时候,国家就不再成为“政治的国家”,那时“社会职能就由政治职能变为簡單的行政管理职能”(參看第四章第二节恩格斯同無政府主义者的論战)。

义上的国家”愈民主，则一切的国家开始消亡也愈快。

当大家都学会了管理，实际上都自己来管理社会生产，自己来进行统计并对寄生虫、老爷、骗子手等等“资本主义传统的保护者”实行监督的时候，企图逃避这种全民的统计和监督就必然很难达到目的，必然只会是极少数的例外，并且还可能受到极迅速极严厉的惩罚（因为武装工人是实事求是的，不像知识分子那样抹不开情面；他们未必会让人随便跟自己开玩笑），这样，人们对于人类一切公共生活的简单的基本规则就会很快从必须遵守变成习惯于遵守了。

到那时候，从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过渡到它的高级阶段的大门就会敞开，国家也就会完全消亡了。

第六章

马克思主义被机会主义者庸俗化了

国家对社会革命的态度和社会革命对国家的态度问题，像一般革命问题一样，是第二国际（1889—1914年）最著名的理论家和政论家们很少注意的。但是，在机会主义逐渐滋长而使第二国际在1914年破产的过程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甚至当他们接触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还是竭力回避或者不加理会。

总的看来，我们可以说，由于在无产阶级革命对国家的态度问题上采取了有利于机会主义、助长机会主义的回避态度，结果就产生了曲解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完全庸俗化的现象。

为了简要地说明这个可悲的过程，我们就拿最著名的马克思

主义理論家普列汉諾夫和考茨基來說。

1. 普列汉諾夫与無政府主义者的論战

普列汉諾夫写了一本專門論述無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問題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的名字是“無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1894年用德文出版。

普列汉諾夫很巧妙地論述这个題目，对反对無政府主义的斗争中最现实、最迫切、政治上最重要的問題，即革命对国家的态度和一般关于国家的問題完全避而不談！他的这本小册子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历史文献，其中有关于施蒂納和蒲魯东等人思想演变的宝貴材料；另一部分是庸俗的，其中有关于無政府主义者与强盜沒有区别这样拙劣的議論。

这两部分的結合，不但十分可笑，而且足以說明普列汉諾夫在俄国革命前夜以及革命时期的全部活动：在1905—1917年，普列汉諾夫正是这样表明自己是在政治上充当資产階級尾巴的半学究，半庸人。

我們看到，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同無政府主义者論战时，極其詳尽地說明了自己是怎样看待革命对国家的态度問題的。恩格斯在1891年出版馬克思的“哥达綱領批判”时写道：“我們（即恩格斯和馬克思）那时正在同以巴枯宁为首的無政府主义者作最猛烈的斗争，——那时离第一国际的海牙會議¹¹³閉幕才两年。”

無政府主义者正是企圖把巴黎公社宣布为他們“自己的”，認為它能証实他們的学說，然而他們根本不懂得公社的教訓和馬克思对这些教訓的分析。对于是否需要打碎旧的国家机器、用什么东西来代替它等具体政治問題，無政府主义者連一个比較接近真

理的答案都沒有提出过。

但是在談“無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时迴避整个国家問題，不理會馬克思主义在公社以前和以后的全部發展，那就必然会滾到机会主义那边去。因为机会主义者求之不得的，正是完全不提我們剛才所指出的两个問題。光是这一点，已經 是机会主义的胜利了。

2. 考茨基与机会主义者的論战

在俄国文壇上，考茨基的著作的譯本無疑比其他国家多得無可計量。难怪有些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开玩笑說，在俄国讀考茨基著作的人比在德国还多(附带說一說，在这个玩笑里含有比开这个玩笑的人所料想的更深刻得多的历史內容：俄国工人在1905年对世界最优秀的社会民主主义文献中最优秀的著作有空前强烈的要求，他們得到的这些作品的譯本也比其他各国多得無可比拟，这样就比較先进的邻国的丰富經驗加速地移植到我国無产階級运动的所謂年輕的基地上来了)。

考茨基之所以在俄国特別出名，除了他对馬克思主义作了通俗的解释以外，就是他同机会主义者及其首領伯恩施坦进行了論战。但是有一个事实几乎是沒有人知道的。如果有人想考察一下考茨基在1914—1915年危机尖銳时期怎样最可耻地表现出张皇失措，堕落到替社会沙文主义辯护的地步，那就不能放过它。这个事实就是：考茨基在起来反对法国最著名的机会主义代表(米勒兰和饒勒斯)和德国最著名的机会主义代表(伯恩施坦)之前，就已經表现出很大的动搖。1901—1902年在斯圖加特出版的、旨在捍衛革命無产階級觀點的、馬克思主义的“曙光”杂志¹¹⁴，曾不得不同

考茨基进行論战，并把他在1900年巴黎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¹¹⁵上提出的決議叫做“橡皮”決議，因为这个決議对机会主义者的态度是曖昧的，調和的，躲躲閃閃的。在德国的書刊中还刊載过考茨基的信件，这些信件也表明他在攻击伯恩施坦之前有过很大的动摇。

但是另一件事情的意义更重大得多，这就是：当我们研究考茨基最近背叛馬克思主义的經過的时候，从他同机会主义者的論战中，从他提問題和解釋問題的方法上，我們可以看到，他在國家問題上恰恰是一貫傾向于机会主义的。

我們拿考茨基反对机会主义的第一部大作“伯恩施坦与社会民主党的綱領”來說。考茨基詳細地駁斥了伯恩施坦。但是下面的情况值得注意。

伯恩施坦在他的遺臭万年的“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一書中，指責馬克思主义为“布爾基主义”（此后，俄国机会主义者和自由派資產者千百次地重复这种指責来攻击革命馬克思主义的代表布尔什維克）。而且伯恩施坦还特別談到馬克思的“法兰西內战”，企圖（我們看到，这种企圖已經徹底失敗）把馬克思对公社的教訓的观点与蒲魯东的观点混为一談。伯恩施坦特別注意馬克思于1872年在“共产党宣言”的序言中着重指出的結論，这个結論說：“工人階級不能簡單地掌握現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伯恩施坦非常“喜爱”这句格言，所以他在自己那本書里至少重复了三遍，并且把它完全曲解成机会主义的見解。

我們已經講过，馬克思是想說工人階級应当打碎、摧毁、炸毀（Sprengung——炸毀，是恩格斯用的字眼）全部国家机器。但在伯恩施坦看来，似乎馬克思說這句話是警告工人階級不要在夺取政

权时采取过激的革命手段。

不能想像还有比这种曲解馬克思思想的行为更粗暴更丑恶的了。

而考茨基是怎样最詳尽地駁斥伯恩施坦主义的呢？

他避免分析机会主义在这一点上曲解馬克思主义的根源。他引証了我們在前面引証过的恩格斯为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所写的序言中的一段話，說什么根据馬克思的意見，工人階級不能简单地掌握現成的国家机器，但一般來說它是能够掌握这个机器的，如此而已。至于伯恩施坦把完全同馬克思的真正思想相反的話妄加在馬克思的身上，以及馬克思从1852年起就提出無产階級革命負有“打碎”国家机器的任务，考茨基却一字不提。

結果是：馬克思主义同机会主义在無产階級革命的任务問題上的最重要差別被考茨基抹杀了！

考茨基在“反对”伯恩施坦时写道：“关于無产階級专政問題，我們可以心平气和地留待将来去解决。”（德文版第172頁）

这不是反对伯恩施坦，同他进行論战，实际上是向他讓步，是把障地讓給机会主义，因为机会主义者現在所需要的，恰恰是把关于無产階級革命任务的一切根本問題都“心平气和地留待将来去解决”。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2年到1891年这四十年当中，教导無产階級应当打碎国家机器。而考茨基在1899年，即当机会主义者在这点上完全背叛馬克思主义的时候，却用打碎国家机器的具体形式問題来代替要不要打碎这个机器的問題，把我們無法預先知道具体形式这种“無可爭辯的”（也是爭不出結果的）庸俗道理当做护身符！！

在馬克思和考茨基之間，在他們對無產階級政黨發動工人階級進行革命的任務所持的態度上，存在着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

我們且拿考茨基的另一部更成熟的、多半也是為了駁斥機會主義的錯誤而寫的著作來說。那就是他論“社會革命”的小冊子。作者在這裡把“無產階級革命”問題和“無產階級制度”問題作為專題來研究。作者發表了許多極寶貴的見解，但是恰恰沒有談到國家問題。在這本小冊子里，到處談的只是奪取國家政權，也就是說，考茨基的說法都是向機會主義者讓步的，他認為不破壞國家機器也能奪取政權。馬克思在1872年認為“共產黨宣言”的綱領上已經“陳旧的”東西，考茨基却在1902年把它恢復了。

在這本小冊子里，有一節專門談“社會革命的形式與武器”問題。其中講到群眾性的政治罷工和國內戰爭，也講到“現代大國的強力武器即官僚和軍隊”，但是是一個字也沒有提到公社給了工人一些什麼教訓。可見，恩格斯警告工人特別是德國社會主義者不要“崇拜”國家不是沒有原因的。

考茨基把問題說成這樣：勝利了的無產階級“將實現民主綱領”，接着就敘述了這個綱領的條文。至於1871年在以無產階級民主制代替資產階級民主制的問題上所提出的一些新東西，他却一個字也沒有提到。考茨基用下面這種聽起來好像“冠冕堂皇”的老一套的話來搪塞：

“不言而喻，在現行制度下我們是不能取得統治地位的。革命本身預定要有一個長期的深刻的鬥爭，這個鬥爭一定會改變我們目前的政治結構和社會結構。”

毫無疑義，這是“不言而喻”的，正如馬吃燕麥，伏爾加河流入里海的真理一樣。所可惜的是他拿“深刻的”鬥爭一類空洞而浮夸

的話來迴避革命無產階級的迫切問題：無產階級革命對國家、對民主制的態度與以往非無產階級革命不同的“深刻的地方”究竟在哪里。

考茨基迴避這個問題，實際上就是在这个最重要的問題上向機會主義讓步，但他在口頭上却氣勢汹汹地向它宣戰，強調“革命思想”的意義（如果怕向工人宣傳革命的具體教訓，那末試問這種“思想”還有多大價值呢？），或者說“革命的唯心主義高於一切”，或者宣稱英國工人現在“幾乎與小資產者不相上下”。

考茨基寫道：“在社會主義社會里同時並存的可以有……各種形式上極不相同的企業：官僚的（??）、工聯的、合作社的、個人經營的”……“例如，有些企業非有官僚（??）組織不可，鐵路就是這樣。在這裡，民主組織可以採取這樣的形式：工人選出代表來組成某種類似議會的東西，由這個議會制定工作條例並監督官僚機關的行政。有些企業可以交給工會管理，另外一些企業則可以按合作原則組織起來。”（見1903年日內瓦版俄譯本第148頁和第115頁）

這種論調是錯誤的，它比馬克思和恩格斯在70年代用公社的教訓做例子來說明的倒退了一步。

從所謂必須有“官僚”組織這一點看來，鐵路同大機器工業的一切企業，同任何工廠、大商店和大資本主義農場根本沒有區別。在所有這些企業中，技術條件要求每個人絕對嚴格地遵守紀律，要求每個人十分準確地執行他所擔負的一部分工作，不然就會有整個企業陷於停頓或機器和產品損壞的危險。在所有這些企業中，工人當然要“選出代表來組成某種類似議會的東西”。

但是整個關鍵就在於這個“某種類似議會的東西”不會是資產階級議會機關式的議會。整個關鍵就在於，這個“某種類似議會的東西”不會僅僅“制定條例和監督官僚機關的行政”，像思想沒有超

出资产阶级议会制范围的考茨基所想像的那样。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由工人代表组成的“某种类似议会的东西”当然会“制定条例和监督”“机关的”“行政”，可是这个机关却不是“官僚的”机关。工人在夺得政权之后，就会把旧的官僚机关打碎，把它彻底摧毁，完全粉碎，而用仍然由这些工人和职员组成的新机关来代替它；为了防止这些人变成官僚，就会立即采取马克思和恩格斯详细分析过的办法：（1）不但实行选举制度，而且随时可以撤换，（2）薪金不得高于工人的工资，（3）立刻转到使所有的人都来执行监督和监察的职能，使所有的人暂时都变成“官僚”，因而使任何人都不能成为“官僚”。

考茨基完全没有考虑马克思的话：“公社不是议会式的，而是同时兼管立法和行政的工作机关。”

考茨基完全不了解资产阶级议会制与无产阶级民主制的区别，资产阶级议会制是把民主制（不是供人民享受的）同官僚制（反人民的）连在一起，而无产阶级民主制则立即采取办法来根除官僚制，并且能够把这种办法实行到底，直到官僚制完全消灭，供人民享受的民主制完全实现。

考茨基在这里又暴露了他对国家的“崇拜”和对官僚主义的“迷信”。

现在我们来研究考茨基最后的也是最好的一部反对机会主义者的著作，即他的“取得政权之路”的小册子（好像没有俄文版本，因为它是在1909年俄国反动势力猖獗的时候出版的）。这本小册子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因为它不像1899年批评伯恩斯坦的小册子那样只谈一般的革命纲领，也不像1902年写的小册子“社会革命”那样不管社会革命到来的时期而泛论社会革命的任务，它谈的是

使我們不得不承認“革命時代”已經到來的具體條件。

作者肯定地指出一般階級矛盾的尖銳化和在這方面起特別巨大作用的帝國主義。在西歐“1789—1871年的革命時期”之後，東方從1905年起也開始了同樣的時期。世界大戰以驚人的速度日益逼近。“無產階級已經不能再說革命為時過早了。”“我們已經進入革命時期。”“革命時代已經開始。”

這些話是說得非常清楚的。考茨基的這本小冊子應當成為衡量德國社會民主黨（包括考茨基本人）的言行的一個尺度：他們在帝國主義大戰前夜答應要做的是什麼，而在戰爭爆發的時候卻墮落到怎樣下流的地步。考茨基在這本小冊子里寫道：“目前的形勢會引起這樣一種危險，使人們很容易把我們（德國社會民主黨）看得比實際上溫和。”事實上，德國社會民主黨原來就比人們想像的要溫和得多，要機會主義得多！

更值得注意的是，考茨基雖然如此肯定地說革命時代已經到來，但是他在那本自稱為專門分析“政治革命”問題的小冊子里，卻又完全避開了國家問題。

所有這些迴避、保持緘默、躲躲閃閃的做法結合起來，就必然使他完全滾到機會主義那邊去，關於這一點我們現在來談一談。

德國社會民主黨好像以考茨基為代表聲明說：我仍然堅持革命觀點（1899年）；我特別承認無產階級的社會革命是不可避免的（1902年）；我承認革命的新时代已經到來（1909年）；但是，既然問題是無產階級革命對於國家的任務，那末我还是要反對馬克思在1852年說過的話而倒退（1912年）。

在考茨基與潘涅庫克的論戰中，正是這樣直截了當地提出問題的。

3. 考茨基与潘涅庫克的論战

潘涅庫克以“左翼急进”派的一个代表的资格出来反对考茨基,在这个派别内有卢森堡、拉狄克等人,这个派别坚持革命策略,一致确信考茨基已經轉到“中派”立場,無原則地搖摆于馬克思主义和机会主义之間。这个看法已經由战争充分証明是正确的,在战时,“中派”(有人称它为馬克思主义的派別是錯誤的)或“考茨基派”充分暴露了自己的全部貧乏可惜。

潘涅庫克在一篇論国家問題的文章“群众行动与革命”(“新时代”杂志 1912 年第 30 卷第 2 册)里,說考茨基的立場是“消極的急进主义”立場,是“毫無作为的等待論”。“考茨基不願看到革命的过程”(第 616 頁)。潘涅庫克这样提出問題之后,就来談我們所关心的关于無产階級革命对国家的任务問題。

他写道:“無产階級的斗争不单纯是为了夺取国家政权而反对资产階級的斗争,而且是反对国家政权的斗争…… 無产階級革命的内容,就是用無产階級的强力武器去消灭和縫除(Auflösung——直譯是解散)国家的强力武器…… 只有当斗争的最后結果是国家組織的完全破坏时,斗争才告終止。多数人的組織消灭占統治地位的少数人的組織,从这里就証明多数人的組織的优越性。”(第 548 頁)

潘涅庫克表达自己思想的时候在措詞上有很大的缺点,但是意思还是很清楚的。現在来看一看考茨基怎样反駁这种思想,倒是很有意思的。

考茨基写道:“到現在为止,社会民主党人与無政府主义者之間的对立,就在于前者想夺取国家政权,后者却想破坏国家政权。潘涅庫克則既想这样又想那样。”(第 724 頁)

潘涅庫克的說法犯了不明确和不具体的毛病(他的文章的其

他缺点因与本题无关，这里暂且不谈），考茨基恰恰是抓住了潘涅庫克指出的具有原则意义的实质，但是在这个根本的原则性的问题上完全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立场，完全滚到机会主义那边去了。他对社会民主党人与无政府主义者的区别的论断是完全不对的，马克思主义完全被他歪曲和庸俗化了。

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区别就在于：（1）马克思主义者的目的是完全消灭国家，但他们认为，只有在社会主义革命把阶级消灭之后，在导向国家消亡的社会主义建成之后，这个目的才能实现；无政府主义者则希望在一天之内完全消灭国家，他们不懂得实现这个目的的条件。（2）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无产阶级在夺得政权之后，必须彻底破坏旧的国家机器，用新的由武装工人组织组成的公社式的国家机器来代替它；无政府主义者主张破坏国家机器，但是，他们完全没有弄清楚无产阶级应当用什么去代替它以及怎样运用革命政权；无政府主义者甚至否认革命无产阶级运用国家政权，否认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3）马克思主义者主张利用现代国家准备无产阶级进行革命；无政府主义者则否认这一点。

在这个争论中，反对考茨基而代表马克思主义的恰恰是潘涅庫克，因为马克思正是教导我们说，无产阶级不能单纯地夺取国家政权，也就是说，不能只是把旧的国家机关转到新的人手中，而应当打碎、摧毁这个机关，用新的机关来代替它。

考茨基离开了马克思主义而滚到机会主义者那边去了，因为他正好完全抹杀了机会主义者所绝对不能接受的破坏国家机器的思想，把“夺取”只是解释成获得多数，这就替机会主义者留下了空隙。

考茨基为了掩饰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就采用了书呆子

的办法：“引証”馬克思自己的話。馬克思在1850年曾說必須把“強力完全集中在国家政权手中”。考茨基就得意洋洋地問道：潘涅庫克不是想破坏“集中制”嗎？

这不过是一套把戏，正像伯恩斯坦說馬克思主义和蒲魯东主义都主张用联邦制代替集中制一样。

考茨基的“引証”是牛头不对馬嘴的。無論用旧的国家机器或用新的国家机器，集中制都是可能實現的。工人們自願地把自己的武装力量集合起来，这就是集中制，但这要以“完全破坏”国家的集中机关即常备軍、警察和官僚为基础。考茨基采取了十足的欺騙手段，对大家都知道的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公社的言論避而不談，却搬出一些文不对題的引証来。

考茨基繼續写道，……“也許是潘涅庫克想要消灭官僚的国家职能吧？但是，我們無論在党組織或在工会組織內都非有官吏不可，更不必說在国家行政机关內了。我們的綱領不是要求消灭国家官吏，而是要求由人民选举官吏”……“現在我們談的并不是‘未来的国家’的行政机关要采取怎样的形式，而是在我們取得国家政权以前（着重号是考茨基加的）我們的政治斗争要不要消灭（auflöst——直譯是解散）国家政权。哪一个部和它的官吏可以消灭呢？”他列举了教育部、司法部、财政部、陸軍部。“不，現在內閣中没有一个部是我們反政府的政治斗争可以取消的…… 为了避免誤会，我再重复一遍：現在談的不是获得胜利的社会民主党将赋予‘未来的国家’怎样的形式，而是我們作为反对党應該怎样去改变现在的国家。”（第725頁）

这显然是强詞夺理。潘涅庫克提出的正是革命問題。这無論在他的那篇論文的标题上或在上面对引的那段話中都可以明显地看出。考茨基跳到“反对党”問題上去，这正說明他是以机会主义的观点来代替革命的观点。他得出了这样的結論：現在我們是反对党，到取得政权以后我們再来专门談吧。革命不見了！这正是

机会主义者所需要的。

这里所说的不是反对党，也不是一般的政治斗争，而正是革命。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破坏“行政机关”和整个国家机关，用武装工人组成的新机关来代替它。考茨基暴露了自己对“内阁”的“崇拜”，试问，为什么不可以由——譬如说——拥有全权的工兵代表苏维埃设立的各种专家委员会去代替“内阁”呢？

问题的本质完全不在于是否保留“内阁”，是否设立“专家委员会”或其他什么机关，这根本不重要。问题的本质在于：是保存旧的国家机器（它与资产阶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且浸透了因循守旧的恶习）呢，还是把它破坏并用新的来代替它。革命不应当是新的阶级利用旧的国家机器来指挥、管理，而应当是新的阶级打碎这个机器，利用新的机器来指挥、管理，——这就是考茨基所抹杀或者是他所完全不了解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

他提出的关于官吏的问题，清楚地表明他不了解公社的教训和马克思的学说。他说：“我们无论在党组织或在工会组织内都非有官吏不可”……

我们在资本主义下，在资产阶级统治下是非有官吏不可的。无产阶级受资本主义的压迫，劳动群众受资本主义的奴役。在资本主义下，由于雇佣奴隶制和群众贫困的整个环境，民主制被缩小、压抑并阉割得残缺不全了。因为这个缘故，而且仅仅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政治组织和工会组织内的负责人被资本主义环境腐化了（确切些说，有被腐化的趋势），有变为官僚的趋势，也就是说，有变为脱离群众、站在群众头上的特权者的趋势。

这就是官僚主义的实质，在资本家被剥夺以前，在资产阶级被推翻以前，甚至无产阶级的负责人也不免会在一定程度上“官

僚化”。

在考茨基看来，既然被选举出来的公职人员还会存在，那也就是说，在社会主义下官吏也还会存在，官僚制也还会存在！这一点恰恰是不对的。马克思正是以公社为例指出，在社会主义下，公职人员将不再是“官僚”或“官吏”，其所以能如此，那是 因为除了实行选举制度以外，还可以随时撤换，还把薪金减到工人平均工资的水平，并且还以“同时兼管立法和行政的工作机关”去代替议会制机关。

实质上，考茨基用来反驳潘涅库克的全部论据，特别是考茨基说我们无论在工会组织或在党组织内都非有官吏不可的那个绝妙的理由，就是过去的伯恩斯坦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那一套“理由”。伯恩斯坦在他的那本背叛变节的作品“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中，激烈反对“原始的”民主制思想，反对他所称为“教条主义的民主制”的东西，即绝对服从选民的委托，公职人员不领报酬，中央代表机关软弱无力等等。为了证明这种“原始的”民主制不中用，伯恩斯坦就援引了维伯夫妇所解释的英国工联的经验。据说，工联根据自己七十年来在“完全自由”（德文版第 137 页）的条件下发展的情形，确信原始的民主制已不中用，因而用普通的民主制，即与官僚制相结合的议会制来代替它。

其实，工联并不是在“完全自由”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而是在彻底的资本主义奴隶制下发展起来的，在这种制度下，自然“不得不”对普遍存在的邪恶现象、暴虐、不公平以及把穷人排斥在“最高”行政机关之外的现象作种种让步。在社会主义下，“原始的”民主制的许多东西都必然会复活起来，因为人民群众在文明社会史上破天荒第一次站起来了，不仅自己来参加投票和选举，而且自

己来参加日常管理。在社会主义下，所有的人将轮流来管理，因此很快就会习惯于不要任何人来管理。

馬克思用自己天才的批判分析才能，在公社所采取的实际办法中看到了一个转变，机会主义者因为胆怯、因为不愿意与资产阶级决裂而害怕这个转变，不愿意承认这个转变，無政府主义者则由于急躁或一般不懂得大规模社会变动的条件而不愿意看到这个转变。“連想也不要想破坏旧的国家机器，我們沒有內閣和官吏可不行呵！”——机会主义者就是这样議論的，他們滿身市儈气，实际上不但不相信革命和革命的創造力，而且还对革命害怕得要死（像我国孟什維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害怕革命一样）。

“只須考虑破坏旧的国家机器，用不着探究以往無产阶级革命的具体教訓，也用不着分析应当用什么和怎样去代替破坏了的东西。”——無政府主义者（当然是指無政府主义者当中的优秀分子，而不是指那些跟着克魯泡特金先生之流去做资产阶级尾巴的無政府主义者）就是这样議論的；所以他们就采取絕望的策略，而不采取那种以大無畏的精神进行革命工作、根据群众运动的实际条件完成具体任务的策略。

馬克思教导我們要避免这两种錯誤，教导我們要勇气百倍地去破坏全部旧的国家机器，同时又教导我們要具体地提問題，要看到公社在数星期內就能够开始建立起新的無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并实行上述种种办法来扩大民主制和根絕官僚主义。我們要学习公社社員的革命勇气，要把他們的实际办法看成是实际迫切需要并能立刻实现的初步經驗，如果沿着这样的道路前进，我們就能徹底消灭官僚主义。

消灭官僚主义的可能性是有保証的，因为社会主义将縮短劳

动日，發動群众去建設新生活，使大多数居民都能够毫無例外地执行“国家职能”，这也就会使一切国家完全消亡。

考茨基繼續写道：……“群众罢工的任务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是破坏国家政权，而只能是促使政府在某个問題上讓步，或用一个順从(entgegenkommende)無产阶级的政府去代替敌視無产阶级的政府…… 可是，在任何时候，在任何条件下，这”（即無产阶级对敌对政府的胜利）“不能导致国家政权的破坏，而只能引起国家政权內部力量对比的某种变动（Verschiebung）…… 因此，我們政治斗争的目的，和从前一样，仍然是以取得議會中多数的办法来夺取国家政权，并且使議會变成駕于政府之上的主宰。”（第726、727、732頁）

这就是最純粹最卑鄙的机会主义，口头上承認革命，实际上却背弃了革命。考茨基的思想仅限于要有一个“順从無产阶级的政府”，这与1847年“共产党宣言”所宣布的“把無产阶级組織成为統治阶级”的思想比較起来是倒退了，落到了庸俗的地步。

考茨基一定会同謝德曼、普列汉諾夫和王德威尔得之流实行他所爱好的“統一”，因为他們都贊成爭取一个“順从無产阶级的”政府。

我們却要同这些社会主义的叛徒决裂，要为破坏全部旧的国家机器而奋斗，使武装的無产阶级自己成为执政者。这是“二者之間莫大的区别”。

考茨基一定会成为列金、大衛、普列汉諾夫、波特列索夫、策烈鉄里和切尔諾夫之流的亲密伙伴，因为他們完全同意为爭取“国家政权內部力量对比的变动”而斗争，为爭取“議會中的多数和駕于政府之上的全权議會”而斗争，——这是一个多么崇高的目的，它是机会主义者完全可以接受的，一点沒有超出资产阶级議會制共和国的范围。

我們却要同机会主义者决裂；整个觉悟的無产階級会同我們一起进行斗争，不是为了争取“力量对比的变动”，而是为了推翻資產階級，破坏資產階級的議會制，建立公社式的民主共和国或工兵代表苏維埃共和国，建立無产階級的革命专政。

* * *

*

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比考茨基更右的派別，在德国有“社会主义月刊”¹¹⁶派(列金、大衛、科尔布等人，其中还包括斯堪的那維亞人斯陶宁格和布兰亭)，在法国和比利时有饒勒斯派和王德威尔得，在意大利党内有屠拉梯、特雷維斯以及其他右翼代表，在英国有关费边社分子和“独立党人”¹¹⁷(即“独立工党”，实际上它是始終依附自由派的)，如此等等。所有这些先生無論在議會工作中或在党的政論方面都起着很大的而且往往是主要的作用，他們公开否認無产階級专政，鼓吹露骨的机会主义。在这些先生看来，無产階級“专政”是与民主“矛盾”的！他們在實質上跟小資產階級民主派沒有多大区别。

根据这种情况，我們可以得出結論說：第二国际絕大多数正式代表已經完全滾到机会主义那边去了。他們不仅忘記了公社的經驗，还要把它加以歪曲。他們沒有教导工人群众說，工人們应当起来的时候快到了，应当打碎旧的国家机器而用新的国家机器来代替它，从而把自己的政治統治变为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他們不但沒有这样教导工人群众，反而教导工人群众相反的东西，他們对“夺取政权”的了解，也給机会主义者留下了無數空隙。

現在，为了解决究竟由英国或德国、由这个財政資本或那个財

政資本来統治世界的爭執，国家及其因帝国主义竞赛而加强的軍事机关已經变成了屠杀千百万人民的軍事怪物，在这个时候曲解和抹杀無产階級革命对国家的态度問題，就不能不产生極大的影响[⊖]。

写于1917年8—9月

1918年由“生活和知識”出版社
出版单行本

按1919年“共产党人”出版社
出版的小册子原文刊印，并根据
手稿和1918年的版本做过校訂

⊖ 手稿上还有下面这一段：

“第 七 章 1905 年和 1917 年俄国革命的經驗

这一章的題目非常大，可以而且应当写几卷書来論述它。自然，在这本小册子里只能談一談与無产階級在革命中对国家政权的任务直接有关的最主要的經驗教訓。”（手稿到此中断。——編者注）

初 版 跋

这本小册子是在1917年8、9两月写成的。我当时已经拟定了下一章即第七章“1905年和1917年俄国革命的經驗”的大綱。但是，除了題目以外，我連一行字也沒有来得及写，因为1917年十月革命前夜的政治危机“妨碍”了我。对于这种“妨碍”，只有高兴。但是本書第二部分（关于“1905年和1917年俄国革命的經驗”）也許要拖延很久才能写出，因为做出“革命的經驗”总比論述“革命的經驗”更愉快，更有益。

作 者

1917年11月30日于彼得格勒

注 释

- 1 全俄工兵代表苏維埃第一次代表大会 于1917年6月3日至24日(6月16日至7月7日)在彼得格勒举行。出席大会的有1000多名代表。布尔什維克当时在苏維埃中占少数,只有105名代表。占多数的是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維克。在大会議程上有这样几个問題:对临时政府的态度問題,战争問題,筹备立宪會議的問題等。列宁在大会上就对临时政府的态度問題和战争問題發表了演說。布尔什維克对每个根本問題都提出了自己的決議案。他們揭露了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質,揭露了同资产階級妥协的危害性,并且要求全部政权由苏維埃掌握。大会的決議表明,大会的立場是支持临时政府的,它贊成临时政府所准备的俄国軍队在前綫的进攻,反对政权归苏維埃。——(正文第1頁)
- 2 “工人报”是孟什維克的中央机关报,从1917年3月到11月每日在彼得格勒出版。——(正文第3頁)
- 3 見“馬克思恩格斯書信选集”1953年俄文版第396頁。——(正文第4頁)
- 4 列宁指的是1917年4月24—29日(5月7—12日)在彼得格勒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七次(四月)全国代表會議的決議(見“苏共代表大会、代表會議和中央全会決議彙編”1954年版第1卷第332—353頁)。——(正文第5頁)
- 5 弗·普·利亚霍夫 是沙皇軍队中的一个上校,1908年他曾經指揮俄軍鎮压波斯的资产階級革命。列宁在这里說到利亚霍夫政策,是指沙皇政府鎮压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而言。——(正文第6頁)

- 6 指1917年2月28日(3月13日)出版的“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維埃消息报”(日报)。在全俄苏維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成立了工兵代表苏維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以后,該报就成了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机关报,从1917年8月1日(14日)第132号起改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維埃消息报”。整个这段时期內,該报都操縱在孟什維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手里,激烈地反对布尔什維克党。在全俄苏維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从1917年10月27日(11月9日)起,“消息报”成了苏維埃政权的正式机关报。1918年3月,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由彼得格勒迁到莫斯科,該报也就改在莫斯科出版。——(正文第7頁)
- 7 全俄农民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917年5月4—28日(5月17日—6月10日)在彼得格勒举行。出席大会的有各省的和部队的1115名代表。布尔什維克积极参加了这次代表大会,揭穿了资产阶級临时政府的帝国主义政策及孟什維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妥协行为。列宁就土地問題在大会上发表了演說。他要求立即沒收地主的土地,把这些土地交給农民委员会,实行土地国有。但是大会为社会革命党所把持,这就决定了大会決議的性質。大会同意资产阶級临时政府的政策,同意“社会主义者”参加临时政府,并在決議中支持把战争进行到“胜利結束”,支持准备好的前綫进攻。大会反对立即把地主的土地交給农民,主张土地問題应等待立宪會議来解决。——(正文第7頁)
- 8 “新生活报”是孟什維克派的日报,即所謂社会民主党人“国际主义者”集团的机关报。这个集团联合了孟什維克,联合了馬尔托夫分子以及独立的半孟什維克派知識分子。“新生活报”派經常动搖于妥协分子和布尔什維克之間。
“新生活报”于1917年4月在彼得格勒出版,十月革命后对苏維埃政权采取了敌对立場,1918年7月被封閉。——(正文第8頁)
- 9 列宁指的是英国政府發給英国独立工党領袖麦克唐納出国护照一事。麦克唐納是应孟什維克領袖邀請來俄国訪問的,后来訪問沒有实现。——(正文第9頁)

- 10 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維埃“告全世界人民書”是在1917年3月14日(27日)的苏維埃會議上通过的,次日即在各中央报纸上发表。社会革命党—孟什維克的領袖們在革命群众要求結束战争的壓力下,不得不通过这个告全世界人民書。
- 告全世界人民書号召各交战国的劳动者起来爭取和平。但是并没有揭露战争的侵略性質,也没有提出爭取和平的实际措施,实际上是为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繼續进行帝国主义战争辯护。——(正文第9頁)
- 11 1917年5—6月,意大利占領了阿尔巴尼亚,法国和英国軍队占領了希腊的許多城市。在帝国主义世界大战期間(1914—1918年),波斯的北部和中部被俄国軍队占領,南部被英国軍队占領。——(正文第10頁)
- 12 指布尔什維克党团委员会和社会民主党人—国际主义者联合委员会在全俄苏維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提出的声明,声明中要求在大会上首先提出临时政府所准备的前綫进攻的問題。声明中指出,这次进攻是帝国主义盟国的巨头指使的,俄国反革命集团打算用这种办法把大权集中到外交界的軍人集团和资本家集团手中,以打击爭取和平的革命斗争和俄国民主派所采取的立場。这篇声明向工人阶级、軍队和农民發出了国家已处于危急中的警告,号召大会立即回击反革命的进攻。——(正文第10頁)
- 13 “人民事業报”(日报)是社会革命党的机关报。該报从1917年3月到1918年6月在彼得格勒出版,曾屡次更改名称。1918年10月,該报在薩馬拉复刊,出了3号;1919年3月又在莫斯科复刊,出了10号。該报因进行反革命活动被封閉。——(正文第10頁)
- 14 巴塞尔宣言(关于战争的)是1912年在巴塞尔第二国际非常代表大会會議上通过的(見“列宁全集”第4版第21卷第184—193、278—279頁)。——(正文第19頁)
- 15 胶州湾 位于中国北部,屬山东省,在1914年以前,它和太平洋的加罗林群島、馬里亞納群島、馬紹尔群島都屬于德国,在帝国主义世界大战期間(1914—1918年)被日本占領。——(正文第20頁)

- 16 指临时政府陸軍部長克倫斯基禁止烏克蘭軍隊召開代表大會；儘管如此，代表大會還是於 1917 年 6 月在基輔召開了。

關於臨時政府和孟什維克黨及社會革命黨對烏克蘭所採取的反革命政策，列寧在“烏克蘭”和“烏克蘭和俄國執政黨的失敗”這兩篇文章（見本卷第 76—77、84—86 頁）中曾尖銳地批評過。——（正文第 21 頁）

- 17 俄國 1905—1907 年的革命喚起了東方各國人民的革命運動。1908 年土耳其發生了資產階級革命。1906 年波斯開始了資產階級革命，在 1909 年推翻了波斯國王。1910 年中國展開了反對本國封建主義和外國帝國主義者的革命運動，這次運動引起了中國革命，在 1911 年 12 月成立了資產階級共和國。——（正文第 24 頁）

- 18 “社會民主黨人報”（日報）是布爾什維克黨莫斯科省委員會和莫斯科市委員會的機關報，後來又是莫斯科專區委員會的機關報。以 1917 年 3 月開始出版，直到 1918 年 3 月，由於黨中央遷到莫斯科，該報就與“真理報”合併。——（正文第 26 頁）

- 19 “真理報”是布爾什維克的合法日報，在彼得堡出版。該報是根據彼得堡工人的倡議在 1912 年 4 月間創辦的。

“真理報”是群眾性的工人報紙，它是依靠工人的捐款出版的。在它的周圍有大批的工人通訊員和工人作家。“真理報”僅僅在一年之內，就刊載了 1 萬 1 千多篇工人通訊。“真理報”的發行額平均每日 4 萬份，個別月份達到 6 萬份。

列寧在國外領導“真理報”的工作，他幾乎每天都寫文章寄給報紙；他經常給編輯部指示，並且把一批黨的優秀的寫作人才團結在報紙周圍。

積極參加報紙工作的有：莫洛托夫、斯維爾德洛夫、斯大林、加里寧。編輯部的經常撰稿人有米·斯·奧里明斯基、尼·古·波列塔也夫、克·恩·薩莫依洛娃、尼·尼·巴圖林、安·伊·叶利札羅娃、克·斯·叶列梅也夫等。第四屆國家杜馬的布爾什維克代表中積極參加“真理報”工作的有：阿·叶·巴達也夫、格·伊·彼得羅夫斯基、馬·康·穆拉諾夫、費·尼·薩莫依洛夫、尼·羅·沙果夫。

“真理报”不断遭到警察的迫害。在創办的第一年，它被沒收 41 次，編輯被控告 36 次，編輯坐牢一共坐了 47 个半月。“真理报”在出版的 2 年零 3 个月期間，被沙皇政府查封过 8 次，查封后报纸又改用別的名称出版，如：“工人真理报”、“北方真理报”、“劳动真理报”、“拥护真理报”、“無产階級真理报”、“真理之路报”、“工人日报”、“劳动的真理”。在 1914 年 7 月 8 日(21 日)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前报纸被查封。

二月革命后，“真理报”才复刊。从 1917 年 3 月 5 日(18 日)起，“真理报”成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的中央机关报。4 月 5 日(18 日)列宁由国外回来，参加了編輯部，领导“真理报”。1917 年 7 月 5 日(18 日)士官生和哥薩克搗毀了“真理报”的編輯部。1917 年 7—10 月由于临时政府的迫害，“真理报”多次更換名称繼續出版，用过的名称有：“‘真理’小报”、“無产者报”、“工人日报”、“工人之路报”。自 10 月 27 日(11 月 9 日)起又用原名“真理报”出版。——(正文第 26 頁)

- 20 工厂委员会代表会议于 1917 年 5 月 30 日至 6 月 3 日(6 月 12—16 日)在彼得格勒举行。出席会议的有各工厂委员会和彼得格勒市工会理事会的代表 568 人。列宁为会议写了“关于同經濟破坏作斗争的几項經濟措施的決議”(見“列宁全集”1957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24 卷第 473—475 頁)，該決議案以布尔什維克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于 1917 年 5 月 25 日(6 月 7 日)發表在莫斯科的布尔什維克报纸“社会民主党人报”上，后又作为召开这次代表会议的組織委员会的提案，于 6 月 2 日(15 日)發表在“真理报”第 71 号上。会议議程包括下列問題：生产的监督与調整問題，工厂委员会的任务問題，工厂委员会在工会运动中的作用問題。列宁在会议上發了言。他尖銳地批判了“新生活报”的代表阿維洛夫的反革命言論和他所提出的关于生产的监督与調整問題的決議案。代表会议以絕大多数通过了列宁写的“关于同經濟破坏作斗争的几項經濟措施的決議”。——(正文第 27 頁)

- 21 “言論报”(日报)是立宪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从 1906 年 2 月起在彼得堡出版，1917 年 10 月 26 日(11 月 8 日)被彼得格勒苏維埃軍事革命委员会查封。后来曾用別的名称出版，到 1918 年 8 月停刊。——(正文第 28 頁)

- 22 “統一報”(日報)于1917年3月至11月在彼得格勒出版,在1917年12月和1918年1月曾用其他名称出版。該報由普列漢諾夫主編。“統一報”聯合了孟什維克護國派的極右翼集團,無條件地支持資產階級臨時政府,對布爾什維克黨進行了瘋狂的攻擊。——(正文第28頁)
- 23 “前進報”(«Vorwärts»)(日報)是德國社會民主黨的中央機關報,自1876年起由威·李卜克內西主編。恩格斯曾在該報展開過反對機會主義各種表現的鬥爭。從90年代後5年起,即在恩格斯逝世後,“前進報”經常發表一些在德國社會民主黨內和第二國際內占統治地位的機會主義者的文章。在帝國主義世界大戰期間(1914—1918年),“前進報”採取了社會沙文主義的立場。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後,“前進報”成了反蘇宣傳的中心之一。該報在柏林出版到1933年。
從1946年4月起,“前進報”又在柏林復刊,由德國統一社會黨柏林組織出版。——(正文第30頁)
- 24 指第四屆國家杜馬的地主和資本家代表于1917年6月3日(16日)在彼得格勒召開的會議。二月革命後臨時政府沒有正式解散國家杜馬。杜馬的地主和資本家代表繼續召開自己的會議,這裡成了反革命的策源地。臨時政府在1917年10月6日(19日)才通過解散杜馬的決議。——(正文第32頁)
- 25 “人民意志報”(日報)是社會革命黨右翼的機關報,于1917年在彼得格勒出版,1917年11月被封閉;以後又改名出版,最後于1918年2月被封閉。——(正文第38頁)
- 26 “新時報”(日報)是反動貴族和官僚集團的報紙。1868年在彼得堡出版,1905年起成為黑幫分子的機關報之一。列寧稱它為典型的賣淫式的報紙。二月革命以後,“新時報”完全支持資產階級臨時政府的反革命政策,瘋狂地攻擊布爾什維克。該報于1917年10月26日(11月8日)被彼得格勒蘇維埃軍事革命委員會封閉。——(正文第43頁)
- 27 第一次聯合政府于1917年5月5日(18日)成立,內閣名單于5月6日(19日)公布。參加聯合政府的除了資產階級的代表外,還有社會革命黨人克倫斯基和切爾諾夫,親社會革命黨的彼列維爾節夫,孟什維

- 克斯柯別列夫和策烈鐵里，“人民社会主义者”彼舍霍諾夫。——（正文第 44 頁）
- 28 指临时政府劳动部长孟什維克斯柯別列夫 1917 年 5 月 13 日（26 日）在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維埃會議上的發言。斯柯別列夫声明，必須把有产階級的稅率增加“到利潤的 100%”。——（正文第 49 頁）
- 29 列宁指的是全俄苏維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禁止布尔什維克党中央委员会會決定在 1917 年 6 月 10 日（23 日）举行的游行示威的決議。游行示威是要向苏維埃代表大会表示，彼得格勒的工人和士兵要求把全部国家政权交給苏維埃。孟什維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反对这次准备好了的游行示威。他們在苏維埃代表大会 6 月 9 日（22 日）的會議上通过了禁止游行示威的决定。布尔什維克党中央委员会服从了苏維埃代表大会的决定，取消了游行示威。按照苏維埃代表大会的决定，游行示威延至 6 月 18 日（7 月 1 日）举行。孟什維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企圖在反布尔什維克的口号下举行这次游行示威。6 月 18 日（7 月 1 日）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参加游行示威的約有 50 万人。絕大多数拥护布尔什維克党的革命口号。只有少数人举着妥协党的表示信任临时政府的标語。这次游行示威表明了群众革命情緒正在不断地高涨，布尔什維克党的影响和威信已經大大提高；同时表明了小資产階級妥协党的徹底破产和临时政府在首都的失敗（关于六月游行示威，見本卷第 95—97 頁）。——（正文第 55 頁）
- 30 1917 年 6 月 7 日（20 日），临时政府下令要無政府主义者搬出前沙皇大臣杜尔諾沃的別墅。这道命令实际上是針對占用別墅大部分的赤衛队和工会組織發出的。彼得格勒的工人提出了抗議，許多工厂都罢工了。临时政府不得不讓步。但在 6 月 18 日（7 月 1 日）夜間派了一队武装的哥薩克和士兵搗毀了別墅。这种突然的袭击引起了彼得格勒工人的憤怒。——（正文第 55 頁）
- 31 魯齐烏斯·賽尔吉烏斯·卡提利納 是羅馬的政治家和軍事家。紀元前 63 年，他策划了一次陰謀，目的在發動政变，推翻羅馬的共和国，实行軍人独裁。——（正文第 58 頁）

- 32 这个草案的基本思想已包含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和布尔什维克党全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党团委员会就代表大会禁止布尔什维克党决定在6月10日(23日)举行的和平示威一事发表的声明中。

在“列宁全集”第2版和第3版的第20卷中，编辑部用“关于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的文稿”做标题发表了这个草案。第4版根据文件的内容更换了标题。——(正文第62页)

- 33 列宁指的是临时政府部长孟什维克策烈铁里于1917年6月11日(24日)在全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主席团、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农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和代表大会党团委员会的联席会议上发表的演说。这次会议是针对布尔什维克决定在6月10日(23日)举行示威而召开的。为了对策烈铁里的演说表示抗议，布尔什维克退出了这次会议。——(正文第64页)

- 34 路易-欧仁·卡维涅克是法国的一个将军，1848年二月革命以后是法国临时政府的陆军部长；1848年6月间，在他的领导下镇压了巴黎工人的起义。——(正文第68页)

- 35 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和布尔什维克党全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党团委员会就代表大会禁止布尔什维克党决定在1917年6月10日(23日)举行的和平示威一事发表的声明。布尔什维克在声明中揭穿了苏维埃代表大会的领袖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禁止和平示威的挑衅行为以及临时政府的反革命政策，并且警告说革命已处在危急中，号召工人阶级坚持斗争和提高警惕。6月11日(24日)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主席团、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农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和代表大会党团委员会的联席会议上宣读了这个声明。布尔什维克想在6月12日(25日)的苏维埃代表大会会议上宣读这个声明，但是会议主席剥夺了布尔什维克代表的发言权。声明就交给了苏维埃代表大会主席团。尽管布尔什维克取消了游行示威，在代表大会的这次会议上还是通过了谴责布尔什维克党的决议。——(正文第73页)

- 36 “小报”是资产阶级的日报，自1914年9月至1917年7月在彼得格

勒出版。——(正文第 83 頁)

- 37 “俄罗斯意志报”是大銀行出資創办的資產階級日報，該報进行了猛烈的反布尔什維克煽動。列寧說它是最下流的資產階級報紙。該報于 1916 年 12 月至 1917 年 10 月在彼得格勒出版。——(正文第 83 頁)
- 38 沙皇政府內務部副部長鐘柯夫斯基在 1914 年就知道第四屆國家杜馬代表馬林諾夫斯基是奸細。當時鐘柯夫斯基把這件事通知了第四屆國家杜馬主席羅將柯，羅將柯也“保證”決不洩露秘密。他們決定叫馬林諾夫斯基離開杜馬，但是要做到“使杜馬和部長們都不丟丑”。馬林諾夫斯基辭掉了代表職務，並在警察司的幫助下到國外去了。1917 年根據警察司的檔案材料馬林諾夫斯基才被揭露。1918 年蘇維埃政府把馬林諾夫斯基交法庭審判，並根據革命法庭的判決把他槍斃了。——(正文第 87 頁)
- 39 “日報”是自由資產階級派的報紙，1912 年在彼得堡由銀行出資創辦。這個報紙有孟什維克取消派參加，1917 年 2 月後完全由他們掌握。1917 年 10 月 26 日(11 月 8 日)該報被彼得格勒蘇維埃軍事革命委員會封閉，後來又用別的名稱出版到 1918 年 5 月。——(正文第 88 頁)
- 40 1917 年 6 月 16 日(29 日)“日報”、“新生活報”、“交易所新聞”刊登了臨時政府為審理沙皇政府的罪行而成立的特別檢察委員會的結論。在結論中第一次公布了有關奸細馬林諾夫斯基案件的材料。——(正文第 88 頁)
- 41 “交易所報”即“交易所新聞”，是資產階級的日報，1880 年在彼得堡創刊。“交易所報”這個名詞後來成了沒有原則的和賣淫式的資產階級報刊的通稱。該報于 1917 年 10 月底被彼得格勒蘇維埃軍事革命委員會封閉。——(正文第 88 頁)
- 42 指做過多年警察司偵探的社會革命黨中央委員阿捷夫的奸細活動。他于 1908 年被揭發，隨即逃往國外。——(正文第 88 頁)
- 43 指 1917 年 6 月 18 日(7 月 1 日)臨時政府發動的前綫進攻。這次進攻是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同意的。——(正文第 98 頁)

- 44 全俄工会代表会议于1917年6月21—28日(7月4—11日)在彼得格勒举行。出席会议的有211人,布尔什维克有73人,其余是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崩得分子和部分无党派人士。列入会议议程的有工会运动的任務問題,工会的建設問題,經濟斗争問題等。布尔什维克在一切重要問題上都提出了自己的決議案或修正案。代表会议以仅仅相差10—12票的多数通过了孟什维克护国派提出的決議。代表会议选出了工会临时中央委员会。——(正文第109頁)
- 45 指右翼社会革命党人叶·克·布列什柯-布列什柯夫斯卡娅。她拒絕参加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以抗議社会革命党第三次代表大会(1917年5月底至6月初在莫斯科举行)沒有把克倫斯基选进中央委员会。——(正文第115頁)
- 46 “土地和自由报”是社会革命党人的报纸,1917年3月至1918年5月在莫斯科出版。——(正文第115頁)
- 47 立宪民主党的部长盛加略夫、曼努依洛夫、沙霍夫斯科依等人于1917年7月2日(15日)退出临时政府。列宁的文章“立宪民主党人退出內閣是指望什么?”第一次發表于1917年7月15日(28日)“無产階級事業报”,上面沒有署名。
- “無产階級事業报”(日报)是喀琅施塔得工兵代表苏維埃布尔什维克党团的机关报,1917年出版,以代替7月間被临时政府封閉的喀琅施塔得布尔什维克“真理呼声报”。——(正文第139頁)
- 48 列宁指1917年7月3—4日(16—17日)彼得格勒的游行示威。7月3日(16日),維波尔格区开始出现反对临时政府的自發的游行示威。最先出来的是第一机枪团,接着,别的部队和工人也同他們匯合在一起了。游行示威很可能变成反对临时政府的武装起义。
- 布尔什维克党反对在这个时候采取武装行动,它認為革命危机还没有成熟,军队和外地群众还没有做好准备来支持首都的起义。7月3日(16日)下午4时,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彼得格勒委员会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軍事局的联席会议上,作出了劝阻發动的决定。当时正在开会的彼得格勒市布尔什维克第二次代表会议也

通过了同样的决定。出席会议的代表分别前往各工厂和各区去劝阻工人实行发动。但是，发动仍旧开始了，要阻止已经不可能了。

中央委员会、彼得格勒委员会和军事局考虑了群众的情绪以后，于7月3日（16日）深夜通过了参加游行示威的决定，目的在使游行示威成为和平的和有组织的运动。列宁当时不在彼得格勒。他得到消息后，于7月4日（17日）早晨来到彼得格勒。参加7月4日（17日）游行示威的有50多万人，是在布尔什维克的“全部政权归苏维埃！”这一主要的口号下进行的。

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知道并且同意派士官生和军官来镇压举行和平示威的工人和士兵。他们向群众开了枪。反革命部队也从前线调回来打击革命运动。

7月4日（17日）夜间，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作出了停止游行示威的决定。列宁在深夜来到“真理报”编辑部，审阅当天的报纸。列宁离开半小时后，编辑部就被士官生和哥萨克部队捣毁了。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实际上是这次反革命屠杀的参加者和帮凶。在游行示威被镇压后，他们又同资产阶级一起攻击布尔什维克。“真理报”和“士兵真理报”等布尔什维克报纸都被临时政府封闭了。大规模的逮捕、搜查、屠杀开始了。彼得格勒卫戍部队中的革命部队被调离首都，开往前线。

七月事变以后，政权完全转入反革命的临时政府手中，苏维埃不过成了它的一个软弱无力的附属品。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已经告终。革命和平发展的时期已经结束。摆在布尔什维克面前的任务是准备武装起义，推翻临时政府。——（正文第143页）

- 49 “活的言报”（日报）是黑帮的黄色报纸，1916年在彼得格勒创刊，1917年曾进行猛烈的反布尔什维克煽动。该报于十月革命时停刊。——（正文第144页）

- 50 “乌克兰解放协会”（«Союз визволення України»）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组织，是在1914年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开始时建立的。该协会的目的是指望德国击败沙皇俄国，使乌克兰同俄国分离，建立一个受德国保护的资产阶级—地主乌克兰君主国，实际上是使乌克兰成为德国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正文第145页）

- 51 德雷福斯案件是1894年法国反动的保皇派軍人对总參謀部犹太籍軍官德雷福斯进行的挑衅性审判案。軍事法庭依据捏造的間諜罪和叛国罪判处德雷福斯無期徒刑。当时在法国掀起了要求重审德雷福斯案件的社会运动，这个运动是在共和派和保皇派的剧烈斗争中展开的，1906年，德雷福斯終予被宣判無罪。

列宁說德雷福斯案件是“反动軍人千千万万件可耻勾当中的一件”。——(正文第153頁)

- 52 “社会民主党人报”是秘密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1908年2月創刊，1917年1月停刊，共出58号。創刊号在俄国出版，后来移至国外，先在巴黎，后在日内瓦出版。中央机关报的編輯部是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由布尔什維克、孟什維克和波兰社会民主党的代表組成的。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上登載过80多篇列宁的文章和短評。列宁在編輯部內为徹底的布尔什維克路綫进行了斗争。一部分編委(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以調和主义的态度对待取消派，企圖阻撓实行列宁的路綫。孟什維克編委馬尔托夫和唐恩对中央机关报編輯部怠工，同时又在他們那个小集团所办的“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上公开为取消主义辯护。列宁对取消派进行的不調和的斗争，使馬尔托夫和唐恩在1911年6月退出了“社会民主党人报”編輯部。从1911年12月起，“社会民主党人报”由列宁主編。——(正文第156頁)

- 53 列宁从瑞士归国途中曾在斯德哥尔摩停留一天，瑞典左派社会党人于1917年4月13日(新历)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大会。——(正文第156頁)

- 54 列宁的“三次危机”一文第一次發表于“女工”杂志1917年第7期。

“女工”杂志是布尔什維克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刊物；1914年2月至6月在彼得格勒出版，后曾一度停刊，到1917年5月复刊，1918年1月又停刊。——(正文第159頁)

- 55 临时政府鎮压了七月游行之后，在1917年7月7日(20日)發布了逮捕列宁的命令。当天，在工人老布尔什維克謝·雅·阿利路也夫的家庭里举行了會議，出席这次會議的有列宁、奥尔忠尼啓澤、斯大林、叶·德·斯塔索娃等人。

在这次会上决定列宁不应该出席反革命临时政府的法庭受审。这个决定挽救了列宁的生命。后来查明，政府曾命令士官生逮捕列宁并在途中把他杀害。共产党把自己的领袖隐蔽起来了，列宁在秘密的地方继续领导党和无产阶级。——(正文第164页)

- 56 “政治形势”一文第一次以“政治情绪”为题发表于1917年8月2日(7月20日)喀琅施塔得布尔什维克的报纸“无产阶级事业报”第6号。为了使报纸不被临时政府查封，编辑部在刊载这篇文章时把“武装起义”这几个字改成了“坚决斗争”。该文是亲手稿刊印的。——(正文第166页)
- 57 “真理报”新闻简报 德文版以“真理报俄国新闻简报”(«Russische Korrespondenz «Prawda»»)的名称于1917年6月至11月在斯德哥尔摩出版。它是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国外代表机关出版的。该简报还出版了法文版。——(正文第170页)
- 58 贝里斯案件 是沙皇政府于1913年在基辅对犹太人贝里斯进行的挑拨性审判。贝里斯被人诬告，说他为了举行宗教仪式而杀害了信奉基督教的儿童尤辛斯基(实际上是黑帮分子杀害的)。沙皇政府力图借这幕审判丑剧煽起反犹太人运动，造成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这样来使群众转移目标，不去参加国内日益增长的革命运动。审判引起了社会上强烈的愤怒；很多城市的工人都举行了示威游行表示抗议。贝里斯终于被宣判无罪。——(正文第171页)
- 59 见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1955年莫斯科中文版第2卷第317页)。——(正文第177页)
- 60 “论立宪幻想”一文于1917年第一次在“工人和士兵报”上发表，后来以“论当前局势”为题出版了单行本。为了使报纸不被封闭、使布尔什维克党秘密准备武装起义不致暴露，编辑部在发表这篇文章时，把文章中的“武装斗争”几个字改为“坚决斗争形式”。该文亲手稿刊印。——(正文第184页)
- 61 列宁指的是法兰克福议会，即在德国三月革命以后，在1848年5月召

开的国民會議。参加这次會議的大多数是自由資产者，他們毫無結果地空談宪法草案，实际上仍然讓国王掌握政权。——(正文第188頁)

- 62 列宁指的是馬克思的“拿破侖第三政变記”(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1954年莫斯科中文版第1卷第219—321頁)。——(正文第188頁)

- 63 見恩格斯的“德国农民战争”1953年俄文版。——(正文第191頁)

- 64 到卡諾薩去是指低声下气地表示屈服。

1077年，德皇亨利四世到卡諾薩(意大利北部的一个城堡)去求見教皇格雷哥里七世，想向这个对他进行过斗争并且开除他的教籍、剥夺他的王权的教皇請罪。亨利四世恳求教皇接見他，在教皇沒有接見他之前，穿着懺悔者的衣服在城門口等候了三天之久。——(正文第197頁)

- 65 指临时政府准备召开的国务會議。會議于1917年8月12日(25日)在莫斯科举行。参加會議的大多数是地主、資产階級、將軍、軍官和哥薩克的代表。苏維埃代表团是由孟什維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組成的。會議的目的是动员資产階級和地主的反革命力量来粉碎革命。在會議上，科尔尼洛夫、阿列克謝也夫、卡列金等人提出了鎮压革命的綱領。克倫斯基在演說中威胁說，要鎮压革命运动和制止农民夺取地主土地的行動。布尔什維克党中央委員會号召無产階級反对莫斯科国务會議。在會議開幕那天，布尔什維克在莫斯科組織了一天总罢工，参加罢工的有40多万人。在其他許多城市也举行了反对国务會議的群众大会和罢工。——(正文第197頁)

- 66 “鐘声”(«Die Glocke»)杂志由德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德国社会民主党黨員社会沙文主义者帕尔烏斯(海尔方德)于1915—1925年在慕尼黑(后在柏林)出版。——(正文第208頁)

- 67 临时联合政府是由克倫斯基、涅克拉索夫、阿夫克森齐也夫等人在1917年7月24日(8月6日)組成的。立宪民主党人、孟什維克、社会革命党人、“人民社会主义者”和靠近立宪民主党人的非党人士都参加了这个政府。新組成的政府为立宪民主党人所操縱。——(正文第211頁)

- 68 指 1917 年 7 月 8 日 (21 日) 临时政府的宣言。这个宣言包含了一系列最感性的诺言, 临时政府、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企图用这些诺言来安慰经历过七月事件的群众。临时政府一方面号召继续进行帝国主义战争, 一方面又答应在规定的日期——9 月 17 日 (30 日) 举行立宪会议的选举, 制定关于 8 小时工作制、社会保险等的立法草案。——(正文第 211 页)
- 69 “联络委员会”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把持的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在 1917 年 3 月 8 日 (21 日) 成立的, 目的是同临时政府取得联系, “影响”临时政府并“监督”它的活动。实际上“联络委员会”是在帮助临时政府实行资产阶级政策, 竭力阻挠工人群众为争取全部政权归苏维埃而进行的积极的革命斗争。参加“联络委员会”的有齐赫泽、斯切克洛夫、苏汗诺夫、菲里波夫斯基和斯柯别列夫 (后来又有切尔诺夫和策烈铁里)。1917 年 5 月“联络委员会”取消了, 因为那时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代表已经直接参加了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正文第 222 页)
- 70 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的问题发生于 1917 年 4 月。丹麦社会民主党人柏格别尔格来到彼得格勒, 代表丹麦、挪威、瑞典三国工人党的联合委员会邀请俄国各社会主义政党参加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 共同讨论缔结和约问题。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所把持的执行委员会和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 都先后决定参加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并担任会议的发起人。全俄布尔什维克第七次代表会议 (四月代表会议) 估计到社会沙文主义者一定会参加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 因而坚决反对参加这个会议, 并揭穿了这个会议的帝国主义性质。8 月 6 日 (19 日), 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讨论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问题时, 加米涅夫号召参加这次代表会议。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布尔什维克党团不同意加米涅夫的发言, 党中央委员会指斥了他的机会主义路线, 并决定在中央机关报上发表党对这个问题的看法。8 月 16 日 (29 日) 在“无产者报”上又刊载了列宁的一封信“论加米涅夫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上关于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的发言”。后来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没有开成。——(正文第 231 页)

71 列宁指的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决议揭穿了孟什维克同反革命资产阶级的联盟,号召一切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同孟什维克护国派断绝组织上的联系,团结在布尔什维克党的周围。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六次代表大会于1917年7月26日至8月3日(8月8日至16日)在彼得格勒举行。代表大会是秘密举行的。列宁通过自己的战友莫洛托夫、奥尔忠尼启泽、斯维尔德洛夫、斯大林在地下领导了代表大会。出席代表大会的有157个有表决权的代表和110个有发言权的代表,他们代表24万党员。

列入大会议程的有下面这些问题:(1)组织局的报告,(2)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的报告,(3)各地的工作总结报告,(4)当前形势:(甲)战争和国际形势,(乙)政治形势和经济状况,(5)修订党纲,(6)组织问题,(7)立宪会议的选举,(8)共产国际,(9)党的统一,(10)工会运动,(11)选举,(12)其他事项。此外,大会还讨论了列宁应不应当到法庭受审的问题。

代表大会讨论的基本问题是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和关于政治形势的报告。代表大会提出了准备武装起义推翻临时政府的口号和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口号。代表大会在决议中强调了列宁关于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结成联盟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最重要条件的原理。代表大会给托洛茨基分子以坚决的回击,因为他们反对党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方针,否定在西欧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以前社会主义在俄国有获得胜利的可能性。代表大会通过了布尔什维克党的经济纲领,批准了新的党章。在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反对列宁出席反革命临时政府法庭受审的决定。代表大会抗议资产阶级和警察迫害革命无产阶级领袖,并写信给列宁表示慰问。代表大会发表了党的宣言,号召工人、士兵、农民积蓄力量,准备在布尔什维克党的旗帜下同资产阶级进行决定性的搏斗。代表大会选出了由列宁、阿尔焦姆(谢尔盖也夫)、捷尔任斯基、斯维尔德洛夫、斯大林、邵武勉等同志组成的中央委员会。——(正文第238页)

72 “无产者报”(日报)是布尔什维克党的中央机关报,于1917年8月

13日(26日)至8月24日(9月6日)出版,以代替被临时政府封閉的“真理报”。該报共出了10号。——(正文第238頁)

73 列宁引用的是涅克拉索夫的詩“善良的詩人是幸福的”(見“涅克拉索夫著作書信全集”1948年俄文版第1卷第66頁)。——(正文第248頁)

74 “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是中派的党,成立于1917年4月。考茨基的組織“劳动友好社”是該党的主要組成部分。“独立党人”鼓吹同露骨的社会沙文主义者一致行动,衛护他們并为他們辯护,要求放弃階級斗争。

1920年10月在哈雷举行了独立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会上發生了分裂。党内大部分在1920年12月同德国共产党合并。右派分子单独成立了一个党,仍称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存在到1922年。——(正文第258頁)

75 “全俄农民代表苏維埃消息报”(日报)是农民代表苏維埃的正式机关报,1917年5月至12月在彼得格勒出版,代表社会革命党人右翼的觀點。——(正文第266頁)

76 列宁指的是恩格斯的“法德农民問題”(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1955年莫斯科中文版第2卷第433—437頁)。——(正文第272頁)

77 “工人日报”是布尔什維克党的中央机关报,于1917年8月25日(9月7日)至9月2日(15日)出版,以代替被临时政府封閉的“真理报”。該报共出了12号。——(正文第281頁)

78 孟什維克的“統一”代表大会于1917年8月19—26日(9月1—8日)在彼得格勒举行,召开这次代表大会的目的在于把各个孟什維克团体联合成一个統一的党。出席大会的有孟什維克护国派(普列汉諾夫分子和波特列索夫分子)、孟什維克“国际主义者”(馬尔托夫派)及“新生活报”的代表。大会表示信任临时政府,主张把帝国主义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在大会进行中,表现出与会者是極不团結的,因此統一的任务沒有实现。——(正文第283頁)

79 列宁指的是1907年6月3日(16日)的政变。六三政变就是大家都知道

- 的所謂“六三政制”的斯托雷平反动时期的开始。——(正文第 288 頁)
- 80 1917 年 5 月 27 日至 6 月 5 日(6 月 9—18 日)在彼得格勒选举区杜馬时,布尔什維克的票数約占总票数的 20%。1917 年 8 月 20 日(9 月 2 日)选举彼得格勒市杜馬时,布尔什維克的票数增加到 33%。——(正文第 290 頁)
- 81 “斯巴达克”杂志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莫斯科省委员会、莫斯科市委员会和(从第 2 期起)莫斯科专区委员会的杂志;它从 1917 年 5 月 20 日(6 月 2 日)出到 10 月 29 日(11 月 11 日)。——(正文第 293 頁)
- 82 列宁指的是彼得格勒苏維埃士兵委员会于 1917 年 8 月 25 日(9 月 7 日)通过的关于改选苏維埃問題的決議。委员会主张士兵有权从每个連队中选出苏維埃代表,工人却須要从 1 000 人中选 1 名代表。士兵委员会的決議违背了选举权利平等的原則,这样士兵代表的名額就有可能超过工人代表的名額。——(正文第 297 頁)
- 83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5 年俄文版第 15 卷第 224—230 頁。——(正文第 299 頁)
- 84 見“馬克思恩格斯書信选集”1953 年俄文版第 473 頁。——(正文第 299 頁)
- 85 在科尔尼洛夫叛乱被粉碎以后,改組临时政府的問題提出来了,孟什維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决定同立宪民主党人一起参加政府。政府危机因成立五人(克倫斯基、捷列申柯、維尔霍夫斯基、維尔杰列夫斯基和尼基廷)执政內閣而得到解决。虽然执政內閣中没有立宪民主党人的正式代表,但是执政內閣是在同他們达成幕后協議之后成立的。孟什維克和社会革命党人在 1917 年 9 月 2 日(15 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會議上通过決議支持执政內閣,从而帮助了地主和資本家掌握政权。——(正文第 304 頁)
- 86 “关于目前政治形勢的決議草案”是列宁起草的,准备提交中央委员会决定于 1917 年 9 月 3 日(16 日)召开的布尔什維克党中央全会討論。9 月 3 日召开了中央委员会的小型會議,但在会上沒有討論这个

草案。在这个时期保存下来的和已發表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的會議記錄里,也沒有关于責成中央全会討論这个草案的指示。——(正文第 306 頁)

- 87 全俄民主會議 是孟什維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于 1917 年 9 月 14 日至 22 日(9 月 27 日至 10 月 5 日)在彼得格勒召开的,會議的目的在于削弱日益增漲的革命高潮。参加會議的有各小資產階級政党、主张妥協的苏維埃、工会、地方自治局、工商界和部队的代表。

由于这次會議,就产生了預备国会(共和国临时議會),孟什維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想利用預备国会使国家离开苏維埃革命的道路而走上資產階級立宪的道路。布尔什維克党中央委员会决定抵制預备国会,只有要無產階級放弃准备武装起义的工作的投降分子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坚持参加預备国会。布尔什維克揭露了預备国会的叛卖活动,号召群众准备武装起义。——(正文第 317 頁)

- 88 “自由生活报”是孟什維克派的報紙,1917 年 9 月 2 日(15 日)至 8 日(21 日)在彼得格勒出版,以代替暂时被封閉的“新生活报”。——(正文第 341 頁)

- 89 指苏維埃轉到了布尔什維克手中:彼得格勒苏維埃在 1917 年 8 月 31 日(9 月 13 日),莫斯科苏維埃在 1917 年 9 月 5 日(18 日)轉到了布尔什維克手中。——(正文第 355 頁)

- 90 “俄罗斯語言报”(日报)是自由資產階級的報紙,1895 年在莫斯科出版,1917 年 11 月被查封。——(正文第 367 頁)

- 91 “国家与革命”一書是列宁 1917 年 8—9 月在秘密状态中写成的。列宁在 1916 年下半年就認為有必要从理論上探討国家問題。当时他写了一篇短評“青年国际”(見“列宁全集”第 4 版第 23 卷第 153—156 頁),在这篇短評里他批評了布哈林在国家問題上的反馬克思主义立場,并答应写一篇文章詳細地論述馬克思主义对国家問題的觀點。列宁在 1917 年 2 月 17 日(新历)給亞·米·柯倫泰的信中談到,他差不多已經把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問題的材料准备好了。这些材料是用很小的字体写在以“馬克思主义論国家”为标题的藍皮筆記本里的。筆記中的

材料有的摘自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有的摘自考茨基、潘涅庫克和伯恩施坦的著作并有列寧的評語、結論和概括。

“國家與革命”一書按原定計劃有7章，最後一章，即第七章“1905年和1917年俄國革命的經驗”列寧沒有寫，保存下來的只有這一章的詳細提綱（見“列寧文集”1933年俄文版第21卷第25—26頁）。關於出版這本書的問題，列寧在給出版者的信中寫道，如果他“實在來不及寫完第七章，或者這本書太厚，那末可以把前6章單獨出版，作為第一分冊……”。

在手稿的第1頁上，作者用的筆名是“弗·弗·伊萬諾夫斯基”。列寧預計用這個筆名可以出版這本書，不然就會被臨時政府沒收。但是這本書到1918年才出版，因此也就不需要再用筆名了。第2版是在1919年出的，列寧在第二章中加了“馬克思在1852年對問題的提法”一節。——（正文第371頁）

- 92 費邊社分子 是一部分英國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于1884年成立的改良主義的、極端機會主義的“費邊社”的成員。該社以古羅馬大將費邊·孔克達特（“緩進者”）命名。費邊素以緩進待機、迴避決戰著稱。用列寧的話說，費邊社“最完備地表達了機會主義和自由主義所採取的工人政策”。費邊社分子誘惑無產階級脫離階級鬥爭，鼓吹用改良辦法由資本主義和平地、逐步地過渡到社會主義。在帝國主義世界大戰期間（1914—1918年），費邊社分子採取了社會沙文主義的立場。關於費邊社分子的評定，可以看列寧的如下著作：“貝克爾、狄慈根、恩格斯、馬克思等給左爾格等的書信集”俄譯本序言（“論馬克思恩格斯和馬克思主義”1955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86頁）、“社會民主黨在俄國革命中的土地綱領”（“列寧全集”第4版第15卷第154頁）、“英國的和平主義和英國的不愛理論”（“列寧全集”第4版第21卷第234頁）等。——（正文第371頁）

- 93 見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1955年莫斯科中文版第2卷第316頁）。

在本卷第376、378—382頁上，列寧引用的也是恩格斯的這一著作（同上第317—320頁）。——（正文第374頁）

- 94 見恩格斯的“反杜林論”1948年俄文版第264—265頁(195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94—295頁)。

在本卷第386頁上,列寧引用的也是恩格斯的這一著作(同上1948年俄文版第172—173頁)。——(正文第383頁)

- 95 見馬克思的“哲學的貧困”1941年俄文版。——(正文第387頁)

- 96 見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1954年莫斯科中文版第1卷第8—41頁)。——(正文第387頁)

- 97 見馬克思的“哥達綱領批判”(“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1955年莫斯科中文版第2卷第11—47頁)。

哥達綱領是1875年在哥達舉行的愛森納赫派和拉薩爾派(當時這兩派都是德國獨立存在的社會主義政黨)聯合代表大會上通過的德國社會主義工黨綱領。這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機會主義綱領,因為愛森納赫派在一切重大問題上向拉薩爾派讓步,接受了拉薩爾派的意見。馬克思和恩格斯給予哥達綱領以殲滅性的批判。——(正文第387頁)

- 98 見馬克思的“哲學的貧困”1941年俄文版第148—149頁。——(正文第389頁)

- 99 見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產黨宣言”1948年俄文版第68、78頁(“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1954年莫斯科中文版第1卷第20、28頁)。——(正文第389頁)

- 100 見馬克思的“拿破侖第三政變記”(“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1954年莫斯科中文版第1卷第308—309頁)。

在本卷第396—397頁上,列寧引用了恩格斯為該書第3版寫的序言(同上第221—222頁)。——(正文第393頁)

- 101 “新時代”(«Die Neue Zeit»)雜誌是德國社會民主黨的雜誌,1885年至1923年在斯圖加特出版。1885—1895年“新時代”雜誌曾發表過恩格斯的幾篇文章。恩格斯經常向該雜誌編輯部提出意見,並因它背棄馬克思主義而給予尖銳的批評。從90年代後半期起,即在恩格斯逝世以後,該雜誌系統地刊載了修正主義者的文章。在帝國主義世界大

战期間(1914—1918年),該杂志采取了考茨基中派立場,支持社会沙文主义者。——(正文第398頁)

102 見“馬克思恩格斯書信选集”1953年俄文版第63頁。——(正文第398頁)

103 見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1948年俄文版第9頁(“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1954年莫斯科中文版第1卷第2頁)。——(正文第401頁)

104 見“馬克思恩格斯書信选集”1953年俄文版第263頁。——(正文第402頁)

105 見馬克思的“法兰西內战”(“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1954年莫斯科中文版第1卷第498—499頁)。

在本卷第408、408—409、414—418頁上,列宁引用的也是馬克思的这一著作(同上第501、498—500、499—501頁)。——(正文第406頁)

106 見恩格斯的“論住宅問題”(“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1954年莫斯科中文版第1卷第549—550頁)。

在本卷第420—421、421頁上,列宁引用的也是恩格斯的这一著作(同上第605、589頁)。——(正文第420頁)

107 列宁指的是馬克思的“政治上的漠不关心”一文和恩格斯的“論权威”一文(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5年俄文版第15卷第88—95頁和第134—137頁)。

在本卷第422、423、424—425頁上,列宁引用的也是这两篇文章(同上第88—91、136、136—137頁)。——(正文第422頁)

108 見“馬克思恩格斯書信选集”1947年俄文版第296頁。——(正文第427頁)

109 爱尔福特綱領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于1891年10月在爱尔福特召开的代表大会上通过的,用来代替1875年的哥达綱領。恩格斯在“对1891年社会民主党綱領草案的批判”(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6年俄文版第16卷第2部第101—116頁)一文中批判了爱尔福特綱領的錯誤。

在本卷第 429—435 頁上，列寧引用的也是恩格斯的這篇文章（同上第 105—111 頁）。——（正文第 429 頁）

- 110 指恩格斯為馬克思的“法蘭西內戰”一書所寫的序言（見“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1954 年莫斯科中文版第 1 卷第 452—464 頁）。

在本卷第 436、437、437—440 頁上，列寧引用的也是恩格斯的這篇序言（同上第 454、458、462—464 頁）。——（正文第 436 頁）

- 111 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6 年俄文版第 16 卷第 2 部第 386—387 頁。——（正文第 441 頁）

- 112 見馬克思的“哥達綱領批判”（“馬克思恩格斯文選”（兩卷集）1955 年莫斯科中文版第 2 卷第 30—31 頁）。

在本卷第 446、451、452—454 頁上，列寧引用的也是馬克思的這篇文章（同上第 31、21—23 頁）。——（正文第 445 頁）

- 113 第一國際海牙會議於 1872 年 9 月 2—7 日（新曆）舉行。馬克思和恩格斯出席了這次代表大會。參加大會的有 65 名代表。列入議程的問題有：（1）關於總委員會的權利；（2）關於無產階級的政治活動等。代表大會的全部工作是在同巴枯寧派作尖銳的鬥爭中進行的。大會通過了關於擴大總委員會權利的決議。代表大會就“無產階級的政治活動”問題所通過的決議中說道：無產階級應當組織自己的政黨以保證社會革命的勝利，無產階級的偉大任務就是奪取政權。在這次代表大會上，巴枯寧和吉約姆被開除出國際，因為他們是破壞者和新的反無產階級政黨的組織者。——（正文第 462 頁）

- 114 “曙光”雜誌是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政治刊物；由“火星報”編輯部於 1901—1902 年在斯圖加特出版，共出了 4 期（3 冊）。在“曙光”雜誌上刊載了列寧的下列文章：“時評”、“地方自治局的迫害者和自由主義的漢尼拔”、“土地問題和‘對馬克思的批評’”一書的前 4 章（標題為“土地問題的‘批評家’先生們”）、“國內評論”和“俄國社會民主黨的土地綱領”。——（正文第 463 頁）

- 115 指 1900 年 9 月 23—27 日（新曆）在巴黎舉行的第二國際第五次國際社會主義者代表大會。參加大會的有 791 名代表。俄國代表團由 23 人

- 組成。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這一根本問題上，代表大會以多數票通過了考茨基提議的列寧稱之為“對機會主義者採取調和態度的”決議。除了其他決議以外，代表大會還決定設立社會主義國際局，由各國社會主義政黨的代表組成，並設書記處於布魯塞爾。——（正文第 464 頁）
- 116 “社會主義月刊”（«Sozialistische Monatshefte»）是德國社會民主黨機會主義者的主要機關刊物，國際機會主義的機關刊物之一；在帝國主義世界大戰期間（1914—1918 年），它採取了社會沙文主義立場。該月刊從 1897 年到 1933 年在柏林出版。——（正文第 477 頁）
- 117 英國獨立工黨（Independent Labour Party）於 1893 年成立。該黨的首領是詹姆斯·凱爾-哈第、拉·麥克唐納等。獨立工黨自命在政治上不依賴資產階級政黨，實際上是“不依賴社會主義，而依賴自由主義”（列寧）。在帝國主義世界大戰期間（1914—1918 年）獨立工黨最初發表宣言反對戰爭（1914 年 8 月 13 日〔新曆〕）。之後，在 1915 年 2 月協約國社會主義者倫敦代表會議上，獨立黨人同意代表會議通過的社會沙文主義的決議。從那時起，獨立黨首領以和平主義的詞句打掩護，採取了社會沙文主義立場。1919 年共產國際成立後，在左派黨員群眾的壓力下，獨立工黨的首領通過了退出第二國際的決議。1921 年獨立黨人參加了所謂第二半國際，在第二半國際瓦解後，他們重新加入了第二國際。1921 年，英國獨立工黨的左翼脫離該黨，加入了英國共產黨。——（正文第 477 頁）
-

列宁生平事業年表

(1917年6—9月)

1917

- 6月3—24日(6月16日—7月7日)** 列宁参加全俄工兵代表苏維埃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工作。
- 6月4日(17日)** 列宁在全俄工兵代表苏維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發表关于对临时政府的态度演說。
列宁的論文“經濟破坏和無产階級同它的斗争”和“資本家的第一千零一次的謊話”在“真理报”第73号發表。
- 6月6日(19日)** 列宁的論文“六三派頑固分子主张立即进攻”、“为制止革命而結成的联盟”和“感激之至”在“真理报”第74号發表。
列宁参加党中央委员会的扩大會議并提議組織工人和士兵的和平游行示威。斯大林支持列宁的提議。
- 6月7日(20日)** 列宁的論文“有沒有通向公正的和平的道路?”、“論人民公敌”和“短評”在“真理报”第75号發表。
- 6月8日(21日)** 列宁的論文“‘大撤退’”、“就本質論战的益处”、“輕信的流行病”和“天上的仙鶴不如手中的家雀”在“真理报”第76号發表。
- 6月9日(22日)** 列宁的論文“实行社会主义还是揭露盜窃国庫的行为?”在“真理报”第77号發表。

- 列宁在全俄工兵代表苏維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發表关于战争的演說。
- 6月10日(23日)黎明前** 列宁参加全俄苏維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布尔什維克党团會議，后又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會議。根据列宁的提議，中央委员会決定取消預定在6月10日(23日)举行的游行示威。
- 列宁在深夜为“真理报”准备材料，并根据中央委员会关于取消游行示威的決定草拟指令。
- 6月11日(24日)** 列宁的論文“思想混乱和惊惶失措的人們”、“暗示”、“扰乱人心的謠言”和“謎”在“真理报”第79号發表。
- 列宁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及布尔什維克党团委员会就禁止游行示威向全俄苏維埃代表大会提出的声明草案”。
- 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委员会會議上作关于取消游行示威的發言。
- 6月13日(26日)** 列宁的論文“轉变前夕”和“給編輯部的信”在“真理报”第80号發表。
- 6月14日(27日)** 列宁的論文“俄国革命的对外政策”和“矛盾的立場”在“真理报”第81号發表。
- 6月15日(28日)** 列宁的論文“乌克兰”在“真理报”第82号發表。
- 6月16日(29日)** 列宁的論文“什么是現在和‘将来’卡維涅克分子产生的階級根源？”在“真理报”第83号發表。
- 6月16—23日(6月29日—7月6日)** 列宁主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前綫和后方軍隊党組織全国代表會議的工作，并被选入主席团。
- 6月17日(30日)** 列宁写信給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斯德哥尔摩国外局。

- 列宁的論文“怎样同反革命作斗争”、“乌克兰問題和俄国执政党的失敗”、“惩办包庇奸細的罗将柯和鐘柯夫斯基!”和“莫名其妙的歪曲”在“真理报”第 84 号發表。
- 6月18日(7月1日)** 列宁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非正式會議,总结 6 月 18 日(7 月 1 日)的游行示威。
- 列宁的論文“执政的和負責的党”和“又是一个委员会”在“真理报”第 85 号發表。
- 6月20日(7月3日)** 列宁的論文“六月十八日”在“真理报”第 86 号發表。
- 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前綫和后方军队党組織全国代表會議上做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
- 列宁在全俄苏維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員。
- 6月20日和23日(7月3日和6日)之間** 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前綫和后方军队党組織全国代表會議上做关于土地問題的报告。
- 6月21日(7月4日)** 列宁的論文“革命、进攻和我們的党”、“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維克先生們,你們同普列汉諾夫的区别究竟在哪里?”和“罗将柯怎样为自己辯护”在“真理报”第 87 号發表。
- 6月22日(7月5日)** 列宁的論文“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維克把革命引导到哪里去?”在“真理报”第 88 号發表。
- 6月24日(7月7日)** 列宁的論文“用‘雅各宾主义’能够吓倒工人階級嗎?”和“論建立俄国农业工人工会的必要性”(第一篇文章)在“真理报”第 90 号發表。
- 6月25日(7月8日)** 列宁的論文“論建立俄国农业工人工会的必要性”(第二篇文章)和“松懈的革命”在“真理报”第 91 号發表。
- 6月27日(7月10日)** 列宁的論文“階級变动”和“革命毅力的奇迹”在“真理报”第 92 号發表。

- 6月29日(7月12日)** 列宁的論文“空話与事实”和“資本家先生們是怎样把利潤隱藏起来的(关于監督的問題)”在“真理报”第94号發表。
- 6月29日—7月4日(7月12—17日)** 列宁因病在姆斯塔米亚克車站附近的內沃尔村(芬兰)休养。
- 6月30日(7月13日)** 列宁的論文“危机日益逼近,破坏日益严重”和“怎么办?”在“真理报”第95号發表。
- 7月1日(14日)** 列宁的論文“他們是怎样欺騙和为什么要欺騙农民的?”和“誰的責任?”在“真理报”第96号發表。
- 7月3日(16日)** 列宁写“立宪民主党人退出內閣是指望什么?”一文。
- 不迟于7月4日(17日)** 列宁写“全部政权归苏維埃!”一文。該文在7月18日(5日)“真理报”第99号發表。
- 7月4日(17日)** 列宁在克舍辛斯卡姬宮的陽台上向示威群众講話。
- 7月5日(18日)黎明前** 列宁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會議,會議通过关于停止七月游行示威的公告。
- 7月5日(18日)** 列宁迁往秘密住所。
- 列宁写“政权在哪里?反革命在哪里?”、“黑帮报纸和阿列克辛斯基的卑鄙誹謗”、“誹謗和事实”、“接近了本質”和“是不是新的德雷福斯案件?”等文。这些論文在7月19日(6日)“‘真理报’专頁”上發表。
- 7月6日(19日)** 列宁为七月事件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小型會議。
- 列宁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委员会执行委员会會議,會議在列諾工厂(現名列宁格勒“紅十月”国家工厂)的警衛室內举行。
- 列宁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委员会执行委员会通告”。

- 7月6—7日(19—20日) 列宁写“德雷福斯案件重演”一文。
- 7月6—11日(19—24日) 列宁避居在工人謝·雅·阿利路也夫家里。
- 7月7日(20日) 临时政府下令逮捕列宁。
- 列宁写“辟謠”和“三次危机”两篇文章。
- 列宁写信給全俄工兵代表苏維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局,抗議搜查他的住所。
- 7月8日(21日) 列宁写“关于布尔什維克領袖出庭受审的問題”一文。
- 7月10日(23日) 列宁写“政治形勢”一文。該文在8月2日(7月20日)“無产階級事業报”第6号發表。
- 7月11日(24日) 列宁給“新生活报”編輯部的信在“新生活报”第71号發表。
- 7月12日(25日)黎明前 列宁到达拉茲里夫車站附近的一个村庄。过了几天,列宁搬到拉茲里夫湖畔的草棚里。
- 7月15日(28日) 列宁的論文“立宪民主党人退出內閣是指望什么?”和“給‘無产階級事業报’編輯部的信”在“無产階級事業报”第2号發表。
- 7月中旬 列宁写“論口号”一文。該文在1917年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喀琅施塔得委员会印成单行本。
- 7月19日(8月1日) 列宁的論文“感謝李沃夫公爵”在“無产階級事業报”第5号發表。
- 列宁的論文“三次危机”在“女工”杂志第7期發表。
- 7月26日(8月8日) 列宁写“論立宪幻想”一文。
- 7月26日和27日(8月8日和9日) 列宁的論文“答复”在“工人和士兵报”第3号和第4号發表。

- 7月26日—8月3日
(8月8—16日)** 列宁在地下领导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六次代表大会。大会选举列宁为名誉主席并写信向他致敬。
- 7月29日(8月11日)** 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第六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列宁的论文“拿破侖主义的开始”在“工人和士兵报”第6号发表。
- 7月底** 列宁写“革命的教训”一文。该文在9月12日和13日(8月30日和31日)“工人报”第8号和第9号发表。
列宁在拉兹里夫两次会见斯大林。
- 8月3日(16日)** 列宁在第六次党代表大会上被推选为立宪会议代表候选人。
- 8月4日和5日(17日和18日)** 列宁的论文“论立宪幻想”在“工人和士兵报”第11号和第12号发表。
- 8月16日(29日)** 列宁的信“论加米涅夫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上关于斯德哥尔摩代表会议的发言”在“无产者报”第3号发表。
- 8月17—25日(8月30日—9月7日)** 列宁写信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国外局。
- 8月18—19日(8月31日—9月1日)** 列宁写“关于阴谋的谣言”一文。
- 8月19日(9月1日)** 列宁的论文“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在“无产者报”第6号发表。
- 8月21日和22日(9月3日和4日)** 列宁由拉兹里夫到皇族车站,以司爐身分坐机车从这里秘密越过芬兰边境。
- 8月22日—9月17日
(9月4—30日)** 列宁避居芬兰帖里奥基车站附近的雅尔卡拉村,后又避居离赫尔辛福斯130公里的拉赫齐城以及赫尔辛福斯。
- 8月24日(9月6日)** 列宁的论文“政治讹诈”在“无产者报”第10号发表。

- 8月26日(9月8日) 列宁的論文“紙上的決議”和“論斯德哥尔摩代表會議”在“工人報”第2号發表。
- 8月29日(9月11日) 列宁的論文“政論家札記(农民和工人)”在“工人報”第6号發表。
- 8月30日(9月12日) 列宁的論文“論誹謗者”在“工人報”第8号發表。
列宁写“給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員會的信”。
- 8—9月 列宁写“国家与革命(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說与無产階級在革命中的任务)”一書。
- 9月1日(14日) 列宁的論文“政論家札記”在“工人報”第10号發表。
- 9月上半月 列宁写“党綱問題”、“齐美尔瓦尔得問題”和“关于在群众組織中违反民主的現象”等信。
- 9月1—3日(14—16日) 列宁写“論妥协”一文。該文在9月19日(6日)“工人之路報”第3号發表。
- 不迟于9月3日(16日) 列宁写“关于目前政治形势的決議草案”。
- 9月6日(19日) 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員會會議上被推选为民主會議代表候选人。
- 9月10—14日(23—27日) 列宁写“大难临头,出路何在?”小册子。
- 9月11日(24日) 列宁由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維埃选为民主會議代表。
- 9月14日(27日) 列宁的論文“革命的一个根本問題”在“工人之路報”第10号發表。
- 9月15日(28日) 列宁的論文“怎样保証立宪會議的成功(关于出版自由)”在“工人之路報”第11号發表。

譯 后 記

編入本卷的列宁的著作共 88 篇，其中 14 篇过去已有中文譯文。有几篇文章的譯文很早就在我国出現，并有过几种譯文。如“国家与革命”一文的第一章第一、二节的譯文(衛生譯)就在 1921 年 5 月 7 日的“共产党”杂志第 4 期上發表过。1929 年又有上海中外研究学会出版的全文譯文。1932 年有莫斯科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列宁选集”第 12 卷(封面作：“世界全史”)的譯文。1939 年解放社出版的“馬克思恩格斯与馬克思主义”一書(許之楨編，柯柏年、吳黎平等譯)上有該文第五章第二节的譯文。1947 年有莫斯科外国文書籍出版局出版的单行本的譯文(蒼木譯校)。

“轉变前夕”、“六月十八日”、“論口号”、“給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信”、“論妥協”、“政論家札記(农民和工人)” 6 篇文章的譯文在 1930 年出版的“二月革命至十月革命”一書(华兴書店，陈文达譯)中就發表过。其中前 5 篇文章还有 1942 年解放社出版的“列宁选集”第 11 卷上册(吳亮平譯，张仲实校)的譯文。“政論家札記(农民和工人)”一文还有 1945 年解放社出版的“列宁选集”第 11 卷下册(何錫麟譯，张仲实校)的譯文和 1956 年莫斯科外国文書籍出版局出版的“論工农联盟”一書中的譯文。

“論建立俄国农業工人工会的必要性”、“他們是怎样欺騙和为什么要欺騙农民的?”、“論立宪幻想”、“論斯德哥尔摩代表會議” 4

篇文章有1942年解放社出版的“列宁选集”第11卷的譯文。

在莫斯科外国文書籍出版局出版的“列宁文选(两卷集)”(唯真、李明、蒼木共同譯校)第二卷中有譯文的有5篇文章:“全俄工兵苏維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一部分)、“論口号”、“革命的教訓”、“大难临头,出路何在?”、“国家与革命”。

为了“列宁全集”譯文風格和人名、地名、術語譯法的統一,我們將已有譯文重新翻譯了;在譯校过程中我們参考了前人的譯文。“国家与革命”、“論口号”和“大难临头,出路何在?”3篇文章的譯文并分別由原譯者唯真同志和蒼木同志看过。

参加本卷譯校工作的有高叔眉、傅子荣、余征、刘功勋、张国銓、宋鴻訓、袁延恒、鞠惠芬等同志;为本卷修辭的是王誠可同志;全書由孙岷同志做了最后校定。

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編譯局
